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ZHUMING ZHONGNIAN YUYANXUEJIA ZIXUANJI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江蓝生

卷



B1262242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江蓝生卷 江蓝生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36-2861-6

I. 著... II. 江...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江蓝生—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052 号

责任编辑: 万贞纯 装帧设计: 包云鸠 马 芳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1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551) 2651321 邮编: 230061

缘 起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五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1. 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 年龄在 45~60 岁之间, 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 适当兼顾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根据上述条件, 经过反复酝酿、讨论, 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 分别寄呈各位学术指导, 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最后, 根据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的推荐意见, 编辑组按得票数排出了被推荐人的名次。其中前十位被推荐者是: 江蓝生、马庆株、沈家煊、唐钰明、项楚、潘悟云、李家浩、游汝杰、张振兴、邵敬敏。

这套《自选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 首先要感谢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对本丛书编辑工作所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体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对中年语言学家的热情扶植和对汉语语言学事业的挚爱。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选集》作者之一江蓝生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江先生从选题的策划论证、编辑体例的确定直到稿件的审读都给编辑组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事实上, 在本丛书编辑工作之初, 江先生是以主编的身份参加编辑组的具体工作的, 只是后来得知自己被学术指导推荐为《自选集》作者之一时, 才再三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编辑组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尊重江先生的意愿。

我们也应该感谢《自选集》的诸位作者, 他们愿意把自己学术成果的精华交给我们编辑出版, 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

我们缺少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的经验, 错误和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编辑组

2001 年 12 月

作者简介

江蓝生,女,1943年11月生,湖北省沔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1962~196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1978~1981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攻读近代汉语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江蓝生的学术专长为近代汉语语法与词汇,在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版了许多学术论著、工具书与译著(详见后附论著目录)。在词汇研究方面,她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对近代汉语白话词语进行考释;主持并编写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探讨词义演变规律与词语考释方法。目前她正与语言研究所白维国研究员共同主持编写一部《近代汉语词典》。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她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虚词源流与语法化问题,二是语言接触问题。她撰写的专题语法论文材料扎实,论证比较严谨,不仅善于发现问题,细致、准确地描写语言事实,而且还着力对这些语言事实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她一方面学习和继承吕叔湘先生把语音、语义、语法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的路子,另一方面又具有把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与现代活的方言材料相结合的个人风格。她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多次应邀到国外讲学,获得好评。她的专题研究成果较好地解决了一些汉语史研究中的难题,推动了汉语词汇史和汉语语法史的研究。

目 录

说“麼”与“们”同源	(1)
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	(23)
处所词的领格标记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 ...	(45)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	(65)
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	(75)
《老乞大》语序研究	(96)
后置词“行”考辨	(119)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	(139)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	(155)
《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	(172)
《燕子赋》(乙)校释拾零	(181)
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	(189)
重读《刘知远诸宫调》	(200)
北京话单音词书证	(222)
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232)
古代白话说略	(244)

作者论著目录	(279)
跋	(283)

说“麽”与“们”同源

本文讨论的是疑问代词“甚麽”的“麽”(包括样态指示词“这/那麽”的“麽”)和复数词尾“们”的来源。“麽”字早先也用来标写是非问语气词(今作“吗”),其来源一说是唐五代时期用在疑问句句尾的“无”(“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刘十九》诗),疑问语气词“麽”(吗)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一 “甚麽”的“麽”

1.1 关于“甚麽”的来源,中外学者考证者很多,^① 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仍有分歧。为减少读者翻检之劳,现综合各家(也包括笔者)意见,把跟本文论题有关的内容、特别是意见大体一致的扼要介绍于下;为便于理解,酌情举一些例子。

(一)“甚麽”的前身是“是物”,“是物”的“物”跟六朝疑问代词“何物”的“物”有语源关系。

何物:北方~可贵?(世说·言语)|陆逊、陆抗是卿~?(同上,

^① 如章炳麟《新方言》、唐钺《国故新探》卷二、吉川幸次郎《说甚麽》(《中国语学》2)、周法高《中国语法札记》(《史语所集刊》24)、太田辰夫《甚麽考》、志村良治《甚麽の成立》、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张惠英《释什么》、黄丁华《闽南方言里的疑问代词》、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

方正)|语卿道~?(同上,贤媛)|~鬼担去?(异苑,6)|~老姬,生宁馨儿!(晋书·王衍传)

前两例“何物”一指物,一指人,“物”还有实义,后两例已虚化。“物”又作“勿”,表明其义已虚化。

何勿:等道,犹今言~语也。(后汉书·祢衡传,李贤注)|君是~人,在此妨贤路。(敦煌本,启颜录)

是物:未审别驾疑~?(神会,石井本)|见无物唤作~?(神会,伯3047)

(二)“是物”又作“是勿”、“是没”,最早见于8世纪中叶的敦煌文献。“是物”连读音变为“甚”或“甚物”、“甚没”,见于9世纪的文献。

是勿:未审别驾疑~?(神会,伯3047)|空更有~在?(同上,石井本)|~儿得人怜?(因话录,4)

是没:~是因?~是缘?(大乘无生方便门,斯2503)|是~?(神会,石井本)|空便有~物?(神会,伯3047)

甚:于身有~好处?(燕子赋,伯2491)|~处传书觅?(鹊踏枝,伯4017)

甚物:若不是夜地,眼目不睹,为~人入里许?(启颜录·吃人,太平广记,卷248引)

甚没:三藏曰:“问我作~?”(宝林传,6)|是~人?……作~来?(李陵变文)

(三)“甚”[-m]字又作“什”[-p],可能由于当时(9世纪)某些方言中,当[-p]位于鼻音之前时音变为[-m](如汉藏对音材料中“十二”、“十五”的“十”用[ɕim]标注);此外“甚”的常用义为程度副词“很”,感到用它兼表疑问不太合适,于是就选用笔画少的“什”来代替。

什没:前生为~不修行?(阿弥陀经讲经文,斯6551)

拾没:不知而问曰~。(《集韵》上声果韵母果切“没”字注)

(四)“甚物”、“甚没”以及“什没”的下字又作“谟、摩、麼”。“什摩”和“什麼”分别见于 10 世纪中叶和后半叶(即:(是)物 * mjuət > 没莫勃切 muət > 没母果切摩莫婆切 mua)。

甚谟:毕竟唤作~物(三宝问答,斯 2669)

什摩:贵姓~?(祖,4)

甚摩:~处来?(祖,20)

什麼:在~处?(灯录,8)

甚麼:~处人?(灯录,8)

(五)从“是物”与“是没”并存、“甚物”与“甚没”并见,可以判定敦煌写本中出现的单音节疑问代词“没”(以及加上词头“阿”的“阿没”)就是“物”的音变形式。另外,敦煌文献中与“没”并存的单音节疑问代词“莽”(以及加上词头“阿”的“阿莽”)是“没”的异读形式。敦煌文献所见唐五代西北方音“谟”、“唐”同为 o 韵,则“莽”正读 mo,音如“谟”。《藏汉对照词语》残卷斯 2736 号 102 条为:ʔa: mo: tɕhe: ra,^①可释读为“阿莽处了”。“莽”有模朗、莫补二切,二切敦煌皆音 mo。(参看罗常培 1933、郑张尚芳 1992)侯精一、杨平(1993)记载:山西方言宕江摄字“忙”文读为[maŋ],白读为[muə](介休)、[mɔ](平遥)、[mɻ](太原)、[muo](孟县),因此,无论从唐五代敦煌文献还是现代山西方言都可以推测,“莽”就是跟“没”语音相近的白读音。“没”、“莽”单用作疑问代词表明,现在河北、山东、湖北、湖南乃至广东、福建等地的单音节疑问代词(包括带子尾、儿尾、个尾的,写作“吗、麼、乜”等)的语源可以追溯到敦煌文献

① 敦煌写本《藏汉对照词语》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编号 S. 2736 和 S. 1000。1948 年英国学者托马斯(F. W. Thomas)和翟理斯(L. Giles)合撰《一种藏汉语手卷》一文,文中用拉丁文转写藏文,并对汉语词语进行了解读。60 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又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和订误,并利用残卷进行藏语史和汉语史的研究。

里的“没”，再往上追，就是“何物”、“是物”的“物”。

表一

北 京	济 南	长 沙	梅 县	潮 州
ma 吗	mər 么(儿)	mo tsɿ 么(子)	mak ke 乜(个)	mi? kai 乜(个)

没：金刚经道～语？（神会，石井本及伯 3047）| 问：“离念是～？”答：“离念是不动。”（大乘五方便，伯 2270）| 缘～横罗鸟灾？（燕子赋，伯 2653）

阿没：于身有～好处？（同上，伯 2653；“阿没”，伯 2491 作“甚”，伯 3666、斯 214 两卷作“阿莽”）| 天下祇知有杜荀鹤，～处知有张五十郎！（唐摭言，卷 12）

莽：今受困厄天地窄，更向何边投～人？（变文集·捉季布传文；庚卷“莽”作“甚”）

阿莽：但知捶胸拍臆，发头忆想～。 （燕子赋，伯 2653）| 如今及～次第，五下乃是调子。（同上，伯 2653）

（六）参照太田辰夫（1988）的论考，现在把“甚麽”的来源归纳为下表：

表二

词 形			出现时代
是物(是勿、是没)	没(阿没)莽(阿莽)		8 世纪前半叶
甚			9 世纪
甚物(甚没)		什没	9 世纪
甚摩		什摩	10 世纪中叶
甚麽		什麼	10 世纪后半叶

1.2 “甚麽”源自“是物”，方言中单用的疑问代词“吗、麽、乜”等的语源是“物”，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分歧和不明点在于如何解

释“是物”的“是”和“物”。太田辰夫(1988)说“是”本为指示代词,唐时又有“凡”义,表示任指,“是物”即任何之物。他从汉语的疑问代词一般也转用于任指(什么→任什么)推测:“或许因此而相反地从任指的‘是’而产生了疑问的意思?”太田先生的推测有两点障碍:其一,从任指到疑问这种逆向引申有无实际旁证?其二,从“没”单用作疑问代词来看,“是物”、“是没”跟“是何”、“是谁”应是同样的结构,“是”字不表任指。志村良治(1984)主张“是物”的“是”跟疑问代词“底”同出一源,由指示词而转为疑问词。但这无法解释无论古代还是唐代的文献中并未见“是”单用作疑问代词的例子。吕叔湘(1985)认为,“是物”是“是何物”的省缩,“是”用来加强疑问语气,如同“是何”(“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世说·贤媛》)“是谁”(“是谁教汝?”《北齐书·王晞》)以及后世的“是什麼”(师出问:“是什麼堂堂密密?”《灯录》卷一八)一样。“是何物”的例子如:“是何物人?敢向我厅边觅虱?”(敦煌本《启颜录·昏忘》)“不是妖鼓之声,是何物声?”(《变文集·叶净能诗》)“何物”用在“是”字后而做表语的机会很多,再加上汉语有避免用疑问指代词做主语的倾向,就在它的前而加上“是”字,使它成为表语,这就促使“是何物”固定词组化,为减省音节,就说成了“是物”,犹如“作何物”减省为“作物(摩、麼)”一样。我们认为吕先生的解释平实有据,比较可信。不过,“是物”也有可能就是“是”跟“物”的结合,由于疑问代词“何物”的长期使用,使原本是构词语素的“物”沾染上了疑问词义,起初它不太能单独使用表示疑问,要跟“是”结合使用,后来才渐次获得独立性,可以单独作疑问代词(没,莽),但在句首时仍不能单用,要取“是物”(是没)的形式。这样看来,“是物”的“是”最初是带有系词性的。

1.3 接下来是如何解释“是物”的“物”的问题。一般都把这个“物”看做器物之“物”,笔者把它释作“等类、色样”,认为“何物”义

同“何等”、“何种”，由此才引申作疑问代词“什么”讲的。现略加说明。

(一)物，色也，类也。王国维《释物》依卜辞考“物”本义为杂色牛(《观堂集林》卷六)，后转指毛色，如《周礼·春官·鸡人》“辨其物”郑注：“毛色也。”又泛指“色样、种类”，如《周礼·春官·保章氏》：“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郑注：“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知水旱所下之国。”又《地官·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牺牲。”孙诒让正义：“物犹种类也……凡牲畜，区别毛色，各为种类，通谓之物。”《左传·昭公九年》“事有其物”杜注：“物，类也。”又《左传·桓公六年》：“丁卯，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杜注：“物，类也。谓同日。”《左传》的例子表明，“物”已由指牛畜的毛色种类进而泛指人事的类别。

(二)物，万物也。王国维《释物》又云：“物本杂色牛之名，……由杂色牛之名，因以名万有不齐之庶物。”上举《周礼·春官·保章氏》孙诒让正义说：“凡物各有形色，故天之云色，地之土色，牲之毛色，通谓之物。”可以看出，“物”从指万物的形色种类引申而指形形色色的万有之物。《玉篇·牛部》：“物，亡屈切，凡生天地之间皆谓物也。事也，类也。”此注反映了六朝时期“物”的两项主要意义。

我们认为，疑问代词“何物”的“物”不取义于万物之“物”，而是“等类、色样”之义，这从“何等”的意义和用法可以得到证明。先秦的疑问代词书面上只用单个汉字表示，如“何、曷、胡、奚、恶、安、焉”等，汉代始见“何等”作疑问代词用，有些例子“等”还保存实义，有的则已虚化，“何等”跟“何”完全相当。“何等”可以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如：处家～最乐？(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所谓尸解者，～也？(论衡·道虚)|或问温室中树皆～木？(汉纪·成帝纪三)|欲作～？(百喻经，上)此外“何等”还可以作状语，相当于“怎

么”：陛下在，妾又～可言？（史记·三王世家）|受将军任，在此备贼，～委去也？（三国志·吴志·董袭传）“何等”做定语，还可以表示不满或鄙视，如：“逆贼曹操，～明公！”（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裴注引《献帝春秋》）这跟“何物老嫗，生宁馨儿”用法相同。可以看出，除了做状语外，以上各种用法“何物”全都具备。“何物”是六朝时期跟“何等”并用的疑问代词，其意义、用法基本相同，“何物”的“物”应跟“何等”的“等”为同义词，即为“等类，色样”之义。

表三

何～	单用	是～	甚～	作～
何等 何物	等，底 没	是底 是物	甚底 甚物	作底 作物(生)

汉语的同义词往往沿着类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发现虚化了的“等”和“物”也具备这一特点。“底”是“等”的音变形式，唐人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六：“问曰：‘俗谓何物为底，底义何训？’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旧，今人不详其本，乃作底字，非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七也说：“浙东西语‘何’为‘底’，乃‘等’之转，‘等’乃‘何等’之急省。”颜师古上举文说：“等字本音都在反，转音丁儿反。”“丁儿反”相当齐韵，跟“底”（荠韵）只是声调不相同。

下面把表三里的有关词语（上文未及者）举例于下，以供对照。

（1）“等”、“底”作疑问代词：死公，云等道！（后汉书·祢衡传，唐李贤注：“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应璩，百一诗）|郎唤依底为？（晋诗·秋歌，“底为”，为何，干什么）|月没星不亮，持底明依绪？（乐府诗集·读曲歌）

（2）“是底”与“是物”义同，相当于“什么”：摘荷空摘叶，是底采莲人！（张祜，读曲歌）|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色（索）我将

来,道我是底!(变文集·趺跏书)

(3)“甚底”与“甚物”相当,出现较晚,“底”类似词尾:不知持守甚底?(朱语,8)|家私间事,关公甚底!(鸡肋编,卷上)|将为儿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警世通言·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4)“作底”与“作物(生)”义同,相当于“怎么”,用于询问方式、原因等:不知杨六逢寒食,作底欢娱过此辰?(白居易,寒食日寄杨东川诗)

作物(生):异没时作物?(神会,石井本;比较敦煌本《启颜录》“阿兄在里作何物在?”可见“作物”为“作何物”之省)|作摩不传?(祖,11.226)|教老僧作麼生说!(灯录,8)

以上各形式两两对立,“何物”的“物”跟“何等”的“等”意义相同,这一点是连接疑问代词和复数词尾的意义枢纽,是解释“麼”、“们”同源的语义依据。(详见2.2)

1.4 “这/那麽”的“麼”与“甚麽”的“麼”同源。

“这/那麽”指示样态、方式,出现较迟,元曲里的例子大概是最早的。唐宋时期跟“这麼”相当的有“只没、只摩、祇麼”等,跟“那麽”相当的有“任摩、恁麼”等,此外还有“异没、熠没、与摩、溜麼”等,^①都是同一词语的异写形式。以下各举一例:

今言“只没道”,为有“若为道”;若无“若为”,“只没”亦不存。(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僧曰:“学人不重朝廷贵,不可条然只摩休。(祖,3.8)|莫祇麼论主论贼……论说闲话过日(临济录,499a)|任摩去时如何(祖,8.169)|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灯录,17.5)|异没时作勿生(神会,石井本)|到与摩时整理脚手不得(祖,14.275)|更作熠没检校,斩煞令军(变文集·李陵变文)|和尚溜麼道却得(雪峰语录,上)

^① 详见梅祖麟(1983)、志村良治(1984)《指示副词“恁麼”考》。

由于汉语近指、远指没有严格的区分,上举各词到底指近指远有时须据语境判断。上举样态指示词的下字按时代先后依次为:没、摩、麼,跟疑问代词“甚麼”的下字出现次序完全一致(见“表四”),这也有助于说明它们的同源关系。“这/那麽”就是“这/那样”、“这/那般”的意思,“麼”为“样、般”义,跟“物”的“色样”义相合。“这物”的例子没有见到,但是有跟“此等”相当的“此物”的例子:“官岂少此物辈耶!”(《太平御览》卷八一七引魏文帝诏)这个例子很宝贵,它不仅说明“此物”的“物”跟“此等”的“等”同义,而且也暗示出样态指示词的下字“没、摩、麼”也源自“物”(只要把“此物”的“此”换成“这”)

跟“没”单用可以做疑问代词相对应,“没”(以及“麼”)也可以单独做样态指示词。例如:

慈亲到没艰辛地,魂魄于时早已消,(变文集·大目连变;没,如此、这般也)|秣华自古不得久,况是倚春春已空。更被夜来风雨恶,满阶狼籍没多红。(陆龟蒙,和袭美题蔷薇诗)|万水千山还麼去,悠哉,酒面黄花欲醉谁!(黄庭坚,南乡子词)

表四

疑问代词	是物	是没	没	甚摩	甚麼	麼
样态指示词	此物	只没	没	只摩	祇麼	麼

这种用字与功能的对应性也说明疑问代词“麼”跟样态指示词的“麼”同出一源。

二 复数词尾“们”

2.1 关于“们”的来源,吕叔湘先生很早就做过系统的论考。

1940年在《释您、俺、咱、咱、附论们字》^①一文中,他考察了“们”字的历史;1949年根据这篇文章改写而成的《说们》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对“们”的语源作了推测。现把吕先生的主要观点加以归纳,介绍于下。

(一)“们”字始见于宋代,唐代文献里出现的“我弭”的“弭”、“儿郎伟”的“伟”跟“们”大概有语源上的关系。

(二)在宋代文献里,标写复数词尾的有“懣、满、瞞、門、們”等字,这些字应同表一音。“懣”本音“闷”(去声),俗音“門”(平声)(见宋·楼钥《攻媿集》卷七二),故后来用平声的“瞞”(《集韵》有漠奔切一读)代替;更后写作“門”,最后加入旁(下文用简化字“门”“们”)。

(三)元代文献大多数用“每”字,少数用“们”字;明初仍多用“每”,明朝中叶以后“们”字才多起来,但《金瓶梅词话》里仍用“每”字。

表五

唐五代	宋	金元	明	清
弭、弥、伟	懣、满、瞞、 懣、門、們	每	每、們	們

(四)“每”和“们”属于不同的方言系统,“弭、伟、每”都是同一语词在个别方言及个别时代的不同形式。宋元时代北方系方言用“每”,南方系方言用“们”;元代北方系官话成为标准语,“每”字通行起来,但南方系官话始终说“们”;元代以后北方系官话也不说“每”而说“们”。

^① 该文原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卷二期,后收于商务印书馆(1984)《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此文后改写成《说们》和《说代词词尾家》两篇,收在科学出版社(1955)《汉语语法论文集》中,再后,这两篇内容经压缩,作为《近代汉语指代词》的第二章。

(五)“们”和“辈”可能有语源上的关系。在用法上“辈”与“们”吻合。在语音上,“辈”与“们、每、弭”声母都是双唇音,虽有塞音和鼻音之别,但在谐声字和方言里不乏通转的例子;中古音里“每”、“辈”同韵,“们”、“辈”虽不同韵,但上古音里文部与微部原是同类,也有通转的痕迹。

前四点是吕先生对历史文献中反映的语言事实所作的准确描写和概括,第五点是对“们”的语源的推测。“们”和“辈”之间是否有语源关系,吕先生虽倾向于有,但态度十分谨慎,表示“不能肯定”。笔者虽然不同意这一推测,但本文立论的基础却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吕先生所提供的语言事实。

2.2 在历史上,“侪、等、辈、曹、属”这些表示类别的词都可以用在人称代词或名词的后面表示某一类人,如:吾侪(左传·成公二年)|使曹(同上,昭公一二年)|彼等(史记·黥布传)|公等(同上,平原君虞卿传)|我属(同上,项羽本纪)|我曹(汉书·外戚传)|我辈(世说·德行)|门生辈(同上,方正)。从“公等”、“彼等”表示某一类人的复数,以及“何等”、“等”用作疑问代词这一事实出发,根据同义词类同引申的规律,我们推测:既然“何物”与“没”(＜物)同样用作疑问代词,那么跟“何等”的“等”意义相同的“物”(类也)原则上也应该可以用在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之后,表示某一类人,进而虚化为复数词尾。“物”跟上述类别的词的区别在子先秦两汉时期它主要指事物的类别,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古代没有“吾物”、“彼物”那样的用法。但是,“物”既然也是表示类别的词,而且在魏晋南北朝“物”又普遍用于泛指众人或总指一切人,它也就具备了跟“等”一样用在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之后表示某一类人、或进一步虚化为复数词尾的条件。关于“物”指人,吕叔湘(1990)举了三十八个例子,如: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世说·方正)|各得其所,物无异义。(颜氏家训·慕贤)|楷性宽厚,与物无忤。(晋书·裴秀传)

|(帝)见度身形黑状,谓师伯曰:“真健物也。”(南齐书·焦度传)

2.3 对复数词尾音变的解释

2.3.1 唐宋以来文献中出现的复数词尾可根据有无鼻音韵尾-n分为两类(本节例皆引自吕叔湘 1958)。

(一) 不带鼻音韵尾的:弭、弥、伟、每

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退来(因话录、唐语林引此作“弥”) | 措大伟(嘉话录) | 儿郎伟(司空表圣文集·障车文) | 浪儿每(董西厢) | 官员每(元代白话碑) | 你每(刘仲景遇恩录) | 我每(正统临戎录)

(二) 带-n尾的:懣(满)、瞒(懣)、们(们)

孩儿懣(默记) | 他懣(清波杂志) | 他满(克斋词) | 贤瞒(乐府雅词) | 你瞒我瞒(齐东野语) | 官嫖们(二程语录) | 他们(龟山语录) | 大人们(甲寅通和) | 你们(中兴战功录) | 郎君们(燕云奉使录) | 他们(朱子语类)

2.3.2 这一节解释语源“物”与唐代文献中“我弭”的“弭”之间的音变关系。

“物”是微母字[mv-],古无轻重唇之分,微母原从明母分化,唐五代西北方音明、微尚无分别,可知唐代多数方言里微母字仍读如明母[m-](现代南方方言且不说,就连北方话陕西延川方言中仍有把古微母字读[m-]声母的,如晚[mæ]);隋唐时期北方话里产生了[i]介音,“物”的中古音可构拟为[*mjuæt],在它虚化为复数词尾的过程中随之发生了音韵弱化,[*mjuæt]弱化脱落韵尾,读音就跟“弭”、“弥”相近了(《广韵》弭,绵婢切,高本汉拟为*mjwiē;弥,武移切,高氏拟为*mjiē;今二字均音mi,也是弱化脱ě所致),我们知道,做词尾的语素是很容易发生脱尾现象的。从“物”到“弭”的音变过程可推测为:*mjuæt→mjuə→mjə→mje→mi。“物”与“弭”的音变关系可以从现代闽、粤语方言中窥见一斑。以下是

“什么”一词在某些方言的读音：^①

表六

厦 门	潮 州	阳 江	海 口
sim mĩ?	mi? kai	mi	mi
甚物	乜个	□	物

海口话“什么东西”说[mi+ mi+](物物)或[mi+ mi+ si+](物物事),疑问代词和名词同为[mi]音,最能说明疑问代词[mi+]的语源是“物”,由此也可判定阳江话[mi]的语源也是“物”。厦门话和潮州话还保持入声,但读音跟“弭”接近;阳江话和海南岛话“物”的读音跟“弭”相同。“物”在现代某些方言里的读音可从语音上支持复数词尾“弭”跟疑问代词“麼”(＜物)同源的假设。

“儿郎伟”的“伟”是个云母字,楼钥《攻媿集》云:“或以为唯诺之唯,或以为奇伟之伟。”(卷七二),吕先生(1984)29页注①云:“可见二字当时音读已同,……大致已读如今日之 uei,或更唇化为 vei(如今西安音),v-既多为 m-所蜕变,则此 vei 字原来可能为 mei。”这个推测是很有道理的(笔者“文革”期间在广州串联时曾听到“伟大”的“伟”有人读 mei)。因此,唐时“儿郎伟”的“伟”很有可能跟金元文献中始见的“每”读音相近。由“弭、弥”音变为“每”比较好解释,方言中多有把“眉”读如[mi],“杯”读如[pi]的(如山西闻喜方言);北京话“昧”字一读 mèi(昧良心),一读 mi(把钱昧了);“糜”字一读 méi(糜子),一读 mí(糜烂)。“弭、弥”与“伟、每”之别反映的是同源语素在北方某些方言中的不同音变,是一种叠置式音变的现象。

2.3.3 那么,复数词尾中带 - n 韵尾的一组(以下简称“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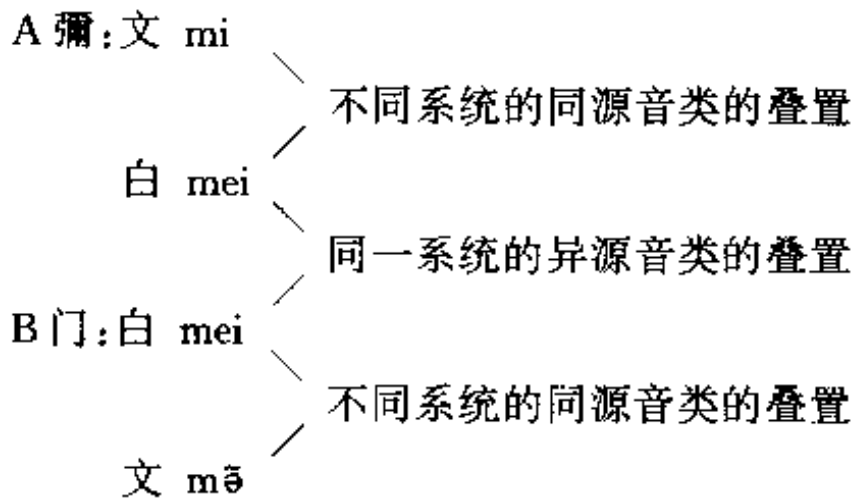
① 厦门话据周长楫(1993),海口话据我所吴可颖告知,郑张尚芳记音。其余两地据《汉语方言词汇》。

组)跟开音节的一组(以下简称“每”组)在语音上是什么关系呢?用传统音韵学、训诂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阴阳对转。上古文部和微部是同类,《周礼·冢宰》假“匪”为“分”,《易林》以“悲”协“门”(见吕叔湘 1984 第 30 页注①)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可用来说明“每”组与“门”组的音转关系。现代方言是含有历史语言面貌的活化石,我们可以借助于方言材料,从语言共时平面的差异中认识其历时的演变。据钱曾怡(1993)知道,山东博山方言里帮组字中存在着 A、B 两种文读与白读的对应,现整理为下表:

表七

A	彌、嬖	謎	筆	披	B	門出~	悶氣	本	忿	們
文	miɿ	miɿ	piɿ	p'iɿ	文	mǝɿ	mǝɿ	pǝɿ	fǝɿ	mǝɿ
白	meiɿ	meiɿ	peiɿ	p'eiɿ	白	meiɿ	meiɿ	peiɿ	feiɿ	meiɿ

“嬖”是母亲的义称,只有白读音,跟只有文读音的“彌”互补,可视为一组文白异读。“们”字博山方言有两读,“他们”、“这/那人们”读[mǝɿ],在“娘娘们们 ㄟ”(男人行动似女性)一语中读[meiɿɿ]。文白异读现象反映的是不同系统(姊妹方言)的同源音类通过横向扩散而形成的叠置音变现象。A、B 两组的白读音虽然相同,其来源却不同,以“彌”和“门”为例,两组的关系是:



复数词尾“弭、彌”与“每、伟”的关系跟 A 组相似,是同源语素在不同方言的变体。从博山方言可以推知,“彌、每”的读音因跟“门”的白读音相同而合流,处于跟“门”的文读音相对立的位置,最后“门”的文读音在竞争中排挤、取代了它的白读音,从而确立了“门(们)”的地位。博山方言告诉我们, A、B 两组的白读音相同是复数词尾“弭、彌”从 A 组跳到 B 组的桥梁,是完成由“弭、彌”到“门”的叠置式音变的媒介。^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复数词尾“弭、彌”是其语源“物”脱尾音变的结果;“每、伟”是“弭、彌”的方言变体;而“门”组字不是从“物”纵向音变而来的,它是通过其白读音[mei]跟“每”读音相同而充当复数词尾标记的,最后又以其文读音[men]取代了白读音[mei]的。

2.4 这一节我们将举出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里的一些事实,说明疑问代词“麼”(包括样态指示词“麼”)跟复数词尾“们”或有音转关系,或用字相同,以进一步论证二者同源的假说。

2.4.1 疑问代词与复数词尾用字音通例

(一)“没忽”音转为“们浑”

“没忽”为唐五代俗语词,义为肥胖貌,鼓满貌。如王梵志诗:“到大肥没忽,直似饱糠豚”。敦煌写卷伯 2717《字宝碎金》:“肥颧颧,音末曷。”《太平广记》卷二三四《御厨》引《卢氏杂说》有“浑羊歿忽”一语。以上“没忽、颧颧、歿忽”都是同一词语的异写形式。《集韵》去声恨韵:们,莫困切,“们浑,肥满貌。”“没”字唐五代文献中用来标写疑问代词和样态指示词,“们”字宋代用以标写复数词尾,从“没忽”到“们浑”,说明“没”与“们”之间有塞尾对鼻尾的音转关系。

^① 梅祖麟(1986)认为从“弭、伟、每”到“麼、门、们”是受契丹语影响所致,们字是个双料货的词尾,-n 属于阿尔泰语,mai 每的部分属于汉语,都表示复数。我们认为,既然汉语本身的历史和现状能够说明从“每”组到“门”组的变化,就不必用异族语言的影响来解释。

(二)今甘肃宁夏方言疑问词“阿门”[a- mən-]问性状方式,相当于“怎么”,如:我们走兰州,阿门走呢?(见谢小安等,1990)临夏方言的“阿门”跟敦煌变文里的“阿没”、“阿莽”当为同一词语,这也说明“没”与“们”有音转关系。

(三)2.3.2已指出阳江话、海口话的疑问代词音 mi,语源为“物”,mi与唐代复数词尾“弭”的今音一致。

2.4.2 样态指示词与复数词尾标记音同例

(四)文献中“门/们”做样态指示词标记:半钩新月浸牙床,犹记东华那门相(陈允平,南歌·茉莉;张相云:“那门犹云那般,如今云那么光景也。”)心绪浇油,足趂趂家前后,身倒偃门左右(绯衣梦,二折;张相云:“言足忽前忽后如趂趂般,身忽左忽右如倒偃般。”)这们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儿滴滴地(清平·李翠莲)这们,使我迎伙伴去(老乞大)那们时便消了(朴通事)我有那们大功夫和他走(红楼梦 26回,程乙本)这们闹起来(儿女英雄传 29回,亚东本)俾能这们高兴(老残游记 17回,亚东本)

博山方言有“大老闷”一词(ta- lo- mō-形容很大),“闷”与“门”音近,用如样态指示词,这说明文献中样态指示词写作“门”或“们”是反映实际读音的。

(五)“每”用作样态指示词明代有例:“也先说:‘这每便好也。’”(正统临戎录)“每”,金、元及明初用作复数词尾,此处作样态指示词下字。

(六)大同方言“我们”的“们”和“这么个”的“么”读音相同,都读[mɔ?](跟否定词“没”[mɔ?]同音,见马文忠 1986),也可支持“麼”、“们”同源的假设。

上述材料说明了疑问代词(以及样态指示词)跟复数词尾之间存在着音转或音同的关系,联系上文谈到的“物”的“等类、色样”义,“何物”与“此物”与“此等”的对应关系等,我们相信这两个语法

成分同出一源,都是由表示类别的实词“物”虚化而来的。

三 实词“物”语法化的特点

(一)实词“物”朝着不同的方向虚化为疑问代词“麼”和复数词尾“们”两个不同的语法成分(这证明了不同的语法成分可以从同一个实词歧变而来的语法化歧变原则),其语法化的原因和途径是不同的。从实词“物”虚化为复数词尾主要是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即意义为“等类、色样”的“物”用在名词、代词之后,表示某一类人(跟“侪、等、辈、曹、属”一样),进而虚化为复数词尾。据冯春田(1991)考察,在《二程语录》和《朱子语类》中,“们”虽已用作复数词尾,但早期的“们”仍具有“辈、等、曹”一类的语义色彩,如:内臣宫嫔们(二程,264页)|东坡、子由们(朱,92页)|老苏们(朱,1392页)|周、程、张、邵们(朱,2632页)。与此并存的有“~辈”、“~等”,如:胥吏辈(朱,2651页)|东坡、陈少南辈(朱,193~194页);再如:公们(朱,197页)|公辈(朱,2776页)|公等(朱,2086页)|某们(朱,2571页)|某等(朱,3152页)。以上事实很能说明(1)“们”的语义来源是跟“等、辈”同义的类别词;(2)“~们”跟“~辈”并存使用,说明“们”不是源自“辈”。从原则上讲“侪、等、辈、曹、属”都有条件虚化为复数词尾,但在实际上绝大多数方言选择了“们”(〈物〉),南方一些方言选择了“等”,呈现“~们”与“~底”并存的局面(如同何物~何等、是物~是底、作物~作底并存一样)。广州话“我哋、你哋”的“哋[tei](《汉语方言词汇》),梅县话“偈丁人、你丁人”的“丁[ten](黄雪贞1994)应是“等”的音变。(试比较唐五代西北方言“等”字藏文对音为tiŋ)此外,西安话里“我们”[mẽ·]和“我的”[ti·]并用(《汉语方言词汇》),是“~物”、“~等”在同一方言里并存的反映(样态指示词下字一般选择“么”(〈物〉),但也有选择

“底”(<等)的,如黄山汤口徽语“这么、那么、怎么”分别说作“尔底[n³ ti]、那底[na⁵ ti]、何底[xe² ti]”。

从名词“物”虚化为疑问代词不能用词义引申说来解释,而是由词义沾染和类化等语用因素引起。即“何物”受“何等”的类化而用作疑问代词,由于“何物”的惯用,使“物”沾染上“何”的词义,从而可单独做疑问代词用(不过已音变为“没”);而这一过程很可能又受到“何等”的“等”早已单独作疑问代词用的影响。

(二)“物”字虚化为语法成分以后,还多少保存着原来实词的一些特点。如“甚麽”、“怎麽”的“麽”可以看做词尾,但“这/那麽”的“麽”还保存着“样、般”的意义,而这正是实词“物”存留“等类、色样”义的反映;复数词尾“们”可以用在单数指人专有名词之后,仍是指某一类人的意思(如:杜勒斯们)。我们从这些残存的意义和特殊的用法受到启发,从而做出合乎情理的推测。

(三)实词“物”词义虚化进入语法范畴时,随之发生了音韵上的种种变化,各种异写形式就是这种音变的反映。一方面由于方言的分歧,音变形式纷繁多样;另一方而由于作者或手民随音记字,不一定跟实际读音完全吻合,这都给后人追溯语源带来困难。但是不管怎么纷乱,总有线索可寻。拿现代方言中跟“甚麽”相当的词的读音来看,韵母有舒声、入声之别,主要元音有[a ə o i]之分,但声母都相同(参看 1.1“表一”)。^① 语音形式的变化是把原来的实词跟语法化了的成分加以区别的手段;同出一源的“麽”和“们”沿着不同的途径发生音变,也起到把两个不同的语法成分加以区别的作用。因此,在考求虚词的语源时,一方面要把这些不同的标记只作为语音标记来对待,不能望文生义;另一方面,某些语法成分的最早用字可能跟语源有意义上的关系,要特别予以注意,

^① 福州话“甚物”[sim bɿʔ],“物”音变为b-声母,仍是双唇音(见林宝卿 1992)。

“何物”、“是物”、“作物(生)”的“物”就属于这一类。

由于语法成分的汉字标记一般只记音,因而在早期往往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很不固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筛选淘汰,逐渐趋于统一。淘汰的原则是:1. 避免常用字,如采用常用字,往往增加偏旁以示区别;2. 避免难写字。如果既常用、笔画又繁多(如“满、慊”),十之八九会被淘汰。疑问代词选择“麼”(不常用),复数词尾选择“们”(常用字“门”加入旁),就是上述原则起作用的结果。

(四)实词“物”语法化后,引起汉语语法体系的变化。疑问代词“甚麼”确立后,在口语中替代了此前最为通用的“何”,形成了新的疑问代词系统:

是物→甚/甚麼 (体词性) 作物→怎/怎麼 (谓词性)

此外还形成了新的样态指示词系统:

只没(祇麼)~怎麼 這麼~那麼

复数词尾“们”出现以后,汉语的指人复数表达健全起来,逐渐形成严整的系统:

我们 你们 他们 自家们(合音词:俺 您 您 咱们)

四 余 论

疑问代词和复数词尾是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它们怎么会同出一源呢?如果不对它们的历史做深入的考察,如果不把它们放到本系统中跟其他成员联系起来考察,而且如果没有现代方言资料做参证,是得不出上述结论的。本文在以上几个方面大大借助了吕叔湘先生、太田辰夫先生以及方言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考证语源,意义、用法、语音三方面都要考虑到,这里想特别说一下对音变的解释。当我们说B的语源是A时,一般要从音理上说明A为什么会变化为B的。但是语言演变的机制除了“变化”外,还有

“选择”，在几种共存的形式中通过竞争选择某一种形式（详见徐通锵 1991 第 404 页）。过去我们只注重“变化”，而忽略了“选择”，一味用连续式音变去强作解释。本文受徐通锵先生叠置式变异理论的启发，用文白异读的“竞争”来解释“们”的来源，解释得是否恰当是一回事，在语言演变的研究中，应该同时考虑变化与竞争两种途径却是不应忽略的。

参考文献：

-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说们.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北京：学林出版社，1985
- 吕叔湘. 未晚斋语文漫谈（一三）. 中国语文. 1990, (1)
- 太田辰夫. 中国语史通考. 日本白帝社，1988
- 太田辰夫. 汉语史通考（上书中译本，江蓝生、白维国译）. 重庆出版社，1991
- 志村良治.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 日本三冬社，1984
- 罗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言. 史语所单刊甲种三十二，1933
-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梅祖麟. 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𦵏”（举）字. 中国语文. 1983, (1)
- 梅祖麟. 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 中国语文. 1986, (6)
- 郑张尚芳. 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 语言研究. 1983, (2)
- 郑张尚芳. 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 民族语文. 1992, (4)
- 张 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 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 黄丁华.闽南方言里的疑问代词.中国语文.1963,(4)
- 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 张惠英.释什么.中国语文.1982,(4)
- 钱曾怡.博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 张 崇.延川县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
- 马文忠、梁述中.大同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
- 侯精一、杨平.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93,(1)
- 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方言.1994,(4)
- 林宝卿.漳州方言词汇(三).方言.1992,(4)
- 谢小安、张淑敏.甘肃临夏方言的疑问句.中国语文.1990,(6)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研究室.汉语方言词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

附记

拙文《说“麼”与“们”同源》(《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后意犹未尽,现补记于下。

1. 唐代以来的文献中复数词尾曾写作“弭、弥、伟、每”。据陕西榆林地区电大黑维强同志告知,今陕西吴堡县复数词尾读如“每”。佳县复数词尾读如“弭”。另据侯精一、温端政(1993)知道,山西多数方言点“每”读[mei](略去调值),但汾阳、和顺、闻喜等地读[mi]。这些现象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文献中复数词尾用字的方言依据。

2. 拙文把博山方言“门”[mē][mei]异韵的现象看作文白异读。这种现象自古就有,上古文微二部不分(如借“匪”作“分”,以“悲”协“门”)即是其例。现在要补充的材料是,晋南运城片六个点也有同类现象。侯、温(1993)33页指出这些地区“煤、门”的韵母读音相同,都是[ei]。另外,潘家懿(1988)《临汾方言志》61页有下表

河东话	北京话	例 子
ei	ei ən	悲 培 配 煤 非 肥 匪 费 奔 盆 喷 门 分 坟 粉 奋

从河东话的[ei]分属于北京话的[ei]和[ən]来看,这种对应关系所反映的也是文白异韵的差异。

3. 敦煌写本《燕子赋》中疑问代词有“阿莽”一词(“发头忆想阿莽”),“阿”为词头,“莽”犹“甚麽”的“麽”。另有“者莽”一词(原卷“如今会遭夜莽亦推”,“夜”,它卷作“者”),“者莽”犹“这麽”。同一作品中疑问代词与样态指示词同用“莽”字,也可证“这/那麽”的“麽”与“甚麽”的“麽”同源。

4. 拙文发表后收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惠寄的小川环树先生《代名词偕們的沿革》的大作复印件,不胜感荷。小川氏大作原载《支那学》第九卷第四号,初稿写于1938年,改订于次年,可能是系统考察“们”字历史的最早一篇论文了。

(原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

虚词“来”在近代汉语里的功能十分繁多,粗略一算,就有以下数种。(1)表示时间、处所乃至人和事物的范围;(2)表示在……时间之后(如陈后主《有所思》:当由分别久,梦来还自疑);(3)表示概数(如《祖堂集》“二百来人”);(4)做时间词词尾(如小来、古来、今来、昨来、向来、先来);(5)做副词词尾(都来、倒大来);(6)做状态助词,犹“……般”“……样”(李曾伯《水调歌头》:境圆明,冰样洁,水来清);(7)做衬词(《隔江斗智》三折:与他那结义的人儿这几日离多来会少)……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在以上几种功能之外“来”做结构助词的用法。这种用法起始很早,至今仍保存在吴方言里。上溯其源头,追踪其发展道路,可以更有把握地认识现今吴语里的助词“来”和“得来”。

吴语里有一种特殊的助词“来”[lɛ¹³]和“得来”[tə²⁵ lɛ¹³],《汉语方言概要》把“来”看做“得来”的简化形式,把它们称为后附的程度副词,并指出它们附加在动词后面往往还需要一个补语。例如:“时髦得来”(时髦得什么似的),“性急得来”,“晒来”(晒得慌),“牵记得来”,“极得来要死要活”(极,性急,急迫),“说得来八面玲珑”(99页)。但是,如果从汉语史的角度观察的话,以上提法中还有一些可商榷的问题。具体是:

(一)“来”是不是“得来”的简化形式?换言之,是先有“得来”后有“来”,还是相反?

(二)这种用法的“得来”和“来”性质是什么?是后附的程度副词,还是助词?

(三)在用法上,后面带补语的跟不带补语的是一种什么关系?即哪一种用法为常式,哪一种用法为变式?本文拟从语法史的角度,以近代汉语文献和现代方言为依据,就以上几方面谈谈看法,并试着说明“来”和“得来”用作助词的原因。

一 现代汉语方言里的助词“来”和“得来”

1.1 吴语

吴语里除了通用的助词“得”之外,又用“来”和“得来”。当然,这是从整体上说的,具体到每一个方言点,情况会有不同。有的地方“来”和“得来”并用,有的地方只有其中之一,总的说,“得来”比“来”使用得更为普遍。

1.1.1 来 吴语里的助词“来”放在形容词或动词的后边,有带补语和不带补语两种用法。我们把带补语的称作A式,把不带补语的称作B式(“得来”亦然)。

A式:动/形·来·补语

“来”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连接表示结果、程度或状态的补语,相当于结构助词“得”。下面是清代吴语小说《何典》里的例子:

(1) 天壳海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沸浑。(何典·序)

(2) 他的母亲刘娘娘,也生来细腰长颈,甚是标致。(又2回)

下面两例转引自《上海市区方言志》:

(3) 我做来勿好,请侬原谅。(465页)

(4) 拎勿清,花头经透来勿得了。(同上)

B式:形/动·来

“来”放在形容词或某些动词的后面,表示程度深或行为动作之强烈。下面转引《简明吴语词典》124页的两组简例:

- (5) 远_来 | 冷_来 | 白_来
想_来 | 望_来 | 哭_来

“远来”即很远,远得很;“哭来”即哭得很厉害。B式里的形容词或动词一般是单音节的,而且能进入B式的动词很有限,大多是跟心理、情感活动有关的动词,而A式里的动词没有这种限制。上举《简明吴语词典》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伊吃来好来”(意为:他吃得可好呢),其中前一个“来”出现于A式,“好来”是“吃来”的补语;后一个“来”出现于B式,它后面不带补语。

1.1.2 得来

A式:动/形·得来·补语

“得来”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引出表示结果、程度或状态的补语,相当于结构助词“得”。

- (6) 勳说得_来怕人势势。(海上花列传,13回;勳,不要)

- (7) 冻苏秦耸背巡街,冻得_来一方市户千家闭。(缀白裘,卷2,烂柯山·逼休〔滚绣球〕)

- (8) 忙得_来性命交关 | 乱得_来像狗窠 | 吓得_来勿敢响 | 重得_来吓煞人(上海市区方言志,465页)

从例句可知,“得来”后面的补语可以是短语(如例6和例8的后三句),也可是小句(如例7和例8的第一句)。

B式:动/形·得来

“得来”加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程度之深或行为动作之强烈。例如:

- (9) 呵唷,啊唷,我吓得_来!(海上花列传,5回)

- (10) 陈老爷客气得_来!(又,28回)

(11)重得来! | 热得来! | 做得来! | 笑得来! (上海市区方言志, 465 页)

1.1.3 比较 1.1.1 和 1.1.2 两节可以知道, 吴语里的助词“来”和“得来”的用法和意义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仅是, B 式“动·来”的动词有一定的限制, 而“动·得来”里的动词则不大受限制)。A 式里的“来”和“得来”相当于结构助词“得”, 而 B 式里的“来”和“得来”跟“得”不相当。虽然“远来”“远得来”的意思是远得很, “想来”“想得来”的意思是想得很, 但不能因此把“来”和“得来”跟程度副词“很”相对应。因为, “来、得来”本身并不表示程度之深, 只有当它们进入 B 式之中, 这个结构式才具有表示程度深的意义。它们跟“远煞、想煞”的“煞”性质不同, “煞”是后附的程度副词(当然它也可用在形容词或某些动词之前, 如煞远, 煞想), 而“来、得来”只是助词性质的。^①

1.2 四川方言

在现代汉语诸方言中, 就管见所及, 除了吴语, 四川方言里也使用助词“来”和“得来”, 这从四川籍作家郭沫若和沙汀早期的作品里可以看到(香坂顺一氏首先注意到这一情况)。郭老是四川乐山县人, 他的作品里只见用“得来”, 而未见用“来”:

(12)他是乐得养尊处优, 胖得来, 实在连走路都很艰难了。(棠棣之花第三幕,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6.219,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1986, 下同)

(13)你们假如知道韩国人为什么穷得来只能够吃点豆饭藿羹, ……那你们就……(又, 第五幕, 6.266)

(14)因为这两天没有得到静养, 痛得来已经不能行动了。

^① 关于上海话里的“来”和“得来”, 曾向上海华东师大邵敬敏同志请教。除文中已述外, 又云: A 式的“来”, 除老年人及上海郊区人外, 现市区中青年都已念“勒”; B 式的“来”有被 B 式的“得来”取代的趋势。

(楚霸王自杀,又,10.198)

例(12)“胖得来”后面用逗号断开,表明语气上的停顿,实际上此例仍是A式。

沙汀是四川安县人,他的作品里“来”和“得来”并用。例如:

(15)眼睛都睡来像毛桃子了。(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短篇小说选,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下同)

(16)他是乡约的内弟,细眉细眼,鼻梁瘦来和刀背一样。(丁跛公,又,17页)

(17)而那个平日只会用侦查眼光看他的脚色,也忽然变来爱讲话了。(老烟的故事,又,139页)

(18)简直瘦得来只剩一张皮了。(兽道,又,57页)

(19)全城的医生弄得来束手无策。(防空,又,74页)

(20)突出的颧骨红得来像鹤顶一样。(呼嚎,又,174页)

上面诸例中,“来”或“得来”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词全是单音节的,这跟吴语的情况很相近。间或也有双音节的,如:

(21)快乐和害羞得来像一个新郎一样。(丁跛公,又16页)

但这句话的书面语味道太浓了。此外,上举诸例中只见A式,未见B式,这是跟吴语不同的。

郭老和沙汀年青时都在上海居住过多年,不知他们作品里出现的“来”或“得来”是不是受吴语影响的结果。经向四川籍同志调查,知四川有不少地方现在仍用“得来”,如梓潼、江油、眉山、自贡、涪陵、内江、犍为等地;但兼说“得来”和“来”的地方比较少,如犍为、自贡等地。无论是“得来”还是“来”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年轻

人用得少,老年人用得较多。^① 因此,郭老和沙汀作品里的“得来”和“来”,可以看做彼时四川方言的特色。

1.3 北京话

北京话里结构助词用“得”,不用“得来”,更不用“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在清代用北京话写成的小说《儿女英雄传》里,偶或也有“得来”的用例:

(22)这场恶斗,斗得来十分好看!(6回)

(23)讲得来满口生烟,杀得来浑身是汗。(8回)

(24)那琵琶弹得来十分圆熟清脆。(18回)

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一种可能是,《儿女英雄传》里的“得来”是受了南方旧白话小说特别是平话的影响,用三音节的“V得来”比用二音节的“V得”更带有渲染、夸张的语气,因而被作者借用过来。还有一种可能,作为北京话前身的某些北方话里早就使用结构助词“得来”,只是到近现代才不用的(这一点将在溯源部分介绍),因而《儿女英雄传》里“得来”,有可能是对历史上北方话旧词语的沿用。当然也可能以上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二 溯 源

2.1 来

2.1.1 唐五代文献里的结构助词“来”

跟结构助词“得”大体相当的“来”,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五代,唐诗和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这类用例。

(25)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姚合,腊日猎,

^① 关于四川方言里使用“得来”和“来”的情况,蒙川大中文系博士生朱庆之同志代为调查。

全唐诗, 502. 5712)

(26)瘦马寒来死, 羸童饿得痴。(又寄王度居士, 又, 497. 5634)

(27)清泉洗得洁, 翠霭侵来绿。(皮日休, 樵担, 又, 611. 7048)

(28)山容洗得如烟瘦, 地脉流来似乳肥。(又, 奉和鲁望春雨即事次韵, 又, 613. 7073)

(29)移得萧骚从远寺, 洗来疏净见前峰。(郑谷, 竹, 又, 675. 7738)

(30)铁碓碓来身粉碎, 铁叉叉得血汪汪。(大目连变文, 敦煌变文集, 757 页)

(31)男女病来声喘喘, 父娘啼得泪汪汪。(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又, 836 页)

以上各例上下句相对仗, “来”与“得”互文对举, 都引出了结果补语, 可知“来”用如结构助词“得”。再看以下几例, “来”虽不跟“得”对出, 但据上下文意可以判定它们也用如结构助词:

(32)锦背苍鹰初出按, 五花骢马喂来肥。(李贺, 排遍第一, 全唐诗, 27. 381)

(33)养来鹦鹉嘴初红, 宜在朱楼绣户中。(刘禹锡, 和乐天鹦鹉, 又, 360. 4061)

(34)越梳初盛蜀茗新, 薄烟轻处搅来匀。(施肩吾, 蜀茗词, 又, 494. 5603)

(35)夫主谎来身已倒, 官人侍婢一时扶。(丑女缘起, 敦煌变文集, 793 页)

(36)大拟妻夫展脚睡, 冻来直[似]野鸡盘。(不知名变文, 又, 815 页。“似”原缺, 今臆补)

“大拟”即“待拟”, “大”为“待”的同音借字, 变文及后来的元杂剧里

习见。此句意为：夫妻二人拟伸腿睡觉，无奈天寒无被冻得如野鸡缩成一团。

从上面所举唐诗和变文里的例子可以知道，至迟在中晚唐时期，“来”就已经有了作结构助词的用法。唐五代以后，在宋金词里还偶尔能看到作为结构助词的“来^①”，例如：

(37)揽镜沉吟，瘦来须有差别。(方千里，满路花，全宋词，第四册，2501页)

(38)好个一江春水，深来不似情深。(元好问，朝中措，元好问诗词集，705页)

2.1.2 诸宫调里的助词“来”

金代用北方话写成的《刘知远诸宫调》(下简称“刘知远”)和《董解元西厢》(下简称“董西厢”)里仍可见“来”作结构助词的用例，但为数不多。例如：

(39)知远惊来魂魄俱离壳，前来扯定告娇娥。(刘知远第十一[黄钟宫·出队子]；试比较《董西厢》卷2[道宫·解红]“说得魂离壳”)

(40)飞虎说来痴，群贼倒枪旗。退却乱军，免却生离，都是哥哥虎威。(董西厢，卷4[越调·青山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董西厢》里“来”又在一种新的格式里作助词，即在动词和“来”中间加上受事宾语，后面再带补语。例如：

(41)只被你拖逗人来一星星都碎撻百裂。(卷4[第八])
这种用法在两种诸宫调里虽仅一见，但此句在曲词里共重复了三遍，应无讹误。我们权且把这种“动·名·来·补”的句式称作A'式。

与A'式不同，通常的句式是先动词和名词之间加上助词“得”，然后再在名词后面加上助词“来”和补语；即：“动·得·名·来·

^① 宋金词二例引自王锬(1986)，笔者核对后注上了出处页码。

补”，我们把这种句式称作 A[”]式。例如：

(42)天良削薄得人来怎敢喘气。(刘知远第二〔道宫·解红〕)

(43)天天闷得人来穀。(又，〔黄钟宫·出队子〕)

(44)诨得脸儿来浑如蜡滓。(董西厢，卷2〔大石调·玉蝉翼〕)

(45)都为他家害得人来病。(又，〔南宫调·一枝花〕)

在 A[”]式中，由于动词后面已跟有结构助词“得”，因此后面的助词“来”就显得很不必要，试比较下面二例：

(46)引调得人来眼狂心热。(董西厢，卷1)

(47)引调得张生没乱煞。(同上)

这两句意思完全一样，去掉复出的助词“来”，对句义并无影响，反而更加紧凑，因而 A[”]式未能通行开来。不过，吴语里尚保留着 A[”]式的用法，例如：

(48)陈老爷，耐倒说得倪来难为情煞哉。(海上花列传，11回。“耐”，你；“倪”，我)

可见，吴语里的这一用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金代。在 A[”]式里，“来”作为结构助词的功能已经衰退，它更近似于一个衬字。试把 A、A[′]、A[”]三式加以比较：

A式：动·来·补

A[′]式：动·名·来·补

A[”]式：动·得·名·来·补

可以看出，A[′]和 A[”]两式都是 A 式在早期的变式，是为了引进受事宾语而产生的，作为结构助词，“得”比“来”跟动词的关系更为紧密。

2.2 得来

尽管唐诗和变文里已见“来”用作结构助词，但当时还没有出

现“得来”作结构助词的用法。“得来”连用作结构助词最早见于宋金时期的文献,在北方是金代(1127~1234)两种诸宫调,在南方是记录朱熹(1130~1200)语录的《朱子语类》。

2.2.1 诸宫调里的助词“得来”

在金代两种诸宫调里,用作结构助词的“得来”已很常见,其数量远远多于“来”。例如:

(49)一个唤彦威,一个史洪肇,着两条担打得来笃磨。
(刘知远第二十[绣裙儿];笃磨,滴溜转动,此处指武艺精熟。)

(50)开口道不数十句,把张君瑞送得来腌受苦。(董西厢,卷1[黄钟调·尾])

(51)见个小僧入得角门来,大踏步走得来荒速。(又,卷2[商调定风波])

(52)君瑞心头怒发,忿得来七上八下。(又,[仙吕调·乐神会])

(53)女孩儿谎得来一团儿颤。(又,卷3[双调·尾])

(54)这一场腌臢病,病得来跷蹊。(又,[刮地风])

“得来”连用,符合汉语同义词素并列构成同义复词的构词法,最初可能是为了加强语气或使音节和谐才在“V得”之后又加上“来”的,后来“得来”逐渐凝固成一个双音节的结构助词。

2.2.2 《朱子语类》的助词“得来”

上面诸例的“来”或“得来”都出现在韵文里,最早出现结构助词“得来”的非韵文资料,是南宋朱熹(今江西婺源人)的门生所辑录的《朱子语类》,这表明“得来”确已生根于口语。

(55)到气稟处,便有不齐,看其稟得来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备。(朱子语类,4.77,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56)心本来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了。(又,5.97)

(57)静坐无闲杂思虑,则养得来便条畅。(又,12.216)

(58)如水之初定,静,则定得来久,物不能挠。(又,14.275)

(59)然这里只是说学之次序如此,说得来快,无恁地劳攘。(又,15.311)

(60)如云有十二因缘,只是一心之发便被他推寻得许多,察得来极精微。(又,16.338)

(61)问:“胡氏说何谓太迫?”曰:“说得来局蹙,不恁地宽舒,如将绳索缚在这里一般。”(又,18.421)

《朱子语类》里有一种“V得来/来”,表面上很像现在吴语里不带补语的B式,实际上并不是,须加以分辨。例如:

(62)又说钟离权、吕洞宾,而今又不见说了。看得来,他也只是养得分外寿考,然终久亦散了。(又,3.44)

(63)思量来,只有一个道理。(又,3.40)

(64)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又,10.172)

以上三例的“V得来/来”,分别是看起来、思量起来、穷究起来的意思,不表示程度之深。再如:

(65)自是他里面有这个道理,得他兄感动发出来,……若其中元无此道理,如何会感动得来!(又,13.238)

(66)不熟时,须著旋思索,到思索得来,意思已不如初了。(又,8.143)

例(65)的“感动得来”是“感动得出来”的意思,也即前句“感动发出来”的变换说法。例(66)的“思索得来”是“思索出来”的意思。此二例的“来”是趋向动词作结果补语,跟吴语的B式在意义和结构上均不同。总之,《朱子语类》里“得来”作结构助词只有A式,未见B式。

2.2.3 元曲里的助词“的来”

元曲里结构助词“得来”使用也较频繁,但一律作“的来”。例

如：

(67)气的来有眼如盲,有口似哑。(合汗衫,二折[越调斗鹌鹑])

(68)瘦的来我这身子儿没个麻秸大。(燕青博鱼,一折[大石调六国朝])

(69)这和尚故将人来撒皂,直写的来恁般牢。(忍字记,一折[金盏儿])

(70)唤侍妾,引领者,我来打鱼缸上身子儿扭的来别,替你稳坐七香车。(望江亭,三折[圣药王])

“得”写作“的”,在元明白话文献中较普遍,如元曲《三战吕布》一折:“争奈俺手下兵微将寡,怎生破的吕布?”《水浒传》二十八回:“我于路不曾害,酒也吃的,肉也吃的,饭也吃得,路也走得。”故知元杂剧中的“的来”即“得来”。

2.3 小结

下面用简表对以上各节内容加以归纳。通过这个表,一方面可以了解结构助词“来”和“得来”的历史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跟现代汉语方言作比较,从而便于更准确把握吴语助词“来”和“得来”的性质。

资 料	助词 格 式	来		得来	
		A 式	B 式	A 式	B 式
唐诗、变文(8—10 世纪)		+	-	-	-
金代诸宫调(12—13 世纪)		+	-	+	-
朱子语类(12—13 世纪)		-	-	+	-
元 曲(13—14 世纪)		-	-	+	-
四川方言(现代)		+	-	+	-
吴 语(现代)		+	+	+	+

从本文前面考察的各项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项结论,可作为

对文章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的回答。

(一)结构助词“来”始见于唐代(公元8世纪前后),唐诗和敦煌写卷中有其用例,但为数不多。当时还未见“得来”连用的例子,且“来”也只有A式。

(二)“得来”用作结构助词最早见于金代的两种诸宫调和南宋的《朱子语类》。在诸宫调里“来”和“得来”并用,“得来”多于“来”;在《朱子语类》里只有“得来”,未见“来”。这两种资料里无论“来”还是“得来”也只有A式。

(三)单用的“来”出现于前,连用的“得来”出现在后,“得来”是结构助词“得”和“来”的同义连用。因此,说“来”是“得来”的简化形式不符合历史事实,《上海市区方言志》说“得来”是“得”和“来”的叠用是正确的。

(四)从历史资料 and 现代汉语方言来看,结构助词“来”和“得来”不是吴语所独有,也不限于南方某些方言。据敦煌俗文学作品、金代诸宫调和元曲知道,唐五代的西北方言和金元燕京一带的方言里都使用这两个助词。现在北方话里虽然不用了,但属于北方方言区的四川话里仍然使用。所不同的是,以上时代和地域里的用例只有A式,而吴语里A、B二式并用。就是说,吴语一方面继承了历史上“来”和“得来”的用法(A式),一方面又新产生出了B式的用法。

(五)吴语里的B式应是A式的省略形式。A式之所以可以省略,有语义和形式上的原因。在语义上,“来”或“得来”后面的补语尽管或表结果,或表状态,但其深层的语义却是共同的,即表示程度之深。试看下而四例(前三例已举过):

夫主讠来身已倒 例(35)

知远惊来魂魄俱离壳 例(39)

飞虎讠来痴 例(40)

孙飞虎诨得来肩磨魂魄离壳(董西厢)

这四例的动词“诨”或“惊”都是“惊吓”义。四例的补语部分所描述的情况尽管各不相同,但其意义核心却一般无二,都是说被吓得很厉害。当这些描述成为一种套话时,人们就不看重也不细究它的具体内容了,光从这种句式就可以获得程度深、情况严重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补语部分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有可能被省略。补语虽然被省去了,人们依然能凭着对原句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的了解,理解省略后的句义。以上四例用吴语 B 式表达,就是“吓来”“吓得来”。B 式简洁,但只能泛泛地表示程度深,若要具体说明如何之深时,就仍须借助 A 式来表达了。

B 式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形/动·来/得来”跟后面的补语之间可以、也往往有语气上的停顿,特别当补语部分比较长时。前举例(12)“……胖得来,实在连走路都很艰难了”,就用逗号跟补语隔开,这表明补语部分在句中的相对独立性。可以设想,一方面当句子只是泛泛地表示程度深,一方面又有这种可停顿性时,就促成了 A 式补语的省略。也就是说,上述语境引发了 B 式的产生。这种情况不光吴语有,北京话口语里也有,例如:“你看他气得!”“瞧把他乐得!”后面不带补语也表示程度深。

基于历史事实和以上两点分析,我们把吴语里的 B 式看做是 A 式省略了补语,因而 B 式里的“来”和“得来”仍应看做助词,不能分析为后附的程度副词。

(六)吴语里 A 式和 B 式并用,但能进入 B 式“动·来”的动词是有限制的,如前所说,主要是跟心理、情感活动有关的一类,如“欢喜、巴结、恨、气、想、牵记”等。这些动词有一个特点,可以受程度副词“老”“邪气”(相当于“很”)的修饰,而一般动作动词则不行。

三 “来”作结构助词的义理

动词“来”常义为“至也，及也，还也”（见《广韵》），为什么会用作结构助词呢？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词，它的意义的引申、虚化或用法的演变都不是偶然的，应是有义理、有规律可循的。在探求动词“来”虚化为结构助词的原因之前，先看看动词“得”和“著”虚化为助词的过程，会使问题迎刃而解。

3.1 助词“得”

动词“得”本义是获取、得到，它用在其他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由此进而虚化为表示完成态的助词和引出结果补语的结构助词；当动作的完成作为一种既成的状态看待时，助词“得”又能表示持续态。即：

得：获取、得到	→	V 得：动作的	完成	$\left\{ \begin{array}{l} \text{表完成态} \\ \text{表持续态} \\ \text{引出结果补语} \end{array} \right.$
			实现	

下面按“得”的三种语法功能分别举例说明。

3.1.1 “得”表完成态(V 得, V 得 O)

(71) 营已入得，号又偷得。（汉将王陵变，敦煌变文集，38 页）

(72) 到得南岸，应是舟舡溺在水中。（韩擒虎话本，又，200 页）

(73) 作此语了，遂乃南行。行得廿余里，遂乃眼瞬耳热。

（伍子胥变文，又，8 页）

(74) 才添得三个，又倒却两个；又添得四个，倒却三个。

（难陀出家缘起，又，398 页）

除例(71)V 得后不带宾语外，其他几例 V 得后都有宾语，“得”跟完成态助词“了”的功用相同。

3.1.2 “得”表持续态(V 得 O)

(75)愁来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弹。(崔颢,代闺人答轻薄少年,全唐诗,130.1326)

(76)可怜寒食街中郎,早起著得单衣裳。(王建,春来曲,又,298.3385)

(77)大王遣官人抱其太子,度与仙人。仙人抱得太子,悲泣流泪。(太子成道经,敦煌变文集,290页)

(78)官健唱喏,改换衣装,作一百姓装裹,担得一栲栳馒头,直到箫磨呵寨内,当时便卖。(韩擒虎话本,又,200页)

(79)见儿将得饭钵来,望风即生吝惜。(大目连变,又,741页)

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持续态的V得O, V几乎都是具有静态义的动词。

3.1.3 “得”引出结果补语(V得C)

做结构助词的“得”唐代之前应已出现,但普遍使用却是在入唐之后。

(80)些些小事,何得纷纭,直欲危他性命,作得如许不仁。(燕子赋,敦煌变文集,253页)

(81)喊得山崩石裂(裂),东西乱走,南北奔冲。(庐山远公话,又,172页)

(82)二将当时夜半越对,諠(讷)得皇帝洽背汗流。(汉将王陵变,又,36页)

由上可知,助词“得”在早期身兼数职,到了后来才专任结构助词之职的。

3.2 助词“著”

助词“著”来源于动词“著”的“附着”义。六朝前后,当“著”用在静态义的动词后面时,其义相当于介词“在、于”,如:“取一绛裙,挂著屏风上。”(俗说)当“著”用在动态义的动词后面时,相当于介

词“到”，如：“先担小儿，度著彼岸。”（贤愚经）静态动词后面的“著”进一步虚化为持续态助词，动态动词后面的“著”进而虚化为完成态动词，在某些方言里还可以作结构助词。即：

著：附著—— $\left\{ \begin{array}{l} \text{V(静)著：在、于} \rightarrow \text{表持续态} \\ \text{V(动)著：到} \rightarrow \left\{ \begin{array}{l} \text{表完成态} \\ * \text{引出结果补语}^{\text{①}}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3.2.1 “著”表持续态(V 着, V 着 O)

“著”在动词后做持续态助词最早见于唐代，五代时开始普遍使用。例如：

(83)余时把着手子，忍心不得。（游仙窟）

(84)见他宅舍鲜净，便即穴白占着。（燕子赋，敦煌变文集，249页）

(85)皇帝忽然赐匹马，交臣骑着满京夸。（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又，432页）

3.2.2 “著”表完成态(V 著, V 著 O)

“著”在动词后面表示完成态，最早见于宋元白话文献，下面转引梅祖麟(1989)四例。

(86)若依彦冲差排，则孔夫子释迦老子，杀著买草鞋始得。（宗杲，大慧书·答刘宝学）

(87)发未发，觉未觉，切须照顾，照顾时，亦不得与之力争，争著则费力矣。（又，答张提刑）

(88)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诗，则后世诗多不足观矣。（朱子语类，卷80）

(89)宋江写著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泊寻着晁盖去了。（宣和遗事·元集）

① *表示极少见。

梅先生常举上海话“骑仔马寻马”和“吃仔饭哉”(“仔”即“著”的音借字)作为吴方言“著”兼表持续态和完成态助词的例子,是很正确的。

3.2.3 “著”引出结果补语(V 著 C)

我们目前尚未发现文献中“著”做结构助词引出补语的例子,但是我们知道某些方言里有这种用法。比如在安徽含山话里,“著”既可做完成态词尾,又可做持续态词尾,其例如:讲之讲之他就来之。(“之”为“著”的音借字)“讲之”的“之”表持续态,“来之”的“之”表完成态。此外,“之”又可做结构助词,例如:把人笑之要死。|那人坏之伤心。(“伤心”表程度之深)可见助词“著”在早期白话及现代某些方言里也是身兼数职的。

3.3 助词“来”

比较上面所述动词“得”和“著”虚化为助词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两个词虚化的关键在于当它们跟在动词后面时,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实现或达到(达到也是一种完成或实现),正是在这一用法和意义上才得以虚化为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动词“来”有着跟动词“得”(以及“著”)大体相同的用法和意义,所以它也沿着这同一途径虚化为身具多种功能的助词。

3.3.1 “来”表完成态(V 来)

动词“来”本指到说话人所在之处,当抵达说话人所在之处时(即所谓“及也”),这一动作就完成了。“来”的这一意义就为它虚化为完成态助词提供了语义上的可能性。在用法上,当“来”用在动词后面时,有时虽然保存一些实义,但跟“来去”的“来”已有距离,其意义核心为得到或完成。例如:

(90)村酒沽来浊,溪鱼钓得肥。(杜荀鹤,山中喜与故交宿话,全唐诗,691.7947)

“沽来”义犹沽到,下联“钓得”义为钓到。

(91)赋来诗句无闲话,老去官班未在朝。(张籍,赠王秘书,又,385.4334)

(92)已疑素手能妆出,又似金钱未染来。(罗绍威,白菊,又,733.8385)

“染来”即染成义,“来”也表完成。以上这种表示动作完成的“来”进一步虚化,就成为完成态助词,略与“了”相当。例如:

(93)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全唐诗,441.4921)

“抛来”与“忘却”对言,“来”义同“却”,表示动作的完结,跟“来去”的“来”意义相去甚远。

(94)富贵祝来何所遂,聪明鞭得无转机。(元稹,长庆四年元旦郡斋感怀见寄;自注:祝富贵、鞭聪明,皆正旦童稚俗法。又,417.4601)

此诗言“祝富贵”“鞭聪明”皆无效用。“祝来”犹言“祝了”。“来”与“得”对举,都表示动作的完成。不过表完成态的“来”只有“V来”式,没有“V来O”式。又如:

(95)遇干戈,被鞭拷,地下深藏与他道。一一君亲眼见来,由不悟无常抛暗号。(无常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669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义的“来”还可以跟在动补短语或动宾短语之后,表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例如:

(96)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朝野僉载,卷2)

“走得脱来”,犹言跑脱身了。

(97)其岁天下不熟,舜自独丰,得数百谷来。(舜子变,敦煌变文集,133页)

当表示完成态的“来”特指过去曾做某事时,就成为表示曾然态的助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来着”。例如:

(98)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朝野金载,卷6)

(99)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会东涂西抹来。
(唐摭言,卷3;疑“会”为“曾”之误)

(100)我适来于门外设誓,与他将军为奴来。(庐山远公话,敦煌变文集,173页)

(101)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又,835页)

这种表曾然的“来”都出现于句末,可以看做兼表时态和语气的助词。

由上可知,“来”在唐五代时候已比较普遍地表示完成态,而完成态助词很容易引出行为动作完成后的结果,因而转作结构助词,这跟“得”既表完成态,又做结构助词的义理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对动词“来”之所以能做结构助词的看法。

3.3.2 跟助词“得”一样,当动作的完成作为一种固定的状态看待时,助词“来”也可以转而表示持续态。不过比较少见,在普遍性上不能跟“得”相比。例如:

(102)江南鼓,梭肚两头来,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太平广记,卷55,“伊用昌”条引玉堂闲话)

(103)驄马新凿蹄,银鞍披来好。(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全唐诗,217.2272)

(104)铅粉坐相误,照来空凄怨。(李白,代美人愁镜,又,184.1883)

3.3.3 由于“得”和“来”无论做动词还是做助词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唐诗中经常用它们互文对举。^①例如:

^① 杨建国同志《唐诗语漫录》也注意到这一现象。见《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4期。

(105)就船买得鱼偏美,踏雪沽来酒倍香。(皮日休,冬末同友人泛潇湘,全唐诗,692.7950)

(106)已应春得细,颇觉寄来迟。(杜甫,佐还山后寄,又,225.2426;“佐”为杜甫之侄)

(107)云里引来泉脉细,雨中移得药苗肥。(吴融,即事,又,687.7893)

此三例的“来”尚未完全虚化,仍有实义。

“得”和“来”还可以作为同义词素,构成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双音词——怪得,怪来。例如:

(108)怪得仙郎诗句好,断霞残照远山西。(徐铉,和太常萧少聊近郊马上偶吟,又,754.8578)

(109)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白居易,竹枝词四首之四,又,441.4922)

“怪得”“怪来”之义犹今语“怪不得”。

3.4 结语

动词“来”虚化为助词的过程如下:

来:到、到达→V来:动作的 $\left\{ \begin{array}{l} \text{完成} \left\{ \begin{array}{l} \text{表完成态} \\ * \text{表持续态} \end{array} \right. \\ \text{实现} \left\{ \begin{array}{l} \text{引出结果补语}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把上述“得、著、来”三个动词虚化的过程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原来的意义各不相同,但当它们用在动词后面时,都可以表示行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由此产生了大体相同的新的语法功能。其中“来”跟“得”的演变过程更为相近。

“得、著、来”在早期白话中虽然皆一身而兼有几种语法功能,但其主次是不同的。“得”和“来”主要作结构助词,二者之中“得”用得更为普遍,几乎没有地域的限制,一直沿用至今;“来”用得不普遍,有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它只是“得”的陪衬,其地位无法跟“得”

相提并论。“著”主要表示持续态,只在某些方言里表示完成态或作结构助词。自唐五代以来,汉语的完成态助词主要由“了”承担,“得、著、来”表示完成态的功能都不如“了”强,三者之中以“得”最强,“来”最弱。“得”用作完成态助词的时间很长,明清小说中仍多见,但最终也未能取代“了”。

我们注意到,在近代汉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助词“了、得、着、来”等曾有相互重叠或交叉的语法功能,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详细考察它们各种功能产生的时间,通行的地域和时代,考察它们相互间或平行、或相前后,既有大致分工,又混用不清的种种关系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一项工作,这自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得了的,权且留作今后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闵家骥等.简明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日本江南书院,1958
香坂顺一.白话语彙の研究.日本光生馆,1983
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创刊号),1981
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1989,(3)
王楙.诗词曲语辞例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6

(原载《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5期)

处所词的领格标记用法与 结构助词“底”的由来^①

现代汉语的结构助词“的”最初的形式是“底”，这个词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语法词，它的来源是汉语史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章太炎的《新方言》开始，关于“底”的来源已经讨论了好几十年了，这期间有许多进展和突破，但至今仍有一些疑点，也未能取得共识。本文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有关资料，从新的角度做出了解释，现提出与同行切磋。

一 诸说举要

1.0 关于“底”的来源，讨论者主要有六家：章太炎、吕叔湘、王力、冯春田、梅祖麟以及石毓智和李讷。

1.1 章太炎的观点主要有二：(1)“底”是“之”的音变(“今凡言之者，音变如丁兹切，俗或作的”)；(2)位置在“的(底)”字结构中间的源自“之”，在末尾的源自“者”(“在语中者，‘的’即‘之’字；在语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热的，‘的’即‘者’字”)。

1.2 王力(1980)认为“底”源自“之”，“之”在文言中音变为

^① 5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考证了助词“底”的由来，睿见卓识，开启后学。今步先生后尘，续加考求，所恨已不能再聆教诲了。谨以此文纪念先生逝世周年。

[tɕɿ](tɕiə→tɕiə→tɕi→tɕɿ),在白话中音变为[tɕi](tɕiə→tɕi)。他不同意章氏的第二点意见,并从三方面提出质疑。一是“底”与“者”语音不合(“者”在上古音属鱼部,在中古音属麻韵上声);二是“冷的水”和“冷的”中的“的”显然是同一性质的,说一个源自“之”、一个源自“者”缺乏说服力;三是“你底”、“谁底”不能译成古文的汝者、谁者。

王先生对章氏的驳难是很有道理的。

1.3 跟章、王二家不同,吕叔湘(1955)认为用音变很难圆满解释,而且也无法得到确证。他从语法功能的对应性、继承性上考察,认为“底”源于“者”,在材料的发掘和分析论证方面有许多创获。具体如:

(一)以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六种格式为参照点来观察其前身“底”的用法:

- | | |
|----------------|--------------|
| a. 名·的·名(哥哥的书) | a'. 名·的(哥哥的) |
| b. 形·的·名(浅近的书) | b'. 形·的(浅近的) |
| c. 动·的·名(我看的书) | c'. 动·的(我看的) |

(以上名、形、动均兼指其短语,名又兼指代词)

吕先生发现唐宋时期“底”已具备以上六种用法:

- | | |
|--------------|----------------|
| a. 我底学问(陆语) | a'. 和尚底(灯录) |
| b. 真实底事(灯录) | b'. 好底(灯录) |
| c. 疗万病底药(灯录) | c'. 碾损老僧脚底(灯录) |

“灯录”即《景德传灯录》,是北宋人编的禅宗语录集,反映唐宋口语。吕先生的文章写于1943年,未能看到五代人编辑的《祖堂集》。据太田辰夫(1988)的考察,《祖堂集》中“底”字已具备上述六种用法:

- | | |
|----------------|------------------------|
| a. 大业底人(2.121) | a'. 汝底(2.10)背后底(1.171) |
| b. 不安底上座(2.54) | b'. 虚底(1.118) |

c. 不辨生死底人(2.123) c'. 问底(5.34)有踪迹底(2.120)

(二)在用法上,“者”字自先秦已有兼并“之”的趋势,继唐钺《国故新探·白话字音考源》之后,吕先生又发现了为数不少的“者”用如“之”的用例,尤以修饰语为动词性短语多见。例如(句末标*者为唐文所举):

a. 闻弦者音烈而高飞(战国策*;弦的声音)|亡身及家长者家口没奚官(南齐书;叛逃者及其家长的奴仆)

b. 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庄子·德充符*)

c. 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庄子·庚桑楚,王先谦集解:“者犹之,言是特所谓解释胸中凝滞之能乎?”)|以梦中阴自求推者郎(史记·邓通传;推(自己)的郎官)|问去者处士第几(唐·虬髯客传)|昨日来者太师官(宋·乙卯入国奏请)^①

(三)文言里“之”只有 a b c 三种用法,“者”只有 b' c' 两种用法,不具备 a' 式用法,直到唐代白话材料里“者”才出现 a' 式。如:麦地占他家,竹园皆我者(寒山诗))|(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国史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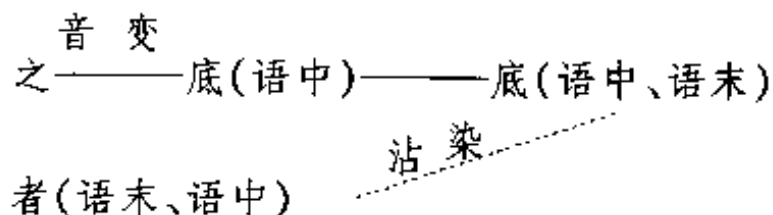
吕先生的文章在资料和方法上都为探求“底”的来源打下了基础,成为后人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时必须利用的重要成果。吕先生关于“底”源于“者”的看法较之源于“之”说有较大的合理性。

1.4 冯春田(1991)列举唐宋白话资料中大量用例说明“者”字结构与“底”字结构相对应,“底”字结构应来源于“者”字结构,“底”的前任是“者”。冯文论述了“底”字结构与“之”字结构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马底性~马底;而“马之性”没有相对应的“马之”),因

^① 曹广顺(1998)又举出三例 C 式的“者”:于是平原君乃折笑慰者美人头。(《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郾。(《三国志·魏·袁刘传》注引《英雄记》)|时净饭王为王太子,造三时殿……拟冬坐者殿一向暖,拟夏坐者殿一向凉,拟于春秋二时坐者,其殿调适,温和处平,不寒不热。(《佛本行集经》12)

而“底”不源于“之”。这些论述和结论跟吕说有许多共同处,但二说不同之处在于,吕说虽然是从用法上考察的,但并未完全排除“者”与“底”或有音变关系的可能性,而冯说则用大量例子说明“底”与“者”不仅形异,并且读音也不相同,“底”取代“者”不是语音变化的结果,而是词汇替代现象。这样就在吕文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那么这个替代“者”字的“底”又源于什么呢?冯文根据“个”既是指代词(“个是谁家子”寒山诗)又有结构助词用法(“好个一镬羹”《祖堂集》2.73;“妙个出身,古今罕有”同左 4.48)推测结构助词“底”应该源于代词的“底”。但冯文没有对这个推测进行具体论证。

1.5 梅祖麟(1988)认为,从语音上看,“之”有可能演变为“底”;从功能上看,“者”在语中的用法(V O 者 + S、V 者 O、N 者 N)与“之”相当,因此当“之”音变为“底”后,受“者”用于语末用法的沾染,也出现了语末的用法。简言之就是:“底”是“之”的音变,它在功能上又吸收了“者”的语末用法。可图示为:



但是,令人不放心的是,“底”实际上是否就是“之”的音变呢?可能性跟实际情况往往不一定是一回事。

1.6 石毓智、李讷(1998)认为,虽然“底(的)”与“之”、“者”在功能上有相同之处,但他们之间并无来源关系,“底”是由其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的用法引申发展而来的。石、李二位基本上同意冯春田“底”源自指示代词的推测,并对这个推测进行了一些阐述,其中对量词“个”充任结构助词的论证比较充分,也是可信的。但是,量词跟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是不同的语法概念,对于助词“个”源于

量词“个”的说明并不能代替助词“底”源自指代词“底”这一观点的论证;尽管石、李二位论证了现代汉语(包括《红楼梦》)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与结构助词在功能上有共性,但是并不是功能上有共性的成分就一定有来源关系,正如“底”与“者”功能相同,“底”却不一定来源于“者”一样。何况,现代汉语的情况不能代替唐宋时候的情况,要论证唐五代出现的助词“底”源于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的“底”,还必须要用历史文献资料做具体证明。其次,文献中“底”作指示代词的例句过于稀少,且多为宋代用例。冯书中所举四例,两例出自宋代的《五灯会元》,唐代二例中庞蕴诗一例可疑:“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愁”,“底”似应作“何”解。剩下来只有寒山诗中的“怜底众生病,餐尝略不厌”一例是应作指代词讲的。石、李文中所举李商隐《柳》诗“柳映江潭底有情”虽然可以释为“如此有情”,但不如释作“何有情”更贴切。如此来看,“底”作指代词唐以前未见,唐五代时极少见,而与此相对,唐五代时助词“底”已频频使用,从时间和使用频率上看,助词“底”也不大可能源自指示代词“底”。

1.7 以上六说的视角或侧重于语音演变,或侧重于功能对应,或两者兼顾,归纳起来是两派,一派主张源自古汉语的结构助词“之、者”,一派主张源自唐宋时期的指代词“底”。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都存在不少疑点,还须进一步探讨。笔者根据对魏晋南北朝小说及东汉至唐以前译经材料的考察,发现那个时期的口语中 useful 如结构助词的“所”和“许”,以此为突破点,经过考察,现提出助词“底”源自处所方位词“底”的看法,试陈述于下。

二 “所、许”的领格标记用法

2.0 太田(1988)、拙作(1988)同时发现魏晋南北朝小说中

“许”的领格标记用法,太田先生的材料还包括东汉以后的汉译佛经,举例范围超出拙作,而且还举出“所”的领格标记用法。^①此后,梁晓虹(1994)、曹广顺(1998)更广其例,又举出为数众多的译经用例,使得今天对“所、许”领格标记用法的观察和认识有了比较充足的材料基础。下面把各家搜集到的有关例句分类列举,鉴于目前对这一现象注意者很少,特不避繁琐,广列其例于下。

2.1 所

2.1.1 代+所(我所)

(1)佛言汝物持去,其余一切皆非我所。(骂意经,后汉安世高译大正藏,17.533下;其他一切都不是我的)

(2)心持非我所是我所。(遗日摩尼宝经,后汉迦讖译,大正藏,12.192上;心中把不是自己的东西看做自己的)

(3)此果我所,汝等勿取。(生经,西晋竺法护译,大正藏,3.73下;这果子是我的)

2.1.2 代/名+所+名

(4)谁能救济我所寿命,我当终身善好奉事。(撰集百缘经·菩萨授记品一·婆持加困病缘)

(5)身所恶露众恶,悉当随水而去。(文殊师利问菩萨置经,后汉迦讖译,大正藏,14.440下;身体内的各种污秽分泌物)。

2.2 许

2.2.1 代/名+许

(6)身不我有,财物非我许。(成具光明定意经,后汉支曜译,大正藏,15.453上;财物不是我的)

^① 《史记》中有“名+所+VP”格式中“所”相当助词“之”的用例:《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平准书论》)|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六国年表》))

(7)中夜有一鬼,担死人来著前,后有一鬼逐来嗔骂前鬼:“是死人是我许,汝何以担来?”(众杂经撰杂譬喻经,上;这死人是我的)

(8)此诸宫殿、玉女营从,尽是我许。(出曜经·观品)

(9)(僧)因问期云:“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囊挂锡及钵云:“此是杯渡许,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高僧传·杯渡;这是杯渡的)

(10)(向靖女数岁病亡,始病时曾玩一小刀,靖妻后又生一女,四岁时索要先时刀子)靖曰:“可更觅数个刀子,合置一处,令女自择。”女见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儿许。”(古小说钩沉·冥祥记;后女取亡女以前玩过的刀子说:这是我的)

(11)(鬼)属云:“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君可自著,勿卖也。”(钩沉·幽明录;市,买也。这袍子买的是西门丁与的)

(12)此象谁许,欲将何处?(佛本行集经,隋阇那堀多译;这象是谁的)

(13)此一封是汝释种摩那摩许,遣我送来。此一封是尼娄驮许,此一封是难提伽许,此一封是拔提迦许,此一封是难陀许,此一封是阿难陀许,自外诸书各各是彼释种子寄与汝来。(同上;此例皆为“专名+许”,表示某人的书信)

(14)又时夜渴,见他澡盥,谓言自许,遂取而饮。(同上;以为是自己的)

2.2.2 代+许+名

(15)彼等谁最在前出者,即取上衣自恣著而已,随意而去,亦不专求自许本衣。(起世因本经,自己原来的衣服)

(16)(罗)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世说新语·规箴,谢尚,字仁祖。仁祖是比我强的人)

(17)若无因缘,自许眷属,^①犹不亲近,况复他人!(佛本行集经;自己的眷属)

(18)我等亦为此朋友故,亦复各为自许物,来此林内,求彼淫女。(同上)

2.3 “所”、“许”源自处所名词

2.3.1 太田(1988)认为领格标记用法的“所”是“所有”的省略,即“我所”为“我所有”之略。梁晓虹(1994)也持同样看法。周法高(p.396~397)说“我所”“为佛教术语,乃梵文 *ma ma-kā ra* 之译(*ma ma* 乃第一人称单数之领格,解作“我的”;*kāra* 为名词),义为‘我之所有’‘我之所属’。因汉语中颇有省略‘所’之例,绝无省略‘所’后面的述语者,于此可见佛教文学用语之特别处。”周氏对“我所”的解释恰好可以否定“我所”是“我所有”的省略的看法,因为不管佛经文学用语多么特别,它一定要让当时的人看得懂听得明白,也就是说它应该符合当时的口语语法。从我们上面举的众多例子来看,“N+所”表示“N的”(领有)是当时普遍的表达方式,六朝小说中的用例尤能说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省略说无法解释同时出现的与“我所”完全相当的“我许”。

“许”的处所义最早见于《墨子·非乐上》:“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孙诒让间诂:“毕云:‘恶许,犹言何许。’王引之云:‘言吾将何所用之也。’”恶许,即何许,也即何所。“许”与“所”义同,一般认为“许”跟“所”在语音上有关系。“许”的处所义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极为普通,如陶渊明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何许”即何处。从“我所”、“我许”的意义都是“我的”来看,领格的“所”、“许”应是同义词,而这最可能源自处所词。

^① 与“自许”相对应。《朱子语类》中有“自底”。如:“只守著自底便了。”(卷38)

2.3.2 处所义的“所”和“许”用在名词、代词后面,有时意义会虚化。例如:

(一)指示处所,可对译为“那里、那儿”。

书及玺皆在赵高所。(史记·李斯列传)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世说新语·品鉴)

(二)失去词汇意义, N 所/许 = N

午言之赵王张敖所。(史记·田叔列传:午把此事对赵王张敖说了。“赵王张敖所”即“赵王张敖”)

于父母所,少作供养,获福无量。(杂宝藏经,1;稍稍供养父母,就会获无量福。“父母所”即“父母”)

(龙王)语王:“王有大恩在我许……”(旧杂譬喻经;王对我有大恩。“我许”即“我”)

我们认为领格用法的“所/许”应跟这种失去词汇意义的用法有关,下面略加说明。^①

前例(16)有“仁祖是胜我许人”和“岂有胜公人面行非者”两句,“胜我许人”与“胜公人”相对应,“我许”即“我”,“许”不为义;但“许”又处于领格标记位置,有可能重新分析为领格助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如 + N + 比”式盛用,例如:“佳婿难得,但如峤比如何?”(《世说·假谲》)此式又作“如 + N + 之 + 比”,比如“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吴书》)。《世说·汰侈》中有“(珊瑚树)如恺许比甚众”句,如把“如恺许比”的“恺许”理解为“恺”,“许”字不为义,则此句结构为“如 + 恺许 + 比”,与“如 + N + 比”为一式;但失去实义的“许”位于领格位置,如重新分析为领格助词,则此句结构为“如 + 恺 + 许 + 比”,与

^① 《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善庆闻语,转为高声,摇(遥)指道安许……”“遥指道安许”,“许”义已虚。

“如+N+之+比”为一式,“许”相当于“之”。我们推想“N+所/许+N”格式中的“所/许”就是通过重新分析才充任为领格助词的。

那么“N+所/许”式怎么会表示领属的呢?在古汉语中,“VP+者”与“VP+者+N”相对应,“推者郎”就是“推者”,或许受此影响,人们就把“N+所/许”看作是“N+所/许+N”的简略式,因而后边不加中心语,单用“N+所/许”也可以表示领属了。这个推断在后代的白话文献中得到一定的证明。

2.3.3 《元代白话碑》里有方位词“根底”用如领格助词的例子,方位词可看作广义的处所词。

a. N+根底+N

(1)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根底胡木刺,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什么差发休交出者。(元代白话碑,5;和尚的寺庙,景教大师的寺院,道士的观院,回教徒的寺院,那些率众拜天的人,不许俗人骚扰,一切差役尽免)

此例中连用四个“N根底N”式,“根底”都相当于领格助词。^①

a'. N+根底

(2)但属寺家的水土、园林、磨房、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竹园,不拣甚么他每根底,休夺要者。(同上,48;任何属于他们的(财产)都不可夺要)

“不拣甚么他每根底”一句在内容、句式相同的其他白话碑文中又作“不拣甚么他每的”(38、39、57、61、69、73、76等)或“不拣什么他的”(44、53、55、56、58、62、64、72等),“N+根底”也表示领属,跟汉

^① 蔡美彪(1955)注:根底“实蒙古语助词之意译,一般用于名词或代名词的与格(第三格),略相当于汉语副动词的‘对’‘对于’或‘给……’。《元秘史》旁译中每以‘行’字译之。有时根底亦用来译蒙古语领格(第二格)的语助词,略与汉语的‘属于’相当。”(6页注③)

魏六朝时期的“N+处/许”表示领属情况相似。除了白话碑外,元明时期的其他材料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

(3)我这里配了歹人,儿子每行面皮如何见得!(元朝秘史;有什么脸面见儿子们)

“儿子每行面皮”即“儿子们的面皮”,“行”本指处所、方位。

(4)谁是舅舅上孩儿,谁是姑姑上孩儿?(老乞大谚解)
《老乞大谚解》反映的是元末明初的语言,后来,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老乞大新释》将此句改作“谁是舅舅的孩儿,谁是姑姑上孩儿”,由此也可以看出方位词“上”与结构助词“的”的对应关系,以及由方位词充任结构助词的可能性。

2.4 由上所述可知,在唐代以前,汉语的结构助词是由“之、者”和“所/许”三者共同承当的,三者的功能大体呈互补之势:

	a	b	c	a'	b'	c'
之	+	+	+	-	-	-
者	(+)	(+)	(+)	-	+	+
所/许	+	-	-	+	-	-

到了唐代,“者”的用法扩大到 a' (也许受到“N 所/许”表示领属用法的影响),新的结构助词“底”又出现,“所/许”被排挤出结构助词系统,成为汉语史上昙花一现的领格助词。“所/许”虽然衰亡了,但用处所词充任结构助词的道路却被方位词“底”继承并拓展开来了。

三 助词“底”源自方位词“底”

3.1 助词“底”的最早用例

由实词虚化而成的语法标记,其最初用例往往最能透露出它的本来身份。助词“底”最早见于唐代,但唐代的用例很罕见,目

前只找到一例,是a'式(代/名+底):

崔湜之为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商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官曰:“知无?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死十余载,河东公竟为中书焉。(刘餗,隋唐嘉话,下,谈刻初印本太平广记引作异纂)

崔湜对同僚们说:“知道吗?姓张的跟我们是一类人,中书令的位置迟早是他的。”

例中的“N底”,按现代的观点前面似省略了动词(“张底”即姓张的),但也许在当时是正常的表达方式。同样的情况在五代禅录《祖堂集》中也有:

大业底人为什摩阎罗天子觅不得?(2.121)

“大业底人”实指作大业底人。

在元明戏曲小说中仍可见介绍姓名、身份时前面不加动词的用法,例如:

自家李山儿的便是。(元曲·李逵负荆,二折)

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
(水浒传,9回)

自家不是别,乃是万俟丞相府中堂候官的是也。(明·荆钗记,十九出)

据此,似不必把“张底”看做省略式。那么,“N+底”中的“底”的来历是什么呢?

3.2 “张底”的“底”是方位词

《全唐诗》卷八七六《选人语》:“有钱石上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这是候选官职者总结仕途捷径的谐谑语,“石上、刘下、张下”分别指称姓石的、姓刘的、姓张的掌选官。在姓氏后面加上方位词表示某姓的人。这跟“张底”的用法相同,“底”本来表示物

体的最下部,是跟“上、下”同类的方位词。“张底”和“张下”之别,只是所选用的方位词不同而已。

按说“上、下”也有可能演化为结构助词的,拙文(1998)曾经提到“N上、N下”的“上、下”不指示具体的方位,而是泛指某处、某人那里、某人方面,甚至N上、N下就等于N,这情况跟2.3.2节中谈到的“所”字的虚化完全相应。请看下面三例:

追取左贤王下兵马数十万人(李陵变文)

陵下散者,可有千人(同上)

羽下精兵六十万(汉将王陵变)

其中专有名词后边的“下”指示某人方面,它处于结构助词的位置,如果进一步虚化,就有可能变为结构助词。但语言实践选择了“底”而不是“上、下”充任结构助词,我们推想应是“上、下”的方位词身份太明确、太常用了,不适合转作他用。

3.3 在“名词+方位词+名词”结构中,方位词正处在结构助词“之”的位置,在一定的语境中会产生歧义,提供了重新分析的机会,促发了方位词向结构助词的转变。现以王武子《朝中措》词“闲看枕屏风上,不如画底鸳鸯”句为例说明。此句的意思是慨叹自己独守空房,不如画里鸳鸯夫妻长相厮守。但“画底鸳鸯”既可理解为“画里鸳鸯”(“底”为方位词),也可歧解为“画的鸳鸯”(“画”为动词,“底”为助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方位词“底”转用为助词的可能性。前面所举元代白话碑中“N+根底+N”的“根底”用如结构助词也是一个明证。

总之,从结构助词“底”的最早用例是a'式的“N底”来看,它不可能源自指示代词;“N底”跟唐以前的“N所、N许”(a'式)相承接,也有助于说明“底”应是跟“所/许”同类的处所方位词;方位词所处的句法位置提供了它演变为结构助词的语境。

四 助词“底”功能的扩大化

4.1 在唐代较早时期的文献里,助词“底”的用例极其罕见,且只见到用在代词和名词后面的,如“张底、帏帽底”,但在晚唐五代的白话文献中,助词“底”的用例骤然上升,其功能也迅速扩大,除了“名词+底(a'式)外,又出现了“形容词+底”(b'式)、“动词+底”(c'式)以及与这些形式相对的“名+底+名”(a)、“形+底+名”(b)、“动+底+名”(c)等格式,正如冯春田(1991)所详论的,“底”的这些功能与同时期的结构助词“者”完全对应,“底”与“者”是词汇替代关系。吕先生早已指出,“者”在先秦文献中就有兼并“之”的趋势,使它的功能扩大到 a、b、c 三式;到了唐代,“者”又扩大到 a'式,从而一身兼具六项功能。但我们注意到,“者”除了 b'、c'式之外,其他四式的使用都不普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结构助词“底”虽然到唐代才出现,但却显现出强劲的势头,功能迅速扩大,最终取代了“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汉魏六朝时期“所/许”用在代词、名词之后表示领属,开了处所词进入结构助词领域的先河,因为语言自我调节和类化的作用,方位词“底”取代“所、许”,在唐时充任结构助词;虽然它最初只有 a'式的用法,但一进入了结构助词领域,其功能就迅速向该领域的其他成员如“之”、“者”看齐。“之”和“者”是上古沿用下来的文言词,到了中古,文言和口语加速分离,文言词日渐走向衰落,口语词则充满了活力,正是这种语言背景使得助词“底”后来居上,在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4.2 “底”兼具“之、者”的功能,但在《祖堂集》中“底”又有一些“之”、“者”所不具备的功能,例如:

甲、“形/动+底”单独做谓语,描写状态。

(1)举措悉皆索索底,时长恬恬底。(2.91)|云岩云:“湛湛底。”(4.42)|雪峰告众云:“当当密密底。”(3.47)|南风吹来饱麴麴底。(5.94)

(2)师兄见洞山沉吟底。(2.15)

乙、“形、副+底”做状语,修饰动词。

(3)呵呵底笑(2.15)|微微底不安(4.136)

(4)和尚蓦底失声便唾(4.59)|忽底睡着(3.66)

这两种用法在吕先生文章所涉及的材料中只用“地”不用“底”,但在《祖堂集》里却是“地、底”兼用。而且据曹广顺(1995)考察,虽然《朱子语类》中“底、地”的功能是分开的,但仍有一些例外,如:是道理活泼泼底发出在面前(卷60)|自恁地塌塌底去(卷72)|显然底做(卷76)。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底”用如“地”,也有“地”用如“底”作定语的:玄,只是深远而至于黑窔窔地处(朱子语类,卷125)|要扣玄关,须是……硬剥剥地汉始得(五灯会元,卷16)。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是同一系统内的成员之间功能相互沾染所致。“底”和“地”都是活跃在口语中的结构助词,它们在语法性质和功能上的共同点(“形+底”和“形+地”都可以做谓语)引发了相互间功能的沾染,这从先秦的结构助词“者”和“之”之间功能的互相沾染更可以说明。“者”侵入“之”的比较常见,前面已经谈过;“之”侵入“者”的也偶有其例(引自周法高418页):

且有损而后益者,若疟病之之于疟。(墨子·经说下;章太炎云:上“之”字训“者”)

古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危。(韩非子·说林;古书虚字集释云:管子·五辅篇:“是以小者兵挫地而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文例同此。)

所以,结构助词系统内部成员间功能的互相沾染古已有之,不自“底、地”始。也就是说,在晚唐五代时候,“底”不仅吸收了“之、者”

的结构助词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沾染上了另一个结构助词“地”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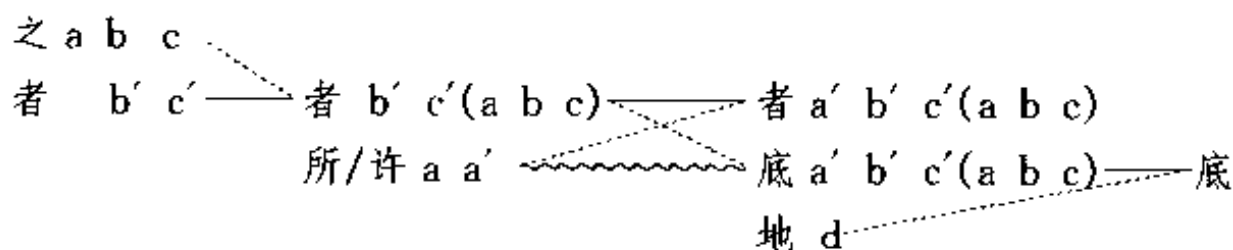
我们还注意到,甲、乙两类例子中的形容词多为 XX、XXYY、XYY 等重叠式,先秦两汉文献中这类形容词常跟“者”结合,可做主语、定语、谓语。例如: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菁菁者莪(诗·小雅)|丘何为是栖栖者与?(论语·宪问)|颍颍,涉之为王沈沈者。(史记·陈涉世家)

由此来看,“底”在形容词重叠式后的用法或者也可以看做是“者”的影响。

4.3 小结

上面我们对结构助词“底”来源于方位词“底”做了论证,如果把“底”用如“地”的功能(做状语)用 d 表示,那么“底”的由来可以图示如下(虚线表示沾染,浪线表示类化):



我们说结构助词“底”源自方位词是从词汇上说的;在功能上,“底”集合了“之、者、所/许”乃至“地”,是一个集大成者。在由“之、者”到“底”的发展过程中,有以下几种因素在起作用:

(一)功能的沾染 “者”先是沾染了“之”的功能(a、b、c),继而又沾染上了“所/许”的功能(a');后来“底”出现后又沾染上“地”的功能(d)。这种沾染是不平衡的双向运动,即“之”对“者”、“地”对“底”的沾染少于“者”对“之”、“底”对“地”的沾染。促发沾染的机制是同一语法系统内部成员间的相互影响。

(二)实词的语法化 “所、许”由处所词而产生领格标记用法

是由它的句法位置决定的。在“N+所/许”结构中,“所/许”的处所义虚化,“N+所/许”就相当于“N”;在“名+所/许+名”结构中,虚化了的“所/许”处在领格助词“之”的位置,提供了重新分析的契机,从而促使“所/许”充任了领格助词。

(三)语言的类化作用 方位词“底”受处所词“所/许”的类化进入领格助词领域,然后受同一系统中的助词“者”和“地”的影响而扩大了自己的功能。

(四)口语词与文言词的竞争 “底”比“者”后出,它迅速沾染吸收了“之”和“者”的全部功能,而且最终替代了“者”。“底”替代“者”不是语音的演变,而是词汇的兴替,其本质是口语词在竞争中战胜了文言词。“底”的胜利,使得汉语的结构助词由源自古代汉语的指代词(之、者)转而变为源自处所词(方位词是广义的处所词)。

不过,处所词并不是近代汉语结构助词的惟一来源,近代汉语结构助词的另一个来源是量词“个”,这两个结构助词开始似无明显的地域分别,但在现代汉语里,“个”只保留在粤方言、吴方言、部分客闽方言及西南官话中,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五)西方学者提出了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语法化是一种单向现象,即语言的演变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从实词向虚词的转移,或从不太虚的成分向更虚的成分转移。本文对处所词“所”的语法化过程的考察,一半符合这一原则:所→N所(那里)→N所(词缀);如果把结构助词看做是等级高于词缀的语法成分,那么另一半则提出了反例:N所(词缀)+名→N+所(结构助词)+名。当然,这种逆向转移是由于重新分析造成的。

五 余 论

为了申说处所词演变为结构助词的可能性,这里再补充介绍金元明白话文献中处所词“处”、“方位词”里”用在谓词性成分后,相当于结构助词的情况。

5.1 VP 处

“处”本是个空间概念,通过词义虚化从空间认知域转入时间认知域,即不表处所,表时间。最著名的例子是岳飞《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的“处”应作“时”讲。但在金刊本《刘知远诸宫调》里有几例则既不能作处所讲,也不能作时间解:

堪伤处,便是荆山美玉,泥土里沉埋。(卷2;便是:便似。令人伤心的是,刘知远就像美玉被深埋在泥土里)

虽得身荣,一事不全处:兄嫂堪恨如狼虎,把青丝剪了尽皆污(兀)。(卷12;兀,剜除。虽然得到荣华,但有一样不圆满的,就是头发被凶狠的兄嫂剪去)

交人难忘处,把俺夫妇薄贱。(卷12;让人难忘的是,兄嫂把我们夫妻侮辱。)

以上三例中“VP 处”的“处”用在复合句前一分句之末,上一分句举出一种情况,下一分句申述其原由或具体情况,“~处”相当于文言的“者”,可对译为“……的”或“……的是”。跟结构助词“的”b' c'式相对应。元明其他文献中还有用在反问句中的用例:

(郢哥):“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

(武大):“我只是这般模样,有甚么吃得肥处?”(水浒传,25回)

“主人家哥,休怪,小人们这里定害。”“有什么定害处?吃了些淡饭,又没什么好茶饭。”(老乞大谚解,77)

把这生分忤逆呆种杀了有什么多处！（朴通事谚解，中219）

“有什么吃得肥处”犹言“有什么吃得肥的”，“有什么定害处”犹言“有什么打扰的”，“有什么多处”犹言“有什么多的”（也即“多什么”），其中“处”都相当于助词“的”。

5.2 “怕里”

宋词中有“怕里”一词，其义相当于“怕的是”（例引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怕里流芳暗水，啼烟细雨带愁去。（周密，扫花游词）

还怕里，帘外笼莺，笑人醉语。（又，一枝春词）

心里恨，莫结丁香；琴上曲，休弹秋思。怕里，又悲来老却兰台公子。（马庄父，月清华词）

“怕里”的“里”跟方位词“底”同义。“底”在唐宋时候常用如“里”，比如杜甫《哀王孙》诗“屋底达官走避胡”，“屋底”即屋里；前举王武子《朝中措》词“不如画底鸳鸯”句，“画底”即画里。是知“怕里”义同“怕底”，由此也可以看出“底”与方位词的关系。

参考文献：

蔡美彪. 元代白话碑. 科学出版社, 1955

曹广顺. 近代汉语助词. 语文出版社, 1995

曹广顺. 佛本行集经中的“许”和“者”（待刊）. 1998

董秀芳. 古汉语中的后置词“所”——兼论古汉语中表方位的后置词系统. 四川大学学报. 1998, (2)

冯春田. 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冯春田. 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唐五代某些语法现象浅析.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江蓝生.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 语文出版社, 1988

- 江蓝生.后置词“行”考辨.语文研究.1998,(1)
- 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梅祖麟.词尾“底”、“的”的来源.台湾史语所集刊.1988
- 石毓智、李讷.汉语发展史上结构助词的兴替——论“的”的语法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88,(5)
- 太田辰夫.中国语史通考.日本白帝社.1988
- 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
- 王 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
- 袁毓林.“者”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7,(3)
- 章炳麟.新方言.章氏丛书.1915
-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第七章).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
- 祝敏彻.朱子语类中“地”、“底”的语法作用.中国语文.1982,(3)

(原载《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

0 语法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实词逐渐虚化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语法成分的过程,二是指短语或词组逐渐凝结为一个单词的过程,可分别简称为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这两种现象各有其产生的原因和演变规律,需要分别加以研究,本文讨论的范围只限于实词的虚化。

1 语法化是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每个实词的虚化都有它们各自的诱因,各自的历程。观察一个实词虚化的过程,大体可以通过考察这个实词由于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引起的词义变化;也可以反过来从某个实词意义的引申变化来观察它的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义的进一步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实词虚化的过程是可以通过句法位置、组合功能以及词义的引申演变等方面观察到的。(详见刘坚等 1995)

语法化往往伴随着音变,这已有古今大量的语言事实为证;那么由语法化而引起的音变是不是也是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呢?实词由实变虚是语法化,由虚变得更加空灵也是语法化,那么伴随着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是否也具有这种阶段性的特点呢?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本文拟以“V+X+NL”(V:动词;X:介词;NL:处所名词)句型中处所补语的介词为例,来探讨音变与语法化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2 “V+X+NL”句型是指“坐在椅子上”送到门外边“一类句

子, X 成分是引出处所补语的介词, 通常用“在”“到”充当。但是在北京话口语中, X 成分不说“在/到”, 而说“的”(·de),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里著录了这种用法的“的”, 举例为: 站~地上|靠~树上(59 页)。清末社会小说《小额》中也写作“的”, 例如:

我们傻瓜是的, 还坐的那儿听呢。(44 页)

接三的那天, 大这们一闹丧, 躺的月台头啦。(74 页)

说的这儿, 大夥儿也都乐啦。(9 页)

你先把这封信给送的府里去吧。(18 页)

前两例“的”相当于介词“在”; 后两例相当于介词“到”, 释作“在”还是释作“到”主要由“的”字前面动词的词义决定, 如果动词是静态的, 如: “坐”、“躺”等, 介词“的”一般相当于“在”; 如果动词是表动态的, 如“说、送”等, 介词“的”, 一般就相当于“到”。

再往上追, 发现元明时代的白话文献里 X 成分有写作“底”、“的”的, 例如:

住(往)常时汉儿皇帝手里有两个将军来, 杀底这达达剩下七个, 走底山洞里去了。(元典章·刑部·谋反, 1644 页)

请将范太医来看, 太医来这里, 请的屋里来。(朴通事谚解, 166 页)

跳东瓜, 跳西瓜, 跳的河里仰不搭。(同上, 249 页)

赵宣子齐整穿了朝服要出朝去, 看天色尚早, 端坐的堂上, 十分恭敬。(皇明昭令)

头里进门, 到是我叫他抱的房里去, 恐怕晚了。(金瓶梅词话)

关于介词“的”有人认为是“在”或“到”的轻读音变, 拙文(1994)则认为是“著”的轻读音变。那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到现代方言的情况, 但主要材料是六朝以来的文献。“著”本是个动词, 其义为“附着”, 当它出现在“V + X + NL”句型中时, 一方面充当动词的

补语,一方面介绍出动作的处所,根据动词的语义和上下文语境,或相当于“在”,或相当于“到”。例如

A “著”相当于介词“在”:

坐著膝前(世说·德行)|安著屋中(百喻经,上)|挂著屏风上(俗说)|埋著地中(李陵变文)|坐着南厅里(王梵志诗)|串(穿)著身上(舜子变)|戴著顶上。(董西厢)

B “著”相当于介词“到”:

刻木做班鸠,有翅不能飞,摇著帆樯上,望见千里矾(欢闻变歌)|玄怒,使人曳著泥中(世说·文学)|送著门外(世说·简傲)|将我儿去,原卖著我本国中。(变文补编,124页)

下面我们再以山西方言为材料,进一步论证介词“的”是“著”的轻声音变。

3.0 汉语持续态助词“著”由动词“著”(附着)虚化而来,这已成定论。在山西省各个方言点上,持续态助词的读音纷杂不一,但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著”的轻声音变。下面是从北到南十四个点持续态助词的读音:

大同 tʂəʔ	广灵 ·tsə	山阴 ·tiəʔ	忻州 tʂə/tia
阳曲 təʔ	文水 tiəʔ	孝义 tiəʔ	和顺 ·lei 武乡 ·ta
沁县 ləʔ	汾西 ·ta	临汾 ·ti	运城 ·tʂv 永济 ·tʂuo

把这十四处的读音加以排列,可以看出“著”字轻读音变的主要特点:一是韵母央化,二是声母由舌上变舌头,少数地方由舌上或舌头音变读为边音。

	tʂəʔ		·ta
·tʂuo	·tʂə	tiəʔ	·ti
	·tʂv	·tiə	·ləʔ
	tsə		lei

3.1 山西有些方言点处所补语的介词用“在”,但有些点用

“的”(或“得”“哩”),跟持续态助词音同,从系统上看,二者同样来源于动词“着”。下面五个点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介词用字及标音据各方言志):

	持 续 态 助 词	介 词 X 成 分
文 水	的 tiə ² 在墙上挂的哩	的 tiə ² 挂的墙儿上
孝 义	得 tiə ² 门圪落里放得块杌子	得 tiə ² 锁得箱子里
阳 曲	的 tə ² 门子开的嘞	的 tə ² 坐的椅子上
武 乡	的 .tə 坐的喝水	的 .tə 花儿摆的桌子上咧
和 顺	哩 lei 坐哩吃比站哩吃强些	哩 lei 豆腐跌哩灰锅里—— 吹不得,打不得

从上面山西方言的情况更可以推断明清白话资料中写作“的”的 X 成分来源于“著”,是“著”的轻读音变。清代蒲松龄《聊斋俚曲》是用山东淄川话写的,其中 X 成分写作“着”。例如:放着外头不大好,放着里头闷腾腾。(《淄川方言志》),其中介词“着”相当于“在”。

在“V+着+NL”句型中,“著”已完成了由动词向介词的虚化,其语音表现是读轻声,声调弱化,失去原有的调形和音高。然后进一步发生轻读音变,山西方言中从 .tʂuo→.tə 的一系列音变可以看做是词义连续渐变的语音表现。从动词到介词,是“著”由实到虚的变化,这种虚化是否到此就停止了呢? 山东某些方言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虚化还在继续前进。

3.2 钱曾怡(1993)记录山东博山方言中持续态助词读 ə,如:你拽 ə 他走|你坐 ə 说|他帮 ə 我干活|争 ə 不足,让 ə 有余。(钱书说 ə 也可改用“着”tʂuə)同时,博山方言“V+X+NL”中的 X 成分也读 ə,例如:拴 ə 树上再说|跑 ə 北京去|别撂 ə 道上。跟山西方言相比,“著”音变的更加厉害,已脱落了声母,只剩下一个央元音,更值得注意的是,博山方言中“ə”有多种语法功能,类似于一个词

缀,现据钱著摘述于下:

①名词后缀,相当于“子”:麦ə|狮ə|桌ə|鼻ə|姑ə|妮ə|钻空ə|后脑勺ə

②用在名词和指代词的后面,表示里面:家ə|心ə|大楼ə|这ə|哪ə

③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完成,带宾语或数量补语(也可用“了”liǎo)吃ə饭就来|去ə三回|睡ə觉啦

④相当于结构助词“得”:扫ə干净|改ə对|哭ə死去活来

⑤相当于结构助词“的”:我ə|吃ə|教书ə|要饭ə

⑥用在副词后面,相当于结构助词“地”:慢慢ə吃|老老实实ə说|赶快ə走

⑦用在数词后,相当于“个”:四ə|一百三十ə

同一系统里的诸多语法成分同用一种语音形式表示,这是诸多语法成分在语法化过程中都发生了类似的轻读音变,即:元音央化,声母脱落。由于这些语法成分出现的场合是互补状态,所以不至于影响交际。比如“请把书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一句,说成“请把我ə书轻轻ə放ə桌ə上”并无大的妨碍。

语音和语义层面的结构关联在于区别性,而博山话里一个语音形式能够对应那么多的语法成分,这说明在博山方言语法系统中,这些语法成分的词义虚化的程度极高,虚化到只须占据一个音节位置就行。

3.3 即使到了这个地步,词汇的虚化还没有停止,据于克仁(1992)知道,在山东平度方言中,处所补语前的介词经常被省略,处所补语直接在动词后面,不过这时动词说的较重、较长,例如:

把饭端:哪来|把鸡蛋打:碗来|把车开:操场上|抹:我身上了。这就是说平度话的X成分被融合到前面的动词里,通过加重和延长动词的读音来表示其语法意义,很像是一种屈折形态。在现代

北京话中,有时可以直接说:把书搁 o 桌子上吧|他把油抹 o 我身上了。动词不必重读或延长,成为一种零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种零形式看做是屈折形态后 X 成分的进一步虚化。

3.4 如果把山西、山东以及北京话的情况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可以看出 X 成分“著”词义虚化的轨迹及其在语音形式上的表现:

(一)			(二)		(三)	(四)
tʂuəʔ	tʂəʔ		tiəʔ	təʔ		
·tʂuə	·tʂə	·tsə	·tiə	tə	a	: o
	·tʂʏ			·ləʔ	lei	

“著”的音变过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著”字在“V + 著 + NL”句型中做动词 V 的补语,同时引出动作的处所,开始虚化为介词。“著”字读轻声是其语音上的表现。书面上仍用“著”字标示。在第一阶段的后期,“著”字由于轻读弱化,韵母央元音化,有些地方声母也开始由舌上向舌尖前移。在第二阶段,主要表现在声母由舌上变为舌头(少数地方变为边音),书面上改用“的、得、底”(少数地方用“嘞、哩”)标示。当然,把舌头音看做是古音的保留也是一种见解,如果这样看,第二阶段就须跟第一阶段进行调换。但是,从北方方言的普遍情况来看,“著”已不读舌头音;而且以上读做舌头音的都出现在轻读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倾向于把这里的舌头音看做舌上音的轻读音变。我们知道,当一个音节读轻声时很容易发生跟历史音变方向相左的逆向音变现象,如清音浊化、舒声促化等,我们认为舌上倒回舌头也属于逆向音变现象之一。第三阶段, X 成分对动词的附着性增强,其介词性大大减弱,发展到后来更像是动词的后缀。其语音形式简化到只剩下一个央元音,不仅跟其本字的读音面目全非,而且跟同一系统中的异源语法成分完全混同,在语音上没有任何区别性,只靠分布的互补区别语法作用,只相当于一个后缀。到了第四个阶段, X 成分虚化的程

度更深,在形式上跟动词融为一体,已经失去了独立的音节位置,只靠动词加重加长读音来表示;进一步发展,连读重音和长音也不必要,出现了零形式。

西方语言学家曾提出过语法化单向循环原则,即一个成分虚化到极限后就跟实词融合在一起,自身变成了零形式(沈家煊 1994)。汉语“V+X+NL”句型中X成分的语法化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原则,而且如上所述,这种不断虚化的过程都有其相应的语音形式来体现。即:

动词(著)→介词(着/的)→词缀(a)→零形式(:/ø)

动词“著”语法化的过程很好地说明了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伴随着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也是一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相邻地区方言点共时平面上的读音差异,可以显示这个语法词历时演变的轨迹。实词由实变虚后往往还会继续虚化,与此相应,音变也不会在完成实词虚化后就停止。它随着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而继续变化,总的趋势是不断简化,离本字的读音越来越远。这种持续不断的音变受到两方面的推动力:一是词义虚化程度的加深,意义变化了,要求形式相应地变化。语音层面与语义层面的结构关联是区别性,语音线性结构中的每一个变化原则上总是与语义的区别相对应的。另一个推动力是句法结构。“V+X+NL”这个结构在长期使用中具有很强的凝固性,在这个结构中,前面的动词和后面的处所名词是主要成分,X成分是次要成分。由于结构的凝固性,人们只要听清动词后面有处所词,就会习惯地把这个处所词理解为处所补语,不仅X成分是“在”义还是“到”义不重要,甚至连有没有X成分作为中介也无关紧要。当一个成分在结构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时,它就会不断虚化,发展到极端,就变为一个零形式,从结构中消失。它的语音形式也相应地越来越弱化、简化、含糊化,以至逐渐消失。由此可以看出,音变不是在语

音层面孤立地发生的,它跟语义层面和语法层面密切相关。

X成分“著”六朝时期在“V+著+NL”句型中先由动词虚化为介词,在这个阶段它跟前面动词的关系要比同时期并存的“VO+著+NL”句型紧密得多。“VO+著+NL”的例子如:

埋玉树著土中(世说·伤逝)|负桓著背上(异苑)|倒盐百斛著江水中(笑林)|援两手著舫户外(俗说)

在这个句型中,动词后面有宾语,“著”跟动词的关系隔了一层,“著”跟处所名词结合得比较紧,在这个结构中,“著”的动词性还较强。而在“V+著+NL”句型中,“著”直接跟在动词后面做补语,同时引出处所补语,它的介词性加强了。入唐以后,“VO+著+NL”句型很少见,这也说明唐代前后,“著”的介词性质已经成熟。

“著”由介词进一步虚化为词缀,是由于它在“V+著+NL”句型中,跟动词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对动词的依附性加强,与此同时,它的独立的中介作用越来越减弱,结构的语法意义不依赖它也无大妨碍。再发展下去,语言的经济原则起作用,就促使它在结构中隐没。我们可以把X成分的虚化过程用以下四个句型表示:

VO+X+NL→V+X+NL→VX+NL→V+NL

4.0 由词缀向零形式的转变,这在印欧语中有许多实例,汉语是分析型语言,一般情况下,实词虚化到一定程度后似乎不再继续下去,不像屈折型语言那样虚化为屈折形态。但是处所补语介词在某些方言最终虚化为零形式的事实,说明即使是分析型语言的汉语,也遵循着语法化的单向循环原则,尽管这样的例子比较少。

4.1 汉语的“儿”尾跟前面词根的韵母融合在一起,复合为一个儿化音节,是经常引用的这类实例。“子”尾也有类似情况。

在山西和顺方言中,子尾已经消失,舒声字采用增加音长的办法来表示,例如:

荏(子)ts'a:~ 柜(子)ku:ei~ 靴(子)ɕy:~ 炉(子)lu:~

入声脱落闭韵尾,另加-ɤu,如:栗(子)li:ɤu- 虱(子)sɿ:ɤu-

山西原平方言的子尾分三种情况:①一般情况子尾读轻声,词根要随之变调(阴平变 24,去声变 51,入声变 24,韵母变开韵尾);②前字为鼻韵尾的·ə 变 ŋ,如疯(子)fɔŋ;③前字韵母为 a ia ua 及入声 a' ia' ua' 的用延长主要元音表示,入声塞尾变开尾。例如:疤(子)pɑ:ɤ 瓜(子)tsua:ɤ 傻(子)ʂɑ:ɤ 刷(子)sua:ɤ 这第三种情况是一种屈折形态,可以看做零形式。

山西晋城方言中的子尾可分两种情况:①子变韵母:ɿ:ɤ、i:ɤ、u:ɤ、y:ɤ、a:、i:a、u:a。前四个子变韵母中的ɤ 可以看做是子尾脱落了声母的变音,还保留着词缀的残余;后三个子变韵母只用长音表示,应视为屈折形态,零形式。②子尾在阴平、阳平、上声调的多数字中可以不改变韵母,只用变调 ɿ35 表示。例如:

钉(子)tiānr 房(子)fār 钳(子)tɕ'ier

在这里词缀与词根已完全融合为一体,只用变调表示,由黏着形态变为屈折形态,完成了由双音节到单音节的变化。

4.2 名词“子”由实词到词缀再到零形式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子”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结果。徐通锵(1990)认为子尾音变动力是汉语一个词与一个音节对应的结构关联在起作用,当复音词破坏了音节和词之间一对一的平衡和对应关系时,音节结构规则就通过变声、变韵、变调去改造、融化复音词的语音面貌,使之单音节化。这种解释就儿尾和子尾的屈折形态而言或许不无道理,但用来解释山东平度方言处所补语介词省略,动词重读、长读的屈折形态就不太合适。而且这种解释跟汉语不断把单音节词变为复音词的发展方向相左。所以我们认为还是用词义的虚化来解释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侯精一. 晋东南地区的子变韵母. 中国语文. 1985, (2)

侯精一、温端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江蓝生. “动词 + X + 地点词”句型中介词“的”探源. 古汉语研究. 1994, (4)

刘 坚、曹广顺、吴福祥.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中国语文. 1995, (3)

梅祖麟. 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 中国语言学报. 1988

孟庆泰、罗福腾. 淄川方言志. 同上. 1994

钱曾怡. 博山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4)

温端政. 山西省方言丛书(包含吉县、汾县、沁县、山阴、绛县、永济、天镇、武乡、清徐共九册).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徐 丹. 关于汉语里“动词 + X + 地点词”的句型. 中国语文. 1994, (3)

徐通锵.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 中国语文. 1990, (1)

于克仁. 平度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1992

(原载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 65 岁华诞》)

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

提要 本文考察了在汉语假设助词系统发展的历史中,曾有时间词加入的事实。文中分析了诱发时间词“时”与“後”语法化的句法环境和内部机制;揭示了“时”与“後”语法化的过程以及其句法功能随着语法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不断扩大的事实。文章还论证了“後”虽被“呵”取代,但与“呵”并无来源关系。指出由时间范畴进入假设范畴,是汉语跟其他一些语言共有的语用认知规律。

关键词 语法化、时间词、时、後、假设句

零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唐宋以来,时间名词“时”和表示时间的方位词“後”怎么会充当假设助词的。关于“时”与“後”的假设助词用法,此前已有多人论及,但关于诱发它们语法化的根本原因和具体过程则论者寥寥,语焉不详,有必要深入加以探讨。

汉语的假设复句可以没有任何句法上的标记,而仅靠主从复句语义上的关系表达,从句表示事况、条件,主句表示结果,即所谓意合法,古今皆然。例如: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事儿,没有他,办不成。

但同时也有带标记的假设句。加上标记是为了使句子的假设义更为明确,使假设语气或显得突出,或显得委婉、和缓。带标记的假设句分为三种:a、从句前部有假设义类连词(可称为前置式);b、从句句尾有语气助词(可称为后置式);c、从句中既用假设连词,又用语气助词(可称为兼用式)。

1.1 汉语的假设义类连词从古至今有不少变化,古汉语多用单音词“如、若、倘、或、果、苟”等,中古以后多用以这些单音词为主构成的一系列复音词。如“若其、若或、倘使、倘如、假令、假使、脱若、设使”等。到了唐宋金元时期,又出现了来源于俗语词“可中、不争”,愿望动词“欲、待”,惧怕义动词“怕、恐”,疑问副词“还”等的假设义连词。但这些新兴的假设连词使用的范围和历史时期有限,在现代汉语里已不见其行踪;倒是古代汉语的“如、若、倘”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复音词“如果、假如、倘若”等,一直沿用至今。

1.2 汉语的假设语气助词古今变化更大,上古、中古基本都用“者”,少数用“也”,唐宋时期出现了新兴的假设助词“时”和“後”,元代前后又相继用“呵、么、呢”等,到了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才开始出现现代汉语最盛行的假设助词“的话”。“时”比“後”使用的时间长、范围广,元明白话文献里很常见,就是清代小说里也不鲜见,某些现代方言如连城客家话、湖南永兴话里仍然使用,而假设助词“後”在明代文献里就基本不见了。跟前置的假设义连词相比,后置的假设助词的继承性较差,不仅古代汉语的假设助词“者”或“也”早就销声匿迹,就是唐宋的“时”与“後”、元代盛行的“呵”也都相次退出了现代汉语主流。

1.3 古代汉语的假设助词“者”和“也”

1.3.1 “者”是由其后置代词(一般称“被饰代词”)的用法而虚化为助词的。先看 a 组两例句:

a. 仁者安人,智者利人。((《论语·里仁》))

此句的“者”是后置代词,指人,“仁者”可释为“仁爱的人”,“智者”可释为“智慧的人”。

a'. 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记·中庸》))

此句的“者”意义虚化,既不指人,也不指事。“仁者”只指“仁”这种概念本身,“义者”只指“义”的概念本身。“者”出现在主语之后,相当于话题标记,其句法功能是表示语气停顿,引起下文。再看 b 组两例:

b. 不有居者,谁守社稷? 不有行者,谁扞牧圉?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居者”指驻守的人,“行者”指巡逻的人,“者”为指人的后置代词。

b'. 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论语·公冶长》))

“君子者”即指君子,不可释作“君子的人”,“者”的指代义弱化。由于“者”出现在这个假设句从句的句尾,因此它就起着加强假设语气的作用。也就是说,此句本是假设句,并不是用了“者”才变成假设句的。“者”是“鲁无君子”这个条件句的话题标记,起着表示提顿语气,以引起下文的作用。

1.3.2 “也”在古代汉语里是个语气助词,可以用在句中(词语后或从句句尾),也可以用在句末,其假设助词用法与其在语词后和在从句后表示提顿的用法直接有关。试看:

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论语·公冶长》))

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左传·哀公三年》)

后两句是假设句,其中“晋人也”“男也”“女也”的“也”虽然可以分析为假设助词,但究其实,跟第一句中表停顿的用法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由上可知,古代汉语用作假设助词的“者”和“也”实质上都是话题标记,但二者演变的径路不同。“者”是由后置代词虚化后充当话题标记的,而“也”是从语气助词在句中表提顿的用法成为话题标记的。

1.3.3 假设从句“VP 者”与“若/如 VP 者”的范式化

除了只用假设连词“如、若、使”等的前置式假设句外,后置式的假设从句“VP 者”和前后置词兼用的假设从句“若/如 VP 者”是自先秦至唐代使用最为普遍的格式,已成为一个范式句法格式,打开各类资料,皆不难寻见。例如:

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商君书·算地》)

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史记·孟尝君列传》,“文”是田文自称)

若忆太子犹不已者,我今当与大臣寻求所在。(《大正藏·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 636a)

不得使我银钱,若用我银钱者,出来报官,浑家不残性命。(《敦煌变文集·舜子变》)

这种范式化的假设句,为某些假设句中的时间词“时”发生语法化提供了类推的句法模式。

二

2.1 来自时间范畴的假设助词“时”与“後”

2.1.1 “时”的语法化

从目前掌握的历史文献资料来看,用作假设助词的“时”在敦煌本王梵志诗中已频见。据项楚(1991)考证,传世王梵志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中敦煌出土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应是初唐武则天时的作品,一卷本《王梵志诗》与唐时童蒙教材《太公家教》的时代相同。因此,假设助词“时”的出现时代不会晚于初盛唐。下面拟以敦煌两种王梵志诗集为主,参照寒山、拾得诗以及唐五代其它可靠的白话资料,对时间名词“时”语法化的句法结构、语义条件和大致路径作一考察和说明。

2.1.2 “VP 时”表示未然

作为时间名词,“时”可以指过去、现在、将来任何一个时段或时点。例如:“忆昔少年时,求神愿成长。”(寒山 159)此指过去某时段。“闻身强健时,多施还须喫。”(王 067)此指现在之时。“嗟见世间人,个个爱吃肉。……阎罗使来追,合家尽啼哭。炉子边向火,镬子里澡浴。更得出头时,换却汝衣服。”(拾得诗)末两句指来生将变作畜生禽兽,身披毛羽,“时”指将来。指过去或现在的表示行为动作或事件业已发生,即已然;指将来的表示行为动作或事件尚未发生、实现,是将然、未然。假设的行为、事件显然是尚未发生的,所以,表示假设的助词“时”应是首先从表示将然、未然的时间名词虚化而来的。

2.1.3 “时”语法化的大致途径:

(一)VP 时 $\approx$ VP

在“VP 时”表示未然的短语或小句中,“时”表时间的意义弱化,“VP+时”主要强调的是 VP 本身,但“时”字仍保存有时间意义。例如:

钱财只恨无,有时实不惜。(王 067)

后句虽然可以理解为“当有钱的时候不会吝惜”,但于是指未然,

又是跟上句的“无”相对而说的,所以也可理解为“如果有的话就不吝惜”。试比较:

(1)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王 002;当我有钱的时候,妻子对我就好)

“VP 时”指过去的事,指已然,“时”没有虚化,是时间名词。

(2)心不逐诸缘,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时,内外无余事。
(拾得诗)

后两句可理解为“当心意不生时,就内外两空”,但由于“心意不生”是泛言的,尚未成为事实,所以理解为“心意不生的话,就内外两空”也可以。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时”由实变虚,刚刚开始语法化的句法和语义环境。在这种阶段,“时”还没有完全失去其时间意义,因而在理解句义时可以两解。

(二)(若)VP 时=VP

“VP+时”已失去指示时间的意义,就相当于 VP。“时”成为谓词性话题的标记,起提顿语气引出下文的作用。按其语法化的程度又可细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A. 句前无假设义连词,单音节动词做话题较常见。例如:

(3)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王 288;没有孩子也很好)

与“有”对言,强调的是“没有孩子”这种状况,而不是时间。

(4)双陆智人戏,围棋出专能。解时终不恶,久后与仙通。
(王 214;会下围棋的话终不是坏事)

“解时”指具有会下棋的能力,非指“会下围棋的时候”。

(5)臣妾饮时,号曰发装(妆)酒,圣人若饮,改却酒名,唤甚即得?唤曰万岁杯。(《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本》;“臣妾饮时”与后面“圣人若饮”相对,其句义为“臣妾若饮”甚明)

(6)问:“正与摩时如何?”师曰:“是阇梨窠窟。”僧曰:“不与摩时如何?”师曰:“不顾占。”(2·67;“与摩”:这么、如此。僧人问如果这样如何,如果不这样如何)

以上各例中用如假设助词的“时”多出现在对举事况的句子中,对举时强调的是事况而不是事况发生的时间,所以“时”容易语法化。

B. 与A类语境相同,但从句前面有假设义连词。例如:

(7)若使交他教化时,化尽门徒诸弟子。(《敦煌变文集·破魔变文》)

(8)不知贵朝欲待自守,为复待与夏国?若自守时,与贵朝为邻,甚无害;若是夏国时,恐西人出没,常为边患。(《三朝北盟汇编·燕云奉使录》)

(9)世尊若差我去时,今日定当过丈室。(同上,《维摩诘经讲经文》)

(10)见说一女已倾弃,人道却有一女奇。若是时,若是时,却当与君作个道理。(《张协状元》)

由于从句前有假设连词出现,所以“时”所负荷的假设义减弱,其语法化的程度应比前面不用假设义连词的更进一步。

C. 到了元代,还有一种出现在紧缩句中的助词“时”,可对译为“就”“则”。例如:

(11)你若肯时肯,不肯时罢手,休把人空迤逗。(元 止轩小令《醉扶归》)

(12)我与你四锭钞,肯时卖,你不肯时,赶将去。(古本《老乞大》26a)

上面这些例子中,“VP+时”都不是指示时间的,而是指行为、动作、性质、状态、或事件本身的,“时”字虚化的程度较A、B两种情况更深。

(三)“VP 时”用在非假设句中,有以下两种情况:

A. 并列对举句

(13)运命满(漫)悠悠,人生浪聒聒。死时天遣死,活时天遣活。(王 101)

(14)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王 273;“时”与“即”对举)

(15)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见时不可见,觅时不可觅。(拾得诗)

(16)端坐剩心惊,愁来益不平。看时未必相看死,难时那许太难生。(张鹭《游仙窟》;下句:说难怎么那么难)

在这类对举句中,VP 都是单音节动词、形容词,“时”既不表时间,又不表假设语气,只是表示提顿语气,对译时可译作“则”;如果把 VP 看作句子的话题,那么“时”就相当于话题标记。仔细体味,这类句子虽不是典型的假设句,但其中的分句跟紧缩的假设句相似;特别是拾得诗一例,动词“见”和“觅”都是未然的行为,看作并列的紧缩假设句也无不可。但“难时那许太难生”一句是不能分析为假设句的。

B. 推论句与让步转折句

(17)既相公不来时,张太尉管军事,节都在张太尉也。
(《挥麈录·王俊首岳侯状》)

(18)既恁投大都去时,俺是高丽人,汉儿田地里不惯行,你把似拖带俺做伴当去不好那?(古本《老乞大》2b9;把似:不如)

(19)既这般时,价钱喂亏着俺。(同上 362a;喂:很)

(20)虽然这般时,房子委实窄,宿不得。(《老乞大谚解》44a)

推论以已知条件为前提,让步是先承认已然的情况、条件,因此,推

论句和让步转折句的从句可看作广义的条件句,跟源自时间条件的假设句在语义上有共同性。但是,“既”“虽然”表示所论事态是已成的事实,跟假设句表示未然的语义要求正相反,因此推论句和让步转折句分句中的“时”虽然也可以看作话题标记,但它不表假设,只表示一般的语气提顿,其作用是引起下文。显然这类用法的“时”语法化程度比A类要高。(古本《老乞大》此二处的“时”都作“呵”)

(四)“NP 时” = NP

以上所谈各类情况,“时”都是出现在VP(即谓词性成分)后面的。到了元明时期,“时”出现了在名词主语后面表示语气提顿,以引起下文的用法:

(21)新罗参时,又好,愁什么卖。(《老乞大谚解》2b7)

(22)系腰时,也按四季。(同上 46a7;系腰:腰带)

这两例中的名词主语是典型的话题,其后面的“时”可看作话题标记。这种在名词主语后做话题标记的“时”,与时间名词“时”的词汇意义以及“时”在假设句中表示未然态的语法意义距离最远,跟时间范畴、假设条件最不相干,因而其语法化的程度最高。

2.1.4 小结

A. 诱发时间名词“时”语法化的句法语义条件是:出现在时间条件短语或小句末尾,表示动作或事态是没有实现的、未然的;当“VP 时”的“时”实词意义弱化时,就引发了语法化。

B. “时”语法化的内部机制:类化与重新分析

在时间小句或短语“(若)VP 时”中,VP 与“时”之间是定中修饰关系,“时”是语义重心;而当“时”语义虚化时,语义重心前移,原先的定中修饰结构开始松动瓦解,“时”被重新分析为原条件小句的附加成分或曰话题标记。这种因语义重心前移而发生的句法结构上的重新分析,跟前面讲过的“VP 者”的“者”由后置代词虚化

为假设助词的情况类似,而且“(若)VP时”跟“(若)VP者”的句法结构完全相同,由于类推的作用,这种词义虚化的“时”很自然地演变为假设语气助词。

C. 语法化的过程:VP时 $\approx$ VP $\rightarrow$ (若)VP时 = VP $\rightarrow$ 既/虽然 VP时 = 既/虽然 VP $\rightarrow$ NP时 = NP。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时”由实到虚、由虚到更虚,语法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它的语法功能也随之不断扩大,即:时间名词 $\rightarrow$ 时间名词或假设语气助词两可 $\rightarrow$ 假设语气助词 $\rightarrow$ 一般停顿语气助词 $\rightarrow$ 名词话题标记。假设语气助词、一般停顿语气助词、名词话题标记,是话题标记“时”语法化程度不同的三个层次。由于话题标记直接来源于时间条件从句,所以假设助词跟话题标记的语义联系最为密切,一般停顿语气助词次之,名词主语后的“时”跟时间条件句最无关涉(在历史文献中也出现得最晚),因而其语法化程度最高,是典型的话题标记。语法化程度深浅不同、句法功能不同的助词“时”可共时存在,尽管其最初出现时应有时间上的先后。

2.1.5 从语法化的发展历程看连城客家方言的助词“时”

某些现代汉语方言中仍使用“时”作假设助词,福建连城客家方言即是其一。据项梦冰(1997),连城客家方言中保存着助词“时”的多种用法,其功能分布如下:

a. “NP时 VP”

春兰时系老婢子 əŋ (春兰是婢女)|这时敢毒人个菇都敢 ouŋ (这可能是有毒的蘑菇吧)|三个时敢还忒少(三个可能还太少)|佢时去,我唔去(他去,我不去)|细人个手骨时冰甘雪冷岛 ouŋ (小孩的手冰凉冰凉的)

b. “V时 V”与“VP₁时 VP₂”

香时香,唔好看就系(香是香,不好看就是)|去时去,要晚得一惜就系(去是去,就是要晚一些)|去医院底一检查时确的

实系瘤(去医院一检查,的确是瘤)|佢唔食羊肉时我知得 eɿ
(他不吃羊肉我知道的)

c. “NP₁ 时 NP₂”

今晡时墟日 əɿ(今儿是集日)|姑丈买个时水蜜桃 ouɿ(姑
夫买的是水蜜桃)

d. “VP 时 NP”

端起来看时碗底一下都虫(端起来一看碗里全都是虫子)
|食饭时又只一壶酒(吃饭呢又只有一壶酒)

e. “S₁ 时 S₂”(S₁ 时假设从句)

病死时一个女都无 ouɿ(要是病死的话就一个女儿也没
啦)|打广东转时要着潮州搭船 əɿ(要是从广东回来的话得在
潮州搭船)

f. “S 时”(在疑问句句尾)

佢紧去(一般)时(neɿ)(人家要是去呢?)|紧落雨(一般)
时(neɿ)(要是下雨呢)

可以看出,连城客家话助词“时”的功能和分布十分丰富,有的超出了笔者在近代汉语文献资料里所发现的。这有可能是文献资料的局限所致,一般来说任何文献记载都不太可能比实际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更生动丰富;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在近代汉语时期助词“时”的功能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连城客家话的地步。连城客家话共时平面上助词“时”的不同用法,是其历时发展变化的反映。项文把“时”的上述多种用法统统分析认定为话题语标记,似有些笼统。从我们上文对“时”语法化过程的描述可知,作为话题标记的“时”,其内部也有语法化程度深浅之分:它最初是在假设小句末尾由时间名词虚化为话题标记的,其后又可以用在紧缩的假设句和广义的条件句末做话题标记,最后在名词主语做话题标记。联系时间词“时”语法化的历程,我们认为,或许可以把连城客家话话题标记

“时”的功能细分为假设句中的假设助词(e、f)、紧缩句或顺序叙述句中的停顿助词(b、d)和名词主语句中的话题语标记(a、c)三类。

2.2 “後”的语法化

2.2.1 上面谈“时”的语法化时指出“VP 时”可表示时点(起始点、终结点)也可表示时段(起始和终结两个点之间的持续过程),如“出门时带了把伞”,“时”表时点;“出门时要注意安全”,“时”表时段。表示时段的“VP 时”指自事情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因此跟“VP 後”语义相通,甚至可以用“後”替换。例如:“他来时再交给他”意思是“他来後再交给他”。假设是设定具备某条件之时、或具备某条件之後才会有某种结果出现,所以,时间词“时”和“後”都有机会在适当的语境下虚化为假设助词。

2.2.2 “後”语法化的途径与“时”大体相同,但也有其特点。就目前所知,其例最早见于五代《祖堂集》。

(一)VP 後≈VP

(23)僧问:“只如达摩是祖师不?”师云:“不是祖。”僧云:“既不是祖,又来东土作什摩?”师云:“为汝不荐祖。”僧曰:“荐後如何?”师云:“方知不是祖。”(《祖堂集》3·15;荐祖:祭祀祖先)

(24)问:“如何是无刃之剑?”师云:“非烹炼之所成也。”僧云:“用者如何?”师云:“来者皆尽。”僧云:“不来者如何?”师云:“也须尽也。”僧云:“不来者为什摩却须尽也?”师云:“不见道,能尽一切。”僧云:“尽後如何?”师云:“方知有此剑。”(同上,2·142)

这两例都是禅师与僧徒的顶真式问答句,“荐後如何”、“尽後如何”可从字面理解为“祭祀之后怎么样”,“铲除尽后怎么样”;也可理解为“祭祀了怎么样”,“铲除尽了怎么样”。“後”类似于表示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由于这两个问句是对动作行为完成的预设,所以

又可以理解为“祭祖的话怎么样”，“除尽的话怎么样”。不管作何理解，“後”字意义发生虚化是显见的。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到“後”语法化的语境和认知上的原因。

(二)(若)VP 後 = VP

A、有前置标记者

(25)若能晓了骊珠後，只这骊珠在我身。（《祖堂集》1·64；“骊珠”喻禅机、悟性）

(26)我从小生长在村内，霞帔不知怎地披，金冠便与我後，怎戴得？（《刘知远》十二）

(27)则兀那瑞连便是证见，怕你不信後，没人处，问一遍。（关汉卿《拜月亭》；“怕”犹“若”）

(28)(锅子)若还破後，难折还他酒钱。（《古今小说》卷十五“若还”为同义复词）

这五句是有前置标记的假设句（“便”表示让步假设），“後”字虚化程度更高，“VP 後”就相当于VP，“後”可视为假设助词。

B、无前置标记者 在宋金元资料中，“後”出现在许多不用前置标记的假设句中，也应视为假设助词。这些句子最常见的是某些否定句和并列对举句：

(29)这个事是天教做，不恁地後，怎生隔着个恁大海便往来的？（《三朝北盟汇编》卷四《燕云奉使录》；“不恁地後”：不是这样的话）

(30)有印後，为安抚；无印後，怎结束。（《刘知远》十一）

(31)恋着三娘，欲去不能去；待住後，如何受辛苦？（同上，二）

(32)得後，是自家采；不得後，是自家命。（《董西厢》卷一）

(33)不来後，是众僧大家采；来後，怎当待。（同上，卷二）

(34)是人後,疾忙快分说;是鬼後,应速灭。(同上,卷四)

(35)有酒後,宽洪海量;没酒後,腹热肠慌。(元曲《遇上皇》)

(36)主人不肯後,要如何? (《古今小说》卷15)

这类对举句的特点在于先列举两种相反或相对的情况,然后在正句分述两种不同的结果。其分句语义在于摆出情况,而不是指明时间。从句为否定句,意在指出相反的情况,而不是对时间的否定,所以这两种情况下“後”的假设助词身份尤为明显。当然,“後”也能在这两种情况之外的无前置标记假设句中充当假设助词,例如:

(37)说谎後,小人图什么? (《董西厢》卷一)

(38)周秀闻言,上复官人:“问这佳人,说着後话长。”(《宣和遗事》)

(39)不是不思量,说着後教人语长。(杜善夫《太常引》词)

“说着後”犹言“要说的话”,“说”是未然的行为,所以“後”表假设语气也很明显。

C、“时”与“後”互文对举

(40)欲把捉时无把捉,道虚空後不虚空。(吴潜《望江南》词)

(41)谗言可畏,十分不信後须疑;人气好毒,一息不来时便死。(《董西厢》卷七)

(42)怕不问时,权作弟兄;问着後,道做夫妻。(《拜月亭》一折[金盏儿]怕:若也)

(43)我有酒後,宽洪海量;没酒时,腹热肠慌。(《遇上皇》一折[鹊踏枝])

这些例子说明“後”与“时”的功能和词性是相同的;同时也说明这

两个助词曾一度并用。

(三)非假设句中的助词“後”

(44)把酒问春因底意,为谁来後为谁归?(五代 王周《问春》诗;为甚来啊为甚归)

(45)从来不惯伤春泪,为伊後,滴满罗衣。(陆游《一丛花》词)

(46)为你後,甘心憔悴。(赵长卿《贺新郎》词)

(47)瘦後因他瘦,愁後为他愁。(吕止轩《醉扶归》小令)

以上用法的“後”与时间条件无关,不表假设语气,纯为表示语气间歇的,其语法化程度较假设助词高。

2.2.3 小结

A. “後”语法化的条件、原因、过程等情况跟“时”基本相同。“後”演变为假设助词是对“时”的直接类推。

B.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假设助词“後”在五代时期已出现(见《祖堂集》),纯为停顿助词的用法在五代虽仅看到王周《问春》诗一例,但很可能两类用法产生于同一时期,时间相错不会太久。因为上古的假设助词与停顿助词既是用同一个标记(者、也),又是同时期出现的。“时”字也一样,初唐《王梵志诗》中同时出现“时”做假设助词和停顿助词的用法。如果要略分前后的话,从诱发“时”和“後”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为时间短语或小句来看,应该是假设助词用法在前,纯停顿用法稍后。

C. “後”与“时”同为表示时间的词,二者的句法位置又相同,所以能在相似的语境中发生类同的语法化运动。不过,助词“後”使用的范围和延续的时间都没有“时”广泛和久长。“後”多出现在宋金元词曲中,《刘知远》诸宫调中只用“後”不用“时”,明代文献中就基本不见了。与此相对,助词“时”则南北通用,历经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还残存在一些方言中。

D. 在功能上,目前还没有见到“後”出现在名词后边做话题标记的用法。这跟另一个语气助词“呵”的兴起有关。

三

3.1“後”与“呵”

3.1.1 语气助词“呵”的早期用例见于宋代文献,现参考太田(1958)的说明将其语法意义归纳如下:

a. 祈使、命令: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欧阳修词)|功名事,到头须在,休用忙呵。(杨无咎词)

b. 疑问、推测:仗何人细与,叮咛问呵?(秦观词)|那日尊前,祇今问有谁呵?|著甚情惊,你但忘了我呵。(周邦彦《满路花·思情》词)|莫是嗔人呵?(周邦彦词)

c. 感叹:想俺这等人好难呵!(关汉卿《调风月》一折)

d. 停顿:归来呵,休教独自,肠断对团圆。(李之仪词)|母亲呵,他是唐王驾下差往西天见佛求经者。(《西游记》十三回)

以上各例“呵”的位置可分为句末与句中两类:句末,表祈使、感叹、疑问等;句中,表停顿。其中表停顿的李之仪词一例,“呵”也像是假设助词。

3.1.2 假设助词“呵”盛用于元代,前举第(34)金代《董西厢》例中的“後”,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里都改成了“呵”。另据李泰洙(2000)考察,在新发现的反映元代本面貌的古本《老乞大》里,假设助词较多用“呵”(共93例),其他用“时”(共70例),面在其后经过修改、反映明初语言面貌的《老乞大谚解》中,93例“呵”被统统改为“时”。例如:

(48)你道的是呵,两三句话,便成了交易。(古本《老乞大》23a)

你说的是时,两三句话,便成了交易。((《老乞大谚解》9b5)

(49)使不得呵,你肯要那?(古本《老乞大》18b9)

使不得时,你肯要麼?((《老乞大谚解》59b2)

(50)既恁卖马去呵,咱每恰好做伴当去。(古本《老乞大》3a4)

(51)你既卖马去时,咱们恰好做火伴去。((《老乞大谚解》7b8)

在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假设助词也用“呵”:

(52)无体例勾当休行者!行呵,俺每根底奏者!((《元代白话碑——1268年整郢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53)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大官人立下五个肯劝谏的人呵,虽有差的勾当呵,也便改正,不失了管的地面。((《孝经直解》))

元杂剧里虽然也用“时”或“後”,但“呵”也常用:

(54)若不嫌弃呵,愿与哥哥做个兄弟。((《燕青博鱼》二折)

可以说,假设助词“呵”是元代文献的重要标志之一。到了明代,返回到主要用“时”,清代主要用“么”“呢”,很晚才用“的话”。

3.1.3 “呵”与“後”无来源关系

“呵”与“後”虽然都能作假定助词,但二者并没有来源关系。首先,二者句法位置有明显的不同。助词“後”出现于五代,只用在句中(包括从句句尾),从不出现在整个句子的末尾;而助词“呵”在出现之初的宋代主要用于整个句子的末尾,表达各种语气,只有表示停顿一项可用于句中,二者位置不重合。其次,二者的语法意义也有很大的差别。“後”只表示假设和停顿语气,而“呵”最初主要表示祈使、感叹、疑问、停顿语气,只是到了元代才大量用于假设

句。“後”表假设、停顿是从时间词虚化而来；“呵”表假设停顿是因为它本身是语气助词，我们知道，很多语气助词都可以用于句中（或从句句尾）表示停顿或假定语气，如“么”“呢”等。赵元任（1985）也指出，a、ne、me、ba 这四个助词都有表疑问和表停顿这两种作用。因此，“呵”与“後”虽然有部分功能重合，但各有原因，并不能说明二者有来源关系。文献中时有“後”“呵”互文对举表示假定语气的例子，也说明它们应是来源不同、功能有交叉的两个语气助词。例如：

（55）时来呵铁也争光；运去後黄金失色。（《金凤钗》
三折）

而且，在《刘知远诸宫调》中，假设助词用“後”，非假设语气的句末语气词用“呵”，分工明确。如卷三（黄钟宫）：“金印将来归去呵，红日看看西下落。”（尾）“金印奴家紧藏着，休疑怪不与伊呵。”

3.2 “後”被“呵”取代

虽然“呵”与“後”没有来源关系，但由于它们功能上的交叉和语音上的相近（刘勋宁文说文献中的“呵”应该读 he，不读 a），促使假设语气词“後”自元代渐渐融入功能更广的语气词“呵”之中，从而被“呵”吸收、取代。“後”和“呵”都是语气助词，既然“呵”的功能涵盖了“後”，从语言成分的经济原则来看，“後”就显得不太必要，甚至多余了；而且，“後”是个常用方位词，可兼表时间与空间，使用频率较高，再兼做假定和停顿助词容易产生混淆，可能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後”在与“呵”共存了一段时间後，最终退出了语气助词范畴。

太田氏（1958）认为“呵”不是从“後”变来的，这个观察是对的；但他认为“後”可能受到“呵”的同化，吸收了“呵”的功能，就是说“後”的假定助词用法是从“呵”吸收来的，则未中肯綮。事实是，助词“後”产生于助词“呵”之前，而且，如我们前面所详述，“後”跟

“时”一样,同样具有从时间词虚化为假定助词的义理和语境。“後”的假定助词用法是时间词“後”语法化而带来的;而“呵”表假定是因为它本身是个语气助词,做话题标记和表示停顿是语气助词的语法功能。

四 余 论

4.1 时间与假设

如前所述,“时”和“後”都是由时间词语法化为假设助词的。假设句的从句总是提出或设定某种条件,当这种条件实现时(或实现后),就会出现主句所述的结果,因此假设句大多包含或隐含着时间因素。由此来看,时间词“时”与“後”进入假设范畴并非偶然。吕叔湘(1982)指出时间关系句往往含有条件关系,而且有些时间关系句兼有假设之意,如英语的 when 也常兼有 if 意;德语时间和假设两种关系同用 wenn 一词。我在香港电梯内外都看到如下告示:When there is a fire do not use the lift(如遇火警,切勿使用升降机),可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反映了在时间与假设的关系上,这三种语言有共同的认知动因。不过,汉语的“时”和“後”位于假设小句的末尾,句法位置使它语法化为一个后置的助词;而在英语、德语中,时间关系词位于小句最前头,所以它通过转喻手段而用作句首假设连词。

4.2 有形与无形

这是就书面上说的。假设句必于句中有停顿(紧缩句除外),有的有标记,如在从句句末用“者、也、时、後、呵、么、呢、的话”等,有的没有标记,如吕叔湘(1982)所举《儿女英雄传》两例:

你是问道儿的吗?——问道儿,下驴来问啊。(14回)

这个大礼儿断错不得;错了,人家倒要笑话。(35回)

“问道儿”、“错了”之后不仅有停顿,而且语调应是上扬或加重的,有时还要带拖腔半拖腔。停顿,在书面上可以用逗号标示,而语调就无法标示了。假设句的这些无标记的要素也很重要,不应忽视。

附记:

“後”用如完成体助词的例子如:“菱花照後容虽改,薳草占来命已通。”(刘禹锡诗)此言虽然照了镜子知容颜改,但是占了薳草却知命已通。“後”与“来”对举,表示两个动作的完成,“後”字表示时间的意思较虚,既可理解为“菱花照罢”,也可理解为“菱花照时”,但以实义理解为照镜子之后也可通。

元代文献中还有“时”与“呵”互文的例子:“玄德公也,若你不来时,万事罢论;若来呵,便插翅也飞不过这大江去。”(《黄鹤楼》一、白)“我则道别离时易,谁承望相见呵难。”(《太平乐府》卷二[水仙子·怨别离])

参考文献:

艾皓德.近代汉语以“时”煞尾的从句.中国语文.1991,(6):451~459

曹国安.“时”可表示假设.古汉语研究.1996,(1)

大内田三郎.水浒传の言语——助词“时”について.人文研究(大阪)十一卷.1990,(4):261~278

胡明扬.《老乞大》复句句式.语文研究.1984,(3):35~40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42~243

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从句句尾助词研究.中国语文.2000,47~56

刘勋宁.青海西宁话表示假设的语气词[·xɔ]与近代白话的“呵”.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371~

376

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吕叔湘.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2000

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史有为.主语后停顿与话题.中国语言学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江南书院(东京).1958

王克仲.意合法对假设义类词形成的作用.中国语文.1990,(6):439~447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333~334

项 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7,271~308

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第六章.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赵京战.关于假设义类词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94,(4)

张炼强.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中国语文.1990,(3)

张 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中华书局.1953,333~336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节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原载《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

《老乞大》语序研究

0.1 本文利用《老乞大》不同时代的四个版本,对其中的语序问题进行动态的比较研究。这四个版本是:(1)古本《老乞大》(标为 A),1998 年发现,为韩国一私人收藏家所藏刊本,据考,可信为元代所编,今年即在韩国重印出版。(2)奎章阁本《老乞大谚解》(标为 B),此本大体反映元明时代的语言。(3)乾隆 26 年(1761)刊本《老乞大新释》(标为 C)。(4)乾隆 60 年(1795)刊本《重刊老乞大》(标为 D)。为了便于检索和称引,我们把《老乞大》全文分成了若干句节,如 1A 就指古本《老乞大》的第一个句节,12B 就指《老乞大谚解》的第 12 个句节。通过这四个本子的语序对比研究,可以大体看出元明清时期汉语在语序方面的某些发展变化,这些确凿的语言事实能在理论上和材料上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出很有价值的参考。

0.2 汉语与印欧语不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词语在句中的语法功能不是通过词形本身的变化,而是通过词语的顺序来表达的。汉语语序的基本规律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动词在前,宾语在后;状语、定语在中心语之前,补语在中心语之后。这些基本语序自古至今有很大的继承性和稳固性。《老乞大》各本也基本上继承了汉语的上述语序特点,所以阅读起来没有很大的障碍。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老乞大》各本,尤其是古本和谚解本中也存在着一些跟上述基本语序不相一致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宾语的位置、

某些副词状语的位置、复句中某些连词的位置等方面。这些相异之处反映了元代汉语的某些特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1. 宾语的位置

如上所说,汉语自古以来沿袭着动词在前,宾语在后的 VO 式语序。先秦汉语在特殊情况下宾语的位置可以在动词前面。例如:

- a. 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
- b. 疑问句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 c. 肯定句中代词“是”做宾语前置: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左传·襄公二年》)

以上是就先秦汉语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在上述情况下也有宾语置于动词之后的句例。

《老乞大》中宾语前置的情况跟先秦的三类很不相同,既不限于否定句、疑问句,也不限于代词类。《老乞大》里的前置宾语主要有两类,一类以受事主语的面貌出现,另一类以处所状语的面貌出现。由于第一类宾语前置的问题容易跟话题主语相混淆,而语义上的受事又不等于结构上的宾语,所以有必要先对受事主语句做一点说明。

古今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的受事主语句,主要有下列共同点:

(1)受事主语 受事主语实际是话题主语的一种,它位于句首,有强调的作用,谓语是对它的描述、说明。受事主语所指的事物总是确定的,或泛指(概指一切事物、任何事物)。除了语义上的强调作用之外,受事主语还能在句子结构上起到使音节匀称均衡的作用。因此,如果把受事主语移到谓语动词之后,不仅使话题主语消失,语义不突出了,而且也使句子的音节结构失去了平衡。

(2)谓语动词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一般是及物动词,而且往往是复杂的,不能是单个动词,也就是说,或者动词前面有修饰语,或者后面有补语、宾语等,或者兼而有之。

我们把《老乞大》中符合上述特点的受事主语句看做话题句,一般不作为宾语前置现象看待。例如 120A、B“盛草的筐儿也没”, 173A、B“姓也不曾问”等就是话题句,是为了突出语义而把受事成分前移的,副词“也”就是起强调语气作用的。动词前有副词“都”的受事主语句也是话题句,例如 182A、B“骆驼都打了也”, 598A、B“这些行货/货物都买了也”等,“都”的语义指向前面的受事主语,使前面的事物带有概遍性,因此是话题,不是前置宾语。本文所说的宾语前置,是就一个受事主语句的底层句法结构面言的,在表层结构上它是一个主谓句或主谓谓语句,但根据一些标准可以判断它的底层结构是 OV 式。把受事主语句中的话题句与底层结构 OV 式严格加以区分是相当困难的,这里只提出一些大致的标准,并举例说明。

1.1 受事主语为前置宾语

1.1.1 谓语动词为一般及物动词

(1)在主谓谓语句“S S' V”中(S 是大主语, S' 是小主语),当 S 为谓语的施事, S' 是 V 的受事时,可把 S' 看做前置宾语;或者,在受事主语句“SV”中,可以在句首补出施事大主语,原来的受事主语降位为小主语。例如:

483A 咱每为父母心尽了,不曾落后。(31a6;a 指正面,b 指反面,下同)

483B 咱们尽了为父母的心,不曾落后。(38b3/204;斜线后面的数字为后时刊本的页数,下同)

A 本的 SS'V 式主谓谓语句 B 本改为 SVO 式,可知其底层结构应为 SOV 式。

496A 咱每结相识行呵,休说那你歹我好,朋友的面皮休教羞了。(32a7)

496B 咱们结相识行时,休说你歹我好,朋友的面皮休教羞了。(41a7210)

496C 咱们会相与人,不要说你歹我好,不要羞了朋友的面皮。(37b6)

496D 咱们相好的人,不要说你歹我好,休羞了朋友的面皮。(44a3/221)

496 句的三个分句共有一个大主语“咱每/咱们”,A、B本“咱每/咱们……朋友的面皮休教羞了”为主谓谓语句,C、D本改为SVO式,可把A、B本“朋友的面皮”视为前置宾语。

503A 咱每世上人做男儿行呵,自己祖上名听休坏了。(32b6)

503B 咱们世上人做男儿行时,自己祖上的名声休坏了。(43a7/213)

此句也可以补出施事主语“咱们”来。C、D本改为VO式“须要想自己祖上的声名,不可坏了”,这表明A、B本的原话已不大符合后来的句法了。

494A 茶饭喫了呵,椀子家具收拾者。(32a5)

494B 茶饭喫了时,椀子家具收拾了。(41a10/209)

494C 到吃完了饭,椀盏傢伙收拾了。(37b4)

494D 吃完了饭,椀盏傢伙收拾了。(44b6/ss222)

在A、B本里有两句受事主语句,到了C、D本里,前一句改为VO式,后一句仍为受事主语句。但是,从上文看,这一句可以补出施事主语“咱每/们”,所以受事主语“茶饭”“椀子家具”可视为前置宾语。

(2)如果A、B本(或其中之一)受事主语句“SV”在C、D本(或

其中之一)改为 VO 结构,或前加“把”字,可以认为 A、B 本“SV”结构的底层为 OV。例如:

493A、B 布帐子疾忙打起来,铺陈整顿者,房子里搬入去者。

鞍子辔头,自己睡卧房子里放者,上头著披毡盖者。那的之后,锣锅安了者,疾忙茶饭做者。(32a2、41a1/209; B 本“者”“著”作“着”)

493C 把帐房忙打起来,铺陈整顿了,搬到帐房。鞍子辔头,搬到自己睡处放下,上头把毡子盖了,然后埋好了锣锅,疾忙做茶饭。(37b1)

493D 把帐房忙打起来,铺陈整顿了,鞍子辔头,搬到自己睡处放下,上头把毡子盖了。然后安了锣锅,疾忙做茶饭。(43a8/219)

在 A、B 本中有四句受事主语句:“布帐子疾忙打起来”、“铺陈整顿者”、“锣锅安了者”、“疾忙茶饭做者”。与此相对,在 C、D 本里前两句前加介词“把”,改为处置式;后两句改成了 VO 式,原受事主语可视为前置宾语。

(3)在句尾有祈使语气词“者”的受事主语句“SV”里,V 为单个动词的(不限于单音节,也包括凝固为一个词的双音节动词),其底层结构应为 OV 式。上举 493A、B 本“铺陈整顿者”、“茶饭做者”就是其例。再如:

78A 恁主人家一就与俺买去,买著一斤肉者。休要底似肥的,带肋条肉买者。(6b3)

78B 你主人家一就与我买去,买一斤肉着。休要十分肥的,带肋条的肉买着。(19a1/37)

这两句里既有通常的“买……肉”,又有“……肉买”,由于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是单个动词“买”,而且可以补出隐含的施事主语“你”,所以可把“带肋条的肉”看做前置宾语。C、D 本把最后一句

改为“带肋条的就好”，可见原来“带肋条的肉买者”的说法到了清代已不通行了。

(4)句首有状语的受事主语可视为前置宾语。因为既然受事主语不出现在句首，它当然不是话题。上举 493A、B 本的“疾忙茶饭做者”是其例。再如：

68A 主人家，别处快镢刀借一个去。(6a2)

68B 主人家，别处快斲刀借一个来。(17a8/33)

68C、D 主人家，你可往别处借一把快斲刀来。(6b6、17a5/35)

A、B 本前置宾语“快镢刀”是动词后数量宾语的中心语，C、D 本改为 VO 式。

下面例句中的谓语动词为动补结构，也可依据前面的标准来判断受事主语句的底层是否为 OV 式。

7A 俺汉儿人□(缺字应为“上”)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1a9)

7B 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少汉儿言语省的。(2a6/3)
“省的”意思是“懂得”。“些小/些少汉儿言语省的”在 C、D 本中被改为“些须知道官话”(1b1、2a8/5)，改成了 VO 式，说明 A、B 本原来是宾语前置句，与清代的表达方式不相合。

205A 底似的汉儿言语说不得的上头，不敢言语。(15a1)

205B 他汉儿言语说不得的，因此上不敢说话。(46b7/92，
“语”为“话”之误)

205C 他不懂汉人说的官话，故此不敢说话。(17a3)

205D 他不懂中国的话，故此不敢说话。(47b2/96)

A 本“底似的”义为这样的，如此的，在文中代指从朝鲜来的商人。A、B 本的大主语是施事，底层结构实为 SOV，“汉儿言语”是前置宾语。C、D 本改为 SVO 句。

326A 俺汉儿言语不甚理会的,……(21b7)

326B 我汉儿言语不理会的,……(5b7/138)

这组例句跟 205 的情况相近。C 本作“我中国的话,我不能会”。(24b8)出现了两个“我”,其上应为衍字,或为“我中国的话不能会”,或为“中国的话我不能会”,前者可看作 SOV 式,后者为话题主语句。D 本作“我们不会中国的话”(6a6/145),改为 SVO 式。

479A、B 咱人,今日死的,明日死的,不理会的。(30b/10、37b4/202)

这句话的小主语是两个并列的主谓结构,在句中是“不理会的”的前置宾语。

609A 二两半卦钱留下者。(39b7)

609B 五分卦钱留下着。(65a6/257)

这是算卦先生事毕让顾客留下算卦的钱时说的话,汉语一般说留下多少多少卦钱。这两句不合汉语的习惯说法,C、D 本改为话题主语句:“五十卦钱你留下。”(45b6、67a1/267)仍感别扭。

《老乞大》中动补结构“将来”带宾语一般为 VOC 式,如 577A “将好钞来”,577B “将好青丝来”,但是也有宾语位于动词之前的例子:

363A 那般者。布袋里钞将来都检了,着牙人先检了。
(24a1)

363B 这们便布袋里取银子来,着牙人先看。(13a3/153)

363C 既这么着,银子在布袋里,取银子来,教牙人先看了。
(27b2)

“布袋里钞将来”意思是从布袋里把钱拿出来检查一下。此句可加“把”,受事主语“钞”前面又有状语,应为前置宾语。B、C 本把“钞将来”改作“取银子来”,也即把 OVC 改为 VOC。

(5)连动句的宾语通常位于动词之后,如位于动词之前,应视

为前置宾语。例如：

455A 咱每远垛子放者射，赌一个羊。(29b3)

455B 咱们远垛子放着射，赌一个羊。(33a4/193)

455C 咱们放个远垛子，射几箭，赌一个羊吃如何？(34b6)

455D 咱们放个远垛子，射几箭，赌个输赢。(35a10/203)

这组例子中有施事主语“咱每/咱们”，A、B本宾语“远垛子”在第一动词“放”之前，为SOV₁V₂式，C、D本改为SV₁OV₂。

1.1.2 谓语动词为“有”

“有”在《老乞大》中有两个意义，一个表示领有，一个表示存在。文本中既有“有+名”式，也有“名+有”式，其中常有C、D本把受事主语句“名+有”(SV)改为“有+名”(VO)的现象。由于此类句子中的谓语动词“有”为单个动词，跟一般的话题句不同，根据前面的标准，可把“名+有”的“名”看做前置宾语。例如：

101A 为什么这般的歹人有？(8a5)

101B 为什么有这般的歹人？(24a6/67)

101C、D 分别作“为什么有歹人呢？”(9a4)，“为什么有歹人？”(24a4/49)由于句首有疑问副词，可把A本看成OV式，B、C、D三本把它改为VO式。

431A 卖的好弓有么？(27b10)

431B、C、D 改为“有卖的好弓么？”(27b4/180、32b1、29a2/191)也是把原句改为VO式。

432A 你将这一张黄桦弓上弦者，我试拽，气力有呵我买。
(28a1)

432B 你将这一张黄桦弓上弦者，我试扯，气力有时我买。
(27b7/182)

C、D本把“气力有”改为“有……气力”：你把这一张黄桦皮弓上了弦，我拉拉试试看有几个气力，若好，我就买了去。(32b2、29a5/

191;D 本无“试试”和“去”)

438A、B (有卖的弓弦时将来。……)弦有,你自拣着/着买。

(28a9、29a4/185;“弦”A 本作“絃”)

438C、D 改为:“有,你只拣着买。”(33a2、30b4/194)只用动词回答,说明“弦”并不是需要强调的话题语。

250A (这一两半没些眉眼,使的么?)好钞有,你将去。

(17b9)

顾客嫌店家找的钱不好,店家说有好钱。“好钞有”为 OV 式。

505A、B 父母在生时,家法名听好来,田产物业有来,孳畜头

匹有来,人口奴婢有来。(32b8、43b4/214;“名听”

“物业”B 本作“名声”“家计”)

505C、D 他父母在生时,家法名声好来,田地房产都有,又有

骑坐的牲口,使唤的奴婢。(38a9、45b7/224;“生”,D

本作“世”)

在 A、B 本中并列的三个“名+有”句在 C、D 本中都作了改动,“田产”句加上了副词“都”,变成明显的话题主语句,后两句改为 VO 式(“有”字统管两句)。

“有”的否定式为“无”、“没有”,它们的受事宾语也往往位于其前,但此类例句多可用话题句解释,故暂时存疑。例如:

95A (大嫂,将蒿荐席子来,与客人每铺。)席子无,兀的三个蒿荐与恁铺。(7b8)

95B 作“席子没”(23a5/45),95C、D 作“席子没有”(8b6、23a2/47)。

表示存在的“有”另有一义相当于“在”,但被后人误解为有无的“有”,下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296A、B 拜揖哥哥,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么?

(20a8、1a129)

这是问李舍在不在,而不是问有没有李舍,是主谓句。蒙古语里表示有无和在否同用动词“有”,C本的编写者不明此情,以为是问有无,就改为“这店里却有卖毛蓝布的朝鲜客人李舍么?”关于这类意义为“在”的“有”字句中处所宾语的位置放在下一节(1.2)中讨论。

1.2 处所宾语前置做状语

(1)这类现象主要出现在谓语为趋向动词“来/去”的句子中。处所宾语本是目的地,位于不及物动词“来/去”之前,相当于表示目的的处所状语。例如:

19A 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2a7)

19B 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5a4/9)

“汉儿田地里来”即为“来汉儿田地里”之意,19C、D作“到了中国地方”(2b1、5a4/11),改为VO式。

99A 我先番大都来时,你这店西约二十里来地……(8a1)

99B 我先番北京来时,你这店西约二十里来地……(23b4/46)

此句意思是“我上次来北京时……”。由于“北京”前不用介词“从”或“到”,表示目的的处所宾语又放在了“来”的前面,容易产生歧义,也可理解为“从北京来”,C、D本就由于这样误解把此句改为“我前番从北京来时”(8b10、23b2/48)

45A、B 你说的恰和我意同,则/只除那里好,但是直东/辽东去的客人每/们别处不下,都在那里安下。(3b9、10a8/19)

“辽东去的客人们”从上下文看应是“从辽东去北京的客人们”之意。45D作“大概辽东来的客人们别处不下”(10b1/22),把“去”换成“来”,理解为“从辽东来的客人们”,意思是对的。

401A 恁好坐的者,我赶者羊,到涿州卖了便回来。(26b1)

401B 火伴,你再下处好去坐的着,我赶着羊,到涿州卖了便

回来。(21a5/169)

A 本没有出现“去”,B 本“下处好去坐的”意为“到住处好好等着”。C、D 本作“你往下处坐着”(30a6、22a4/177),改成 VO 式。

384A、B 俺/我赶者/着马,下处兑付草料去。(25b7、18b5/164)

这是连动句,直译为“去下处兑付草料”。C、D 本作“往下处兑付草料去”,用介宾结构做状语。

183A 小的,你将碗、碟、罐儿去。(13a10)

183B 小的,你将碗、碟、罐儿家去。(41b5/82)

183C、D 小厮,你可拿了碗碟与瓦罐回家去。(15a8、42a8/85)

这组也是连动句。A 本谓语动词“去”不带处所宾语,B 本处所宾语“家”前置为状语,C、D 本改用动宾结构“回家”做状语。

59A、B 街北这个店子是俺/我旧主人家,咱每/们则/只这里下去来。(5b2、15b5/30)

“来”为语气词,“去来”连用有提议、劝诱语气。C、D 本作“咱们就到那里下”(6a6、15b3/32),把位于句后的动词“去”换成位于前面的介词“到”。

403A、B 咱每/们铺里商量去来。(26b3、21b5/170)

403C、D 咱们且到铺里商量去。(30a9、22b3/178)

不仅前加介词,而且仍保留“去”,不过“去”变为补语。

(2)动补结构(补语为趋向动词)的处所宾语在 A、B 本里往往以处所状语的身份前移,而在 C、D 本里则改为 VO 式。例如:

385A、B 你税了契时,到明日,俺/我下处送来。(25b7、18b7/164)

385C、D 你税了契,明日送到我下处来罢。(29a8、19b4/172; D 本无“罢”字)

493A、B 铺陈整顿者/着,房子里搬入去者/着。(32a2、41a2/209)

493C 铺陈整顿了,搬到帐房。(37b2)

此外,还有少数单个动词的处所宾语以状语的身份前移的现象。例如:

493A、B 鞍子轡头,自己睡卧房子里放者/着。(32a3、41a4/209)

493C、D 鞍子轡头,搬到自己睡处放下。(37b2、43a10/219)

C、D本改用VC式。

(3)A本表示存在的动词“有”,当它的意义为“在”时,处所宾语位于其前,充当处所状语。B本把“有”意译为“等候”,C、D本则改用介宾结构做状语。例如:

376A 更不时,恁都则这里有者。(25a6)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不,你们就在这里等着。“这里有者”不合汉语的表达,B本作“你都只这里等候着”(16b10/160),C、D本作“你们都在这里等候着”(28b7、17b10/168)。

384A 你都这里有者,我税契去。(25b6)

384B 你都这里等候着,我税契去。(18b3/164)

384C、D 你们在这里等候着,我税了契就来的。(29a7、19a10/171)

除了古本外,其他三本都不用“有”,C、D本都改用“在+处所名词”做状语,这说明“有”的这种用法是元代特有的。

1.3 系词否定式宾语的位置

在古本《老乞大》中,系词“是”的宾语位于其后,但是“不是”的宾语却往往位于其前。例如:

368A (恁这马是一主儿的那,是各自的?)一主儿的不是,这四个伴当是四个主儿。(24a7)

“一主儿的不是”不合汉语的通例，B、C、D 三本都去掉了这一句，只说“这马是四个主儿的”(14a2/155、27b9、15a3/163)。

517A 秋里系针铁，寻常的不是，有玲珑花样的。(33b7)
此句意思是秋天带的针铁不是寻常的，而是有花样的。“寻常的不是”不合通常说法，B 本改为“寻常的不用”(46b3/220)，C、D 本改为“平常的不用”(39a8、48b4/230)，就通了。

555A 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36a5)

555B 我买时，不是买自穿的，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54a2/235)

555C、D 我买去，不是自家穿的，……。 (41b9、56a3/245)
这组例子也是 A 本“不是”位于句尾，B、C、D 三本“不是”位于句首，这说明否定系词“不是”用于句尾的用法应是元代汉语的特点。

2. 副词的位置

副词一般靠近或紧挨在被修饰的中心语之前，但《老乞大》中有与此常例相违者，即副词远离被饰成分。有以下几种情况：

2.1 副词“也”紧跟在主语之后。例如：

45A 你道的是，我也心里那般想著有。(3b9)

45B 你说的是，我也心里这般想着。(10a6/19)

45C、D 你说的是，我也心里这么想着。(4a8、10a7/21)

现代汉语通常说“我心里也那么想”，而这四句为主谓谓语句，“也”位于大主语“我”之后，修饰整个主谓谓语，远离小谓语。

《朴通事谚解》中有同类现象：

我也跟官人时节，那里问雨雪阴晴。(15a4/289；意思是：我跟着官人时，也不管雨雪阴晴)

“也”跟在主语和时间状语之间，远离谓语。

2.2 副词“好”离被饰成分较远。例如：

401A 恁好坐的者。我赶者羊,到涿州卖了便回来。(21a5/169)

401B 火伴,你再下处好去坐的着。我赶者羊,到涿州卖了便回来。(21a5/169)

401C、D 火伴,你往下处坐着。我赶这羊,往涿州去卖了就回来。(30a6、22a3/177)

“恁好坐的者”意思是“你在这里好好呆着(等我)”,“好”在被饰成分之前。但当有两个谓语动词时,“好”却位于另一动词“去”前,离开原被饰动词“坐”,作“好去坐的着”。C、D本不用“好”,改作“你往下处坐着”,说明B本的表达已不合当时的口语。

副词状语离被饰成分较远的情况在《朴通事谚解》中也可见:

咳,这官人好寻思、计量大。(22b8/48)

意思是“这官人的寻思、计量好大”,“好”远离被饰成分“大”。

2.3 谓语为动补结构时,副词位于整个动补结构之前,远离被修饰的补语。例如:

90A 那般时,马每分外吃的饱。(7b2)

90B 这般时,马们分外吃的饱。(22a5/43)

90C 似这般喂法,这马是分外吃的饱。(8a9)

90D 似这般喂,那马分外吃的饱。(22a1/45)

现代一般说“马吃得分外饱”,而《老乞大》四本都作“分外吃得饱”,副词“分外”远离补语“饱”。

600A 这里有五虎先生,最算的好有,咱每那里算去来。(39a8)

600B 这里有五虎先生,最算的好,咱们那里算去来。(63b6/254)

600C 这里有个五虎先生,最是算的好,咱们就到那里算卦。(45a6)

600D 这里有个五虎先生,看命最好,咱们到那里问问。
(65b4264)

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算的最好”,A、B、C 三本的“最”修饰整个句子,“最”远离补语“好”,只有 D 本改为“最好”。

《朴通事谚解》和《朴通事新释》中也有同样的现象:

徐五的徒弟李大,……那厮十分做的好。(25b9/188、32a10)

当程度副词“十分”等与禁止词“休”“休要”同时出现时,“十分”位于禁止词前,与现代汉语相反。例如:

100A 你底似的休早行,俺听得前头路涩有。(8a4;“底似”:
这样,如此)

100B 你十分休要早行,我听得前头路濇。(24a3/47;“濇”为
“涩”的异体字)

“你底似的休早行”按现代的语序应为“你休底似的早行”,意为“你不要这样早走”。B 本语序与 A 本同,但 C、D 本改为“你们不要十分早行”,跟现代汉语的语序一致了。

《朴通事谚解》的同类例子如下:

我再没高的了,官人十分休驳弹。(37b8/212)

你十分休小看人,常言道:“寸铁入木,九牛之力。”(36b/332)
这两句中的“十分”在现代汉语里要用“过子”或“太”,意思是“官人不要过于挑剔”,“你不要太小看人了”。

顺接关系复句中,副词“便”位于前后两个分句之间。例如:

281A 那般呵,俺迎伴当每去。(19b4)

281B 这们,便我迎火伴去。(61b7/122)

281C 既这等便当,我们就定在这房里住,且迎接火伴去。
(22a6)

A 本没用副词,B 本把“便”用在分句之间,C 本把“便”误解为“便当”,说明 B 本的用法未被理解。C 本在主句动词前加副词“就”,

与现在的语法相合。

3. 连词的位置

这里讨论的是复句中的两个连词“既”和“怕”，它们都出现在前一分句的句首，而且在主语的前面。

3.1 既 现代汉语中连词“既”只用在前一分句主语后，不用于主语前，多用于书面语。古本《老乞大》中情况相反。例如：

336A 既你待卖时，咱每商量。(22a8)

336B 你既要卖时，咱们商量。(7b2/142)

336C 你揔要卖的，咱们好商量。(25a9)

336D 你揔要卖呢，咱们好商量。(7b10/148)

这四句中 A 本“既”位于主语前，B 本“既”位于主语后。C、D 本把“既”改为副词“揔”(即“总”)，意思稍变。

419A 既你知道价钱，索什么多说？拣好钞来，卖与你。
(27a7)

419B 你既知道价钱，要什么多说，拣好银子来，卖与你。
(25a10/177)

419C、D 你既知道价钱，我也不多说了……(31b4、26a10/
185)

只有 A 本“既”位于主语前，其他三本都位于主语后，跟现在的语序一致。

3.2 怕 假设连词“怕”是宋金元时的俗语词，义为“如、若、倘”，句中如有主语时就用在主语前面。如《董西厢》卷二：“相国夫人，怕伊不信自家说。”关汉卿《拜月亭》：“怕哥哥不嫌相辱呵，权为个妹。”《老乞大》A、B 沿用这一语序。例如：

66A、B 怕你不信时，别个店里试商量去。(5b10、17a1/33)

66C、D 你若不信我的话么，到别个店里问问去。(6b3、16b6/
34)

C、D本把“若”放在主语后面,跟现在的语序一致。

4. 与表达法和词义有关的语序问题

有些句子读着觉得别扭,其实跟语序没有直接关系,有的跟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关,有的跟词语的意义已经虚化有关,这里附带讨论一下。

4.1 状语与补语

《老乞大》中有些用状语表达的句子在现代汉语里往往用补语表达。例如:

149A 这桥便是我夜来说的桥,比在前喂好有。(11a10;“喂”用如“很”)

149B 这桥便是我夜来说的桥,比在前十分好。(35a1/69)

149C 这坐桥就是我夜里说的桥,比从前十分修好了。
(12b8;“夜来”的意思是“昨天”C本误解为“夜里”)

149D 这坐桥就是我夜来说的桥,比从前十分收拾的好了。
(35a2/71)

这组表示比较的例子现代要用述补结构表达,说成“比以前好得多了”,或是“跟以前相比修得十分好”,而《老乞大》前三本都用程度副词做状语来表达。D本虽然用了动补结构“收拾的好了”,但是前面又用了程度副词“十分”,“十分”远离被饰补语“好”,跟2.3节的情况相同。

458A 高些个射,休小了。低射呵,甯到也。(29b5)

458B 高些个射,休小了。低射时,甯到也。(33a10/193)

458C 须要高些射,低了就甯过把子去了。(34b8)

“高些个射”,即“射高点儿”,“低射”即“射得低了”,现在用动补式表达。C本去掉动词“射”,仅作“低了就……”,与现在的说法一致。但《老乞大》中也有用动补式的,如457A“射歪了也”,457B、C、D“射的歪了”。其语境区别是“低射”是未然的,“射歪了”是已

然的。

4.2 “怎么”位于句末做谓语,问原因。

在现代汉语里,疑问指代词“怎么”主要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做状语,询问方式或原因,如“他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知道的?”“树木怎么枯了?”如果做谓语,则询问状况,不询问原因,后面要带“了”,如“你怎么了,这么不高兴”,“那件事怎么了?有没有希望?”可是在《老乞大》里,“怎么”除了上面的用法外,还可以位于句末单独做谓语,而且可以问原因,跟现代不同。例如:

17A、B 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2a4、4b3/8)

17C、D 你是朝鲜人,学他官话做什么?(2a7、4b4/10)

据吕叔湘(1985)考证,“怎”是“作”和“物(摩、么)”的合音词,原义是“作什么”(309—310页),C、D本改为“做什么”正与原义相合。如此看来,上举A、B本中“怎么”的用法相当于“作什么”是不奇怪的。最早的用例见于《景德传灯录》卷二四:“某甲怎么道未有过,打怎么?”元人杂剧和《水浒》中也常见(吕书314页)。不过,从C、D本把“怎么”改为“做什么”来看,可能到清代“怎么”单独做谓语、问原因的用法已开始动摇,也就是说,“怎么”已渐渐失去其作为动宾词组的意义,趋于凝固为一个疑问指代词。

297A 你寻他怎么?俺是他亲眷,才从高丽地面来。(20a9)
其他三本也都作“你寻他怎么”,说明“怎么”的这种用法清代并未绝迹。

267A (尽教,胡留下者,便使不得也罢。)你要那话怎么,使不得呵,你肯要那?(18b8)

267B (罢罢,将就留下着,便使不得也罢。)你说什么话,使不得时,你肯要么?(59b/118)

A本“你要那话怎么”的“要”据另三本应是“说”字之误。B、C、D三本都改作“你说什么话”,可见“怎么”的这一用法确实处于衰落

过程中。

5. 小结

5.1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老乞大》的语序问题,重点是宾语的位置,也兼及某些副词状语的位置和少数复句中连词的位置。判断是否为宾语前置,不是一桩易事。由于汉语自古就有受事主语句,而受事主语句又是话题句的一种,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把受事主语看做宾语前置。这样一来判断哪些受事主语句其实不是话题句,而是底层结构为 SOV 句式的表层反映,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但是,《老乞大》中确实有一些句子跟一般的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不同,它的表层结构虽为主谓句(SV)或主谓谓语句(SS'V),但是究其根底却是以 SOV 式为底层结构的。本文力图找出作为话题句的一般受事主语句与宾语前置句的形式和语义区别,虽然不是十分准确、细密,但总算初步提出了一些可资参考的鉴定标准。我们相信这些标准大体符合语言实际,是可用的。在这里还想补充一条软标准,这就是直感。直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对于现代汉语和古代、近代汉语语法、语用常规的认识,它有时往往相当准确。

5.2 《老乞大》A、B 本中的特殊语序应是当时北方汉语真实面貌的反映。北方自古以来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错杂居住的地方,语言接触使北方汉语受到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族)很深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现代西北方言看得很清楚。下面拟以甘肃临夏方言、青海西宁方言、宁夏银川方言、陕西延川方言为参照,来认识《老乞大》中的特殊语序现象。

5.3 宾语前置问题 《老乞大》中宾语前置现象主要有四种:一般及物动词的宾语前置;系词否定式(不是)的宾语前置;趋向动词“来/去”的处所宾语前置。这四种宾语前置现象的语法背景不同,性质不同。

5.3.1 阿尔泰语的语序是 SOV,《老乞大》A、B 本中一般及物动词后的宾语前置现象就是受这种语序影响的结果;由于汉语本来就有受事主语句,所以有可容纳性,接受起来具有天然的便利条件。张成材(1998)介绍西宁方言有“宾+动”式:你茶喝、馍馍吃(你喝茶,吃馒头)|爸爸一个洋糖给了(叔叔给了一块水果糖)。王森(1993)介绍临夏方言只有带“是”的句子语序与北京话一样,其余都是“宾+动”式。例如:我箱子揭开者三块钱拿出来了(我打开箱子拿出了三块钱)|我我的亲人想者(我想我的亲人)|他他的成绩知道了(他知道了他的成绩)|别人家背后你的脊梁不要叫戳着(别叫别人在背后戳你的脊梁)。这都说明 SOV 语序对西北汉语方言的影响是很深的,《老乞大》里的宾语前置现象也应做同样的解释。这种底层为 SOV 式的主谓谓语句毕竟与汉语的通常表达方式有抵触,所以在清代本里修订者往往按照当时汉语的习惯说法把它们改为 SVO 式。

5.3.2 阿尔泰语表示领有某物时,是把事物名词放在前,动词“有/没有”放在后,作“名+有/没有”,事物名词为主格,不是宾格。汉语则相反,作“有/没有+名”,名词是宾语。《老乞大》A 本中的“名+有”如“为什么这般的歹人有”,“气力有呵,我买”等是受阿尔泰语语法影响的结果,从汉语的角度看,就是宾语前置了。西宁话:家里人有啊(家里有人吗)?|你们学校几个老师有啊(你们学校有几个老师)? 临夏话:解放前河州城里医院没有,西医没有(没有医院,没有西医)。这些也是同类现象。

5.3.3 阿尔泰语表示判断时,总是把名词或短语放在系动词之前,进行否定判断时也是如此,即总是把否定判断词放在句末。名词或短语是主格不是宾格。《老乞大》中类似“自穿的不是”,“一主儿的不是”,“寻常的不是”等是这种语法特点的反映。汉语的语序正相反,从汉语的角度看,以上例句中的名词或短语就是前置宾

语。临夏话否定句中有一种“词/短语+的”的格式与《老乞大》十分相像：“明早”，“明天早晨”的不是（“明早”不是“明天早晨”）|我谦虚的不是，也保守的不是（我不是谦虚，也不是保守）|我新衣裳没有的，有了没穿的不是（我是没有新衣裳，不是有而不穿）。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乞大》中这种语序的语言背景与阿尔泰语有关。

5.3.4 阿尔泰语表达什么地方去时，是把表示目的地的处所名词放在动词“来/去”的前面，作处所状语。《老乞大》中“汉儿田地里来”（19A），“我先番大都/北京来时”（99A、B），“铺里商量去来”（403A、B），“下处兑付草料去”（384A、B）等都是这种语法特点的反映。汉语相反，把处所名词放在动词“来/去”的后而，做处所宾语。按照汉语的观点，上述句子就是处所宾语的前置。西宁话：昨晚夕，我你家里去了（昨晚我到你家里去了）|家上海去过，我还没去过（他去过上海，我还没去过）。张崇（1990）介绍延川话把普通话的“趋向动词+处所宾语”说成“主语+处所名词+趋向动词”，例如：你学校去格来？（你去过学校吗；“来”为语气助词）|你山里上去（你上山去/你从山里上去）|他延川回来了（他回到延川了/他从延川回来了）。

在上述宾语前置的四种现象中，严格来说，只有第一种，即一般及物动词前的名词性成分是前置宾语，因为其底层结构是SOV式，其他三种的底层是主谓结构或状中（状动）结构，只是我们站在汉语语法的立场把它分析为前置宾语而已。尽管上述四种特殊语序的背景、性质不同，但都反映了阿尔泰语的影响，而且，这些特异现象到了清代本里大都被纠正，改成合乎汉语语法惯例的表达。

5.4 某些副词状语的位置

《老乞大》A、B本中某些副词作状语有远离被饰成分的现象，也可以在现代西北方言里看到。李树俨、张安生（1996）介绍银川方言否定句中程度副词“甚、太”等可以放在禁止词“罢（不要）”之

前,也可以放在其后。例如:辣子甚罢种得稠了/辣子罢甚种得稠了(辣椒别种得太稠了)|饭太罢舀得满了(饭别舀得太满了)。西宁方言中否定词在其所修饰的状语后面:他常常按时不上班|你阿蒙好好不学习(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之个小说我仔细没看过(这个小说我没仔细看过)。临夏方言在否定句中都取“状+否定词”的语序,如:有的小学生书好好地不念者(不好好地念书)|房子各处胡不要盖(不要到处乱盖房子,“不要”连读)|这几年我们家这么着没团圆过。副词充当状语时,大多放在名词性成分后面:这个还不算,还比这麻达的事情有呢(比这麻烦的事情还有呢)|娃娃病下了,我还医院里没看去|我今个才他哈认下了(“哈”为宾语标记)。从上举各西北方言的情况来看,状语位置的异常现象仍是阿尔泰语法影响的结果,阿尔泰语的宾语在动词之前、否定词位于句末,这就使得状语的位置不得不作相应的变动。

关于状语代替补语表达的问题前面 4.1 节提到这个问题,这里用道布《蒙古语简志》里的材料作一说明。蒙古语里没有像汉语那么发达的补语表达方式,汉语用补语来表达的,蒙古语大都用状语来表达。下面的例句是对蒙语的直译:这毛太生长(这家伙的毛长得太长了)|米太放入(米放得太多了)|啊,你好修理(啊,你修理得真好)|这花真美好缝,啧啧(这朵花绣得真漂亮)|好冷啊,厉害冷有啊(冷的厉害呀)|今天厉害热有(热得厉害)|嗨,你又错做(你又做错了)|泥稀和需要(泥要和得稀一点)。由此可见,《老乞大》里以状语代替补语的现象也是阿尔泰语的影响所致。

至于复句中某些连词的位置与汉语的通例不相符合的现象如何解释,拟留作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道 布. 蒙古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3

- 张 崇. 延川县方志. 语文出版社, 1990
- 王 森. 甘肃临夏方言的两种语序. 方言. 1993, (3)
- 李树俨、张安生. 银川方言词典·引论. 1996. pp. 16~17
- 张成材. 西宁方言词典·引论. 1998. pp. 14~15
-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学林出版社, 1985
- 魏岫明. 汉语词序研究(唐山论丛 6). 台湾唐山出版社, 1992
- 李思明. 晚唐以来可能性动补结构中宾语位置的发展变化. 古汉语研究, 1992, (4)
- 屈承熹. 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朱文俊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 徐思益. 灵活性和原则性——简谈移位和省略. 中国语言学报, 1995, (6)
- 曹聪孙.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的 SVO 和 SOV 之争. 天津师大学报, 1996, (2)
- 袁毓林. 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 中国语文. 1996, (4)
- 项梦冰. 连成方言的话题句. 语言研究. 1998, (1)
- 姚振武. 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 中国语文. 1999, (1)
- 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原载《语言研究》2000 年第 3 期)

后置词“行”考辨^①

提要 历来有不少学者把后置词“行”看做是蒙古语格助词的译词。本文把宋元明文献中有后置词“行”的句子分为A式和B式两种,A式:动/介+N行(+VP);B式:N行+VP。通过对方位词“上、下”用法的历史考察,发现N上和N下有跟N行A式相同的用法,其语法意义也相同,因而认为:从句型的角度看,A式是汉语自古就有的,B式是元代汉语受蒙古语语序影响而出现的新句型。文章进而对山东、山西诸多方言点“上”字的白读音进行了调查和横向比较,认为后置词“行”是“上”的白读音的变音,也就是说,“行”的本字是“上”,其身份原本是个汉语词。

后置词“行”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张相(1953)卷六“行”字条根据宋元明词曲众多用例释作“这/那里、这/那边”。蔡美彪(1955)注云,“行”一般与“根底”同,在《元朝秘史》译文里常以“行”字对译蒙古语的与格助词,在元代碑文中很少用。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1956)针对此注指出,蔡氏实际上把“行”解释成蒙古语的译词,但“行”在欧阳修、柳永、周邦彦等北宋人的词里就已经出现了(218页左下)。另外,小林高四郎(1954)详细考察了《元朝秘史》旁译(即对译)和总译文中的情况,指出“行”分别与蒙古语的场所格、与格、宾格等助词相对应,并且推测使用“行”字对译,“并

^① 本文曾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古汉语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这次发表小有改动。承梅祖麟先生惠寄日本学者有关资料的复印件,十分感谢。

非完全不相干,可能有某种根据”,至于根据什么,他没有研究。此后,山川英彦(1967)对“N行”在《元朝秘史》里的用法进行了更为细致、全面的描写,并且指出“~行”具有把应置于动词之后的宾语提到前面的积极功能。80年代以来,余志鸿(1983、1987、1992)几篇文章都是讨论阿尔泰语与汉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问题,其中谈得最多最详的就是后置词“行”。余氏吸收了山川氏的研究成果,并扩而大之,举出元曲中的许多用例,明确地认为后置词“行”是汉语从阿尔泰语引进的语言现象。笔者近年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兴趣,读书思考,渐有一得,现写出向汉语史、蒙古语专家及各位读者请教。

—

宋元明白话文献里有一种用在代词、身份名词后面的“行”(音读如“杭”),如:“我行、你行、伊行、咱行、谁行”,“郎行、娘行、爹行、贱妾行、君子行”等;偶而也用在指事或指物的名词之后,如“我去那酒色财气行取一纸儿重招;我去那生老病死行告一纸儿赦书。”(元曲《来生债》二折[煞尾])宋代和明代比较少见,主要用于元代,下面分两类三种句式来介绍“N行”的用法和语法意义。^①

1.1 A式:“N行”前面有动词或介词

(一)动/介+N行

“~行”有的相当于“这/那里”,有的词义虚化,去掉也不影响句意。

(1)若言无意向咱行,为甚梦中频梦见?(柳永《木兰花》)

^① 有关“~行”的用例多采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行”条及余志鸿(1983、1987),此外也参考了最几年出版的有关辞书,恕不一一指出。

词；无意到我这里)

(2)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周邦彦《风流子》词；不到他那边)

(3)你晓夜兼程来探访，都只为我行。(《伍员吹箫》一折[天下乐]；都只因为我的缘故)

(4)衷肠说与谁行！(巾箱本《琵琶记》23出；说给谁，对谁说)

(二)动/介+N行+VP

“~行”有的相当于“这/那里”，有的词义虚化，去掉也不妨。

(5)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周邦彦《少年游》词；在哪里过夜的)

(6)离魂暗逐郎行远。(姜夔《踏莎行》词；跟随着情郎越走越远)

(7)他怎肯去汉王行保奏。(《气英布》三折[滚绣球]；到汉王那里保奏)

(8)你在我行口强。(《西厢记》一本二折[朝天子]；在我面前嘴硬)

(9)这烦恼待向谁行诉。(《潇湘雨》三折)

(10)新挑的手帕儿在谁行放？(《金瓶梅词话》73.15b；·前为回数，·后为页数，a、b分别表示正反面，下同；放在谁那里)

1.2 B式：“N行”前面没有动词或介词

(三)N行+VP “~行”虽无实义，但却不可少。

(11)动不动君王行奏。(《金钱记》三折[耍孩儿]；向君王奏)

(12)云：我官人行说了。(《魔合罗》三折；我对官人说了)

(13)嫂嫂母亲行更加十分孝。(《替杀妻》二折[滚绣球]；嫂嫂对母亲更加孝顺)

(14)又道是丈夫行亲热，耶娘行特地心别。(《拜月亭》；

对丈夫亲热,对爷娘有二心)

(15)大师行深深的拜了。(《西厢记》一本二折;对着大师深深地拜了)

(16)云:但较些呵,郎中行别有酬劳。(《拜月亭》二折;只要病好些,对郎中另有酬谢)

(17)床头金尽谁行借?(元乔吉《山坡羊·冬日写怀》曲;向谁借)

(18)我如今修一封平安家书,差人岳母行报知。(《倩女离魂》三折;向岳母报知)

(19)你这等贼心贼肝,我行须使不得。(《水浒》十四回;对我可使不得)

(20)知道你夫人行应难离,倒等的我寸心如醉。(《金瓶梅词话》61.4a;难离夫人)

B类的“~行”不可缺少,如果去掉,就使得“N行”的N由受事变为施事,与原句意思不相符合。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行”条没有注意到B类的特殊性,统统把“~行”释作“这/那里、这/那边”。余志鸿(1983、1987)认为,元代的“~行”并不能全用“这/那边、这/那里”来解释,其中有一部分“作为后置词,起着提前宾语或补语的作用”。他以《蒙古秘史》汉语对译和总译为材料,证明这个后置词“~行”“可能是从蒙古语引进的语言现象”,是汉语“与阿尔泰语言交融的产物”。现引余文(1987)中的三例,以窥一斑。上一行为蒙语音译,下一行为汉语白话对译(例子后括号内的数字,前为句节数,后为页码):

1.3

①豁罗合札 刺 亦列牙(224—628)

远 地 行 教去(发往远处。“~行”对译蒙语与格助词)

②成吉思 合罕 亦秃儿坚 突儿 兀禄 客列列勒敦

太 祖 皇帝 人名 行 不 说话

(184~432)

(成吉思汗不跟亦秃儿坚说话。“~行”对译蒙语位格助词)

③帖那 答忽 宜 帖木真 哈撒儿 别勒古台 忽儿班

那 袄子 行 人名 人名 人名 三

阿卜抽翰惕抽(96~129)

将着 去着(帖木真、哈撒儿、别勒古台三人拿着那袄子

送去;“~行”对译蒙语宾格助词)

上举《秘史》对译文中显示出“~行”与蒙古语中的格助词对应,是一个后置的语法标记单位。拿前举B类例句与《秘史》总译文相对照,可以看出B类各例中的“~行”确实以看做语法标记为宜。试对照:

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秘史》134~966)

动不动君王行奏。(元曲《金钱记》)

余志鸿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元曲中跟汉语原有语序不相符合的语言现象,并用语言类型学的观点,从语言接触与语言融合的角度加以解释,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正确分析元曲等白话文献中的同类语法现象,而且对于了解历史上阿尔泰语对北方汉语的影响和渗透,探索汉语在吸收外来语语法格式时的包容性方面都很有启发,这是余文的一个贡献。但是毋庸讳言,余文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关于“~行”的历史来源问题、关于能否把A类和B类同等看待的问题,我们跟余先生都有或大或小的分歧,题目谓之“考辨”,主要是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二

2.1 后置词“~行”读如“杭”(屡见臧晋叔(《元曲选》注),跟蒙

古语里相对应的格助词读音不同,因此,它不是一个音译用字。余志鸿(1987)在追溯这个词的历史时,以《汉书》六例为证,认为“~行”字虚化的用法,大概始于汉代。现照引六例于下,然后略陈己见。

(1)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苏武传)^①

(2)单于乃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匈奴传)

(3)遂囚建行在所。(卫青霍去病传)

(4)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傅常郑甘陈段传)

(5)浞野侯行捕首虏千人。(匈奴传)

(6)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同上)

余文认为以上各例的“行”都不宜作“排行、班辈”讲,还根据这些例子多见于与匈奴交战的文章进而推测:“也许这个‘~行’一开始就是非汉语的。”他1992年的文章仍持这一观点。

今按,上面(3)(4)(5)三例中的“行”均应读 xíng。例(3)“行在所”为一词,也称“行在”,指天子所在的地方,后专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处。此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作:“遂囚建诣行在所。”明示“行”字属下不属上。建,苏建。裴驷集解引蔡邕曰:“天子自谓所居曰‘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汉书·武帝纪》“征诣行在所”颜师古注:“天子或在京师,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谓京师为行在也。”例(4)“行赐”为一词,颜师古注:“遍往赐之。”犹言到各地赏赐。例(5)“行捕”为一词,犹言巡行捕

^① 此例和下例的“丈人行”,余文误排为“丈夫行”。

捉。《水浒》二十三回有此词：“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因此上面三例中的“行”(xíng)均与后置词“一行”无涉。另三例中，例(1)(2)的“丈人行”颜师古注：“丈人，尊老之称。行者胡浪反。”故“丈人行”即指尊长之辈。例(3)的“父行”应指父辈，这从“大父”指祖父可以推知。《韩非子·五蠹》：“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面有二十五孙。”《史记·留侯世家》“大父开地”裴驷集解引应劭曰：“大父，祖父。”也可指外祖父，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大父行”指祖父一辈的人。如《史记·汲郑列传》：“[郑庄]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后来“大父游”成为忘年之交的典故，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六·老僧》：“[张翁]自言与雍丘、孟调之、曾(céng)大父游，历历能道其平生游猎处。孟氏兄弟严事之，如曾(zēng)大父行。”“曾(zēng)大父行”即指曾祖父一辈的人。由上来看，《史记》《汉书》中“丈人行”“父行”的“行”解释为“行辈”有充足的根据，而把它看做虚化的、非汉语的成分则有些唐突。

2.2 须要注意的是，“行辈”义的“行”后来引申出“类别”义，用在名词后边，表示这一类的人。例如唐张鷟《朝野僉载》卷六：“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人也。”“菩萨行人”，犹言菩萨一类的人，菩萨之流的人。再后，“行”又由类别义进而表示复数，跟古代“等、曹、侪、辈、属”之类的类别词曾表示复数为同一道理。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三：“行者教令僧行闭目。”《董解元西厢记》卷八：“怕贤不信，试问普救里僧行。”僧行，犹言僧人们。明贾仲名《金安寿》二折：“便那女娘行心思十分巧，其实的刺不成、绣不到。”明冯惟敏《僧尼共犯》一折：“俺行常想着跳人家

墙头。”《红莲债》一折：“料他行都去参禅入定。”以上这类“行”(háng)都表示复数，跟元代表示“这/那边”或单纯作语法标记的“行”是同形(也同音)异词，切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

2.3 如同入矢(1956)所说，后置词“~行”始见于宋词。但我们注意到宋代只有A式“动/介+N行(+VP)”没有B式“N行+VP”，B式是元代才出现的。我们认为可以认定B式是汉语受蒙古语语序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兴句型，至于A式能否同样看待，还需要做一番考察。

从“N行”的“行”大多可以释为“这/那边、这/那里”来看，“行”很像个方位词(或称位置词)，余志鸿(1987)也认为“后置词‘~行’确实与汉语的位置词有相类之处”。因此，从句型的角度来看，如果在汉语的历史上曾有某个方位词出现在A式“N行”的“~行”的位置上，并且有着相同的语法意义，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A式跟B式同样看做是受蒙古语语序影响而新产生的句式。我们注意到，方位词“上”“下”用在名词、代词之后，跟“N行”有相同的语法意义，有时也出现在跟A式相类的“动/介+N上/N下(+VP)”句型中。

2.4 N下

方位词“下”跟在名词、代词之后，意义虚化，不表示方位上下之“下”，只表示处所、范围，相当于“这/那里”。

2.4.1 处所名词+下

(1)遂破骑劫於即墨下。(《史记·乐毅列传》；即墨，地名；即墨下，犹言即墨那地方，即墨那里)

(2)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搜神记》卷十六；庙下，即庙屋那里)

(3)王孝伯起事，王东亭殊忧惧，时住在募士桥下，持药酒，置左侧。(《俗说》，《古小说钩沉》引《太平御览》卷四六九；

募士桥下,犹言募士桥那里,募士桥近旁)

(4)庾仲初作《扬都赋》,……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世说新语·文学》;屋下架屋,义为在屋子那里又架屋子,犹今言屋上架屋,言其重复。“下”如以实解之,义不可通)

(5)王陵先到标下,灌婴不来。(《敦煌变文集·王陵变文》39;标下,指此前做了标记的地方)

2.4.2 人名+下

(6)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存。”(《朝野僉载》卷一;《太平广记》卷一八五末字“存”作“得”。“崔侍郎下”,犹言崔侍郎那里;“有气力”实指门路硬)

(7)战由(犹)未息,追取左贤王下兵马数十万人,四面围之,一时搦取|陵下散者,可有千人。(《敦煌变文集·李陵变文》85页、93页)

(8)羽下精兵六十万。(《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

例(7)(8)中的“左贤王下、陵下、羽下”的“一下”虽然可以释为“手下”,但实际上“一下”的语法意义是指示某人那边、某人方面。

2.4.3 指示代词+下

(9)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王旷《与东海王越书》《全晋文》1579页;此下,犹此处,这里)

(10)东边见不得,西边须见得;这下见不得,那下须见得。(《朱子语类辑略·总训门人》卷七200页;这下、那下,犹这里、那里)

(11)这下人全不读书。(同上卷七213页)

“~行”与“~下”都能跟代词结合,但在分布上“~行”只见跟人称代词(包括“谁”)结合,而“~下”只见跟指示代词结合。跟“N行”A式相同的句式只见于“处所名词+下”的(1)(2)(3)三例:“于即墨下、至庙下、住在募士桥下”。

2.5 N上

方位词“上”用在名词后面本来表示物体的表面或上方,后来它的意义虚化,泛指处所、范围或方面。多可释作“这/那边,这/那里”。

(1)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上有亲,侨住谟家。(《幽明录》,《钩沉》引《御览》卷七四三,又九四八,《广记》二七六;蔡谟上,犹言蔡谟那边,蔡谟方面)

(2)(路敬潜)授睦州遂安县令。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两间有三殡坑,皆埋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朝野金载》卷一,去县水路数百里上,犹言离县城水路数百里的地方)

(3)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每于百僚上”二句,言经常在众同僚那里诵读杜甫的新佳句)

(4)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鏖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敦煌变文集·张义潮变文》114页;“取西南上”句:往西南方向从小路进军,“~上”相当于“那边”)

(5)过失推向将军上,汉家兵法任交虏。(《变文集·李陵变文》95页;此言把过失推到将军(李陵)身上。将军上,指将军方面)

唐时还有在人姓后加上“上”“下”的用法:

(6)有钱石上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全唐诗》卷八七六《选人语》)

这是候选官职者总结仕途捷径的谶语。《朝野金载》卷一有“当今

之选,非钱不行”之句。从2.4.2例(6)所举该书“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存”句可知,“石上、刘下、张下”分别指称姓石、姓刘、姓张的掌选官。“~上”、“~下”均相当于“那里”。

(7)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朱子语类辑略》卷二;这上,犹此处)

以上诸例除了例(6),大多跟“N行”A式十分相像,试比较这一节所举三例与元曲的异同:

过失推向将军上(例5) 衷肠说与谁行(《琵琶记》23出)
于司徒蔡谏上有亲(例1) 向哥哥行有句言(《窦娥冤》三折)
于百僚上诵佳句(例3) 向贱妾行告耽饶(《倚梅香》二折)

可以说这几例“动/介+N上(+VP)”跟元曲、《元朝秘史》的“动/介+N行(+VP)”在句式上是同一句型,“~上”与“~行”的语法意义也相同。再联系2.4节所举“动/介+N下(+VP)”的用例,我们认为“N行”的A式从句式上是汉语早已有的,不宜把它跟元代出现的B式“N行+VP”同样看待。^①

2.6 N上+V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N上”也有跟“N行”相同的B式,不过比较少见,就管见所及,仅在早期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以及明代杨铭《正统临戎录》中发现数例。《老乞大》《朴通事》均成书于元末,明代(16世纪时)由崔世珍作谚解,谚解本对原书作了些改动,但仍保存着一些元代语言的风貌。试看以下几例:

^① “行”用在名词后表处所,《太子成道变文》已见:“皇宫行有诸使女,免得交人别猜疑。”(《敦煌变文集》318页,伯3496)“皇宫行”即皇宫里。另方位词“边”用在人名后也有跟A式同样的用法。如:“宁昌乡人卜老师,于高参军家人未丰边举取钱拾文。”(《吐鲁番文书·麟德二年卜老师借钱契》;举,弃也,义为借贷)

(1)“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少汉儿言语省的。”“你谁根底学文书来?”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老乞大谚解》上 2a)

“我汉儿人上学文书”意即“我在汉人那里学文书”,或曰“我跟着汉人学文书”。这段问答在后出的《老乞大新释》(18 世纪中叶刊本)中被修改得更符合汉语语法:

“你却是朝鲜人,怎么能说我们的官话呢?”“我在中国人根前学书来着,所以些须知道官话。”“你跟着谁学书来着?”

“我在中国人学堂里学书来着。”(1a)

从词汇上看,把“高丽人”“汉儿人”“汉儿言语”分别改为“朝鲜人”“中国人”“官话”;从语法上看,把“我汉儿人上学文书”、“你谁根底学文书来”分别改为“我在中国人根前学书来着”、“你跟着谁学书来着”,亦即把“N 上 + VP”(B 式)改为“介 + N 上 + VP”(A 式),这也说明 B 式是外来的, A 式是汉语本有的。

(2)到学里,师傅上受了文书。(《老乞大谚解》上 2b;在师傅那里受了文书,向师傅受了文书)

(3)将那顽学生师傅上禀了。(同上 6b;向师傅禀告了)

(4)明日病痊疴了时,太医上重重的酬谢。(同上,下 37a;对太医重谢)

(5)做满月,老娘上赏银子段匹。(《朴通事谚解》105 页;赏给老娘银子段匹)

把这些例子跟元曲中的 B 式相比较,用法及语法意义完全相同:

将那顽学生师傅上禀了(《老》例 3)~将俊名双渐行且权除,把俏字儿冯魁行且暂时与。(元周仲彬《斗鹤鹑》套《咏小卿》)

明日病痊疴了时,太医上重重的酬谢(《老》例 4)~但较些呵,郎中行别有酬劳(《拜月亭》二折;较,痊可、轻可)

因为你上,就那日回到状元桥(《水浒》四回)~你晓夜兼程来探访,都只为我行。(《伍员吹箫》一折)

经过对名词后的方位词“~行”“~上”的句型考察,我们看到“N上”与“N行”有着惊人的相似,请看下表(X代表N后面的方位词):

句 式 \ NX	N 下	N 上	N 行
A 式:动/介+NX(+VP)	+ 先秦以降	+ 六朝以降	+ 宋元明
B 式:NX+VP	-	+ 元明	+ 元明

“N上”与“N行”的A式呈先后相续的关系,B式同现于元明朝代,“行”字本不是方位词,它的读音跟蒙古语格助词无关,却跟“上”有相近之处,凡此种种,使我们怀疑“~行”源自“~上”,“~行”是“~上”的变音。

三

按照正常的语音演变规律很难解释“上”[ɕaŋ]怎么会变为“行”[xaŋ],但是山东、山西的许多方言点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音变的活的证据。

3.1 山东寿光、茌平、聊城等方言“~上”轻读[xaŋ]

董遵章(1957)介绍山东寿光方言“上”表示方位时有两个读音:a.单纯的方位词,如“往上看”读[xaŋ];跟别的词组成名词或方位结构,如“晚上、身上、锅台上”,也读[xaŋ]。b.跟“以、之、边、面、头”组合成的方位词,都读[ɕaŋ]。另外,表示动作也有两个读音:a.单独作谓语,如“上车、上了堤”读[ɕaŋ];b.附着在主要动词后边

表示动作的趋向,如“装上、塞上去”读[xaŋ]。

张树铮(1995)介绍寿光方言一些字读轻声时发生特殊音变,其中举了“上”字:saŋ > xaŋ 如:屋~/摆~/拿~(55页)。此外在“天上地下、道上、道儿上”等短语中“上”读[xaŋ](87—88页)。

张鹤泉(1995)介绍鲁西聊城方言“上”读去声[saŋ],但读轻声时音变为[xaŋ]。如“街上、春上、年头儿上”等,“上”均读[xaŋ]。

山东某些方言“上”音变为[xaŋ]的语言现象在文学作品我也有反映,太田辰夫(1988)举了《儿女英雄传》第十四回的例子。安老爷在山东茌平附近坐小推车坐不稳,总是往下溜。“那推小车子的先说道:‘这不行啊。不,我把你老萨杭罢。’老爷不懂这句话,问:‘怎么叫萨杭?’戴勤说:‘拢住点儿,他们就叫煞上。’老爷说:‘很好,你就把我萨杭试试。’”可见茌平县确把“上”轻读为“杭”[xaŋ] (“杭”与“行”音同)。

“上”为禅母,“行”为匣母,二字声母本不相同,由于“上”字轻读而音变为匣母,人们就用“行、杭”来标记[xaŋ]音;在元曲等白话资料中,“N行”的“行”表达的都是“上”字虚化了的意义,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淡忘了“上”[saŋ]与“行”[xaŋ]之间的来源关系。《儿女英雄传》中安老爷的男仆知道“萨杭”就是“煞上”,但他恐怕未必能分辨“向官人行奏知”的“行”也是“上”。^①

3.2 晋中某些方言“上”的声母变读为[x-]

侯精一、温端政(1993)介绍了山西晋中某些方言“上”的变音现象,“上”作动词与作方位词的读音不同,例如(见12—13页)

	太谷	孝义	文水	平遥
动 词	so	ʂe	su	suə (上学 上车)

^① 今东北人把“干啥”说成“干哈”也是同类例子。但“啥人儿”不说成“哈人儿”,可见音变的原因是轻读。

方位词 xɔ xɛ xu xɔ (房上 街上)

笔者曾在山西省孝义县工作过两年多,知道“上”除了作方位词变读为[xɛ]外,跟在动词后面作助词时也变读为[xɛ],如:荷上、跟上。进一步说,决定“上”是否变读为[xɛ],一方面跟它是否作动词有关,另一方面如下表所示,取决于它在词或短语中的位置,当“上”作动词或短语的前一音节时读本音,当它处在词或短语的末音节轻读时读变音。^①

上~[sɛ]		~上[xɛ]	
动词	方位词	助词	方位词
上学 上课	上房儿 上棚 (正房) (地名)	荷上 跟上	桌子上 岭儿上 (地名)

3.3 晋中方言中的后置词“~行”与“~合”

山西晋中地区某些方言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与宋元时期 A 式后置词“~行”用法相似的后置或分,近几年出版的山西方言志或发表的论文多把这个成分标写为“~行”,个别方言写作“~合”。我们认为。“~行”为“~上”的变音,“~合”为“~下”的变音,试分述于下。

3.3.1 温端政(1985)详细记录了忻州方言后置词“~行”[xɛ]的三种用法(见 127—128 页)

(一)用在人称代词单复数之后:①“~行”或读[xɛɿ],或读[xɛɿ],意义为“家”。如:俺行有五口人|他行来咗一个客人。②“~行”读[xɛɿ],相当于“这里/那里”。如:你的铅笔在我行|你行放的我的一本书|他行你占不上便宜。

(二)用在“谁”或指人名词之后:①“~行”读[xɛɿ],“家行”相

^① 关于孝义方言“上”的音变,参考了郭建荣(1989)的有关记录。

当于“家里”。如：夜来谁家行嚷架来|我在俺舅家行吃啫一顿饭。
②“~行”读[xɛɿ], 相当于“这里/那里”。如：我的铅笔在谁行|他在姥姥行拿啫十块钱。

(三)用在指物名词后,“~行”读[xɛɿ], 相当于“这里/那里”。如：墙行有一间小房|箩头在猪圈行放的哩。

忻州方言里的“~行”“多为“这里/那里”义,至于在一定的语境中相当于“家”,是由“这里、那里”引申出来的一种特指义。温书(24页)指出忻州话“上”字文读[ʂãɿ],如“上海”;白读[ʂɛɿ],如“上学”。我们认为写作“~行”的[xɛɿ]就是[ʂɛɿ]的变音,这从前举太谷(sd xo)、孝义(ʂɛ xɛ)、文水(su xu)、平遥(suə xo)等地“上”字的本音与变音的对应关系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宋元以来人们用“行”字标写“上”字的变音,这不仅因为“行”字与变读音相合,而且还由于“上”是一个常用词,它的实词义跟它的虚化义相差较大,如果用本字“上”标写虚化义,就容易产生歧义,妨碍表达的明确性。比如“墙行有一间小房”(墙那里有一间小房),如把“~行”换成“~上”就不通了。因此在事实上就形成用本字表达实词义,用与变音同音的字(~行)表达虚化义或语法标记单位的倾向。

前而说过孝义话中“上”[ʂɛɿ]变读为[xɛɿ],变音“~上”[xɛɿ]跟忻州话的“~行”[xɛɿ]语法意义相似,一是表示位置、处所,相当于“这/那里”,如“这跟上们”(这些地方)“兀跟上们”(那些地方);二是用在人称代词后面,其义为“家”,如“俺上”(我们家),“偌(人家)上”(人家,别人家),“偌们家上”(同前)。把忻州话的“~行”[xɛɿ]跟孝义话的“~上”[xɛɿ]加以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语音、用法、语法意义等方面都既对应又相类,因此可以说《忻州方言志》所记录的“~行”其本字应为“~上”。

3.3.2 孟庆海(1991)记录了山西阳曲方言里的后置词“~合”。“~合”用在代词、疑问代词(谁)、指人名词、指物名词之后,

或相当于“这里、那里”(读[xA?ɿ])或[xA?ɿ],或相当于“家”(读[xA?ɿ]),其用法和语法意义跟忻州方言的“~行”完全相当。例如:你合有钱没有|我合有七口人|谁合来客人嘞|我的铅笔在谁合|门子合有个笤帚。此外阳曲话还有指示代词“这/那”加“合”的用法(读[xA?ɿ]):这合有人。“这合”犹言“这里”。

据孟书知道,阳曲方言里“下”字文读为[ɕiaɿ],如“下葬”(84页);白读为[xaɿ],如“下降”(34页)、“下头”(90页)、“坐下”(86页)。但“下”字在某些地名和短语中又读入声[xA?ɿ],如“东下庄”(100页)“看一下”(96页)。据此我们认为阳曲话的后置词“~合”[xA?ɿ]实际上是“下”的白读音[xaɿ]的促化变音。^①如我们在2.4节里所介绍的,方位词“下”很早就有跟在处所名词、指人名词、指物名词、指示代词后面表示处所、范围,相当于“这里、那里”的用法,如屋下架屋(《世说新语》)、崔侍郎下(《朝野僉载》)、这下见不得,那下须见得(《朱子语类辑略》)等。古今相对照,也可印证“~合”实为“~下”的变音。“上”与“下”是一对反义方位词,汉语的同义词或反义词往往有类同的用法,阳曲话里“后置词”“~合”源自“~下”的事实也有助于证明忻州等晋中方言中的后置词“~行”源自“~上”。^②

3.3.3 山西方言中,“上”通过改变声母,“下”通过舒声促化来表示词义虚化后的语法意义,这种语言现象十分有趣,也很富于启发性。它表明,变音与本音之间不是文白异读的关系,白读与文读相对,变音与本音相对,就山西方言的“上”和“下”来说,变音是白读音的变体。其次,注意考察语言中的特殊音变现象,不被通常的

① 同样,阳曲话“家合里、书合里”的“合里”实际是“下里”的变音。“下里”为方位词连用。

② 元无名氏杂剧《村乐堂》一折[梁州]:“半片席斜铺在地下,两块砖掇在头行。”此处“地下”与“头行”对举,也可窥见“~行”与“~上”的内在关系。

音韵演变规律所局限,对于考求方言的本字有很重要的意义。关于方言本字的研究,梅祖麟(1995)发表了十分精到的见解,本文考证后置词“行”的本字是“上”,就是在摆脱了一条鞭式的音韵演变观的束缚后才萌发的新思路。

四

最后,把上面的论考做一小结:

(一)宋元明的白话文献中出现的后置词“~行”有两种句式:A式“动/介+N行(+VP)”(向咱行、向谁行宿),B式“N行+VP”(君王行奏)。从句型的角度看,A式是汉语自古以来就有的,B式是元代汉语受蒙古语语序影响而产生的新兴句式。B式“~行”的语法功能是提前宾语或补语,只是一个语法标记单位。B式产生于元代,在元代文献中不算少见,但随着元朝统治的结束,这一用法就衰落以至消失了。山西方言中“N行”多用于A式和存在句,不见B式,这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汉语吸收外族语言的语序时可容性较小。^①明代杨铭(蒙古人)《正统临戎录》记述了明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俘获的事件,其中常见B式“N上+VP”的例子,如“我如今回去爷爷上奏”、“我有个比喻皇帝上说”、“叫铭皇帝上奏”等,这正好说明了B式是从蒙古语来的,也证明后置词“行”的本字是“上”。

(二)从现代山东、山西一些方言来看,“~行”是“~上”的变读音。正好可以解释“N行”多可释作表示处所、位置的“这/那里”“这/那边”。变音是由于该字位于音节末尾读轻声面引起的。用

^① 新疆、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由于长期以来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那里的汉语受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根深蒂固,出现了一些跟内地汉语语序不大相同的语法现象,应当别论。

变音表示该字词义虚化后的语法意义,起到了与本音所表示的词汇意义相区别的作用。

(三)在考证方言本字时,不仅要运用古今音韵演变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注意考察并运用音韵演变的特殊规律。当我们遇到问题,用正常的音变规律无法解释时,不妨打开思路,设法另辟蹊径去探幽访胜。

参考文献:

- 余志鸿.元代汉语中的后置词“行”.语文研究.1983,(3)
余志鸿.元代汉语“~行”的语法意义.语文研究.1987,(2)
余志鸿.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民族语文.1992,(2)
张 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
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十一章).元朝秘史の汉译.1954,(381~417)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
入矢义高.读蔡美彪氏编〈元代白话碑集录〉.东方学报.1956,(26):86~228
山川英彦.元朝秘史总译语法札记.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文集.1967
桥本万太郎.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语言研究.1983,(1)
梅祖麟.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太田辰夫.中国语史通考(15).〈儿女英雄传〉の言语.日本白帝社,1988
江蓝生、白维国.汉语史通考(上书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1
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陈茂山.定襄话的非动作后置“行”——兼与余志鸿同志商榷.
语文研究.1985,(2)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216~
218)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同上.1989

胡竹安.水浒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正统临戎录.丛书集成初编

(原载《语文研究》1998年第1期)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

—

1.0 使役动词“叫、让”在现代汉语里既表示使役，又表示被动。所谓使役，是指动词有使令、致使、容许、任凭等意义，例如：

叫/让他早点儿回家|叫/让您久等了|不叫/让咱去，咱就不去|别理他，叫/让他闹去。

“叫、让”还可以表示被动，是个被动标志词，例如：

弟弟叫/让爸爸揍了一顿|衣裳叫/让雨水淋得精湿|那本书叫/让小王借走了。

1.1 使役和被动是不同的语法范畴，在一些语言里被区分得泾渭分明，为什么汉语的“叫、让”却可以使役、被动兼用呢？罗杰瑞(1982)的解释是：现在的北京话最初是以满族统治东北之后南迁中原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为基础而发展来的，满语的被动是用使役标志来表示的，因此北方汉语里用使役标志来表达被动，很可能有阿尔泰语句法的背景。桥本万太郎(1987)指出，不仅通古斯——满族语，锡伯语、土族语、东乡语等阿尔泰语系里某些蒙古族语言也有使动标志兼表被动的特征，这种使动与被动的兼用是整个北方各族语言共有的一种区域特征。与此相对，汉语南方方言是用给予动词作被动标志的。他十分肯定地说：“在

现代汉语里只限于北方方言的这种使动、被动共用标志的现象会有阿尔泰语系的背景更为无疑。”(46页)

1.2 罗先生、桥本先生的推断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文章没有对一些基本前提加以论证。比如,如果罗先生的结论不错,那么应该证明在清代以前汉语不曾有过“叫、让”兼表被动的用法;如果桥本先生的推断不错,那么应该拿出事实证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存在着使役、被动兼用的现象;而且他们两位都应该说明:除非受到外族语言的影响,汉语自身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使役与被动兼用的现象。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推论,说阿尔泰语受到汉语的影响才产生了使役与被动的兼用,或者说使役、被动兼用是汉语和阿尔泰语系共有的特征。本文对汉语使动、被动兼用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对使动、被动兼用的条件、原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结论是,这种兼用完全是汉语语法本质特征的表现,与阿尔泰语的影响应无关系。

二

2.0 历史上汉语的使役动词主要有“教、遣、使、令”等,现代主要有“叫、让”。历史上“教”最常用,“教”作使役动词读平声,这从唐代以来的文献中“教”常写作“交”可以知道。“叫”本为呼喊义动词,后来(明代以后)才用作使役动词,并逐渐取代了“教”。“让”本为谦让、把好处给别人之义,直到清代的文献里还没有见到用作使役义的例子,“让”表示使役是很晚近的事。

2.1 虽然表示被动的“叫”是在清代的文献中才开始见到的(如《红楼梦》第8回:“叫雪滑倒了。”第25回:“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但是太田辰夫(1958)指出使役动词“教”(又作“交”)早在唐五代的文献中就已有被动用法了。

他认为“教”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表示被动：

(1)兼语动词的宾语是不具有意志的东西：

见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桃李占年芳。(白居易诗)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苏轼诗)

(2)表达造成了某种结果的感觉：

春思翻教阿母疑。(和凝词)

教那西门庆听了，赶着孙寡嘴只顾打。(金，15)

(3)和禁止相配合：

第一莫教渔父见。(李远诗)

莫教人见。(历代法宝记，伯 2125)

莫教人笑汝。(寒山诗)

太田先生对汉语使役兼表被动的解释是：二者在意义上有难以区别的场合。使役与被动的区别不在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基于主观判断。他说“被他打”或许就是做了“使他打”那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自然也能说成“使他打”。(247～248 页)也就是说，太田先生认为汉语使役、被动的兼用主要是这两个范畴在意义上有关联，在一定条件下(比如上举三类情况)不好区分，从而由使役转而表示被动。

2.2 蒋绍愚(1994)不完全同意太田氏的看法，他对使役动词“教、叫、让”用来表示被动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教’作为使役动词，词汇意义很薄弱，其语法意义是表示甲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对于这个动作来说，‘乙’就是施事者。‘被’字的作用是在被动句中引出施事者。但在汉语中动词的主动和被动没有形态的区别，所以当具备两个条件时，‘教’的语法意义就和‘被’相同。”蒋先生举出的两个条件是：

(1)“教”前而的名词不出现，或者根本说不清是什么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

(2)“教”后面的动词或动词组可以表示被动,即必须是及物的,并且表示某一情况已经实现。

蒋先生认为太田氏所举各例都符合以上条件。至于“教”的宾语是否具意志并不成为“教”由表示使役转为被动的必要条件。因为太田氏所举的例子中“教”的宾语就有不少是人。(见 230~232 页)蒋先生的这个意见是对的,而且他对于上述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大大深入了一步,更加贴近现象的本质。下面,我们对汉语使役动词兼表被动的原因再作一些补充和说明。

2.3.1 前面蒋先生提到“汉语中动词的主动和被动没有形态的区别”,太田氏提到“使役与被动的区别不在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基于主观判断”。二位先生的话,指出了汉语跟印欧语等有严格形态标志的语言的本质不同,这就是传统语言学所谓“施受同辞”和汉语语法的意合性。

所谓施受同辞,是指汉语在词法上不区别施动和受动,施受可用同一词形表示。比如:

(1)宋人伐郑,围长葛。(左传·隐公五年)

(2)鲁酒薄而邯郸围。(庄子·胠箧)

同一个“围”字,例(1)为施动,例(2)为被动,没有词形上的区别,人们是根据语境,通过逻辑思维来判定它是表示施动还是表示被动的。这种词法上的施受同词,表现在句法上就是主动句和被动句表层结构相同。例如:

(3)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4)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报任安书)

例(3)和例(4)有六句主谓句,如下所示,其中 A 组是主动句, B 组是被动句。

A: 主动句

蜚鸟尽

狡兔死

左丘失明

B: 被动句

良弓藏

走狗烹

屈原放逐

A、B 两组主谓句的表层结构相同,都是“名+动”,但其深层结构则很不相同。A 组主语是施事,动词为内动词,句子是叙述句。B 组主语为受事,动词是外动词,表示被动,可以看做是主动者不出现的被动句。B 类语法现象,黎锦熙(1986)称之为“反宾为主”,在古代汉语中十分普遍,谢质彬(1996)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谓“反宾为主”,实质上就是受事宾语转化为受事主语。“良弓藏、走狗烹、屈原放逐”实际上就是由“藏良弓、烹走狗、放逐屈原”之类的述宾结构通过反宾为主的方法变换而成的,这从例(1)的“围长葛”和例(2)的“邯郸围”可以得知。我们认为,汉语使役动词转而表示被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汉语语法的上述特点。下面再作进一步说明。

2.3.2 我们把使役句分成两大类。甲类是无主句,即蒋先生所说“教”前面的名词不出现,或补不出的(包括有禁止词的句子):

只教桃李占年芳(白居易)|却教明月送将来(苏轼)|教那
西门庆听了……(金)|第一莫教渔父见(李远)|莫教人笑汝
(寒山)

这类句子的表层结构跟被动句一样:

教+兼语+VP

被+兼语+VP

其中的 VP 都是及物的,所不同在于使役句的 VP 表示施动,被动句的 VP 表示被动,由于汉语施受同辞的原因,这一区别在形式上得不到反映;当这类使役句在表示某一情况已实现或表示禁止(未实现)时就转而表示被动。因为被动句里的情况一般都是已实现

的；禁止句无论使役句、被动句都是未实现的。

乙类使役句是受事主语句，“被”前面的名词出现，或虽未出现但可以补出。这类用例在早期比较少见，所以太田先生和蒋先生都未提及。我们在敦煌写本《燕子赋》(甲)中检得二例：

(1)但雀儿之名脑子，交被老乌趁急。(“雀”为雀子自称之词；“儿”，儿子。句义为“我儿子名叫脑子，被老乌追得很急。一说“急”也为追赶义)

此处“交被”连用仍为“被”义，可知“交(教)”也同表被动。

(2)阿你浦(遣)逃落籍，不曾见你膺王役，终遣官人杖脊，流向儋、崖、象、白。(终归会被官人杖打脊背)

这两例分别使用了使役动词“交(教)、遣”，使役动词前或有名词，或可补出。例(1)为麻雀之子“脑子”，例(2)为“阿你——燕子”。由于“脑子”和“阿你”分别是谓语动词“趁急”和“杖脊”的受事，在句中充当隐现的受事主语，所以句子就由使役转变为被动。^①

使役句和被动句都是兼语句，二者表层结构相同，即：

N + 教 + 兼语 + VP

N + 被 + 兼语 + VP

但其内容语义关系却很不相同：

N(施事) + 教 + 兼语 + VP(施动)

N(受事) + 被 + 兼语 + VP(受动)

很显然，当使役句的主语为受事时，使役句就转化为被动句。

使役句的主语一般都是施事，但是现代汉语里有一类使役句的主语是受事，例如：

桌子叫人搬回家 | 水龙头叫水暖工修好 | 孩子叫家长领走

^① “使”表被动的例子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红楼梦》里的例子如：“谁知他贼人胆虚，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来使众人知觉便不好。”(71回)

这类句子中使役动词后的情况都是未实现的,一旦成为已实现的,使役句就具备了转变为被动句的条件:

桌子叫人搬回家了|水龙头叫水暖工修好了|孩子叫家长领走了。

由此我们知道使役句转化为被动句的条件主要有三:①主语为受事;②使役动词后的情况是已实现的;③谓语动词是及物的。上举《燕子赋》例(2)“终遣官人杖脊”一句虽然“官人杖脊”是未实现的,但使役动词“遣”前面有副词“终”,“终遣”表示最终会实现,是预言事情的实现的,所以此句可转化为被动句。

三

3.0 现代汉语确实存在着桥本先生所指出的北方用使役动词“叫、让”兼表被动、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作被动标志的地域上的分别,但从历史上看,给予动词兼表被动是南北通行的(详见 3.1.1/3.1.2),就是在清代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里也有其例:

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定数所关,天也无从为力。(3回)

文康是满人,《儿女英雄传》的语言是早期北京话的代表,这说明北方汉语也能用给予动词表被动。其实不容忽视的是,文献表明,给予动词自古以来就是兼表使役和被动的(详见 3.1、3.2、3.3)。换言之,汉语使役、被动兼用的特点也表现在给予动词的语法功能上。下面分别介绍给予动词的使动、被动用法。

3.1.1 “与”表示使役义

在“给”作给予动词之前,汉语历史上使用最早、最普遍的给予动词是“与”,直到今天它在书面语中还没有彻底销声匿迹。“与”自先秦就从给予引申出容许、许可义,又由容许义引申为让、使义,

从而用如一个使役义动词。

a 容许、许可

开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书·胤征；惩办祸首，胁从者不治罪。过去有劣迹者，都允许其悔过自新）

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公羊传·隐公七年；陈立义疏：“与者，许也。”不许夷狄控制中国）

见有上柱国勋，请与收赎罪价。（变文集·燕子赋；请允许用勋功抵罪）

b 使、让

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晏于春秋·问上十九；不能使君王陷于危难之中）

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史记·陈涉世家；下令召三老、豪杰，让他们来商量事情）

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与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谢羽。（汉书·高帝纪；沛公……独自骑马，让樊哙等人从小道逃走，让张良留下辞谢项羽）

唐宋白话文献中“与”表使动的用法十分常见：

净能曰：必被岳神取也！欲与张令妻再活。（变文集·叶净能诗，217页；打算使张令之妻死而复活）

老人答曰：“……知和尚看一部《法华经义》，回施功德，与我等水族眷属例皆同沾福利。”（同上，韩擒虎话本，196页；让我等同沾福利）

彼王早知如是次第，何妨与他修行？（祖堂集，卷十四，江西马祖；让他修行何妨）

露花烟叶与人愁。（晏几道，浣溪沙词；使人愁）

老氏便要常把住这气,不肯与他散,便会长生久视。(朱子语类,中华书局标点本 137 页;不愿使气分散)

敦煌变文中有“交与”连用之例,“交与”实即“教与”:

后母一女把著阿耶:“杀却前家哥子,交与甚处出坎!”(舜子变,133 页;后母的女儿拽住父亲说:“这样做会杀死前房哥哥,让他从什么地方爬上井来)

又有“与教”连用者:

君到嵩阳吟此句,与教三十六峰知。(白居易,送嵩客诗)
“教与”“与教”的意思都是“教”,应视为同义连用,“与”也是使役义^①。

3.1.2 “给”表示使役义

《现代汉语八百词》记录了普通话用“给”表示使役义的用法,举例为:

给他多休息几天|你那本书给看不给看?|酒可是不给喝|看着小鸟儿,别给飞了。

鲁迅作品里也有其例:

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为了忘却的纪念)

3.2 “与”在先秦文献已有表示被动的用例,不过比较少见。例如:

(夫差)无礼于宋,遂与勾践所禽也。(战国策·秦策)

王念孙《读书杂志》注:“言为勾践所禽也。”可见“与”表示被动。

到了唐代以后,“与”表被动的用法就很常见了。如:

^① 宋元文献中“与”还相当于“请”,“请”也是使役,不过是一种委婉恭敬的使役罢了。以下二例录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与君不用叹飘零,待结子成阴归去。(张孝祥《鹧鸪仙·落梅》词)|当初他要嫁我来,如今却嫁了周舍。他有八拜交的姐姐,是赵盼儿,我去与他劝一劝,有何不可。(元曲《救风尘》一折;请赵盼儿劝解)

世间一等流，诚堪与人笑。（寒山诗）

鬼识人与料，客辨羊肉厄。（王梵志诗；鬼精明则人被捉弄，客聪明则羊儿遭殃）

和尚是高人，莫与他所使。（祖堂集，卷二；慧可禅师）

明清小说中也很常见，各举一例：

老王八，依你说起来，我的孩儿应该与这杀材骗的！（醒世恒言，卷八）

（众人）虽想二姐儿实在温和怜下，如今死去，谁不伤心落泪？只不敢与凤姐看见。（红楼梦，六九回）

3.3 以上事实表明，汉语古今通用的给予动词“与”自古以来就是兼表使动与被动的。这一节将进一步说明不仅“与”，南方方言如闽南话中的给予动词也是使动、被动兼用的。下面以台湾定静堂丛书所收明刊本闽南戏文为例：

a “乞”为使动义：容许、致使、让

（生）娘仔共小人断约一声，乞你入去。（嘉靖本，荔镜记，二十六出“五娘刺绣”，61b）

（旦）且慢，父也是亲，母也是亲，你咒誓着，咒乞伊明白。（同上）

（旦）请阿兄乞我拜辞一下。（万历本，金花女，10a）

b “乞”为被动义

共君出外乞人做骂名。（荔镜记，三十三出，“计议归宁”，73b）

总是乞人骗。（金花女，14a）

我为谁乞人打，为着陈三。（万历本，荔镜记·代捧盆水，35b）

3.4 以上事实表明，给予动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自古以来都是使役和被动兼用的，可以说汉语使役、被动兼用的特点集中体

现在给予动词身上。现代汉语北方用使役标志兼表被动反映的是唐代以来的历史层次,而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兼表使役和被动反映的是上古的历史层次。桥本氏(1987)注意到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作被动标志,但他没有注意到汉语的给予动词自上古以来就是兼表使役和被动的**事实**,因而他所概括出来的北方使动、被动兼用,南方用给予动词表示被动的“区域特征”不反映语法类型上的差异,而只是词汇选择上的不同。

3.5 这一节解释一下为什么给予动词能够兼表使役和被动。给予动词的基本词义是施与,也即是使对方获得。当给予动词后面带的不是体词而是谓词(与+VP)、或处于给予动词直接宾语位置的**不是体词而是谓词时**(与+N+VP),给予动词的词义就发生了变化,“给去”就是允许去,“给他去”就是让他去,“给他难堪”就是使他难堪,“给”的原义虚化,引申为“许可、让、使”,从而用如使役动词。前举“咸与维新”作“都允许(他们)悔过自新”解、“不能与君陷于难”作“不能使君王陷于危难”解,都是因为“与”的后面有谓词性成分而且表示施动的缘故。

当“与+VP”或“与+N+VP”结构中的VP是及物性的并且表示受动时,就转为被动结构;当这两式前面有名词并且表示受事时,就转为被动句。可以看出,给予动词兼表使动与被动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谓语句施受同辞。

四

4.0 如上所述,使役动词和给予动词都能兼表使动与被动,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的是,给予动词还能兼表处置。关于这一点讲的人比较少,而这又跟探讨汉语使役、被动兼用的原因有关,因此下面略用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4.1 早期处置式的标记有引出工具的“以”(相当于“用”);隋唐以来又出现了“将”字句和“把”字句,此外还有少数“捉”字句;现代汉语通常只用“把”,方言有用“拿”(吴语)、ka³(闽南话)的,总之,近现代汉语处置式的标志都源自跟手持义有关的一系列动词。给予动词表示处置是一种转用,唐宋白话文献里已见其例^①:

燕若入来,把棒撩脚,……更被唇口啜嚙,与你到头尿却。
(变文集·燕子赋,249页;燕子如果再纠缠不休,就把你的窝全都尿湿)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用君盖庇全洛阳城的人。君指大裘)

不须乞米供高士,但与开轩作胜游。(王安石,题正堂相上人箴龙轩诗;把开轩作为胜游)

也拟与愁排遣,奈江山遮拦不断。(宋·莫仑,水龙吟词)

譬如捉贼,“克己”便是开门赶出去,索性与他打杀了,便是一头事了。(朱子语类,1118页)

现代汉语的给予动词“给”也可表示处置,较早的例子见于《儿女英雄传》:

接了人家两三吊钱,给人搁下,人家依吗?(4回)|老爷待要不接,又怕给他摔在地下惹出事来。(38回)

朱景松(1995)举出王朔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中用“给”引进受事成分(即作处置式标记)的十几个例子,现转录四例于下:

要不给那老师找来,安慰安慰她(冯小刚)|哎,东宝,你不

^① 唐宋资料里还有“与将”“与把”连用的,例如:长怕嵇康乏仙骨,与将仙籍再寻看。(唐·曹唐《小游仙》诗)|便与将丝分付了,都来只要两间房。(《董永变》)|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苏轼《西江月》词)|香虬烟断,是谁与把重衾整。(柳永《过涧歇近》词)张相云:“与字与把字同义,故与、把二字,又往往联用之。”“凡云与把,犹云把也。”今谓“与将”也应同样看待。但张相释曹唐诗云:“言为嵇康在仙籍上检查之也。”把“与”释作“为”,疑非是。

是说你能扛二百斤么? 怎么几个萝卜就给你治成这样?(王朔)|求求你们了,想个法儿给他弄走吧!(魏人)|凭什么给我们老王扣下不让回家?(苏雷)

由上来看,给予动词真是“万能”成分,能兼表使动、被动和处置,集三任于一身^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看下面三个例句:

a 使役句:他|给我打(球)了 (他同意我打(球)了)
(施)(兼)

b 被动句:他|给我打了 (他被我打了)
(受)(兼)

c 处置句:他|给我打了 (他把我打了)
(施)(受)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①使役句和被动句的差别在于一个主语是施事,一个主语是受事;②处置句与使动句、被动句的结构不同,处置句是连动式,使动句、被动句是兼语式;③处置式的主语为施事,跟使动句相同,但处置句的第二个名词成分是第二个动词成分的受事,而使动句的第二个名词成分是第二个动词成分的施事;④处置句与被动句中两个名词成分的施受关系完全不同。由上可知,给予动词之所以能兼表使动、被动与处置,就在于变换句中两个名词性成分跟谓语动词的施受关系,而施受关系可以变换的原因又要归结到非形态语言的汉语在词法上施受同辞这一本质特点。

五 结 语

5.0 本文第一节介绍了罗杰瑞、桥本万太郎两位先生关于汉

^① 其实,给予动词的语法功能还不止这些,它还能作介词,相当于“对、向、跟”,“为、替”,以及作连词,相当于“和”等。

语使动、被动兼用有阿尔泰语背景的推论。第二节引用太田(1958)的研究成果,指出使役动词“教”早在唐代文献中就已有表示被动的用法,并详细讨论了使役动词转表被动的条件、原因;第三节考察了给予动词兼表使役和被动的历史及其原因;第四节从给予动词又兼表处置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汉语使役动词、给予动词具有多重语法功能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语是非形态语言,词法上主动与被动没有形态上的区别。

5.1 在探索一种语言的某一语法现象的来源时,一般应先从这个语言自身去寻找原因,如果从该语言的内部找不到合理、圆满的解释时,就须从外部——语言接触、语言渗透等因素去寻找答案。如上所述,汉语使役、被动的兼用完全能用汉语的历史文献、汉语的本质特征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本文对阿尔泰语背景说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5.2 那么,怎么看待满语和蒙古语里一些语言使动、被动的兼用呢?笔者不懂满语和蒙语,对于它们的历史面貌更是一无所知,这里仅借助桥本(1987)注⑩提供的信息作一点推测。桥本先生在注⑩里说土族语和东乡语里使动、被动兼用“也可能是这些语言里的创新现象(innovation),不一定是蒙古语原来的用法,因为1.不只在现代蒙古语,连在中期蒙古语里也没有这个用法,而且2.东乡语、土族语(特别是互助方言)受汉语影响很深,汉语借词也相当多。”据此我们知道蒙古语中期和现代都没有使动、被动兼用现象,这恰好可以证明汉语的使动、被动兼用跟蒙古语无关。其次,诚如桥本先生所说,东乡语、土族语“受汉语影响很深”,因此,与其把东乡语、土族语的使动、被动兼用看做是一种“创新现象”,似乎不如看做是汉语的影响更合乎情理一些。至于满语使动、被动兼用应该怎么看,我们不清楚,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汉语的影响;一种是满语和汉语共有的特点。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类

型的语言,不同的思维特点,但人类的思维逻辑毕竟有很大的共同性,从使动与被动在逻辑上的联系来看,或许使动、被动的兼用不应是汉语的专利。

参考文献:

- 桥本万太郎.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中国语文.1987,
(1)
- 桥本万太郎.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语言研究.1983,(1)
- 罗杰瑞.汉语和阿尔泰语互相影响的四项例证.台湾清华学报
(新).1982,(14)
-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日本江南书院.1958,247~248
-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30~237
- 香坂顺一.白话语彙の研究.日本光生馆.1983.6、7、87、93~
95
- 黎锦熙.比较文法.中华书局.1986,(44)
- 谢质彬.古代汉语反宾为主的句法及外动词的被动用法.古汉语研究.1996,(2)
- 吕叔湘.说“胜”和“败”.中国语文.1987,(1)
- 朱德熙.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方言.1979,(2)
- 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1990,(3)
- 王希杰.施受·词序·主宾语.语法研究与探索(4).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饶长溶.把字句·被字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龚千炎.现代汉语里的受事主语句.中国语文.1980,(5)
- 吴启主.连动句·兼语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徐 丹.关于给予式的历史发展——读贝罗贝著《汉语历时句法——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18世纪给予式的演变》.中国语文.

1990, (3)

徐 丹. 评介〈介词问题及汉语的解决方法〉. 中国语文. 1990, (6)

朱景松. 介词“给”可以引进受事成分. 中国语文. 1995, (1)

(原载 *In Honor of Mei Tsu - 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汉语历史句法及构词法论文集——庆祝梅祖麟教授 65 岁华诞》) 巴黎《东方语言学报》1999 年)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

提要 本文通过对汉语比拟式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梳理了它的发展轨迹和脉络。文章认为,在考察历史语言现象时,有时须跳出历史比较法的框框,从语言渗透、语言融合的角度去把握。元明时期的比拟式正应如此解释。金元时期汉语比拟式出现了与先秦唐宋完全不同的新的句式和语法功能,这种句式不是汉语原有句式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受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语法影响而产生的。它经过了从模仿照搬到逐步调整、改造,从而纳入汉语语法体系的过程,是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语言接触、渗透和融合的产物。而现代汉语的比拟式则充分体现了语言渗透和融合的结果:上述两种比拟式的形式融为一体,两种语法功能也兼而有之。

0 汉语的比拟式是表达两物或两事之间有相似关系的结构,前面一般有像义动词如“如、似、像”之类,本文用 D 表示;像义动词后面的成分是喻体,可以是名词、动词、短语、句子等,本文用 X 表示;X 成分后面有时附上比拟助词,如“然、似的”等,本文用 Z 表示,有时不用比拟助词。本文只讨论后附比拟助词的比拟式,把前面有像义动词的“D+X+Z”式称为全式,把前面没有像义动词的“X+Z”式称为简式。以现代汉语为例:

全式:D+X+Z 像花儿似的|像飞似的

简式:X+Z 花儿似的|飞似的

现代汉语中用法跟“似的”相似的“一样”以及在近代汉语中常用的“一般”,尽管出现在比拟式中比拟助词的位置上,但它们跟“似的”

不太相同,其实词义并未消失净尽,故本文除连类而及之外,暂不讨论“一般”、“一样”之类。

1 先秦

1.0 先秦的比拟式都是全式,比拟助词常见的有“然”和“者”。^①

1.1 (A)D+X+然

(1)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礼记·大学》)

(2)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孟子·告子下》)

(3)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庄子·达生》)

(4)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孟子·公孙丑下》)

(5)木若以美然。(同上)

1.2 (B)D+X+者

(6)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礼记·檀弓》)

(7)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

从句法功能来看,先秦的比拟式在句中一律充当谓语。从语法意义上看,用“然”和用“者”似不完全相同。“D+X+然”式主要表示比喻和比拟,如例(1)一(3);但同时又有表示一种疑似判断语气的,如例(4)“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夫子好像有不快的表情似的),例(5)“木若以美然”(棺木好像太华美了似的)。再看“D+X+者”式,例(6)“一似重有忧者”(好像有深重的伤悲似的),例(7)“似不能言者”(像是不会说话似的),其语义虽然也有比拟成分,但其侧重点却在不肯定的判断语气,其像义动词大略相当于副词“似

^① 先秦两汉例句多采自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 1978 年版),唐宋例句有一部分引自李思明(1998)《晚唐以来的比拟助词体系》(《语言研究》1998 年第 2 期,总第 35 期),恕不一一指出。

乎”。

2 两汉

2.0 两汉的比拟式跟先秦基本相同,但已出现了简式。

2.1 全式:(A)D+X+然

(1)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史记·苏秦传》)

(2)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汉书·贾谊传》)

偶然见“D+X+焉”式:

(3)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史记·封禅书》)

有人认为“焉”实为“然”字之音借。

2.2.1 全式(B)D+X+者

(4)旁若无人者。(《史记·刺客传》)

(5)于是公子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史记·信陵君传》)

2.2.2 简式:X+者

(6)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史记·游侠传赞》)

(7)玄成素有名声,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汉书·韦玄成传》)

简式二例皆可补出像义动词,例(6)“言语不足采者”犹言“言语似不足采者”,例(7)“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犹言“士大夫多疑其似欲让爵辟兄者”,因此把“X+者”看做是“D+X+者”简略了像义动词是合适的。

两汉时期的比拟助词“然”和“者”的语法意义,似有分别,“然”表示比喻和比较(例1—例3),“者”表示不定判断语气(例4—例7),而在先秦文献中“然”可以兼表比拟与判断。

两汉的比拟式不论是全式还是简式,均在句中充当谓语,与先秦同。

3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比拟助词“馨”，只有全式，做谓语：

(1)冷如鬼手馨。(《世说新语·忿狷》)^①

(2)顾看两王掾，辄矍如生母狗馨。(《世说新语·文学》)

馨，段玉裁考证其为“𦣻”字之音借。《说文解字》：“𦣻，声也。从只，𦣻声。读若馨。”段注云：“谓语声也，晋宋人多用馨字，馨行而𦣻废矣”。所谓“语声”，即语助词。“馨”在南北朝时期多做指代词词缀，如：正自尔馨(《世说新语·品藻》)|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世说新语·文学》)|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世说新语·方正》)|王文开那生如馨儿(《世说新语·容止》刘注引《语林》)，“尔馨、如馨”义犹如此，为样态指示词。词缀“馨”用在短语后面进入比拟式而成为比拟助词。不过“D+X+馨”的用例很少，X成分目前也只见NP而未见VP，这说明比拟助词“馨”的使用范围和语法功能很有限。

4 唐、宋

4.0 唐宋时期出现了新的比拟助词“相似”，以全式为主，偶见简式。唐五代用例取自《敦煌变文集》^②和《祖堂集》^③，宋代的例子取自《五灯会元》^④和《朱子语类》^⑤。

4.1.1 全式：D+X+相似

(1)有坚牢树神，状如豹雷相似。(《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2)犹如不打相似。(《敦煌变文集·舜子变》)

(3)他各各气宇如王相似。(《祖堂集》2.60)

① 《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堉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祖堂集》，〔日〕中文出版社影印本。

④ 《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 (4)寒暑兀兀,如愚如聋相似。(《祖堂集》6.62)
- (5)犹如云开日出相似。(《祖堂集》4.61)
- (6)一似十七八岁状元相似。(《五灯会元》1188页)
- (7)如生脱龟壳相似,大苦。(《五灯会元》395页)
- (8)便是屎上青蝇相似。(《五灯会元》925页)
- (9)如昼夜相似。(《朱子语类》597页)
- (10)恰似个狮子跳跃相似。(《朱子语类》1796页)

4.1.2 简式:X+相似

(11)师上堂云:“此事似个什摩?闪电相似,石火相似,火焰相似,霹雳相似。是你诸人著力须得趁著始得,若不趁著,丧身失命。”(《祖堂集》3.88)

(12)尽黑漫漫地,墨汁相似。(《五灯会元》393页)

(13)这边那边飞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五灯会元》395页)

(14)烂冬瓜相似变将去,土里埋将去。(《五灯会元》395页)

4.2 附带说及,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另一个新的比拟助词“一般”,以全式为主,偶见简式。

4.2.1 全式:D+X+一般

(15)沙细人间莫比,恰如粉面一般,和水浑流不止。(《敦煌变文集·妙法莲花经讲经文》)

(16)若拨无因果,便同谤于般若,出佛身血一般。(《祖堂集》3.125)

(17)兜率独尊,超乎群品,亦如树果一般,方为称断。(《祖堂集》3.127)

(18)自生而熟,正如写字一般。(《朱子语类》968页)

(19)便是杀人底人一般。(《朱子语类》1227页)

4.2.2 简式:X+一般

(20)大人才见两僧,生佛一般礼拜。(《祖堂集》4.38)

(21)师云:“者个事军国事一般,官家若判不得,须唤村公断。”(《祖堂集》5.45)

4.3 小结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比拟助词“然”和“者”早已不在口语中使用,六朝时候的“馨”只用在名词性短语之后,且当时也不多见,更没有沿用到唐宋。唐宋时期出现了新的比拟助词“相似”和“一般”。“相似”本是动词“似”前加副词“相”,其意义是动词“像”、“类同”,用在前面已有像义动词“如”、“似”等的比拟结构末尾,致使其词义虚化,从而用如比拟助词。“一般”本是形容词,进入比拟结构后词义虚化,从而用如比拟助词。据李思明(1988)统计,《敦煌变文集》中“相似”只有三例;《祖堂集》中增多,“相似”与“一般”之比为19:2;《五灯会元》只用“相似”,《朱子语类》中“相似”和“一般”数量均大增,其比例为282:107。总的来看,唐宋时期的比拟助词基本上用“相似”到了南宋“一般”的用例才骤见增加。

(二)唐宋时期比拟式主要是全式,简式很少见,其语法功能也主要做谓语,偶见有做状语的,如例(7)(13)(14)(20)。简式是全式省略了像义动词。比拟式做状语,有的是复句中分句的层次,如例(7)、(13);有的是单句中短语的层次,如例(14)、(20)。

总之,从先秦到唐宋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汉语的比拟式基本上都是全式,其语法功能几乎清一色做谓语,只是从五代开始,才见到为数有限的做状语的例子。可以说,在12—13世纪以前,汉语的比拟式在形式和语法功能上都是比较单一的。

5 金、元

5.0 我们用《刘知远诸宫调》^① 和《董解元西厢》^② 作为金代的材料,用《元刊杂剧三十种》^③、《元典章》^④ 等作为元代的可靠资料。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比拟助词“似”、“也似”,由“似”和“也似”构成的比拟式前面不用像义动词,但后面一定要有 NP 或 VP,也就是说,“X+似/也似”比拟结构的语法功能是做修饰语,或修饰 NP 做定语,或修饰 VP 做状语,这一点跟以前的比拟式有着根本的不同。

5.1 X+似+NP/VP

(1)璧玉似牙嚼欲将破。(《刘知远诸宫调》十一[般涉调·苏幕遮])

(2)龙颜尽变改,失却紫玉似颜色。(《刘知远诸宫调》十二[大石调·玉翼蝉])

(3)把山海似深恩掉在脑后。(《董解元西厢》二[黄钟调·侍香金童·尾])

(4)虎狼似恶公人,扑鲁推拥厅前跪。(《元刊杂剧三十种·魔合罗》四[叫声])

(5)做娘的剌心似痛杀杀刀攒腹,做爷的滴血似扑簌簌泪满腮。(《元曲选·看钱奴》二[滚绣球])^⑤

例(1)、(2)“X+似”修饰名词“牙、颜色”,做定语;例(5)“X+似”修饰谓词性成分“痛杀杀”“扑簌簌”,做状语。例(3)、(4)如把“深恩”“恶公人”看做一个词,则“X+似”是定语,如把“深恩”“恶公人”看做短语,则“X+似”是状语。总之,“X+似”结构的功能是做修饰语,不能独立做谓语。

① 《刘知远诸宫调》,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影印金刻本。

② 《董解元西厢》,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③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 1980 年徐沁君校点本。

④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元刊本。

⑤ 《元曲选》,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5.2 X+也似+NP/VP

(6)喝一声爆雷也似喏。(《董解元西厢》二[般涉调·墙头花·尾])

(7)绛云也似丹脸若频婆。(《元刊杂剧三十种·西蜀梦》三[石榴花])

(8)俺哥哥山海也似恩未报。(《元刊杂剧三十种·替杀妻》三[满庭芳])

(9)正熟睡,倾盆也似雨降。(《刘知远诸宫调》二[正宫·锦缠道])

(10)不把我人也似觑,可将我谜也似猜。(《元刊杂剧三十种·老生儿》一[幺篇])

(11)我量力求财……涌进也似钱来。(同上一[仙吕·点绛唇])

(12)捣蒜也似阶前拜则么?(《元刊杂剧三十种·竹叶舟》四[倘秀才])

(13)阔里吉思戏言也似说来也者。(《元典章·刑部》二)

例(6)~(9)“X+也似”修饰NP做定语,例(10)~(13)修饰VP做状语。“似”和“也似”的语法意义和功能完全相同。拙文(1992)认为由于单用的比拟助词“似”容易跟动词“似”相混,为了区别起见,就在助词“似”前面加上语助词“也”作“也似”,也就是说“也似”实为“似”的变体。^① 助词“似”的用例比较少,但从考源的角度看,这

^① 晋葛洪《抱朴子》中有“也”和“似”相邻出现的例子,如:其利口谀辞也似辨,其道听途说也似学,其心险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洁也似廉,其好说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讳也似直(卷二〇)。“也”在句中为表示停顿的语气词,“似”为谓语动词。《抱朴子》中另有不用“似”而用“如”“犹”的例子:烈士之爱国也如家,奉君也如亲,则不忠之事不为其罪矣。仁人之视人也如己,待疏也犹密,则不怒之怨不为其责矣(卷三九)。总之,《抱朴子》中的“也”与“似”或“也”与“如”、“也”与“犹”跟金元资料中的比拟助词“也似”在结构和语义上都不相干。

些例子十分重要,它出现得早,更能反映出这种比拟式初期的面貌,我们正应该由此入手,寻考其出现的原因。

5.3 回顾一下自先秦至唐宋的比拟式,可以清楚地看出金元白话资料里的比拟式跟前代明显不同,主要有二:

(一)句式结构不同

金元以前的比拟式基本上都是“D + X + Z”(全式,如/若 X 然/者、如 X 馨、似 X 相似,如 X 一般),而金元时期的比拟式为“X + 似 + NP/VP”,前面不用像义动词,后面必须有中心语 NP 或 VP。虽然唐宋白话文献中有少数“X + Z + VP”的用例(“生佛一般礼拜”|“烂冬瓜相似变将去”),但从历史传承可以看出“X + Z”是“D + X + Z”的省略,“X + Z”跟后面的 VP 结构关系比较松散,其中间可以有停顿,可以添加成分)如:似见了生佛一般,叉手深深礼拜|如烂冬瓜相似,一日日渐渐变将去)。而“X + 似 + VP”的结构关系紧密,“X + 似”跟 VP 之间不能有停顿(如“剜心似痛杀杀攢腹”)。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早期可靠文献里,“X + 似”结构的特点就是前面不用像义动词,从根本上说,它没有一个前面加像义动词的对应式,因而它不是简式,尽管它跟金元以前的简式“X + 相似/一般”表面上相类同。

(二)语法功能不同

金元以前的比拟式尽管比拟助词有兴替,但它们的语法功能相同,都是在句中充当谓语成分。五代前后有少数简式做状语,但如前所述,这种简式做状语用法的本质可以看做是复句的紧缩。金元的比拟结构“X + 似”是个修饰成分,它的后面一定要有中心语,当中心语为 NP 时,“X + 似”充当状语,“X + 似”不能独立使用,因而它不能充当谓语。以上特点跟唐宋以及唐宋以前的比拟式迥然而异。

5.4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元白话中出现了这种形式和功能全新

的比拟式呢？拙文(1992)认为应是汉语受到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语法影响所致。

蒙古语的比拟表达方式是在名词、代词或少数动词后面加上后置词 *netü*, 然后再接中心语, 蒙语专家照那斯图先生提供了如下例子:

ral metü ularan tur

火 似 红 旗 (像火一样红的旗子)

mori nisqu metü qaruluna

马 飞 似 跑 (马像飞一样地跑)

可以看出金元时期的“X + 似 + NP/VP”式跟蒙古语比拟表达的直译体的语序相一致。

下面两例引自道布(1983)第 97 页和第 109 页^①:

tjam ʃooxã dʒalxoo xũ beexgoe

你 好像 懒 人 有无 (没有像你这么懒的人了)

moer ʃooxã jim

马 如同 东西 (像马似的东西)

如果直译, 这两句就成了“你似懒人没有”、“马似东西”。显然, 这样直译容易有歧解。“马似东西”会歧解为主谓句, 如果“似”前加上助词“也”作“马也似东西”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

5.5 在学界公认的传世宋元话本中, 比拟助词只见“似”、“也似”未见“似的”、“也似的”, 比拟结构“X + 似/也似”前面也不用像义动词, 可以直接做定语或状语, 情况跟金元可靠资料一致, 例如:

(14) 名标青史, 直到如今, 做几回花锦似话说。(《古今小说·史弘肇龙虎君臣会》)^②

(15) 只见一个汉, 浑身赤膊, 一身锦片也似文字。(《古今

① 道布:《蒙古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古今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16)教捉策篱的做眼,飞也似跑到禁魂张员外家。(同上)

(17)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①

(18)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同上)

如此看来,金元比拟助词的形式和语法功能可以作为一项标志,用来作为鉴定作品语言时代的参考。

5.6 我们注意到,在元代可靠语言资料中也有少数例外。比如许衡《直说大学要略》(《鲁斋遗书》卷三)^② 里有两例“D+X+也似”做谓语的例子:

(19)若不用心体验,便似一场闲话也似,这般说过去了便无益。(“似+X+也似”也可看做状语)

(20)便如掩着那耳朵了去偷那铃的也似。

另外在《大宋宣和遗事》^③ 里有“X+也似”在复句中做状语的一例:

(21)把个门儿关闭闭塞也似,便是樊哙也踏不开。

这三例跟前举金元资料诸例形式和用法都有异,倒是跟唐宋比拟句全式“D+X+相似”和简式“X+相似”相同。我们认为,这三例不是金元时期的典型用法,而是用金元时代的比拟助词“也似”替代了唐宋旧格式中的“相似”,是旧瓶装新酒,并没有产生新的语法格式和句法功能。

现代汉语的比拟助词用“似的”或“也似的”,但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知道,在元代可靠的资料里还没有出现“似的”和“也似的”,

① 《清平山堂话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87 年版。

② 《鲁斋遗书》,四库全书本。

③ 《大宋宣和遗事》,涵芬楼排印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

虽然明人臧晋叔所编《元曲选》宾白中已有“也似的”，但是其曲文中未见，而且元刊本杂剧中也未见，所以毋宁把它看做是明人的手笔。

6 明代

6.0 我们以万历本《金瓶梅词话》^① 作为明代的可靠资料。这本书中的比拟式种类繁多，是唐宋各代的积淀，同时也有明代新生的形式，以下各举一二用例说明。

6.1 (A) D+X+相似：(那贲四)如坐针毡相似。(35回)

(B) X+相似：胳膊儿瘦的银条儿相似。(62回)

(C) D+X+也似：两耳朵似竹签儿也似。(61回)

(D) X+也似：生的灯人儿也似。(78回)

A式始见于唐代，B式是A式的简式，五代及宋时有少量用例。C、D二式是金元的“也似”替换唐宋的“相似”，不是新格式。但是由于这种词汇上的替换使得金元时代原来只做定语和状语的“X也似”结构出现了可以在句末作谓语的新功能。

(E) X+Z+VP(Z为“似、也似、也是”)：逗猴儿似汤那几棍儿(73回)|都插烛也似磕下头去(58回)|流水也是往来(56回)

E式有两点可以注意：一是出现了新的比拟助词“也是”，不过“是”与“似”义通，自古已然(详见拙文(1992)第450页)；二是E式比拟结构都做状语，这类用例的数量大大多于做定语的，跟金元资料中定语用法更为常见形成反差。我们认为这种功能上的反差是金元时代的比拟式被逐渐汉语化的一个反映。

(F) D+X+也似+NP：真个是布机也似针线。(3回)

^① 《金瓶梅词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万历刊本。张竹坡评《金瓶梅词话》，齐鲁书社1987年版。

此例“X+也似”做定语,是金元用法的体现,但前面加像义动词“是”,却是汉语比拟式的特点。所以,F式是金元比拟式被汉语化面产生的新句式,不过这种句式的用例很少见。

(G) X+似+VP+的+NP:油似滑的言语(《金瓶梅词话》张竹坡评本1回)。

按金元比拟式的功能,“X+似+VP”后面无须加结构助词“的”就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如前举“山海似深恩”“虎狼似恶公人”,而万历本此句正作“油似滑言语”。G式在后面加“的”,也是使金元比拟式在功能上汉语化的表现。这类例子在《水浒传》中也能见到:“这般火似热的天气(16回)”

(H) X+Z+的(Z为“似、是、也似、也是”):如何狗褪了脸似的(46回)|指头儿似的少了一个(73回)|捏杀蝇子儿是的(35回)|鬼精灵是的(37回)|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58回)|怎的号啕痛也是的(76回)。

H式在形式上的特点是比拟助词后面加上了助词“的”,在功能上H式主要做谓语,少数做状语、补语,未见做定语的。H式无论形式还是功能都跟金元时期的比拟式很不一样,其功能可以说又回到了唐宋比拟式。

6.2 《金瓶梅词话》所见A~H八个格式是汉语的比拟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与阿尔泰语的比拟表达相渗透、相融合的过程的反映。这种渗透和融合经历了从照搬蒙古语语序,到逐步调整、改造,从而融入汉语固有的语法体系的过程。其步骤大致为:

- a. 词汇替换,用金元时期的“也似”替换唐宋时期的“相似”(似竹签儿也似);
- b. 模仿全式,前加像义动词(是布机也似针线);
- c. 削弱、减少“X似/也似”的定语功能,因为这是汉语比拟结构以前所未有的功能;

d. 在做定语的比拟结构“X 似 VP”后加结构助词“的”(油似滑的言语);

e. 在比拟助词“似、也似”后加结构助词“的”(狗捋了脸似的/生根也似的)。

在以上一系列的调整措施中,最关键、最具实质性的步骤是在比拟助词“似、也似”后面加上结构助词“的”,使得比拟助词“似的”增加了结构助词的功能,这样比拟结构“X 似的”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充当谓语、状语、定语、补语等各种成分了。形式上的调整,达到了功能上的融合。

7 结语

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要想认识一种语法格式的由来和特征,就不得不追溯它的历史,理清它的发展轨迹和脉络。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密切交往,长期杂居乃至通婚,汉语和外族语言的接触是非常密切的。《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当时的汉语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唐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各族先后入主中原,推进了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对汉语、汉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考察和分析历史语言现象时,还应该在历史比较法之外,从语言渗透、语言融合的角度去考虑。也就是说,语言不完全是一种同质系统,共时语言中的有些差异不一定是其自身单线条历时层次的反映,而可能是由于语言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造成的。我们认为元明时期的比拟式正应该这样解释。下面把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归纳如次:

(一)从先秦到唐宋,汉语比拟式的典型句式为“D+X·Z”,其简式为“X·Z”。先秦两汉的比拟助词 Z 为“然、者”;唐宋时期的比拟助词 Z 为“相似”或“一般”,无论全式或简式,其语法功能都是在句中做谓语,直到五代以后才有少量简式做状语的例子。

(二)在金元白话资料里出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新的比拟式

“X·Z + NP/VP”,前面不用像义动词,Z为“似、也似”,“X似/也似”只能做修饰成分——定语或状语,不能做谓语。这种比拟式不是汉语原有的比拟式的继承与发展,而是模仿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比拟表达语序面产生的新兴的比拟式,是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语言接触和融合的产物。

(三)汉语在接受阿尔泰语比拟式影响时,经过了从模仿照搬到逐步调整、改造,从而纳入汉语语法体系的过程。拙文(1998)关于后置词“行”的考辨也是一例。即汉语原为“动/介 + NP行 + (VP)”式(向谁行宿),而蒙古语前面不用“动/介”,直接在NP后加后置助词表示动作的对象等,故元代白话文献中常见“NP行 + VP”式(皇帝行奏),但明代以后这种句式就很少见了,渐被“动/介 + NP行(+VP)”(向皇帝行奏)所替代。这说明汉语一般不会原样照搬外族语言的语法格式,即使一时接受了,其后也会“回潮”,这就是为什么汉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却始终保持其基本结构特点的原因。

(四)现代汉语的比拟式为“像 + X 似的(+ NP/VP)”,从形式上可以分解为(a)“像 + X 似的”和(b)“X 似的 + NP/VP”两式,a式是汉语固有的“D + X·Z”式,b式来自阿尔泰语的“X 似 + NP/VP”的变体(变在“似”后加了结构助词“的”)。从功能上汉语的比拟式主要做谓语,阿尔泰语的比拟式主要做修饰语(定语、状语)。语言渗透的结果,使得两种比拟式的形式融为一体,功能也兼容了。真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五)拙文(1992)认为现代汉语北方话中念作“shi·de(是的)”的比拟助词不是来自似/也似→似的/也似的(si·de)系统,而是来自明代表示判断语气的句末助词“是的”,本文重申这一观点,并做补充说明:

(1)“是的”与“似的”是来源不同的两个比拟助词,由于“是”与

“似”词义本有相通的一面,二者读音也相近,再加之“是的”与“似的”又有共同的语法意义——表示比拟,所以其功能迅速相互渗透,以至除了读音以外,二者没有什么不同。在竞争中“是的”战胜了“似的”,成为北方话口语中通行的比拟助词。由于“似”的表义性强,所以至今仍残存在书面语中,南方人在书面和口头上都更习惯于使用“似的”。

(2)《现代汉语词典》把“似的”与“是的”立为两个词目的做法是对的,但把“似的”也注作“shì·de”似可商量。我们主张依其字标作“sì·de”。因为历史上毕竟有从“似”到“似的”的比拟助词存在,而且它现在仍在书面上和相当广泛的方言区里使用。

参考文献: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十九章).商务印书馆(新一版).
1982, 353~358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 507~508

太田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83~185, 322~323.

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 364

香坂顺一.白语语汇の研究.日本光生馆.1983, 91~92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 251

俞敏.语法札记.语文学习.1953, (5)

黄岳洲.试谈“一样”“像……一样”“似(是)的”.语文学习.
1955, (5)

朱德熙.说“跟……一样”.汉语学习.1982, (1)

陆俭明.析“像……似的”.语文月刊.1982, (1)

江蓝生.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中国语文.1992,
(6)

江蓝生.后置词“行”考辨.语文研究.1998,(1)

李思明.晚唐以来的比拟助词体系.语言研究.1998.2.总 35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4 期)

《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经典就陆续被译成汉文。为了达到宣传大众、扩大影响的目的,佛经的翻译者们不避俗语,采用了比较通俗的、接近于口语的文体。这样一来,佛经译本就成为我们研究汉语白话文的历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前后的俗语词和口语语法的极其丰富的资料。充分认识佛经译本对于语言研究的价值,加强对这些资料的利用和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研究的路子。

《生经》共五卷五十五经,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云为西晋竺法护所译,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云为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正月十九日出。本文选释的《佛说舅甥经》属《生经》卷二第十二经,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三《本缘部》上,高丽藏本收于第二十册。大正藏第五十三卷《经律异相》卷四十四亦收,题为《舅甥共盗·甥黠慧,后得王女为妻》,但内容较为简略。此外,敦煌写本P2965号卷子也录有《舅甥经》,但开头部分不全,约缺四分之一。大正藏本跟高丽藏本文字几全同,只有个别地方稍异;敦煌本多为俗体字,且颇多错讹缺脱,但也间有可校正前二本之误处。

《舅甥经》篇幅不长,故事性很强。写的是:舅甥二人盗窃内帑宝物,舅被捉斩首,甥设计将舅火化,盗走尸骨。国王屡次设法捕捉,均未得逞,反让甥智娶王女为妻。甥与国王斗智的情节十分曲折,读来饶有兴味,使人不由得联想起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

事。《舅甥经》口语成分较多,其中有不少语词不经考释不易索解。本文选释其中十九条,以出现先后为次。有些被释词语出现在同一段引文中,为避免分别引文的繁复,拟于该段引文前同时标出所释各个词目,然后一一注释。

惛怗

王诏之曰:“勿广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盗者,谓王多事,不能觉察,至于后日,遂当惛怗,必复重来。且严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无令放逸。”(大正藏 3.78b)

“惛怗”,高丽本作“惛怗”,《经律异相》无此句,敦煌本缺损。此词未见辞书收载,据其下字“怗”“怗”,疑与“狃怗”词义相涉。《尔雅·释言》第二;“狃”复也。”敦璞注云:“狃怗,复为。”郝氏义疏云:“复者,又也,重复之义。狃者,徕之假借也。《说文》云:‘徕,复也。’《玉篇》云:‘习也,怗也。或与狃同。’《诗》‘大叔于田’传:‘狃’习也。”笺云:“复也。”《小尔雅》云:“怗也。”按:鲁语云“夕而习复”,是习复同义。怗(音逝),惯习也。《诗》正义引孙炎云:“狃怗,前事复为也。”……《说文》:“狃,犬性骄也。”与惯习义亦近。”据以上《尔雅》郭注及郝疏可知,“狃、怗、习”三者为同义词,皆可训为“复”(《说文》:“习,鸟数飞也”,故有“复”义)。验之于文献中的用例,也可以看出这三个单音词在意义上的关联,如《荀子·议兵》:“怗之以庆赏。”杨倞注:“战胜则与之赏庆,使习之为常。”(怗通狃)《后汉书·独行·戴就传》:“薛安庸驷,怗行无义。”李贤注:“怗,怗也,犹言惯习。”汉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很容易两两连用,结合为同义并列复词,上举《尔雅》郭注及《诗》正义皆以“狃怗”连用即为其证。因为“习”跟“狃”“怗”同义,所以它也能跟“怗”结合为复词“习怗”,如同“均”“平”“衡”三个同义词可组成“均衡”“平衡”“均平”“平均”等复词一样。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收有“习怗”条,但释文仅释“怗”的音义,云:“又作怗,翼世反。《字林》:‘怗,习也。’……”(大正藏

54.674c)至此我们认为“惛怗”应是“習怗”(xíyì)之误。在字形上,“惛”是“習”的增旁讹字(惛,惯也),俗字为求得复合词二字偏旁的一致,往往给其中一字添加偏旁。“怗”通“怗”,似以“怗”为正体。从意义上看,“習怗”释作“重复”“惯习为常”也与经文句义吻合,言舅甥二人以为国王发觉不了,遂惯习为常,复来行窃。

猥逼、射闹

王又诏曰:“輿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对哭取死尸者,则是贼魁。”弃之四衢,警守积日。于是远方,有大贾来,人马车驰,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闹,载两车薪,置其尸上。(3.78b)

“猥”有“多”义,“盛”义。《汉书·沟洫志》“水猥盛则放溢。”师古注:“猥,多也。”《小说》:“吾曾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过必在此。”(《古小说钩沉》94页)“天怒猥集”犹言“天怒盛集”。例中的“猥逼”指许许多多的人凑上去,“猥”形容人众之盛。

“射闹”的“闹”,敦煌写本作“丙”,应是“𡗗”字之误。慧琳《一切经音义》:“𡗗,多也。……下奴效反。《字书》:‘𡗗,人多扰扰也。’《说文》:‘从市从人也。’俗作闹,经文作丙,误也。”(大正藏 54.515c)“射闹”,犹言趁乱(“射”有穿、钻义)。此言趁着人众纷乱的空子,把木柴置于尸体之上(今印度民间仍保留此种习俗)。

总闹

于是外甥,将教僮竖,执炬舞戏。人众总闹,以火投薪,薪然炽盛。(3.78c)

“总闹”之“总”,不可释为副词“皆”。《说文》:“总,聚束也。”《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王逸注:“纷盛多貌。总总犹傳傳,聚貌。”又《九章·湘夫人》:“纷总总兮九州,寿夭兮在予。”王逸注:“总总,众貌。”是知“总总”状众多纷扰之貌。“总闹”的“总”也是此义,“总闹”为同义复词,言(人众)聚集纷乱之貌。“将

教儻竖”:将,率也;教,命也。

蛇维

王又诏曰:“若已蛇维,更增守者,严伺其骨,来取骨者,则是原首。”(3.78c)

“蛇维”一词,辞书未载。“蛇维”实即梵语音译词“荼毗”的异形,义为火化、焚烧。其梵语音为 shāpiti,又译作“阇维”。“荼毗、阇维”,佛教辞典均收,惟未收“蛇维”。日语中仍沿用此词,汉字标为“荼毗”,读音为だび(dabi)。日语中的“蛇”字,惯用音为だ(见小川环树等编《新字源》),跟“荼毗”的“荼”同音;“维”在日语中读作び,跟“毗”同音(今吴语中“维”一读为bi)。可见“蛇维”确为“荼毗”的异形译音词。“严伺其骨”,谓严守死者尸骨。“伺”义为察也,候也。

兼、微、酒宗、俘囚、受

甥又觉之,兼猥酿酒,特令醇厚,诣守备者,微而酤之。守者连昔饥渴,见酒宗共酤饮,饮酒过多,皆共醉寐。俘囚酒瓶,受骨而去。(3.78c)

“兼猥酿酒”,即多多酿酒。“猥”有“盛多”义,已见前。何以“兼”也有“多”义呢?《说文》:“兼,并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兼持一禾。”是知“兼”字本为持二禾,比之“秉”之持一禾,固为多也。“兼”引申有“加倍”义,“多”义,文献有证。《后汉书·吴右传》:“右父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右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李贤注:“车有两轮,故称两也。”“兼两”,言不止一部车子,非确指两部车子。《北史·长孙道生传》:“拜司空,加侍中,身为三司,而衣不华饰,食不兼味。”所谓“兼味”实指多味,非只指两种食品。由上可以看出“兼”由“并”义引申出来的“倍多”之义。故今释“兼猥酿酒”为多多酿酒,加倍酿酒。“兼”不应训作连词“及”,“兼猥”乃同义词连用。

顺带说,“兼”字在日语里表示时间时有“事先、老早”之义,这恐怕也跟“兼”的“倍多”义有关。“兼日”即多日,不止一日,故展转可作“事先、很早”讲。

“微而酤之”,“微”不作“少”解,而应释作“伺察”。此言外甥伺机用酒灌饮守备者。郭在贻《汉书札记》云:“微乃臚之省借。《说文》:‘臚,司也。’司即伺察之伺(《玉篇》即作‘臚,伺也’)。”(见《训诂丛稿》35页)郭氏举汉代以上书证详论“微”之“伺察”义,文繁不录。“微”有“伺”义,故得与“伺”连文。《舅甥经》中“微伺”凡两见,其一是当守尸者报告有人将木柴放在尸体上时,“王诏微伺,何不周密,若有烧者,收缚送来。”(3.78b)其二是:“王使乳母更抱儿出,及诸伺候,见近儿者,便缚将来。甥酤美酒,呼请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劝酒,大醉眠卧,便盗儿去。”(3.79a)此二处“微伺”皆应训作“窥察”。

“酒宗”之“宗”,义不可解,高丽本也作“宗”,惟敦煌本作“宗”。今按,“宗”,乃“肉”之俗写,敦煌写卷中多见。如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心腹到处皆零落,骨宗寻时似烂焦。”“骨宗”即“骨肉”也。日语至今“宗”与“肉”通用,指兽肉。是“酒宗”乃为“酒肉”之误。

“俘囚酒瓶,即提取酒瓶。”俘囚”为动词,义为提取。玄应《音义》:“俘囚,妨愚反。《尚书》‘俘厥宝玉’,孙安国曰:‘俘,取也。’”(大正藏54.674c)“俘”,本义为“军所获”,为名词,作动词时就指“捉获”。“囚”本义跟俘甚近,由于同义词之间意义、用法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囚”也有了“提取”义。下文“小儿饥啼,饼师授饼,因而鸣之。不意是贼,何因囚之?”(3.78c)此处“囚”字单用作“提取”解。

“受骨而去”的“受”跟常义“接受”略异,已引申为“盛放”。《方言》卷六:“受,盛也,犹秦晋言容盛也。”《广雅·释诂》:“受,盛也。”唐时仍有此义,《游仙窟》:“便命香儿持钵,可受二升已来。”《封氏

闻见记》卷八：“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瓮而有耳。”

前后

王又诏曰：“前后警守，竟不级获。斯贼狡黠，更当设谋。”

(3.78c)

尔为是非，前后方便，捕何叵得？(3.75a)

“前后”为时间副词，多用于动作、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先后多次发生，可释作“多次”“屡次”。“前后警守”犹言多次警守（“竟不级获”的“级”疑为“及”之误）。“前后方便”犹言屡次设计（“方便”做动词，义为设计、设法，详见下文）。

另外“前后”做时间副词还可以偏指以前、前时，六朝及唐五代文献里皆可见。《过去现在因果经》：“然我观王，中情恳至，倍于前后。”（大正藏3.637b）《述异记》：“君勿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古小说钩沉》181页）《汉将王陵变》（王陵母曰）：“前后修书招儿，儿并不信，若借大王宝剑，卸下一子头发，封在书中，儿见头发，星夜倍程入楚救母。”（敦煌变文集45页）《舜子变》：“瞽叟问言：‘娘子前后见我不归，得甚能欢能喜？今日见我归家，床上卧（地）不起。’……”（又，130页）末例“前后”与“今日”对言，明证“前后”指以往、前时。“前后”偏指“前时”是一种反义复词偏义现象，如同“好歹”偏用“歹”，“缓急”偏用“急”一样。

利、素

王即出女，庄严瓔珞，珠玑宝饰。安立房室，于大水旁。

众人侍卫，侍察非妄，必有利色，来趣女者。素教诫女，得逆抱捉，唤令众人，则可收执。(3.78c)

“利色”，犹贪色也。《广雅·释诂》：“利，贪也。”《礼·坊记》：“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注云：“利犹贪也。”“利”之此义，唐五代时仍沿用，《唐语林·政事》下：“宣宗时党项叛扰，推其由，乃边将贪暴，利其羊马，多欺取之。”以上皆可为证。

“素教诫女”，即预先教诫女儿。“素”作时间词有“预先”义。《国语·楚语》：“夫谋必素。”注：“素犹豫也。”“豫”即预先。又《后汉书·列女·曹大家传》：“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注云：“素，先也。”

翫习

如是连昔，数数不变，守者翫习，睡眠不惊，甥即乘株到女室。(3.78c)

“连昔”即连日。“翫习”为同义复词，《说文》：“翫，习厌也。”所谓“习厌”，即惯习而厌满，亦即习以为常之义。此言看守者对发生的异常现象习以为常不再注意。《甄异传》写一个叫夏侯文规的人死后一年现形回家，“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辄来，或停半日。其所将赤衣驺导，形皆短小，坐息篱间及厢屋中，不知。文规当去时，家人每呼令起，翫习不为异物。”（《古小说钩沉》160页）此言家人习为常，不把赤衣驺导小鬼当作异物。查新《辞源》、新《辞海》均未收“翫习”一词，似应补收。

方便

迟守者寤，甥得脱走。明具启王，王又诏曰：“此人方便，独一无二，久捕不得，当奈之何！”(3.78c)

“方便”在这里是名词，犹机谋、办法。又：

吾之一国，智慧方便，无逮卿者。(3.79a)

此例“方便”与“智慧”并列而言，可见应作名词“机谋”解。“方便”作名词，通常可释作“方法”“办法”，如《幽明录》：“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古小说钩沉》274页）此外“方便”还可以用作动词，犹言“设计”“想办法”，如：

尔为是非，前后方便，捕何叵得？(3.79a)

此言：你干了坏事，屡次设计，怎么老抓不到你？

呜噉、呜

女即怀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国中，

有人见与，有鸣嘍者，例缚送来。抱儿终日，无鸣嘍者。(3.78c)

“鸣嘍”为同义复词，犹今语亲吻。《广韵》入声屋韵：“嘍，鸣嘍，口相就也。”玄应《音义》“鸣嘍”条引《声类》云：“嘍，亦鸣也。”(大正藏 54.674c)此词后世文献中又作“呜喱”“呜囁”，如《董西厢》五折《洞仙歌》曲：“拍惜了一顿，呜喱了多时。”又《梁州三台》曲：“恁恁地，觑了可喜冤家，忍不得恁情呜囁。”

“呜”字单用，义与“鸣嘍”同。如：

小儿饥啼，乳母抱儿趣饼炉下，市饼铺儿，甥既见儿，即以饼与，因而鸣之。乳母还白王曰：“儿行终日，无来近者，饥过饼炉，时卖饼者，援饼乃鸣。”(3.78c)

《世说新语·惑溺》也有单用“鸣”例：“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

狂水

甥酤美酒，呼请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劝酒。大醉眠卧，便盗儿去。醒悟失儿，具以启王。王又诏曰：“卿等顽骏，贪嗜狂水，既不从贼，复亡失儿。”(3.79a)

“狂水”据上下文知指酒也。盖酒饮过量使人醉而癫狂，故谓之狂水。辞书未收此词，今语也不说狂水，然日语俗语中仍用“狂水”指称酒。

续

王心念言，续是盗魁，前后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3.79a)

“续是盗魁”，即“又是那个盗魁”之意。“续”本是动词持续、接续义，转作副词，表示动作的重复，相当于“又、复”。《生经》卷一《五仙人经》第十一，写一梵志先献一只宝履给王，后又找到另一只，

“还到本国，续以上之。王即欢喜，群臣意解，复其宠位。”(3.78a)
“续以上之”即“复以上之”之意。《太子瑞应本起经》：“续是大道人
所为耶？”(3.481b)此言“又是大道人所为吗？”以上可证“续”应释
为副词“又”、“复”。

《舅甥经》中还有少数词语不甚了了，如“诸守人捉甥不制”的
“不制”当为“不成”、“不得”之意，但尚缺少旁证。再如“连昔”何以
为“连日”之意，尚不知其所以然。此外还有个别词语不得其解，如
“王即有名，自以子”的“有名”。就是上面已经注释的十九条词
语，恐怕也难免有析说不确，论证不足之处，凡此种种，期待读者不
吝指正。

(原载《语言研究》1989年第1期)

《燕子赋》(乙)校释拾零

敦煌写本中有内容不同的两种《燕子赋》，为区别起见，研究者一般以甲、乙分别称之。1983年，拙文《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校注》(之一，即甲种)在《关陇文学论丛》上发表^①，1989年项楚先生的大著《敦煌变文选注》问世^②，嗣后又读到已故郭在贻先生及其弟子张涌泉、黄征的力作《敦煌变文集校议》^③。项、郭二书卓见叠出，纠正拙文错谬多处，使我获益良多，试举二例以见其一斑。

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罗(罹)鸟灾？(《变文集》249.8；前为页数，后为行数，下同)

“豹尾”一词，拙文释为“此指豹尾枪、豹尾幡之类，为显官仪仗之饰……此处豹尾代指权贵。”项注云豹尾“本是古代君王或达官仪仗属车之一。……然而本篇之‘豹尾’应为阴阳术数家语，犹如上文之‘将军太岁’，动土营建者应避其方，倘或触犯豹尾，必致遭灾获殃。”并举敦煌卷子S.4288《佛说八阳神咒经》为证，其说信而有征，可为定论。

上攀樛使，藉草为床。(249.2)

“樛使”一词，拙文释为“梁窰”，据《广韵》“使，窰”二字同音，

① 《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敦煌变文选注》，项楚著，巴蜀书社，1989年。

③ 《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张涌泉、黄征著，岳麓书社，1990年。

“窠，穴也”，认为梁窠指梁上的巢穴。郭书《校议》读“使”为“櫪”，引《广韵》“櫪（所宜切，又山尔切），梁栋别名，又礼、丽二音”，指出：“其中山尔切一音即与‘使’之切音完全相同。”并举《列子·汤问》：“既去，而余音绕梁櫪，三日不绝。”此说於音义皆合，且书证昭然，不容怀疑。

近日收拾旧文，检出过去未曾发表的《燕子赋》（乙）校注，自觉其中或有可为时贤补阙之处，遂不揣浅陋，择出十数条，略加比次条述，谨再向方家请教。

（1）此歌身自合，天下更无过，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262.1）

“身自合”：本当；本该。“身自”为一词，一般作“亲自”讲，唐五代时可作“本身”“本”讲。例如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四《蜀门讽·咏金刚》诗：“刚被时流借拳势，不知身自是泥人。”即说金刚本是泥塑之人。上举《燕子赋》“此歌”四句在语义上实为两句，意思是：雀儿和燕子合作的《开元歌》当属天下第一。项书注“身自合”为“自唱自和”，恐非是。

（2）口衔长命草，余事且闲闲。（262.4）

“长命草”或泛指可治病健身的药草，或确有以此为名的草。辽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七《金刚顶瑜伽护魔仪轨》一卷音释：“屈萎草，上军律反，下力句反，似白茅而蔓生也，今俗呼为长命草也。”“屈萎”应是“曲”的分音词，故长命草很可能是茎弯曲蔓生的一种多年生植物。

（3）摇头径野说，语里事诤𧈧。（262.2）

径，《集韵》去声径韵：古定切，“直也，坚也。”故“摇头”句云雀儿摇头晃脑硬是胡言乱语。“径”用如今副词“硬”。“诤𧈧”一词字书未载，应是俗写字。今谓“诤𧈧”实即“争规”，“争”通“诤”，义为直言劝谏；“规”为规劝，用正言相谏。“争规”为同义复词，又可倒

为“规争”。《新唐书·常山王承乾传》：“宫臣若孔颖达、令狐德棻……等皆天下选，每规争承乾，帝必厚赐金帛，欲以厉其心。”句中“规争”即为劝谏义。同义复词在早期往往词无定序，所以既见“争规”(诤规)，又见“规争”。《燕子赋》作“诤规”，恐与相近文字的韵脚为“飞、依、儿”有关。“争规”本为用言语劝谏，引申为言语争执、冲突，进而泛指争吵。俗字常据义增加形旁，于是就写成了“诤规”。

(4)燕子语雀儿，好得辄行非！(262.9)

“好得”犹言岂得，怎能，下文“好得合头痴”(262.13)的“好得”同此义。“好”用作反诘副词，唐代始见，例如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诗：“绿樽虽尽日，白发好禁春？”此言白发老人哪能禁得起春光的撩惹。罗邺《谒宁祠》诗：“春生溪岭雪初开，下马云亭酌一杯。好是精灵偏有感，能于乡里不为灾？”“好是”犹言岂是。“好”用作反诘副词，应从其“可”(可以)义引申而来。此释王锬《诗词曲语词例释》始发之。项书注“好得”为“好一个”，恐未安。

(5)燕子语雀儿：好得合头痴！(262.13)

“合头痴”项书注为“形容极其愚笨”，并引王梵志诗证此词又作“合脑痴”，甚是。“好得合头痴”犹言：你怎么能这么蠢！郭书说明“合头”“合脑”义为全头脑，引申为彻底、彻头彻尾，似可商。五代南唐禅师所编《祖堂集》卷十三报慈和尚：“师云：‘不见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意思是：说错一句话，将万世沦为畜牲。“合头语”即蠢话，糊涂话，“合头”不可解释为“彻底”。元明时候有“夹脑”一词，如元杂剧《举案齐眉》一折：“老孟是个真夹脑，酒不醉来饭不饱。”又，孤本元明杂剧《拔宅飞升》剧一：“把石头点成金宝，不理民专弄术法，人都骂他夹脑，我也说他低答。”据文义，“夹脑”的意思是痴呆，愚蠢，跟唐五代时候的“合脑”“合头”意义相同。由此我们推想“合头”“合脑”的“合”应与“夹脑”的“夹”意义相关，

“夹”有围抱义，故“合”应是取义于“整个”“囫圇”的意思，“合头、合脑、夹脑”均犹今语死脑筋——头脑不开窍之谓。

(6)精神目验在，活时解自如，功夫何处得，野语诳乡间。

(263.7)

“精神目验在”是说眼见你精神尚在，言下之意是你还活着。佛家谓修行到家者可脱离一切烦恼，达到自在无碍的境界。而佛徒只有修行涅槃（即寂灭）后才能达到自在无碍的境地，因此“活时解自如”显然是骗人的“野语”谎言。

(7)自从能识别，慈母实心平。恒思十善业，觉悟欲无常。

(263.15)

“识别”指认识事物、辨认方向等，实指小孩长大成人。《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纵年成长，识会东西，抛却耶娘，向南向北。”又《维摩诘经讲经文》：“年才长大，才辨东西，便即离乡别邑。”以上三例并以“长大成人”与“识会东西”连说，故“自从能识别”应是“识别东西”的意思，其隐含的语义是“长大成人”。“慈母”的“慈”应是“辞”字之讹，“辞母”代指离家外出，犹上举三例中“抛却耶娘，向南向北”“离乡别邑”“遣学经营（出外经商）”之意。《敦煌掇瑣》四十一 P. 2809：“世人无慈好酒肉，百味调和劝六亲。”其中“慈”也为“辞”之误，此其讹误同例。“慈（辞）母实心平”句言辞别父母出家修行。“心平”指学佛者中心精诚，清静无杂念，故有“心平不用持戒，行直可（何）须座[禅]”之语（见《敦煌掇瑣》P. 2129）。“自从”二句大意为：自从长大成人之后，就离家精诚修行。

(8)不能别四海，心里恋洪牙（崖）。(264.1)

“四海”指中国海内之地，又指民间。《尚书·舜典》：“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江云：‘四海乃谓民间，则百姓是群臣。’”“先谦案：上文百姓即训百官，江说以四海为民间是也。”“不能”二句意为：我（燕子）既不愿意离开尘世

(“春夏在人间”)又舍不得山野之家(“秋冬石窟隐”)。

(9)本拟将身看,却被看人看。(264.4)

此二句应与“螳螂捕蝉,黄雀其后”构意相近。“螳螂”句比喻处境危险而不自知,此二句则指自身被人算计而不知觉,比喻事出意外。

(10)雀既被燕撮,直见鸟中王。(264.6)

“撮”有捏捉义,如《庄子·秋水》:“鸥鹖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山丘。”但此义与《燕子赋》(乙)不合。《广韵》入声末韵:撮,子括切,“挽牵也。”“挽牵”即今语拽,拉,此义跟赋中语境相合,言雀儿被燕子连拉带扯地拽去见凤凰。与此义有关的是“撮合”一词:拉拽使合在一处。

(11)凤凰台上坐,百鸟四边围。徘徊四顾望,见燕口衔辞。(264.6)

“徘徊”的常义是来回漫步,流连游移,但此句则是回环义。“徘徊四顾望”犹言回环四处张望。《变文集·丑女缘起》写到丑女蒙佛加佑容貌变好,国王夫妇闻讯急往观看:“才见女,喜徘徊,灼灼桃花满面开。”“喜徘徊”是高兴得上下打量之义,不应作高兴得走来走去解。“徘徊”作回环讲不独变文,《西京杂记》:“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宋王禹偁《仙娥峰》诗:“窈窕奇峰叠古苔,望秦岭外势徘徊。”皆为其例。

(12)空辞元无力,谁肯入王门。(264.10)

“辞”,原卷实作“陈”,即“牒”字,右上部分避太宗讳改作“云”。诸家於此均未出校,今补。此二句意思是:虚而不实的诉状不会有什么作用,谁无事愿意登官府的大门。言下之意是:我的诉状句句是实,否则我也不会来打搅您。

(13)随便里许坐,揆护得劳藏(264.13)

“揆”字王重民本读作“愛”,可从。愛,字又作“夔、夔”等,义为

隐蔽。《广雅》卷二下：“簑，障也。”王念孙《疏证》：“《说文》：‘簑，蔽不见也。’《尔雅》：‘蓑，隐也。’……簑、蓑、𦍋、𦍋、愛，古通用。”俗字往往随文义而添加或改换偏旁，今疑“揆”为“援”的误字，而“援”又是“愛”的增旁俗字。“愛”为隐蔽义，“护”为遮挡义，二字同义连文。“劳藏”，项书云：“原文‘劳’是‘牢’字音误，‘牢藏’即牢固。”此说可商。今谓“劳”即慰劳，特指为外出归来者软脚、洗尘、接风之类。《旧唐书·杨国忠传》：“出有赐，曰饌饮；还有劳，曰软脚。”是则“劳藏”为歇脚藏身的意思。

(14)燕子不求人，雀儿莫生嗔。(265.7)

“不求人”，器物之俗名，即搔痒的爪杖，又名“如意”，今俗呼“老头乐”。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不求人”条：“陈定宇集有不求人赞云：‘虽不求人兮，未免求木奴之指；孰若反掌以自搔兮，君子求诸己。’”翟按：“《能改斋漫录》引《音义指归》曰：‘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脊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意。’然则不求人与如意同源，而其本名为爪杖也。”《燕子赋》(乙)中的“不求人”实为度语，射“如意”二字。“燕子不求人”实为“燕子称心如意”的隐语，与下句“雀儿莫生嗔”形成对比，又跟前句“燕子理得舍，欢喜复欢忻”相照应。使用隐语、译语正是民间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与“不求人”称爪杖相类，晋时称草鞋为“不借”，当为“不借人”之省称，如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七：“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二三量(两)不借”即二双双草鞋的隐语。

(15)郑乔(侨)事四海，对面即为婚。(265.7)

“对面即为婚”指子南、子皙争聘徐吾犯妹事。《左传·昭公元年》：二子争聘徐吾犯妹，“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於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人，布弊而出。子南戎服人，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燕子赋》(乙)引此典故用子说明矛

盾解决得好,可以释怨解仇。

(16)不能攀古得,二人并鸟身。(265.9)

项校“得”为“德”,是。然谓“古德”犹云“古贤”,则义犹未尽。“古德”乃当时缁流之语,佛教徒尊称年高有道的高僧为“古德”,一般指已逝的高僧或古代的高僧。如《景德传灯录》卷十八福州大普山玄通禅师:“一日师问:‘只如古德岂不是以心传心?’雪峰曰:‘兼不立文字。’”又卷二十六杭州光庆寺遇安禅师:“问:‘承古德有言,井底红尘生,山头波浪起,未审此意如何?’”明清时候仍用此语,仍是专指僧人,如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从来古德长者劝人戒杀放生,其话尽多,小子不能尽述。”清刘鹗《老残游记》七回:“行脚僧在荒山野壑里访求高人古德。”末例“古德”已泛指高僧,不专指作古之人。

两种《燕子赋》通篇白话,口语化程度很高,对治早期白话词汇很有价值,但迄今为止,仍有一些词义和句义得不到确切的解释。例如《燕子赋》(乙):“抚国知何道,闰我永年名。”(263.8)今疑“抚”或应作“辅”;“闰”本为历法术语,有添益义,又与“正”相对,有“伪、副、偏”义,如闰位即指非正统之帝位,故“闰我永年名”或即妄占(盗用)永年名之意。《燕子赋》(甲)未得确诂之词更多,如“取高头之规,垒泥作窟”(249.2)的“规”;“辽乱尊拳,交横秃剔”(249.12)的“秃剔”与“雀儿剔秃,强夺燕屋”(253.4)的“剔秃”是否为一词,其本字应是什么?“撩瞻擒去”(250.10)的“撩瞻”(今疑为“撩檐”之误。撩,屋檐前的横木)、“雀儿美语咀噉(252.1)的“咀噉”等,这些词语究应如何解释,都还须进一步研究。

另外,两种《燕子赋》中反映的语法事实目前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仅举几例说明。

①终遣官人棒脊,流向僭、崖、象、白。(249.10)

“遣”用如被动介词。

②更被唇口噉嚙,与你到头尿却。(249.6)

“与”用如处置介词,犹“把”

③但雀儿儿名脑子,交被老鸟趁急。(252.10)

“交被”连用作被动介词,说明“交”(即“教”,后世又作“叫”)唐代已有此用法。

④雀儿向前启凤凰;王今乍不知……(264.11)

“乍”即“乍”,为“作物”的合音词,即后来的“怎”,此似为最早用例。

此外赋中三身代词用“我、你、伊”,又可前加类似词头的“是”作“是我、是你、是伊”等;近指指示代词用“者”、疑问代词用“阿莽、阿没”等,都是研究汉语语法史不容忽视的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原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

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重民先生等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三十多年来,这部书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唐五代俗文学和语言方面的主要资料之一。但是敦煌写卷错讹衍脱很多,其中又有大量的俗字异体,再加上其中使用了大量的口语词,读起来有很多障碍。王重民先生等在《叙例》里谈到他们的计划,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即(一)出一个校印本,“把敦煌所出变文和与变文有关的资料,移录校勘,排印成为一个最完备的汇编本,供研究和阅读古典文学的人使用”。(二)出一个选注本,“从校印本内选出最优秀的作品,加上简明的注解,供一般读者使用”。(三)出一个影印本,“将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罗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专门研究的人使用”,“此《敦煌变文集》就是我们计划中的校印本”。可惜《叙例》里所说的(二)(三)两项后来一直没有实现。项楚同志的新著《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 1990)可说是完成了上述的第二个项目。这部书校释精详,不仅可供“一般读者”使用,就是专门研究变文的学者也值得把它当作案头必备的参考。

选注本共选收敦煌变文二十七篇,其中《双恩记》一篇是原《变文集》未收的。另两篇《持世菩萨》和《文殊问疾》就是原来同题为《维摩诘经讲经文》的两篇,注者据原卷尾题或前题分别改为现在的篇名。所选变文“包括了变文中思想和艺术比较杰出的名篇,也兼顾了不同体裁和不同题材的各类作品”,目的是使读者“手此一

编,精华在握”。(见该书《前言》)可以说,这是继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后,又一部研究变文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

最近十多年来,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文字校勘和语词考释方面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文章,成绩斐然可观,其中项楚同志前后发表的近三十篇论文尤为引人注目。这部《选注》既吸收了蒋礼鸿、潘重规、徐震堉等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融汇了作者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在校勘和释义两方面都有很多创获,可说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这本书的优点。

(一)校勘精确

《选注》充分吸收了《敦煌变文集》和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的校勘成果,同时又补充和纠正了这两部书的不少漏校、误校之处。要做好校勘工作,光着眼于文学形体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广博的背景知识。《选注》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深的。例如:

蠓盃兔望丝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众生出没于轮网,恰似蠓盃兔望丝。”(705,737;前为《选注》页数,后为《变文集》页数。只有一个数码时为《选注》页数。下同。)

“蠓盃兔望丝”费解,项注云:“‘蠓盃’当作‘唐蒙’。盖因‘蠓’‘唐’二字部分相似,‘盃’‘蒙’二字部分相同,因而致误。唐蒙,女萝,即松萝,多悬垂飘拂于松枝之下。《尔雅·释草》:‘唐蒙,女萝。’原文‘兔望丝’当作‘网兔丝’,‘望’为‘网’字音误,此字又应移至‘兔’字前。兔丝:亦作‘菟丝’,缠绕性草本植物。按古人多以菟丝与女萝纠缠缭绕比喻极难拆开,如李白《古意》:‘君为女萝草,妾作兔丝花,轻条不自引,为逐春风斜。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此处即以‘唐蒙网兔丝’比喻众生无法摆脱生死轮回之罗网。”(706)校和注两方面都令人信服。

游泥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狱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好用常住水果,盗常住柴薪。”(680,726)

“游泥”一词，蒋先生在《待质录》中疑其为“尤泥”，作缠绕不休讲，变文此处则谓无休止地侵扰伽蓝。项注云：“原文‘游’字是‘淤’字形误，同‘污’”。淤泥，此处用作动词，犹云弄脏。按佛教以淤泥伽蓝为恶业，死后当受罪报，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四：“尔时具寿僧护白佛言：‘我于彼处，见诸有情，其形如墙，或如柱树，如叶花果，或如扫帚钁杓臼形，彼于前生当作何业，受如斯报？’佛告僧护：‘……汝之所见形如墙者，彼诸众生污泥僧伽墙壁，所以得如是报。’”伽蓝，即寺院。对照经文，知项君的校注确然可信。

细马 《韩擒虎话本》：“遂拣细马百疋（匹），明驼千头，骨咄羝羝（羝），麋（麋）鹿麋香，盘缠天使。”（325, 205）

“细马”的“细”，或以为应读为“骠”，《玉篇马部》释“骠”为“竞驰也”。项校“细”为“细”，释“细马”为良马。引证《旧唐书·职官志三》：“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细马称左，粗马称右。”又举杜甫《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诗：“细马时鸣金蹶衰，佳人屡出董娇娆。”他曾经在他的论文《敦煌变文语词校释商兑》（载《中国语文》1985.4）里广举“细食”“细婢”“细娘”“细菜”“细色”以及“细好”连用之例，说明“细”有“精好”之义，可为佐证。

《选注》在补足缺字时必有所依据。例如《百鸟名》：“寒号□，夜夜号，青雀儿，色能青。”（778, 853）缺字徐震堦补为“鸟”字，并乙作：“号寒鸟”。项校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日本中村不折藏敦煌本《佛说善恶因果经》“今身喜露形坐者，死作寒鹞虫”（“鹞”即“號”字），补缺字为“虫”。虽然补“鸟”字于文义无碍，但不如项校信而有征。

不清 《持世菩萨》：“莫生忧虑，我清疑积。”（601, 627）潘重规《新书》校记云：“伯 3079‘不’原作‘我’，涂改为‘不’。《变文集》从原卷作‘我’。规疑‘不清疑积’当作‘靖不疑猜’。”项校云：

“当作‘不请疑猜’。不请：请勿，不必。”下引敦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不请无端恋意情”，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此一事不请师古”，宋王铨《默记》“不请久坐”，以及本篇下文“室中不清(请)更疑迟”等例作为旁证，可谓确定无疑。^①

(二)释义悛当

变文中难以索解的词语很多，除了蒋先生在《变文字义待质录》所列之外(《待质录》里词语近几年来已有不少得到确解)，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是原词难懂，有的借字未破，不得其解。前者如：

豹尾 《燕子赋》(甲)：“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罹鸟灾？”

(374, 249)

“豹尾”通常是指古代君主或达官仪仗中的一种属车，故有人以为这里的“豹尾”或代指达官。项注指出：“然本篇之‘豹尾’，应为阴阳术数家语，犹如上文之‘将军太岁’，动土营建者应避其方，倘若触犯‘豹尾’，必致遭灾获殃。敦煌卷子斯四二八八《佛说八阳神咒经》：‘先读此经三遍，筑墙动土，安立家宅，南堂北堂，东序西序，厨舍客屋，门户井灶，碓磑库藏，六畜阑圈，日游月煞，将军太岁，黄幡豹尾，五土地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忌，十二诸神，土尉伏龙，一切鬼魅，皆悉隐藏，远屏四方，形消影灭，不敢为害，甚大吉利，获福无量。’正以‘黄幡豹尾’与‘将军太岁’等并列。”据项注，还可以进一步推断“豹尾”也应为神将名，与“太岁”同类。

鞭耻 《舜子变》：“立(妾)有孤男孤女，留在儿婿手头，愿夫莫令鞭耻。”(249, 129)

下文又有“千重万过，一任阿耶鞭耻”，“有计但知说来，一任与娘子鞭耻”等。或疑“耻”当作“笞”，蒋礼鸿认为作“笞”似对，但只

^① 《水浒传》中有“勿请”一词，如“今晚便可动身，勿请迟延自误。”(22回)“来日宋江梯已聊备小酌，对面论心一会，勿请推却。”(62回)“勿请”犹今语“请勿”，其用法可以追溯到变文里的“不请”。

切合“一任阿耶鞭耻”一例，他说本篇的“鞭耻”似应解作折磨、摆布等意思，不能呆死在鞭打上。（见《待质录》）蒋说据开解只差一步。项注引《唐律疏议》卷一：“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鞭撻以耻之”，这就把“鞭笞”写作“鞭耻”并引申为虐待、整治之义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来，使人觉得豁然开朗。

料 《叶净能诗》：“若不食，动经三十五十日；要食，顿可食六七十料不足。”（332, 216）

“料”字据上下文应是量词，但不知其详。项注云：“此处为‘斗’字别体。盖民间书‘斗’字，或加义符‘豆’作‘𪔐’，亦可加义符‘禾’作‘科’。如《太平广记》卷一八四《高辇》（出《玉堂闲话》）：‘高辇应举，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辇得之。占者曰：雷电晦冥，变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将来科第，其十数矣。’‘一石十科’的‘科’显然就是‘斗’字，而双关‘科第’之‘科’字，盖‘科’字一形而兼用作二字。‘斗’字既可加义符‘豆’‘禾’作‘𪔐’‘科’，亦应可加义符‘米’作‘料’。《敦煌杂录·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县无长者问藏间：‘我拟供养五百罗汉僧，亲（斋）粮足否？’藏答曰：‘长者若供养者，粮料合足。’此处‘料’即‘斗’字，亦即‘斗’字，盖俗书‘斗’似‘什’，《说文》‘斗’段注：‘四部许说俗字人持十为斗，魏晋以后作什，似升非升，似斤非斤，所谓人持十也。’故知‘料’字即是‘斗’字，亦即‘斗’字别体。”项注触类旁通，辨析入微，很令人信服。

后一种情况（辨通假、破假借）的例子如：

日大 《韩擒虎话本》：“皇帝闻语，一见擒虎[年登]一十三岁，奶腥未落，有日大胃今（胸襟），阿奴何愁社稷！”（308, 199）

“日大”，项注云即“尔大”，如此大，“日”与“尔”一声之转。下举宋孔平仲《孔氏杂说》为证：“俗所谓日许者，尔许也，声之讹也。《启颜录》咏短人云：‘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人。’”项说应可信，“日”与

“尔”皆日母字，音相近。今检辛弃疾《鹧鸪天·三山道中》词：“抛却山中诗酒窠，却来官府听笙歌。闲愁做弄天来大，白发栽埋日许多。”其中的“日许多”正应作“尔许多”，也可证项说不误。

垂斛 《降魔变文》：“劳度差忽於众里，化出一头水牛。

其牛乃莹角惊(擎)天，四蹄似龙泉之剑；垂斛曳地，双眸犹日月之明。”(563,383)

“垂斛”从字面上难解其义，项注云：“‘斛’通作‘胡’，牛颈下的垂肉。《说文》：‘胡，牛颌垂也。’《佛本行集经》卷十四：‘是时犍虎向彼牛王说偈答言：‘汝项斛领甚高大，止堪驾车及挽犁，云何将此丑身形，忽欲为我作夫主？’”‘斛’也通作‘胡’，与此处相同。”

塞 《茶酒论》：“商客来求，舡舟塞绍。”(435,267)

项注释“塞绍”为相继，《说文》：“绍，继也。”至于“塞”，项引白居易《山中问月》诗“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的“相”字下自注“思必切”，说明“塞”字即口语“相”之记音。下面又举变文中“塞当”“塞随”之例，印证“塞”字是“相”的口语音，所论甚是。（按“塞”后来又写为“厮”）

《选注》释义的精密还表现在：

1)变文里有些词语字面上平常，容易被忽略过去，而项注却能看出它们并不平常。例如：

一生 《燕子赋》(甲)：“赖值凤凰恩泽，放你一生革命；可中鸱子搦得，百年当时了竟。”(407,253)

项注云：“‘一生’犹如‘一星’，表示极细小微贱。”指出这跟《伍子胥变文》“一寸之草，岂合量天；一笙毫毛，拟拒炉炭”(9,3)的“一笙”为同一个词，引《方言》卷二：“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貌谓之笙”为证。此说可信。今语“一星半点”“一星星”的“星”当即《方言》里的“笙”。变文里“猩猩”常写作“狴狴”，也可作“一生”犹“一星”的佐证。

留 《王昭君变文》：“附(駙)马赐其千匹綵，公主仍留十斛珠。”(220, 106)

“留”不是常义停留、保留之“留”，项注释为“赠”。举李商隐《无题四首》之二：“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此用甄后赠枕与陈思王曹植事)及《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虚为错刀留远客，枉缘诗书损文鳞”句(错刀见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作为证明。最后复引《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上的“猴行者乃留诗曰……”说明“留诗”即赠诗。至此“留”有“赠”义已确然不容怀疑。

2)有些词语，项注不仅指出其意义，而且还从语法的角度说明它在使用上的特点。例如变文中有时在三身代词前加“是”作“是我”“是你”“是他”，项注云“是”字乃“用在句首人称代词前的语助词，不为义”，变文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都证明这一解释是对的。再如：

我家 《持世菩萨》：“我要修於仏果，汝须速上天官，莫将诸女献陈，我家当知不受。”(602, 627)

项注除了说明“我家”就是“我”，“家”是人称代词词尾之外，还举宋钱緬《钱氏私志》“对中人以上说话，即称‘小人’；中人以下，即称‘我家’”，指出了“我家”的使用场合。在《持世菩萨》里，是处于尊位的持世菩萨对假帝释自称“我家”。

不辞 《秋胡变文》：“吾与汝母子，恩□义重，吾不辞放汝游学，今在家习学，何愁伎艺不成？”(279, 154)

项注云“不辞”即不推辞，也即愿意。进而指出“多用在表示转折语气复句的上句”。下面引《大唐新语·持法》：“故人或遗以数两黄连，固辞不受，曰：‘我不辞受此归，恐母妻诘问从何而得，不知所以对也。’”从而印证了“不辞”的用法。讲一个词的意义而连及其用法，这是《选注》的又一特点。

3)有些词语与习见者微有不同，看起来好像有错字，实则不

误,项注多能辨明。例如:

恶伤其类 《燕子赋》(甲):“切(窃)闻狐死兔悲,恶伤其类。四海尽为兄弟,何况更同臭味。”(392,251)

《变文集》校“恶”为“物”,项注云:“原文‘恶’字不误,即‘厌恶’之‘恶’。”所举例证有《太平广记》卷四三四《甯茵》条:“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又引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七《陈秀才游学》条:“众士虑其死亡,且恶伤同类。”皆可证明“恶伤其类”不误。项注说“这个成语后来才演变成‘物伤其类’的”。

(三)广征博引,说解透僻

变文为今天的读者展现了唐五代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其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有。因此为这类作品作注,仅仅限于语言文字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等作出必要的阐明。项注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举凡典章制度、宗教民俗、山川地理、花木鱼虫、战具兵器、厌禳占卜、宴饮游戏,无不广征博引,不避烦难。如《伍子胥变文》里有一段子胥夫妇的对话是用药名为隐语的,涉及中草药六十多种,《百鸟名》里的各色禽鸟也多达四十余种,项注大都考释出来,很见功力。再如《王昭君变文》里北方少数民族临丧斫面割耳的习俗,《孟姜女变文》中咬指取血以验亲尸和招魂葬的风俗,《捉季布传文》《董永变文》中有关买卖奴隶的制度,《燕子赋》里关于唐初实行的括客制度,等等,项注都作了必要的说明和考证。六朝以来的古小说,大都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变文自然更不必说。项注对于跟佛教有关的词语的训释,尤其难能可贵,显示出他曾经在佛典上下过相当大的功夫。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个例子:

生缘 《燕子赋》(乙):“本贯属京兆,生缘在帝乡。”(412,263)

项注据本篇内容释“生缘”为籍贯,并指出此词原为佛教术语。即“按照佛教的说法,人命终后,转生之前,有一个阶段叫‘中阴’,亦称‘中有’。其间以七日为一期,寻求生缘,倘得生缘,即可投生。最多七七四十九日,必得转生。”下引《瑜伽师地论》说明经中“生缘”指投生之处,把投生之处具体化,便是籍贯或家乡,“故唐宋俗语常以‘生缘’称呼籍贯或家乡”。经这一解释,读者对此词的来源及引申义便一清二楚了。

变文素称难读,作校作注谈何容易!《选注》也还有补充修订的余地。在校勘上,由于《选注》主要依据的是《变文集》和《新书》的校记,未能一一亲验写本原卷,因而囿于二书疏失之处也偶或可见。比如:

《燕子赋》(甲):“睹燕不在,入来皎(剿)掠。见他宅舍鲜净,便即兀自占着。”(374,249)

“兀自”二字甲卷作“穴白”,丙卷作“穴自”,《变文集》仅据丙卷下字作“自”就臆改作“兀自”,殊嫌根据不足。也就是说卷子上只有“穴白”和“穴自”二形,过录时倘不取此二形应有说明。《选注》从《变文集》作“兀自”,似未为审谛。“穴白”一词又见于伯3633号卷子《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书》,应不误,其义似为钻空子,乘机。^①

此外,《选注》中仍有误校失校处,略陈数事。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左右百万余人,总是接飞手脚。”(674,723)

项注校“接”为“捷”,似可商。今疑“接”当为“傍”之形讹,“傍”通“旁”。下文“铜箭傍飞射眼睛”(680,727),“锥钻天上旁飞”(691,731)可资证明。“傍(旁)飞”,从侧旁而飞,引申为横飞,乱

^① 详见江蓝生《说“兀自”》(《辞书研究》1990年第1期)。

飞。同卷：

“智惠劔(剑)勤磨，不烦恼林……”(670, 723)

“不”字应为“破”字之误，盖“破”字的“石”旁与“不”字形近，又少写另半边“皮”字。《维摩经·菩萨行品》：“以智慧剑，破烦恼贼”可证。

《董永变文》：“董永长年到七岁，街头游戏道边旁，小儿行留被毁骂，尽道董仲没阿娘。”(235, 112)

项注云：“行留”为或行或留，犹云时时刻刻。今疑“行留”的“留”为“流”字之讹，“流”与“留”二字互讹变文中多见。“行流”义为“群辈”。“小儿行流”句意思是(董仲)在小孩群里遭到辱骂。

项注在释义方面也还有可以再加斟酌的地方，仅举三例说明。

《韩朋赋》：“即裂裙前三寸之帛，卓齿取血，且作私书，系箭头上，射与韩朋。(273, 140)

“卓齿取血”，项注释“卓”为“捣击”义。刘凯鸣同志此前著文说如不与《韩朋赋》挂钩，释“卓”为“捣”不误，但具体到《韩朋赋》则于事理不合。贞夫意在取血作书，故“卓齿取血”实即“卓齿咬指取血”之简缩，“卓”应为“着”字之借，“着”义为“用”。刘文并用《孟姜女变文》中两次出现“咬指取血”一语为证(见《敦煌变文校勘复议》，载《中国语文》1985, 6)，其说似更合乎事理。

《孟姜女变文》：“姜女哭道：‘何取此！玉貌散在黄沙里。

为言坟陇有标题，壤壤髑髅若个是？’”(98, 33)

项注云“取此”即“取次”，义为“仓猝，不审细”，“因为髑髅太多，仓猝间无法辨认何者是杞梁尸骨，故有‘何取此’之叹”。今按，“取次”确有“仓猝，不审细”之义，但又有尴尬，进退两难之义，蒋礼鸿先生即释此处的“取次”为后一意义。细味上下文，孟姜女面对散在黄沙里的众多髑髅，不知哪一具是丈夫的尸骨，感到十分为难，因而发出“何取此”的感叹，其意思应是“好为难啊！”而不是感叹事情之仓猝，不从容，故蒋说或更切文意。

《丑女缘起》：“女缘前生貌不敷，每看恰似兽头牟(模)。”

(739, 793)

项注“敷”义为“形容美丽”，并云：“敷”是花朵开放，引申为美貌之义。今谓此说可商。“敷”有“足”义，不敷即不足。古人习以足与不足指人相貌之美丑，如《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谁有好女，相貌备足，当为我儿往求索之。”此以“备足”指相貌美好；《高僧传·释道安》：“嘉字子年，洛阳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即以“不足”指相貌之有缺陷。故知《丑女缘起》里的“貌不敷”即貌不足，也就是长相有缺陷的意思。另外《丑女缘起》里又有“毁谤阿罗汉果业，致令人貌不周旋”(756页)语，“周旋”有周到、周全义，“不周旋”也指相貌不圆满、有缺陷，跟“不足”“不敷”等是同样的表达方式。

评价一部学术著作，主要不是看它还有哪些不足，而是要看它有些什么成就，看它比前人多做了些什么。从这一点来看，项楚同志的《敦煌变文选注》称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很有建树的好书。我们希望有更多像《敦煌变文选注》这样的书问世。

(原载《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

重读《刘知远诸宫调》

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残本一册是俄国柯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探险队于1907~1908年间(清光绪二十三至三十四年)发掘我国西北张掖黑水故城旧址时出土的,后藏于俄国。1958年4月,当时的苏联政府将它归还给我国,当年即由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在影印本问世之前,1935年郑振铎先生对传抄本进行整理,收入《世界文库》第二册,题名为《刘知远传(诸宫调)》;1937年北京来薰阁据复制照片出版了石印本,题名《金本诸宫调刘知远》,使世人得以一览原书的面貌。《世界文库》本所据为传抄本,文字讹误及断句失当之处多见;来薰阁本有些地方描摹失真,不如文物出版社影印本《刘知远诸宫调》一存其真。由于石印本、影印本的问世,使得治文学史和汉语史的学者们得以方便地利用这部可靠而珍贵的资料,一时研究成果叠出。就语言文字校释方面来说,60年代有张星逸、刘坚、蒋礼鸿、陈治文等先生的论文,日本内田道夫所著《校注刘知远诸宫调》发表较早,篇幅也较大。以上这些成果对扫除文字障碍、正确理解文义都作出了许多成绩,但总的来看这些校释是有选择的,零星的。进入80年代以来,出了三个校注本,分别为:凌景埏、谢伯阳(1988)校注的《诸宫调两种》,蓝立冀(1989)《刘知远诸宫调校注》,廖珣英(1993)《刘知远诸宫调校注》。笔者近年因研究课题所涉,重读了《刘知远诸宫调》,细心研读了各本的校注,获益甚多。总的感觉是,蓝、廖二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又做了大量的校勘考释工作,对整部残卷进行了全面、细密的校注,例证丰富,有不少突破。应该说,有了以上各校注本,《刘知远诸宫调》在语言文字上的障碍绝大多数已得以扫除。不过,笔者在阅读蓝、廖二本时发现有些校释不尽妥帖,有些是盲从前人而致误的;还有些应该出校、作注的地方缺如,遂不揣浅陋,逐条记下,拟求教于蓝、廖二先生及各位通家。文中内容大体按例句出现先后为序,引例注明卷数、曲调数(全书通排,共有七十九个曲调),同时也注上曲调名,以便通检。例如 2.22〔仙吕调·醉落托〕是指第二卷第二十二支曲子〔仙吕调·醉落托〕。最后是蓝本所在页数。

(1)凭不得

如何见得五代史罹乱相持?古贤有诗云: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沉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亮牧,郡君却作庶人妻。扶犁黑手番成(承)笏,食肉朱唇强喫荠。只有一般凭不得,南山依旧与云齐。(1.2,〔商调·回戈乐·尾〕,2页)

末后两句大意,蓝本云是指“世事多变,只有南山依然如故”,所说甚是,但从蒋礼鸿先生说,注云:“凭不得,即凭得。‘不’字无义。”此说似可商。廖本把“凭”释为侵扰、欺凌,云“只有一样不能侵扰”,也觉得牵强,于文义不甚贴合。

今谓“凭不得”义为“比不得”,“凭”为“匹”(pǐ)的方言变读音。“匹”有相比义,先秦已来文献皆见,例如《庄子·逍遥游》:“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唐李白《登峨眉山》诗:“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宋代诗词中有“匹似”“匹如”一词,义即比如,好比。如徐铉《离歌辞》诗:“莫嫌春夜短,匹似楚襄王。”杨无咎《步蟾宫》词:“自身作坏匹如闲,更和却旁人带累。”“匹如闲”,义为如同等闲,也即不算什么,没关系。此义的“匹”字时或又写作“譬”,例如柳永《锦堂春》词:“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诮譬如闲”,犹云全然若无其事,毫不在意。“匹”,又作“疋”,同音

通用。例如:《祖堂集》卷十一禾山和尚:“忽因古德光(先)贤,便有见处,岂不是正上不足,比下有余。”(3.124~3.125)此例“正”与“比”对举,益可证“正”(匹)为比义。匹,《广韵》入声质韵譬吉切,今音 pī。北京话表示比较、相比的动词不说 bǐ(比)而说 pī,跟“匹”音正相合。陈刚《北京方言词典》著录了这个词,用“譬”字标示:pī 譬 prep. 比。|他~我高一头。(215页)譬,《广韵》去声寘韵,匹赐切,今音读 pì,跟上声 pī 音不合,故北京话“比”义的 pī 本字应为“匹”。但如上所举,唐宋文献中已有“匹、譬”混合之例,所以陈书以“譬”代“匹”也非偶然。下面再来说明比较义动词“匹”与“凭不得”的“凭”的关系。北京话比较义动词一般读 pī,但也听到有人读作 pǐng,这种读音比较土俗,多出自老年人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之口。笔者调查了本所总务科的郭力军同志,他说他父母就说 pǐng,他也听到别的老北京人这样说。如此说来,北京话表比较义的动词“匹”有两读:pī 和 pǐng。pī 符合古今语音变化规律,pǐng 虽不符合,但却合了阴阳对转的规律。类似的情况在山西文水方言中也有。《文水方言志》112页语法例句65:张三比李四高,可不敌李四胖。“比”字下注音为[p‘iəŋ]上声423。另一处例句中干脆用同音字“品”字表示:你的品不上嗯的,嗯的品不上他行的。(116页)“品”字下注音同上,为[p‘iəŋ]上声423。就是说文水方言中的比较义动词跟“品”的读音相同,都是[p‘iəŋ](上声),所以方言志的作者用同音字“品”表示。我们说文水方言的比较义动词[p‘iəŋ](上声)的本音应为[p‘i](上声),其本字跟北京话一样应为“匹”。“凭不得”的“凭”本为并母字,浊音清化后读阳平调,其声、韵跟“匹”的变读音[p‘iəŋ]相同,只是声调有平、上之别。但是我们知道,上声的[p‘iəŋ]无字,所以《刘知远》只好选择了阳平调的“凭”字代表方言口语中“匹”[p‘i](上声)的变读音[p‘iəŋ]。

邵荣莱(1963)考察了敦煌文献中-ŋ尾字跟阴声韵字代用的

情况有四种,其中三种是梗摄-ŋ尾字与齐韵字混用。①敬三等、霁代用(计、敬)②清、齐代用(妻、清)③青、齐代用(泥、宁、体、听、第、定)。邵文还指出敦煌本《开蒙要训》里庚、清、青三韵字和齐韵字互注的有九对;敦煌曲子词《苏莫遮》以“令”字、“定”字和“帝”字押韵,这也是当时西北方音庚、清、青和齐韵相混的确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也记载了这一语音现象:“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今陕西、山西等地方言中仍保存着这一语音特点,即梗摄-ŋ尾字读为阴声韵-i,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推测《刘知远诸宫调》里的“凭不得”的“凭”字在当时口语中读如阴声韵-i,但不管“凭”是读阳声韵-ŋ,还是读阴声韵-i,其本字都应读为“匹”。今北京话“匹”(pǐ)变读为pīng,是由阴转为阳,而上述西北方音庚、清、青韵转齐韵则是由阳转阴,正所谓阴阳对转也。

(2)散

五代史汉高祖者,……其先沙陀人也。父曰光斑,失阵而卒。后散家产,与弟知崇逐母趁熟于太原之地。(1.2,〔正宫·甘草子〕,3页)

“后散家产”的“散”字,凌、蓝、廖三本皆未出注。今谓:散,失也。“散家产”指失去家产,而不是把家产分发、处理的意思。这从下文“高祖本是豪家,奈散失财物,分离了兄弟母”(2.24〔南吕宫·应天长〕)可知。“散失财物”即丢失了财物。“散”作亡失解,由来甚久。《逸周书·文酌》:“留身散真。”孔晁注:“散,失也。”《国语·齐语》:“其畜散而无育。”韦昭注:“散谓亡失也。”宋苏轼《龟绎先生诗集·叙》:“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可见宋时“散”仍有亡失义。“散”之此义与今不同,二书应出注。

(3)遣

无价荆山美玉,未遣卞和知。(1.3,〔仙吕调·六么令〕,4

页)

“遣”本为使役义动词,此例中“荆山美玉”为受事主语,“遣”转表被动。使役动词在一定的语境中转而表示被动,是古今汉语共有的特点。蓝本注“遣”为“使、教”,未中肯綮。

(4) 饊饊

若言这人所为,做处只要便宜。撮坐善能饮醉酒,冲席
(席)整顿喫饊饊。(1.5, [仙吕调·胜葫芦], 5 页)

《汉语大字典》“饊”字条下引此例,云:“音义未详。”廖本也未注“饊饊”。惟蓝本注云:“饊,疑是糜字。饊糜,饊点。”注中引《玉篇·食部》为证:“饊,古刀切,饊糜,饊饼也。”所释甚是。但是,“饊”何以借作“糜”,尚须从语音上加以说明。

糜,为止摄开口三等字,明母支韵,今音读 mí,如“糜烂”的“糜”。但是粮食作物“糜子”(黍之不黏者)则读 méi。“饊”字反映的应是“糜子”的“糜”(méi)的读音。“饊”是形声俗字,未见于字书。以“某”为声的形声字有“煤”,“煤”字从火某声,读如 méi;“饊”字从食某声也应读如 méi。“饊”的义符为“食”(也有从米作糕者),故“饊糜”的“糜”也用从“食”的形声字“饊”代替。

(5) 前、前面

每番只是人前走踢行拳,凶顽无赖。天罚下此个年少,与
村夫降灾。(1.8, [正宫·文序子], 8 页)

九州安抚,三翁前面,捧盞跪劝香醪。(12.157, [歇指调·永遇乐])

“人前”与“三翁前面”的方位词“前、前面”不是表示具体的方位、方所,而是表示动作的对象,相当于格助词的作用。“人前”即向他人,对他人,“三翁前面”即朝三翁,向三翁。这种用法的“N 前/前面”跟元明白话文献中的“N 行”相仿。“N 行”的“行”用如格助词的例子如:

床头金尽谁行借？（元·乔吉，山坡羊·冬日写怀曲；“谁行借”即向谁借）

嫂嫂母亲行更加十分孝。（元曲·替杀妻，二折〔滚绣球〕；嫂嫂对母亲更加孝顺）

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元朝秘史，134—966；向金国皇帝奏知）

拙文(1998)认为这种用法的“行”实为方位词“上”的轻读音变。用如格助词的方位词“前、前面、行(上)”出现在金元明白话资料中，这种用法应是汉语跟阿尔泰语接触的产物。

(6)野鼓

家麻遮嫩草，野鼓映苍苔。（1.9，〔歇指调·枕屏儿〕，9页）

“野鼓”，廖本无注。蓝本注云：“未详。疑即鼓藻，浮游藻类之一。”

今谓“野鼓”当指野生的鼓子花。为多年生蔓花，叶互生，戟形，有长柄，夏季开淡红色花，漏斗状，似牵牛（喇叭花）而小，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七·旋花》：“其花不作瓣状如军中所吹鼓子，故有旋花、鼓子之名。一种千叶者，色似粉红牡丹，俗呼为缠枝牡丹。”“野鼓映苍苔”是说淡红色的鼓子花与青绿色的苔藓相映照，显现出一种自然色调美。如把野鼓释作藻类则诗味索然而无。鼓子花，古人诗词中时有描写，如唐郑谷《长江县贾岛墓》诗：“重来兼恐无寻处，落日风吹鼓子花。”宋辛弃疾《临江仙·簪花屡堕戏作》词：“鼓子花开春烂漫，荒园无限思量。”此二例中，鼓子花一在墓地，一在荒园，正为野花也，故可简称为“野鼓”。鼓子花为野花，又没有绚丽的色彩，故又被用来喻称容色不佳的妓女。明俞弁《山樵野语》卷十：“诗人以妓女无颜色者谓之鼓子花。”

(7)披牛羴

但见院后披牛廠，柴门向日开。(1.9,〔歇指调·枕屏儿〕9页)

蓝、廖二本释“牛廠”为牛屋、牛棚，是；然廖本未释“披”为何义，蓝本释“披”为“敞开”，似可商。

今谓“披牛廠”为一词，指屋檐斜搭在侧墙边的无壁的牛棚。“披”字应取义于下垂，犹披风、披发之披，而不是敞开。《集韵》上声养韵：“廠，屋无壁也。”是“敞开”义取自于“披牛廠”的“廠”。明刘若愚《酌中志·大内规制纪略》：“宫后披檐，东曰思政轩，西曰养德轩。”所谓“披檐”，指在正屋屋侧搭建的偏屋。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五回：“他把侯小槐的一堵界墙作了自己的，后面盖了五间披厦。”披厦，是指依墙而盖的屋，此处是有壁的；就披檐、披厦乃至披屋而言，可以有壁，也可以无壁。黄侃《郅春语》云：“吾乡谓于正室旁依墙作屋，斜而下，其外更无壁者，曰披厦。”南方也叫“披屋、披房、披子”，那是有壁可住人的偏屋。例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如今我们又增造许多披屋，装饰许多材料，值得多了。”《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家里住着一间草屋，一厦披了，门外是个茅草棚。正屋是母亲住着，妻子住在披房里。”总之，“披”是依墙斜搭在两侧的意思，“廠”才是通透无壁的意思。

(8) 悞然、悞

瘦鳖上离了兹(慈)亲，悞然地两脚到悠庄院。(1.11,〔商调·抛球乐〕,11页)

悞至沙陀小李，逢老丈语话因依。(1.12,〔正宫·锦缠道〕,12页)

蓝本释“悞然”为“无意间”。凌本谓两例中的“悞”都是“俄”字的借用，“悞然地”即忽然的，又举《天宝遗事诸宫调》〔般涉调·瑶台月〕“悞相逢行喜行惊，乍相见偏亲偏爱”句为证。

今按，“俄”与“悞”古今韵母和声调均不同，似难用借字解释。

今以为“悞”乃“兀”之借用。“兀”本为高耸突出貌，故有“突兀”连用为词者，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句。“兀”由指物体之突然貌，扩大而指情态、时间之突然，“兀然”就是“突然”的同义词。我们认为上举诸宫调中三例“悞”字都是“兀”的音借字。“悞然地”就是“兀然地”，亦即忽然地，不知不觉地。“悞至”即“兀至”，亦即忽至。“悞相逢”即“兀相逢”，亦即忽相逢。

(9)您

悞然地两脚到您庄院。(1.11, [商调·抛球乐], 11 页)

此人发迹，定和您也做官寮。(1.18, [仙吕调·六么令], 18 页)

二例中的“您”字，蓝本均改作“你”，引《四声篇海》：“您，尼锦切，你也，俗。”今谓蓝本不当改“您”为“你”。“您”固然有与“你”相当者，然二字音不同，且所指也有不相当者。即“您”字初造时实为“你+们”的合音，“你”字下加个“心”表示-m 收声，与“怎、恁”的造字心理相同。“您”字原本表示复数第二人称，后来也可用作单数第二人称，如上举二例中“您庄院”的“您”为单数领格用法，“和您也做官寮”的“您”，则指你们，为复数用法。“您”在《刘知远诸宫调》中凡十四例，其中八例表复数，六例表单数（其中四例为领格用法），现在蓝本统统改为“你”，使读者看不到原卷用字面貌，看不出“您”与“你”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区别，而且除了上举二例出校外，余皆未出校，也没有统一的说明，易误读者。另外，原卷中的“您咱”(1.19 [商调·玉抱肚])蓝本径改为“你咱”，也未出校，均未为当。

(10)棘针棍

二子不贤，大者李洪义，小者洪信。二妇皆有外名，大者倒上树，小者棘针棍。(1.12, [正宫·锦缠道], 12 页)

“棘针棍”是李洪信妻的外号，书中凡三见（另二处是 2.32 [中

吕调·木笪缓]和 2.34[般涉调·哨遍·尾])。棍,蓝本径改为“棍”,未出校。廖本将“棍”改为“裈”,释曰:“棘针裈,带棘针刺的裤裆,意谓此人随时使人坐立不安。”

今谓廖本以“裈”为“棍”之误,是。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中衤部字常写作衤,如“初、衫、被、袍、裙、褰”等字的偏旁皆作“衤”。“裈”为“裈”的异体,义为“褻衣”。在明代一些韵书、字书内,又注为“妇人内衣”,但实际上却不限于妇女,男人穿的内裤也可称裈裤(详见平山久雄 1995)。廖本释“棘针裈”为“带棘针刺的裤裆”颇觉于事理不合,恐非是。若依蓝本,把“裈”校为“棍”,则棘针棍就是带棘针刺的棍子,用此形容李洪信之妻的狠毒倒是比较恰当的。蓝本没有说明“裈”何以应校改为“棍”,今试为说之。“裈”为“裈”字之误,上文已述;“棍”为“裈、裈”的异体字,《广韵》为古浑切,《集韵》为公浑切,均读见母。“裈”字不见于《广韵》和《集韵》,直到《正字通》始著录此字,作古困切。但唐李绅《拜三川守诗序》中已见此字:“里巷比多恶少,……或差肩追绕击大球,里言谓之打棍谮论,士庶苦之。”(“打棍”称无赖、恶人;“论”为球的隐语)此书是后时刻本,用字不一定反映唐时面貌。但不管怎么说“裈”与“棍”皆为见母字,只是声调有平去之别,故金刻本《刘知远》很可能是以“裈”代“棍”的。

“倒上树”,廖本释作“倒转身子上树,意谓此人尾巴翘上天,目中无人”,恐不确切。实指头向下倒著爬树,形容干坏事的手段高而奇。

(11)与

更怎懔(禁)傍边两个妻,聒聒地向耳边唆送:“快与凌持。”(1.20,[般涉调·耍孩儿],20页)

“快与凌持”的“与”二书失注。“与”本为给予义动词,此处用如表示处置的介词,相当于“把”或“将”。“与”表处置,唐宋白话文

献里习见。例如：

燕若入来，把棒撩脚，……更被唇口啜嚙，与你到头尿却。
(变文集·燕子赋，249页；你(指燕子)如果纠缠不休，就把你的窝全都尿个精湿)

也拟与愁排遣，奈江山遮拦不断。(莫仑，水龙吟词)

譬如捉贼，“克己”便是开门赶出去，索性与他打杀了，便是一头事了。(朱子语类，1118页)

现代汉语中也保存了这种用法，仅举二例。

老爷待要不接，又怕给他掉在地下惹出事来。(儿女英雄传，38回)

哎，东宝，你不是说你能扛二百斤么？怎么几个萝卜就给你治成这样？(王朔小说)

《刘知远》“快与凌持”句中“与”没有宾语，这点跟以上诸例不同。

(12)生欢悦

陌然地见他豪杰，跳过颓垣，怎恁地健捷。欲俵草房去，洪义生欢悦。这汉合是死，讎冤都报彻(2.25，[中吕调·牧羊关]，55页)

“生欢悦”的“生”，蓝、廖二本都释为甚辞，犹“极、很”一类程度副词。恐非是。

生，用于人产生喜怒哀乐等感情活动的场合，《刘知远诸宫调》中多见。例如：

三娘内心喜悦也难舍，只愁李洪义与洪信生脾鳖。(1.17，[黄钟宫·快活年]，17页)|这壁四口儿心生狠劣(1.19，[商调·玉抱肚·尾]，20页)|洪信生嗔，洪义发恶(11.57，[般涉调·沁园春]，122页)|是他家骋穷性气，便生嗔恶。(12.61，[仙吕调·整花冠]，142页)

以上“生脾鳖”、“生狠劣”、“生嗔”、“生嗔恶”意思相近，为发脾气、

发怒。“生”为动词。再看表示喜乐的：

一双老父母，解放眉头结。三翁也随顺，欢容生两颊。

(1.17, [黄钟宫·快活年], 17 页)

联系以上用例，“生欢悦”的“生”也应是动词而不是副词“甚”义。

六朝佛经中描述人产生某一感情、感觉活动时也是用“生”，今以大正藏第三册《过去现在因果经》为例：

亦生随喜(621c)|又生踊跃(644c)|当生欢喜(636a)|恒
生愁忧(633c)|深生随喜(631a-631b)|深生恐怖(630a)|深
生奇特(628c)

而当描写人的感情活动变化剧烈时，常用“心大 X”的固定格式：心大欢喜(621b、624a)|心大苦恼(631b)|心大怖惧(632c)|心大悲绝(649c)|心大惊怪(650b)。这就是说，从历史上的表达常式来看，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把“生欢悦”的“生”释作“甚”。而且《刘知远诸宫调》中也没有“生”作“甚”解的旁证。

用作甚辞的“生”始见于唐代，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详列唐、宋、元各代用例。但从所举诸例来看，“生”作甚辞使用是有一定语义限制的，即只用于不如意的场合。如“生憎”、“生怕”、“生愁”、“生怯”、“生恨”、“生相遮”、“生隔断”、“生扭做”等，未见一例用于如意的场合。就以现代汉语来说，也只有“生怕”、“生恐”、“生把人气死”等说法。因此，从用法上我们也可以判定“生欢喜”的“生”不是甚辞。

(13)遮迭

脑后无眼怎遮迭(2.21, 9 中吕调·牧羊关), 56 页)

蓝本释“迭”为“的”，非是。“遮迭”为动补结构，廖本释作“来得及遮挡”，应从。“迭”作“及”解，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引例甚多，今语“忙不迭”即忙不及之意。

(14)灾隅

洪义和洪信挟冤恨，把人凌辱。三翁常见后，免得灾隅。
须有日中他机谋。(2.24, [南吕宫·应天长], 58 页)

“灾隅”，蓝本校作“灾癘”，云《集韵》隅、癘二字同音(元俱切)，
《博雅》释癘为疣。

今谓此释可商。灾为灾祸、灾难，癘为疮疣，二词义类相去较远，且未见此二词连用者。廖本从蒋说，校“隅”为“虞”，是；然未加说明。今谓“隅、虞”同属《广韵》平声虞韵疑母遇俱切，二字古同音，今音亦同。“虞”有忧虑、忧患义，“灾虞”犹灾患，为同义复词。文献中也有其例，如《全唐诗》卷八五一载吴越僧《武肃王有旨石桥设斋会进一诗》之三：“胜妙重重惟祷祝，永资军庶息灾虞。”据此知“灾隅”应为“灾虞”之误无疑。

此句另一处二书皆失校缺注：“三翁常见后”的“常”应校改为“倘”与假设语气词“后”前后呼应，此言：倘如三翁见到(我被二舅凌辱)的话，就能免掉灾祸。言下之意是三翁如未见，自己就免不了遭殃。“常”借作“倘”，元曲中不乏其例，如佚名《千里独行》第二折：“我常赢了他更好；若是输了呵，我便往衢衢里走。”秦简夫《剪发待宾》第二折：“常存的青丝在，须有变钱时。”(此言如果有长发，就可以换钱)

(15) VP 处

“处”为处所、地方义，有时在 VP(动词或动词短语)后不表处所而表时间，《刘知远诸宫调》中也有这种用法，例如：

斧举处，唬杀刘郎(2.33, [黄钟宫·快活年], 67 页)

携手相别处，不忍两分离。(11.53, [高平调·贺新郎], 118 页)

枪举处，素光练，神锋轮起，冷光飘散，戟尖迎面。(12.68, [越调·踏阵马], 150 页)

以上各例的“处”均可释为“时”。时空通转是汉语日语等一些语言

共有的规律,前人已有说,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VP 处”中“处”字的以下语法意义:

堪伤处,便是荆山美玉,泥土里沉埋。(2.27,〔般涉调·沁园春〕,61 页)

蓝本注“便是”为“便似”,是。

兄嫂由然在,往日凶顽不断却。伤心处,向庄中,常把我妻凌虐。(12.60,〔般涉调·耍孩儿〕,141 页)

虽得身荣,一事不全处,兄嫂堪恨如狼虎,把青丝剪了尽皆污(兀)。(12.73,〔仙吕调·醉落托〕,155 页)

“一事不全处”是指三娘头发被兄嫂剪去,“一个鬢髻撮不住”,虽有金冠无法戴。“一事”义为一样,一种。

(三娘)觑着洪义叱喝:“据礼来不问分辨。交人难忘处,把俺夫妇薄贱。”(12.77,〔大石调·伊州令〕,158 页)

“堪伤处”“伤心处”“不全处”“难忘处”的“处”既不表示处所,也不表示时间,而是具有某种指代性,略相当于指代事物的“者”。这类句子有一个特点,即“VP 处”后面的句子都是解释 VP 的具体内容的,“VP 处”相当于“VP 的是”。这种用法的“处”是由名词极度虚化而产生的。《水浒传》二十五回(郓哥):“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了?”(武大郎):“我只是这般模样,有什么吃得肥处?”“有什么吃得肥处”犹言“有什么吃得肥的?”“处”位于句尾,虚化程度更高,相当于语气助词,与《刘知远》用法稍异。

(16)花驴

那两个花驴养,著牛绳梆我在桑树上。(2.28,〔高平调·贺新郎〕,62 页)

“花驴养”蓝本未注,廖本注为“詈辞,犹骂人畜生。”但廖本未释“花驴”之“花”应作何解。今谓“花”有风骚、浪荡义,可指人性乱,如称私生子为花生子。故“花驴养”不仅骂人是畜生,而且还骂人是

杂种。

(17)这懞 那底

李洪义、李洪信，如狼虎；棘针棍、倒上树，曾想他劣缺名目，向这懞眉尖眼角上存住。(2.32, [中吕调·木笛纰], 66页)

廖本注“这懞”为“这么”；释“向这懞”句为“犹言在这么的眉眼下安身”，非是。蓝本注云：“这懞，这些人，也即他们。”所释甚是。“懞”是当时复数词尾用字，用代词“这”加上复数词尾表示第三人称复数在同时期其他文献中也可见，如蓝本所举《挥麈录余话》卷二《王俊首岳侯状》即为其例。

《刘知远诸宫调》中“那底”共三见。吕叔湘(1985)指出其中一例指事：

那底甚般礼道？不成为新妻，便把旧妻忘了？(2.39, [歇指调·永遇乐], 73页；“那底”相当于直接称代的“那、那样”)

另外两例指人：

昨日打水处，见个小秃厮儿，身上一领布衫，似打鱼网，那底管是。(11.47, [南吕宫·瑶台月], 113页；“那底”相当于“那”，指小秃厮儿)

这翁翁闻说道：“姓刘人，那底久后必荣显。”(1.16, [南吕宫·应天长], 16页；“那底”相当于“他”，代指刘知远)

吕叔湘先生指出：“《元朝秘史》的直译译文中也常用‘那的’代‘他’，因为当时蒙古语里没有与‘他’相当的专用名词。”不过，用远指代词作第三人称代词汉语古代已然，如“彼”用如“他”；现代晋方言以“那家”“兀家”代指“他”是这种用法的沿续。“那底久后必荣”句中的“那底”蓝本注作“那、那个”，仍未达一间；廖本注作“衬词，无义”，则据确诂尤远。

(18)底死

莫忧拒(惧),待交我寻活路,嗔不肯,止不过将我打着皮肉。吾怕底死难熬他,挣揣不去,刀自抹,绳自系,觅个死处。(2.32,〔中吕调·木笪纆〕,66页)

蓝本分别在“止不过”“吾怕底死”后逗断,廖本“挣揣不去”后为句号,“刀自抹”后未逗断,皆未为妥,今重新标点如上。

蓝本释“底”为“何,什么”,误。廖本注“底死”为“抵死”,义为终究。甚是。今谓俗语有“抵死漫生”一词,义为拼死拼活,“抵死”犹到死,故有终究义。句中“怕”字恐不应作“害怕”解,而应释作假设连词“如果、倘若”。“莫忧拒(惧)”以下各句的意思是:“别担心,兄嫂如果逼我改嫁,我不肯,他们发起怒来,只不过把我打一顿罢了。我如果死活也难熬兄嫂的折磨,挣扎不下去,就去自尽。”

(19)快片牛

膀大肫高快片牛,唇口粗,能饮村酒。(2.35,〔歇指调·耍三台〕,69页)

蓝本认“肫”为“臀”,是。肫为豚的异体,本指小猪,因与“臀”同音,而借作“臀”。然蓝本在“唇”字处逗断,并把“快”误认为“决”,作“决片牛唇”,进而又把“决”释为“掀”(翘起),错谬尤甚。廖本标点正确,但释“快片牛”为:“快片,谓耍嘴皮子。牛,北方土语,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也不对。

今谓“快片牛”之“片”应为“骗”的同音借字。“快骗牛”犹言善能骑牛。“快”作善能解,唐时多有其例。如寒山诗“快榜三翼舟,善乘千里马”,“快”与“善”对举互文。白居易《有感》诗“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又以“快”与“能”互文。《张协状元》戏文:“小子快说梦,又会解梦”,则以“快”与“会”对举,皆可证“快”有善、能、会之义。(详见张相书)再说“骗”。“骗”本指跃马而上的动作,《集韵》去声线韵:“𩇑,跃而乘马也,或书作骗。”唐杜佑《通典》云:“武举,制土木马于闾间,教人习骗。”后来“骗”字此义的使用范围扩

大,凡是抬腿摆膀而跃的动作都可以叫“骗”,故骗马之外也可说骗牛,甚至翻墙而过的动作也可以说“骗”。元曲《任风子》二折〔滚绣球〕:“我骗上墙,腾的跳过去。”武术或舞蹈中甩腿腾跃的动作叫“骗腿”等,都是其例。从曲文内容来看,“膀大肫(臀)高”与“快片(骗)牛”正好相应。廖本把“膀大肫高”释为“臀大颡高”,于义难通,不可取。

(20)似 也似

当时间,知远恶,忿气填胸,怎纳无明火。璧玉似牙嚼欲将破,两眼如钁,大叫如雷作。(11.56,〔般涉调·苏幕遮〕,121页)

一对眼睁圆,龙□(颜)尽变改,失却紫玉似颜色。(12.65,〔大石调·玉翼蝉〕,147页)

以上两例中“璧玉似牙”“紫玉似颜色”的“似”二本皆未出注。今谓当出注。这种用法的“似”字始见于金元白话文献,“似”不是动词而是比拟助词,而且“NP 似”做定语,修饰后边的名词,这种用法此前没有见到过,但在金元白话文献中多见,例如:

把山海似深恩掉在脑后。(董西厢,卷2,〔黄钟调·侍香金童·尾〕)

虎狼似恶公人,扑鲁推拥厅前跪。(魔合罗,四折〔叫声〕)
这种比拟结构“NP₁ + 似 + NP₂”很容易跟“NP₁ + 似 + NP₂”(NP₁: 主语;似:谓语动词, NP₂: 宾语)式主谓结构相混,比如:

(A)紫玉似颜色|虎狼似公人

(B)俺那里水似蓝(元曲·七里滩,四折〔挂玉钩〕)|性命似水上浮沤(霍光鬼谏,三折〔滚绣球〕)

表面上A组与B组形式相同,“似”字前后都是名词性成分,实际上其深层结构不同。A组为(NP₁ + 似) + NP₂, B组为 NP₁ + (似 + NP₂)。A组的“似”为助词, B组的“似”是动词。也许正是为了

区别这两种“似”，A组的“似”前通常加上语助词“也”，作“也似”，《刘知远诸宫调》中有其例：

正熟睡，倾盆也似雨降。(2.31, [正宫·锦缠道], 65页)
廖本注此例“也似”为“插在短语或句子中间的衬词，无义”，不够确切。“也”是衬词，但“也似”实为比拟助词。此例中如不加“也”，作“倾盆似雨降”就会产生歧义，所以在金元白话文献中比拟助词“也似”远比“似”多见。而且“NP也似”不仅做定语，还可以做状语，例如：搗蒜也似阶前拜(《竹叶舟》)|不把我人也似覷，可将我谜也似猜(《老生儿》)。

拙文(1992)从比拟助词“似、也似”出现的时代及其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考察，认为它的出现可能受到蒙古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蒙古语的比拟表达方式是在名词或代词后面加上后置词 *metü* (像，似)，然后再接中心语(名词或动词)，即(NP + *metü*) + 中心语。

(21) 呆

对我曾说道俺娘乖，子母间别十二载，道你呆着人见他佯不采。(11.47, [南吕宫·瑶台月·尾], 113页)

这是刘知远对三娘转述其子说的话。“呆”，廖本未出注；蓝本注曰：“呆，应是碍字。”所测度是，然未作说明。

今谓“呆”为“騃”的俗字。呆，原有两读，一音 *ái*，如“呆板”；一音 *dāi*，如“痴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统读为 *dāi*)，*ái* 音一读即源自“騃”。《广韵》上声駭韵：“騃，痴也，五駭切。”明代《字彙》注为“音厓”，已读为平声。“呆”(騃)与“碍”只是声调不同，故被借作“碍”字。

(22) 被

只被夫妻恩重，跳离(篱)陌案，脚一似线儿牵。(2.30, [仙吕调·胜葫芦], 64页)

被你一生在村泊，不知国法事如何。有多少蹊跷处，不忍对你学。(11.51, [般涉调·麻婆子], 117 页)

以上二例的“被”字句都是后一分句的原因，“被”字并不表示被动，可释为“因、因为”，蓝、廖二本皆失注。

另有二处“被”字的用法也不同于通常的“被”字句，应予注意：

二人下马入庄，厅(听)得议论亲事，意欲不许，被三传并三翁先言：“刘郎异日奋发荣贵，和你改换门风。”(1.17, [黄钟宫·快活年], 18 页)

“被”字句的谓语动词通常应是及物动词，跟“被”字句的受事主语有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此例隐现的受事主语为“二人”，而谓语动词“言”却与“二人”无支配关系。

恰才撞到牛栏圈，待朵闪应难朵闪，被一人抱住刘知远。(2.30, [仙吕调·胜葫芦·尾], 64 页)

此例全句的主语“刘知远”没有出现，却在“被”字句中作为宾语出现。《敦煌变文集·祇园因由记》中已见到同样的用法：“彼被趁急，遂失脚走，被舍利弗化火遮之。”因而这种句式应与曲调押韵的需要无关。有关“被”字的特殊用法，蔡镜浩(1995)多言及，可参看。

(23) 难断

洪义将食与，……知远接得，陡发心嗔怒：“厮欺厮负，难断畜生为做。”(11.55, [仙吕调·相思会], 120 页)

“难断”蓝本注云：“断有极义，……难断即难极。这里用作反语，犹言难得，亏得。”今谓蓝注求之过深，“难断”就是难以断却、难以断除。刘知远发迹后微服回沙陀村探望李三娘，李洪义用破罐盛残羹粥给他吃，所以刘知远大怒，说他所作所为改不了畜生的本性。后来刘知远回到太原府衙告诉岳氏探亲经过时说：“兄嫂由然在，往日凶顽不断却。”也可证上文“难断”实为难以断却之义。

(24) 未成忧

斗敌底知远,是遭危困未成忧;立著底三娘,敛定羞娥说不尽怕(怕)。(11.57,〔般涉调·沁园春〕,122页)

“是遭”句的“是”字应释为“虽”,二本皆无注。“未成忧”,蓝本注谓:“成,应是‘曾’字。”非是。“未成”犹言算不上,不足。此言刘知远与洪义、洪信夫妇打斗,虽然身处困境但还不足为忧。

(25)来

忽观门吏,忙向阶前咨覆。走吏荒荒告道,言有机密公文,专来至本府。九州安抚,把来叫至将公文觑,三魂七魄俱无主。(12.64,〔仙吕调·绣带儿〕,146页)

廖本于“把来叫至将公文觑”的“来”后臆补一“人”字,是。“来人”即是递送机密公文的“走吏”。蓝本此处失校。

(26)怒恶 恶发

两个怒恶发不善,各施威勇,斗聘英彦,交马决战。(12.68,〔越调·踏阵马〕,150页)

蓝本于“怒”字后逗断,作“两个怒,恶发不善。”释“恶发”为发怒。廖本此句未断也未出注。今谓“怒恶”与“恶发”皆可为词,词义都是发怒,但从曲文的韵律节奏来看,应为“两个——怒恶——发不善”,故不当于“怒”字后断。“怒恶”为发怒义,蓝本另一处(169页注〔八五〕)引有其例,如《董西厢》卷一:“那贼将闻斯语,心生怒恶。”《赵氏孤儿》:“将这小孩儿寻觅着,不邓邓生怒恶。”二例中的“生怒恶”义同“刘知远”上例的“发不善”,当“怒恶”作动词用时与“恶发”是同义词。

(27)衙内却道是伊儿

(刘知远说)“恁子母说话整一日,直到了不辨个尊卑。你娇儿便是刘衙内!”三娘怒喝:“衙内却道是伊儿!想你穷神,怎做九州安抚使!”(11.49,〔仙吕调·绣带儿〕,115页)

蓝本云“却道”的“道”犹“倒”。若依蓝说,则此句应释为“衙内

反倒是你儿子”，于文义虽勉强可通，但仍有扞格处。今谓“道”字不误，此句按正常语序应为“却道衙内是伊儿”。刘知远告诉三娘：“你的儿子就是那个跟你说了一整天话的刘衙内。”三娘根本不相信，所以怒说：“你却说那衙内是你的儿子！……”《刘知远诸宫调》有些句子的语序与通常不一般，例如：

牛七翁庄头卖务场，刘知远试端详。(1.4, [仙吕调·胜葫芦], 5 页)

此句实为：刘知远试端详，牛七翁庄头卖务场。

莫想青凉伞儿打，休指望坐骑著鞍马。(2.37, [黄钟宫·出队子], 71 页)

唐末龙蛇未辨，布衣下官家潜隐。(1.14, [柳青娘], 15 页)

“青凉伞儿打”实为“打青凉伞儿”，“布衣下官家潜隐”实为“官家潜隐在布衣人中”之意。此类不同寻常的语序，有的可能为适应曲文押韵所致，如前例(1.4)，有的可能反映了阿尔泰语(SOV 型)对北方汉语的影响，如后例(2.23)，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宋洪迈《夷坚丙志》卷十八《契丹诵诗》云：“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余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诗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其中“和尚门子打”即是 SOV 句型的反映。“树上老鸦坐”，是说老鸦蹲宿于树上，《刘知远诸宫调》“青凉伞儿打”“布衣下官家潜隐”结构与此相仿。联系宋金时代的历史背景，《刘知远诸宫调》中的一些特殊语序很可能是汉语与阿尔泰语接触的反映。心存这一意识，会有助于我们扩大思路，正确解读一些按正常语序不易读懂的句子。

好书常读常新，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此正读书之乐也。

参考文献:

- 郑振铎.刘知远传(诸宫调).世界文库.1935,(2)
- 星逸.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江海学刊.1964,(1)
- 刘坚.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中国语文.1964,(3)
- 内田道夫.校注《刘知远诸宫调》.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1964,(14)
- 张星逸.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中国语文.1965,(5)
- 蒋礼鸿.读《刘知远诸宫调》.中国语文.1965,(3)
- 陈治文.《刘知远诸宫调》校读.中国语文.1966,(3)
- 凌景埏、谢伯阳.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
- 蓝立冀.《刘知远诸宫调》校注.巴蜀书社,1989
- 廖珣英.《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中华书局.1993
- 渡部洋.《刘知远诸宫调》语汇索引.开篇(单刊 NO.6).日本好文出版社,1996
-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
- 平山久雄.昆明为什么不读 Gunming.开篇(VOL13).日本好文出版社,1995
- 香坂顺一.早期白话の语彙——〈刘知远〉と〈董西厢〉.中国语研究(第38号).日本白帝社,1996
- 胡双宝.文水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0
- 邵荣莱.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3)
-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江蓝生.后置词“行”考辨.语文研究.1998,(1)

- 江蓝生.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中国语文.1992,
(6)
- 蔡镜浩.中古汉语的连词“被”.中国语文.1995,(2)

(原载《文史》1999 年第三辑总第四十八辑)

北京话单音词书证

50年代初,陆志韦先生出版了编于1938年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他说:“多知道一点方言的单音词,就会多了解一点古书,多了解一点社会历史。”这话不假,现代汉语方言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古代汉语的词汇,尤其是单音词中存古的成分更多,因此研究汉语方言中的单音词对理解古汉语词义、读懂古书无疑大有助益。方言词语对考释古代、近代口语词的桥梁作用已引起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学者们都越来越自觉地从现代活的方言材料中去汲取营养。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就多数情况来说,古代词语的读音、意义和用法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现代方言里,因而利用方言词考释古代词语时,须通古今之音变,须明方音与通语的对应,还要辨别通假字与本字的关系等等,总之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以避免牵强附会,违背语言事实。

正如我们不能脱离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去认识古代汉语一样,我们如想更深地认识现代汉语,也不能离开对古代汉语的了解。本文为北京话的某些单音词寻找书证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消说,我们的书证大都出自古代口语成分较多的白话文献。为现代方言单音词寻找书证,一是可以追溯这些词的历史轨迹,有助于建立汉语的词汇史;二是通过把现代方言词的词义和用法跟古书中的用例加以比较,有的词可能古今基本相同,而有的可能并不那么严丝合缝儿,我们可以从这些异同中了解词义的发展变化。本文

列举的现代北京话用例主要采自陆先生的大著(以下简称“陆书”)和陈刚《北京方言词典》(以下简称“陈书”)。顺带说,陆书搜集的词汇中,有些只是词素或词根,不是严格意义的词,而且还有不少单音词是汉语,尤其是汉语北方话所通用的。关于这一点,陆先生在1955年10月的重印声明中已经提到。本文收单音词14条,按音序先后为次。

(1) 醭儿 búr 酱油、醋等表面长的白色的霉:上了一层~(陆书71页)|酱油多晒晒不爱长~。(陈书24页)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作酢法》:“下酿……三日便发;发时数搅,不搅则生白醭。”这是讲醋上长醭。唐白居易《卧疾来早晚》诗:“酒瓮全生醭,歌筵半委尘。”这是讲酒上长醭。唐宋时候,醭还泛指物体受潮后表面出现的霉斑,比如王梵志诗:“镜匣尘满中,剪刀生衣醭。”“衣”指固体表面的霉,“醭”指液体表面的霉,但在“剪刀生衣醭”这句诗里,“衣醭”泛指霉斑。宋梅尧臣《梅雨》诗:“湿菌生枯篱,润气醭素裳。”此言湿气使衣裳长霉。

(2) 搽 chá 涂抹:一点儿粉(陆书79页)

“搽”字唐宋辞书未收,应是后起字。在敦煌写本中“茶、叉”与“搽”相当。例如《李陵变文》:“人执一根车辐棒,著者从头面唵沙。登时草木遭霜箭,是日山川被血茶。”“茶”音为 tú,但据韵脚,“茶”应与上句之“沙”押韵,故徐震堉校“茶”云:“疑作茶,即搽之省写。”今谓作“茶”不误。《广韵》平声麻韵宅加切小韵下“茶”与“茶”同音(“茶”字下注:又音徒),据上下文知“茶”所表示的意义是涂抹。再看《捉季布传文》:“上厅抱膝而呼足,唵上叉灰乞命频。”(《变文集》66页)此例之“唵土”与上例之“唵沙”意略同,指脸上覆满沙土。“唵”的本字当为“奄”,《说文》:“奄,覆也”。此例“叉灰”之“叉”也表示涂抹义,应与前例“被血茶”的“茶”为同一俗语动词,这个意义的动词现在用“搽”表示。《广韵》平声麻韵“涂”与“茶、茶”同为宅

加切,注云:“涂,涂饰,又音徒。”就是说“涂”一音“荼”,一音“徒”,其义为涂饰,涂抹。敦煌写本中的“荼、叉”所表示的涂抹义实为“涂”(宅加切)的假借字。今语“涂(tú)脂抹粉”也可说“搽(chá)脂抹粉”,就是“涂”字二读的反映。“搽”字较早的用例为元马致远《汉宫秋》一折:“将两叶赛宫样眉儿画,把一个宜梳裹脸儿搽。”

(3)蹲 cún 把腿~了(陆书 77 页)|往下一蹦,~了筋了。(陈书 45 页)

从陆书和陈书所举的例子知道,蹲,不念常音 dūn,其义为腿脚猛然落地时肌肉因震动而聚拢、疼痛。此义北京话又有 dūn 一音,陈书 70 页收此读,字作蹠,释为“下坠挫伤”,举例为:跳高儿不小心,蹠腿了|蹠了后腰。“蹠”是“蹲”(dūn)的后起异体字,明清白话小说可见,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四:“夜珠只在石凳之下蹠着。”《红楼梦》第八十一回:“有几个小丫头蹠在地下找东西。”“蹲”,字又作“踞”,《集韵》平声魂韵徂昆切小韵下列“存、蹲、踞、踞”等字,云蹲“或作踞”。敦煌写本反映了这个事实。如王梵志诗:“踞坐无方便,席上被人嗔。”(方便,指规矩)《伍子胥变文》:“水畔踞身,即坐吃饭。”(《变文集》6 页)“踞”字有时又省去足旁作“存”,例如《汉将王陵变》:“赚下落马,踞跪存身受口勅之次,便乃决鞭走过。”《捉季布传文》:“题姓署名似凤舞,书年着月象乌存。”(《变文集》62 页)“象乌存”,是说书法稳当像乌鸟蹲踞。《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踞乌而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踞,犹蹲也。谓三足乌。”“踞”,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晋吕忱《字林》云“古蹲字”。“踞”也有二读,一为 dūn,一为 cún。敦煌文献中“踞”字的用例为蹲踞屈曲义,跟北京话“把腿蹲 cún 了”“蹲 cún 了筋了”的“蹲”意义上有联系,但不完全吻合,应是从“蹲”的屈曲义引申而来的。《集韵》释“踞”cún 为“以足逆踞曰踞”,似乎此训与今北京话的意思更近。

陈书另收“存”字，释为“卷曲，不舒展”。举例为：领子还～在里头呢，揪出来。(45页)其实这个“存”的本字就是“蹲”(踞)，也是从“蹲”的蹲踞屈曲义引申而来的。

从字形上说，“踞”是“蹲”的古字，有二音，一读 cún，一读 dūn；cún 音的异体字是“踞”，dūn 音的异体字是“蹴”，而“存”是“蹲、踞”的同音假借字。

(4)拿 ná (一)摆身份，端架子。经常作“拿糖、拿大”。～他一把儿|他～着劲儿|你～什么糖？(陆书 194页)|在这人们面前拿个什么大！(陈书 198页)

元杂剧中有“拿班”一词，就是摆身份、端架子义。如《望江亭》一折〔后庭花〕：“非是我要拿班，只怕他将咱轻慢。”“拿糖”最初又有“拿唐、拿堂”等写法，如《白雪遗音·马头调·掩绣户》：“白日里缠人，夜里又拿唐。”明冯惟敏《南锁南枝》套曲：“也不想软款温柔，也不想丢可修留，也不想拿堂扭柳。”明王衡《郁轮袍》二折：“这穷厮拿糖哩！”从“拿班”“拿班做势”等词来看，似应以“拿堂”为正，“班”和“堂”都跟官员出行或升堂时的仪式有关。“拿”字单用的例子见于《红楼梦》：“如今拿出小姐款儿来了。”(三十二回)“拿”即为摆(身份)义。“拿大”也始见于《红楼梦》：“他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会待人的，倒不拿大。”(六回)《儒林外史》还有“拿老”一词，为摆老资格义：“沈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四十一回)

拿 ná (二)介词，与“对、把”用法相同：～他没办法。(陆书 194页)

这种用法的“拿”是从其“对付”义虚化而来的。这从元明戏曲里“难拿”一词可以得知。元杂剧《存孝打虎》三折〔么〕：“我从来劣性难拿，正恼犯如何收煞！”明传奇《绣襦记》十三：“娘，虽说他是有钱的，性儿也是难拿的。”

(5)腻 nì 纠缠不休：这人老上这儿来～我(陆书 197

页)|这孩子爱~他妈。(陈书 203 页)

此义本字应为“泥”，“泥”有去声一读。《广韵》去声霁韵：“泥，滞陷不通。语云，致远恐泥。奴计切。”泥，常义读平声，故陆书、陈书用“膩”字标其去声音。此词本为“滞陷不通”，即阻滞、滞留，引申为拘执不变通，如“拘泥”；又引申为纠缠不止。明杨慎《杨升庵集》云：“俗谓柔言索物曰泥，乃计切，谚所谓软缠也。”“泥”之软缠义唐诗多见，如元稹《遣悲怀》诗之一：“顾我无衣搜蓐篋，泥他沽酒拔金钗。”白居易《新秋》诗：“二毛生镜日，一叶落庭时；老去争由我，愁来欲泥谁？”泥，字又作“泥”，取其以言语相缠意。如白居易《冬至夜》诗：“今宵始觉房栊冷，坐索寒衣泥孟光。”又《雨中听琴者弹别鹤操》诗：“双鹤分离一何苦，连阴雨后不堪闻。莫教迁客孀妻听，嗟叹悲啼泥杀君。”

(6) 拚 pàn 这回他~了老命了。(陆书 203 页)

“拚”义为舍弃不顾，豁出去，普通话读 pīn，北京人读 pàn 保存了古音。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判死”义即“拚死”，“判”义为剖割，由此引申为舍弃。后来，在唐诗和敦煌俗文学作品中屡见“判”作舍弃、豁出去的例子，例如王梵志诗：“前人许赐婚，判命向前去。”(前人：对方)白居易《酬舒三员外见赠长句》诗：“自请假来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须臾。已判到老为狂客，不分当春作病夫。”《李陵变文》：“丈夫出塞命能判，大众胡狼事实难。”(《变文集》90 页)

那么，“判”和“拚”是什么关系呢？“拚”(字又作“拚”)在唐五代文献里始见作“舍弃、豁出去”，但声调是平声而不是去声。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又，‘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拚。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拚”与“官”为韵脚，知其读平声。《广韵》“拚”字为普官切，与“潘”同音，敦煌写本中有借“潘”为“拚”的

用例,如《捉季布传文》:“九族潘遭违赦罪,死生相为莫忧身。”(《变文集》57页)《太子成道经》:“若能取我眼睛,心里也能潘得,取我怀中怜爱子,千生万劫实难潘。”由上可知,唐五代时期作舍弃、豁出去讲的词有两读,一为去声(pàn),一为平声(pān)。这从《集韵》也可得到证实。《集韵》平声桓韵引汉扬雄《方言》释“拌”(铺官切)云:“《方言》:‘楚人凡挥弃物谓之拌,俗作拚,非是。’另在蒲官切小韵下释“拌,弃也”。另在去声换韵普半切小韵下也释“拌,弃也”。“拌”为剖割义,通“判”。今北京话舍弃义读去声不读平声,是继承了“判”的音义。在这个意义上,“拚、拚”是假借字,但竞争的结果是“判、拌”退出舞台,“拚”反而站住了脚根。

(7)破 pò 花费:我~一块钱请客。(陆书 209 页)

“破”作花费讲,较早的书证见于“破券”(即破钞)一词。《太平御览》卷九七五引北齐太上时童谣:“千钱买果园,中有芙蓉树。破券不分明,莲子随他去。”到了唐代以后的文献里就较常见了。如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念昔始读书,志欲千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元亢。”《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天福二年:“受命宝者,天子修封禅礼神祇则用之。其始皆破皇业钱以制之。”以上各例之“破”字皆为花费义。唐时又有“破除、破费”等连用者,如王梵志诗:“有钱怕人知,眷属相轻薄,身入黄泉下,他吃他人着,破除不由你,用尽遮他莫。”(遮他莫,犹言遮莫他。遮莫,尽教也)《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条天宝十四载制:“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户业,妄被人破除。”《捉季布传文》:“深劳破费味如珍。”此外还有“破用、破耗”等,兹不备举。

(8)鹩 qiān 鸡~米。(陆书 158 页)宋孝才《北京话词语例释》:别让鸡~了地里的麦苗|这只大公鸡可厉害了,老~人。(201 页)

鹩,陆书作“𪔐”,《广韵》平声咸韵:“𪔐,鸟鹩物。……𪔐,同

上。”是知“𪔐”为“𪔐”的异体。《类篇》云：“𪔐，鸟啄物也，或作𪔐。”唐章孝标《鹰》诗：“可惜忍饥寒日暮，向人𪔐断碧丝绦。”我们在文献中尚未见到作“𪔐”的例子，但却见到作“𪔐”的例子。如元曲康进之《李逵负荆》二折宋江白：“鸦𪔐肝肺扎煞尾，狗咽骷髅抖搜毛。”《汉语大词典》释“𪔐”为衔义，恐非是。《集韵》“𪔐”有乎监切一读，同“衔”；但《集韵》“𪔐”另有苦兼切一读，通“谦”，此音与“𪔐”音同，故借作“𪔐”。上举元曲“鸦𪔐肝肺”的“𪔐”释作“𪔐”字之借更为贴切。《西游记》同一回中一处作𪔐眼，一处作“𪔐眼”，也可证“𪔐”实为“𪔐”的音借字。如第六十一回：“（行者）跌足高呼道：‘咦，逐年家打雁，今却被小雁儿𪔐了眼睛。’”同一回：“（大圣）变作一个海东青……倒飞下来，落在天鹅身上，抱住颈项𪔐眼。”

(9) 𪔐 qíng 白承受；不能～吃～喝儿|别人动手，他一现成儿|您就～着吧。（陈书 229 页）

《广韵》平声清韵疾盈切小韵收“请、𪔐”等五字，释云：“请，受也，又在性、七井二切。”“𪔐，受赐也。”是则平声的“请”和“𪔐”在接受义上是同义词，只是“𪔐”特指受赐，不过，从实际用例来看，“请”与“𪔐”似无分别。白居易《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诗：“称意那劳问，请平声钱不早朝。”又《自咏》诗：“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平声钱。”白诗二首皆注平声，其义皆为领受。王梵志诗：“得禄奴婢馐，请赐妻儿着。”诗中“请”与“得”对举，可见“请”也为领受义，读平声。以上各例均无“白承受”义。“𪔐”字的书证较晚见，《汉语大词典》举元耶律楚材《和韩浩然韵》之二：“坐𪔐神物愧无功。”此例的“𪔐”字从语境上看已有白得义。明吕坤《宗约歌·戒隐丁》：“看你积将家业，却有谁𪔐。”“𪔐”在这里是继承义，微有“白得”的意思。清代小说《歧路灯》九回：长门乏嗣，次门承继，如次门𪔐了长门的家产，就把次门的生身父母疏远起来，这事行也不行？”此例“𪔐”也指继承，继承来的家产不是自己挣来的，故暗含白

得义。在北京话中“賸”已没有了一般的接受义，特指白得，白承受。

(10) 掏 tāo 这人老爱～窟窿。(陆书 235 页)“掏窟窿”喻指借债。如：“过去一家五口儿就靠他爹一人工资生活，每月都得掏窟窿。”(见陈刚等《现代北京口语词典》(358 页)

“掏”的本字应为“搯”。《说文》：“搯，搯也。”段注云：“《通俗文》：‘搯出曰掏’，掏即搯也。”敦煌写本《孝子传》：“子是舜傍搯一穴，内得次东家井连，从井中出，便投历山，躬耕力作。”(《变文集》901 页)搯穴，即挖洞。唐刘朝霞《贺幸温泉赋》：“直攫得盘古髓，搯得女娲瓢，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今北京话“掏窟窿”的“掏”就从此得义，以挖取喻指向人借债。

(11) 停儿 tír 等份儿：加了一～薪。(陆书 240 页)

“停”本为均等义。如《百喻经·子死欲停置家中喻》：“昔有愚人，养育七子，一子先死……尔时愚人闻此语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当葬者，须更杀一子，停担两头，乃可胜致。”“停担两头”即均等担在两头。由均等义引申为等份儿，字或作“亭”。如《目连变文》：“家财分作三亭，二分留与慈母，内之一分，用充慈父之衣粮。”(《变文集》756 页)金《董西厢》卷二：“众僧三百余人，比及扣寺门，十停儿死了七八。”“停”又可用作动词，义为平分。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五：“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长，忘我矣。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今北京话只存有“等份儿”一项词义。

(12) 托儿 tūr 这茶碗不带～。 (陆书 244 页)

宋程大昌《演繁露·托子》：“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托儿，唐五代叫托子，字多用“拓”。五代王说《唐语林·补遗》卷八：“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手，取櫟子承之。”作动词用的“托”，唐宋时也常用“拓”。《唐语林·补遗》卷八又云：“至如不托，言旧未有刀扣之时，皆常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托，今

俗字作𢵿，非也。”

(13) 𢵿 wā 掏取(糊状的东西): ~ 糰子。(陈书 278 页)

今北京话限于掏取糊状物,但其他方言里不限于此,可用于以手或器皿舀取米、面等物。元曲《陈州糰米》一折(小撇古白):“父亲,他那边又𢵿了些米去了。”《集韵》上声马韵收“𢵿”,“乌瓦切,吴俗谓手爬物曰𢵿”。

(14) 影 yǐng (一)隐蔽,把他~起来(陆书 151 页)|把它~起来(陈书 312 页)

北周庾信《西门豹庙》诗:“漳流鸣磴石,铜雀影秋林。”此言铜雀台蔽在秋天的茂林之中。《捉季布传文》:“更深潜至堂阶下,花药园中影树身。”(《变文集》55 页)此言隐蔽在花园大树背后。《韩擒虎话本》:“五道将军唱喏,影灭身形。”(又 206 页)此例《变文集》校“影”为“隐”,实可不必,“影”本有隐蔽义。《降魔变文》:“小女虽居闺禁。忽闻乞食之声,良为敬重尤深,奔走出于门外……使影墙忽见,仪貌绝伦。”(又 362 页)此言使臣藏在墙后忽然见到女子美貌无比。“影”的隐蔽义一直沿用不衰,《水浒》十七回:“只是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舒头舒脑价望。”《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九回:“只玳安儿影在帘儿外边,听说话儿。”在老舍作品里也能见到,《老张的哲学》:“王德摸了摸刀,影在人群里。”

(二)祖先的画像:悬上他的~(陆书 151 页)|早年间过年就挂~。(陈书 312 页)

唐时“影”指图绘的佛像或人物肖像。如玄奘《大唐西域记·那揭罗曷国》:“三有佛影,焕若真容,相好具足,俨然如在。”《捉季布传文》:“白土拂墙交画影,丹青画影更邈真。”(《变文集》57 页)此指刘邦命画季布的肖像,以便捉拿归案。这个时候“影”不专指祖先的画像,到了《红楼梦》已特指祖先的肖像了。例如第五十三回:

“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居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

参考文献:

- 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科学出版社,1956
陈 刚.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宋孝才、马欣华.北京话词语例释.铃木出版社,1982
陈 刚、宋孝才、张秀珍.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97
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臧晋叔.元曲选.中华书局,1979

(原载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立说传薪风雨人——庆祝詹伯慧教授从教 45 周年》)

近代汉语研究的 拓荒者与奠基人^①

吕叔湘先生可以说是近代汉语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近代汉语这一学科名称,是最近十多年才在语言学界通行开来的,但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40年代初,吕叔湘先生就开始以近代汉语为研究对象,陆续发表了一批语法专题论文,后来收在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下称《论文集》)中。另外,在1947~1948年间,吕先生初步完成了《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初稿,这个稿子搁置了二十多年后,才在80年代经整理后出版面世。在吕先生致力于近代汉语研究的40年代,从事语法专题研究的人还不多,而专门以近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几乎是绝无仅有,这样,正如吕先生自己所说,“在观点、方法、材料各方面都很少观摩、学习的机会”(见《论文集·序》),“这个工作在当时多少有点垦荒的性质”(见《指代词·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吕先生以他学术开拓者的气魄,一方面又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中创获甚多。他的论著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证严密、结论稳妥,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他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为近代汉语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面分四方面论述吕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上的卓越贡献。

^① 此文原题为《试述吕叔湘先生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贡献》。

—

语言学是以语言事实为研究对象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没有资料,无异于无米之炊。跟研究古代汉语一样,近代汉语的资料主要取自前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即书面语言。但是,并不是随便拿一部古代文献就可以作为研究近代汉语的资料的。这是因为语言是发展变化的,魏晋以后言文分歧的现象日益加大,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加工而成的书面语即文言文跟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大,最终发展成文言文与古白话两个系统。用文言写成的书面语已不能反映魏晋以后语言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只有那些或多或少含有白话成分的、那些大体或完全用白话写成的书面语,才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实际语言的情况。这一类资料在30年代已经受到前辈学者如黎锦熙^①、王力等先生的重视,但全面系统地披览、开掘和加以利用的,当推吕叔湘先生。吕先生从众多的古代典籍中披沙拣金,多方搜罗,挑选出一批有用的材料,附在《论文集》后面的引书目录,就是经过选择的、可供研究用的近代汉语基本资料。这份书目以时代为次,收录的文献近200种,有的一种之下又包括数种或数十种(如《元曲选》下列92个剧目。另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后附引书目录,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40余种)。从体裁来看,举凡笔记、小说、佛经、野史、诗集、词集、文集、释儒语录、变文、话本、平话、诸宫调、散曲、杂剧等等,无不备载。可以说,吕先生对于资料的开掘,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的。他所作的开创性的工作,为近代汉语研究奠定了相当规模

^① 黎锦熙《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连载于1928年10月的《新晨报副刊》,又载于《国语旬刊》一卷二期(1929),该文又以《中国近代语研究法》为题刊于《河北大学周刊》第1期(1929),仅文字小有差异。

的资料基础;他的引书目录,为后学者指引了门径,很多学者都曾按图索骥,由入门而登堂入室的。

吕先生一贯重视资料工作,把它看做推动研究的关键环节。十年前,他就加强近代汉语的资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很好的建议,例如:1.编写近代汉语文献的解题目录,“分门别类著录各种文献资料,说明它们反映实际语言的程度,作为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价值,以及版本情况,等等”。2.辑印重要的文献资料,包括单独刊行的和汇编性质的,特别提出“一部经过精细校勘的敦煌俗文学作品集实在是非常需要的”。3.把迄今为止的词汇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供研究者参考。4.编辑读本,作为高校开设课程的教材。(以上均见刘坚《近代汉语读本·序》)在吕先生的大力倡导下,一批资料性的书籍相继问世,如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下称《读本》),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和宋代卷已出版,元明卷待出),郭在贻等著《敦煌变文集校议》,王锺《诗词曲语辞集释》等。这些资料书的问世,免去了研究者找书找文的困难,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经过点校的、比较可信的本子,无疑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吕先生首倡之功不可没。

二

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研究,解决了汉语语法史中的一些重要课题,不少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比如现代汉语里不表疑问的语气词“呢”(哩)的来历,吕先生在《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一文里论证了这个语气词跟唐宋时期用在句末表示语气的助词“在、在裏、裏”有关,即:“此一语助词,当以在裏为最完具之形式,唐人多单言在,以在概裏;宋人多单言裏,以裏概在。裏字俗书多简作里。本义既湮,

遂更著口。”吕先生进而用吴语为佐证,说明语助词由处所词变化而来的可能,更增加了结论的可信度。在《把字用法的研究》一文里,吕先生着意研究促使把字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他比较了研究把字句出现条件的三个视角,指出从动词的意义观察,只能发现一些消极的限制,即只知在哪些情况下不能或不宜用把字式,而不知道在哪些情况下宜于或必须用。从宾语的性质观察,也只能发现一个消极的限制,即宾语代表无定的事物不能用把;但是宾语代表有定的事物却不一定用把。只有从全句的格式观察,才能找到近代汉语里发展这种把字式的推动力,即之所以会使用把字句,“是因为动词的后面紧接着一些成分,不容许宾语插在中间,或是动词前头有特殊性质的副词,它们非放在宾语之后不可”。吕先生的上述分析,抓住了把字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汉语处置式研究的一个突破,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的有关章节就参考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吕先生对近代汉语指代词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除了40年代先后发表的几篇专题论文之外,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下称《指代词》)一书,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内研究的整体规模和成就。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近代汉语里三身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数量代词的整个系统,材料丰富,描写入微,从来的语法史专书还没有这样全面地考察过近代汉语的指代词系统,特别是该书结合语义、用法描写语法,从语音、用法两方面去推寻语源的写法,更显示出吕先生独特的学风和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吕先生有关指代词的论著中,在探求语源方面的成绩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论证了近代汉语的三身代词系统是“我、你、他”,其中“我”古汉语已有,近代汉语沿用;“你”来自“尔”,南北朝后期已经出现,隋唐之际开始通行;第三身代词借用古汉语里作“其他”讲的“他”,

当“他”由泛指众人而专指一人,而且是专指一个有定的人时,就达到了第三身代词的地位。

2. 考察了复数词尾“们”的历史,发现了最早出现的形式是唐代文献里的“弭”和“伟”。宋代文献里作“懣、满、瞞、们、们”,元明时期多作“每”,明代中叶以后多用“们”。推测“每”和“们”属于不同的方言系统,“弭、伟、们、每”是同一语词的各别时代、各别方言的不同形式,北方系官话通行“每”,南方系官话说“们”。

3. 最早发现金元俗语中第一身复数分辨排除式和包括式,排除式用“俺”,包括式用“咱”,并根据文言和南方话里没有这种区别,推测这二式的分别不是汉语所固有的,而是受到北方外族语言的影响的结果。

4. 考察论证了代词词尾“家”是从有实义的领格用法的“家”发展来的,明以后的文献和现代北方话里不见应用,但在吴语区的部分方言里,发展为表复数的词尾。

5. 从语音和用法两方面论证“咱”是“自家”的合音。宋金词曲的“我咱”“你咱”即“我自家”“你自家”的合音,而且“咱”已失去实义,只作音缀之用。

6. 考察了疑问词“什么”从产生之初到定形的各种形式。对于“什么”的来源,提出了一种富于启发性的意见,即:a“何物”的“物”是等类色样之义,“何物”即“何等,何种”;b“是物”的“物”就是“何物”的“物”,“是”就是是否的“是”。“是物”是“是何物”的省缩,正如“作何物”变成“作物”(作么)一样;c“是物”连读,“是”字受“物”字声母(m-)的影响,变音为“甚”(-m)和“什”(-P)。

7. 考察了近指、远指代词“这、那”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形式,从语音和用法两方面论证“这”的本字应为“者”,“那”源于“若”,后来都变为去声。

8. 有别择义的疑问代词“那”(哪)也来自“若”,最初的形式为

“若箇”，但一直保持上声，不像指代词“那”变成去声。魏晋时期文献中用于询问事理、意在否定的反诘疑问代词“那”出现时代比远指词“那”要早，比询问事物的“若箇”和询问样式的“若为”也要早，因此它不是从疑问代词“若”变来的，可能是“若何”的合音。

9.“怎么”是“作勿”连读的变音，五代多作“作摩”“作摩生”，“生”是词尾。跟“怎么”相当的方言疑问词“乍”“作箇”唐代已出现，“作箇”即“乍个”。

跟语法史有关的一些虚词的来源，以前的学者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正如梅祖麟先生所说，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有的缺乏语法观念，只会分类排比，而不辨来龙去脉；有的只说结论，不摆证据（见《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 1986, 6）。而吕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其成就超出了以前的学者。

吕先生的《语法札记》（1944～1947）中收的小文章，有的只有几百字、千把字，但却写得扎实而有分量，不可忽视。例如《宋史·岳飞传》中“莫须有”一语，向来被误解为不须有或子虚乌有，清代大儒毕沅、俞正燮也不得其解，毕氏释作必须有，而俞氏连断句都搞错了。吕先生在《莫须有》一文中，用唐宋文献为证，说明“莫”字为测度疑问之词，“莫须”相当于“恐怕”“别是”，“莫须有”即恐怕有，大概有之义，至此一锤定音。跟《莫须有》异曲同工的是《将无同》一文，“将无同”为晋人之语，宋人已不详其义。吕先生引用共时资料证明“无”字不应以实理解，“将无”为一词，跟“将不”等一样，除了表示测度外，还可用于委婉的提议。“将无同”就是“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吧”的意思。吕先生之所以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是由于他有历史观点，每当考求一个词语的意思时，总是到跟它同时期的文献中去找答案，而不是以今律古，牵强附会。另一个原因是吕先生有语法观点，不是孤立地以字论义，而是从全句的语义、语气来判断一个语词在句中的作用。

三

吕先生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值得仿效和借鉴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吕先生做学问的最大特点是务实,是对语言材料的高度重视。他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贯穿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吕先生很重视对语言资料的时代、反映的方言以及真伪讹误等加以鉴别,并不是拈来就用。比如《史通》卷十七《北齐书》条的“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一语,吕先生经过辨证,指出“们”字应为“伊”字传写之误。其说头头是道,很可相信。再如在利用《元朝秘史》作材料时,吕先生既以字译音译互校,又以总译校以字译,从而发现其中一些误译的地方。吕先生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任何一点有价值的语言材料都很难从他的眼前溜过去;吕先生又是驾驭材料的能手,他能从一大堆纷乱如丝的材料中理出头绪来,按照时代的前后、用法的异同等井井有条地排列,把材料使用得恰到好处。吕先生论著中引用的大量例证,本身就具有很宝贵的资料价值,人们即使不一定同意他的某些观点或结论,但是却不能无视他摆出的那些语言事实,人们完全可以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作进一步的研究。

吕先生是我国最早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汉语研究的前辈学者之一。比如他的《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一文,就是采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纯从形式上研究一种句法的词序问题的。在这篇文章中,吕先生把“得”字“不”字转为动词后置成分之初跟宾语及趋向动词组合时所产生的三型 17 种错综复杂的词序变化搜罗得巨细无遗,归纳得井然有序。每一种格式都有相应的例证,连其中一些当时不常用的、在文献中十分罕见的格式

的例子都被吕先生找到了。经过古今对比,吕先生发现上述三型17种格式经淘汰后,在现代只保留了三型6种。这样不仅把现代汉语中此类句式的来源交待得一清二楚,而且用实例说明了语言形式由简陋到纷繁再到简约的发展规律。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以印欧语言为背景的,印欧语言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语法形式跟语法意义之间有对应性,而像汉语这样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有时意义往往起着区别语言形式的主要作用。正因为此,吕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既借鉴又不拘泥,而是根据汉语的特点,结合语义和用法来研究语法形式,这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虚词和词序在汉语语法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吕先生十分重视对虚词和句式的研究,并自觉地把这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如我们在上一节里曾经谈过的,吕先生不仅注意描写语法,而且总是试图解释一个虚词虚化的过程与语源,一种句式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把过程研究清楚并告诉给读者,要比简单地摆个结论有意义得多。说到考求语源,吕先生采取的把语音和用法结合起来考察的原则是十分值得重视和采纳的。那种音理上讲不通就借助于一声之转,或者只是语音可通就置用法不符于不顾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

吕先生说:“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但有时间的因素,也还有地域的因素,应该先就每一种材料作一番分析,然后才能进行综合。”吕先生说他自己引用历史材料时没能按这个程序做(见《论文集·序》),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谦虚。读吕先生的论著,感到他对材料的时间因素是充分注意到的,同时也很有地域观念。比如他把宋元时期的白话分成平话系白话和金元系白话,“平话系白话大致可信其依据汴京与临安之口语,金元系白话则其初殆限于燕京一带而渐次南伸。”(见《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北宋的时候,中原的方言还是属于南方系;现在的北方系官

话的前身只是燕京一带的一个小区域的方言。到了金、元两代入据中原,人民大量迁徙,北方系官话才通行到大河南北,而南方系官话更向南引退。”(见《指代词·们和家》2.1.3)这种结合社会的变迁来认识语言的地域变化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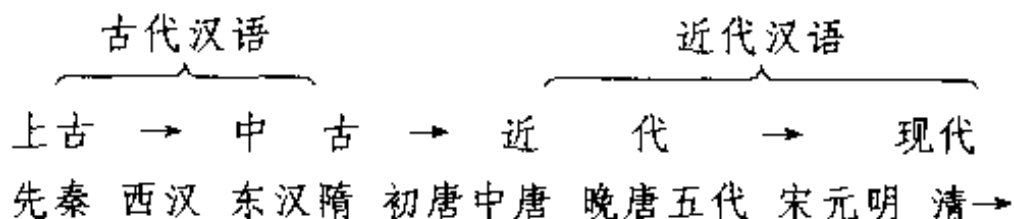
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能发现两种语言的异同,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某种语言的本质特点。吕先生的论著中经常很自然地进行古今对比、汉外(主要是印欧语言)对比、方言对比等。此外,吕先生还是我国最早把统计法引进汉语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释您,俺、咱、咱附论们字》一文中,统计了8种文献中第一、第二身代词单复数形式的用例数目,给读者提供了确凿的语言事实,有一目了然的效果。

吕先生的上述研究方法,开辟了汉语史研究的新路子,在方法论上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很多语言学工作者都从中得到启发,获益甚多。

四

吕先生在80年代多次谈到他对近代汉语的期限的看法,这个问题跟汉语史的分期有关。他不同意把“五四”时期以前的语言统称为古代汉语,认为应该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时期。吕先生认为:“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指代词·序》)“如果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人们的说话从接近书面语变成跟书面语大不相同,我们就能把这个定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分界线。”(《读本·序》)由于今天我们只能凭借书面记录来了解古代语言的面貌,所以吕先生是用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作品的出现作为划分近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界限的依据。他在

《指代词》一书的序里说：“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此外，吕先生还提出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的大胆看法，《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中的例句从唐五代一直收到老舍等现代作家，就是这一观点的体现。吕先生的上述观点一提出，立刻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又展开了汉语史分期的热烈讨论。尽管有些同志对近代汉语上限的看法略早（隋唐）或略晚（宋）于晚唐五代说，但是对于应该分出近代汉语这个阶段来以及以口语与书面语的分化程度作为划分的标准，是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的。受吕先生的启发和影响，近年更有学者进一步给“古汉语”分期，分成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块，“前者以先秦、秦汉的书面语为代表，后者以自东汉到隋末约四五百年间含有较多口语成分的典籍的语言为代表”，“西汉可以看做是以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初唐、中唐则可以看做是从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见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前言》）。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有道理。把他们二位的看法跟吕先生的看法一综合，可以得出对汉语史分期的如下思路：



当然这一思路是否合适，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吕先生对汉语史分期的新看法,贯穿了从语言发展的实际出发、以资料为依据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提出的在汉语史中划分出近代汉语阶段的看法颇具远见卓识和首创性,是对汉语史分期问题的重大突破。他以晚唐五代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也符合汉语发展的实际情况。词汇方面且不论,在语音方面,这个时期轻唇音开始分化;舌上音开始与照三合流;全浊声母开始清化乃至消失;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式开始动摇,入声韵尾开始失落;-m 韵尾开始消失。在语法方面,动态助词系统“了、着、过”开始出现并渐趋成熟;确立了“我、你、他”三身代词系统和“这、那”对立的指示代词二分系统。疑问词“什么”的前身就是唐五代文献里出现的“是物”“是没”“甚摩”等;表示复数的词尾“们”虽始见于宋代,但唐代文献中已出现“弭”和“伟”。凡此种种都说明晚唐五代说是很有道理的。

最近十多年来,由于吕先生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近代汉语学科开始创立和发展起来。1977年,吕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他和刘坚先生招收了首批近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此后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近代汉语课程,招收了研究生。为了培养人才,扶持这一学科的发展,当年由吕先生任主编的《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近代汉语研究的论文。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很有成绩的项楚、敦在贻、王镛、蒋绍愚等,都得到吕先生的热情关怀和奖掖。现在,近代汉语这一学科名称在语言学园地上落地生根,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果也越来越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饮水思源,这一切首先应归功于半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作,在资料、观点、方法诸方面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基础的吕叔湘先生。

参考文献: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1955; (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吕叔湘. 吕叔湘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 学林出版社, 1985

王 力. 汉语史稿(中册). 中华书局, 1980

刘 坚. 近代汉语读本(吕叔湘序).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江蓝生.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吕叔湘序). 语文出版社, 1988

王云路、方一新.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前言.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刘 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前言. 语文出版社, 1992

刘 坚、蒋绍愚.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序(唐五代卷; 刘坚序).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蒋冀骋.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绪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王 镆. 诗词曲语辞集释·前言. 语文出版社, 1991

郭在贻等. 敦煌变文集校议·前言. 长沙: 岳麓书社, 1990

梅祖麟. 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谈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 中国语文. 1986, (6)

(原载《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

古代白话说略

· · 什么是“白话”

“白话”这个词儿意思挺多,在“空口说白话”里,它指的是没法儿实现或毫无根据的话;在“首长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中,是指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话;而在某些方言里,“白话”就是闲聊。这里所说的“白话”不是上而的意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形式。

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的书面语,要知道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先得知道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别。

1. 口语与书面语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口头上使用的语言叫口语,也叫口头语,它以语音(声音符号)为传播工具;书面上使用的语言叫书面语,也叫笔语,它以文字(形象符号)为传播工具。书面语的生产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口语为基础和源泉的。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大概自古以来书面语就跟口语不完全一致。试想,在发明造纸术和纸张广泛使用之前,书面语是一笔一笔刻在龟甲兽骨、铜器、石器或竹简上的,刻起来很费事;有的写在丝帛之上,这成本又多么昂贵!因此,我们推想,最初的书面语要比古人实际运用的口语简约得多,粗略得多,即所谓“书不尽

言”。比如甲骨上的文字就多是占卜吉凶的，有少数记事文字也大都跟占卜有关。不过话又说回来，从本质上看，最初的书面语跟口语之间的差别是比较小的，书面语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口语的实际面貌。《诗经》里的《国风》是民歌的记录，《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弟子对老师言谈话语的记录，应该跟当时的口语大体一致。比如《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可能就是当时口语的如实记录。这句话跟现代口语的差别主要是单音词与复合词的差别。古代尤其上古单音节词较多，“朋友”只用一个“朋”字、“快乐”只用一个“乐”字就行了。反问句式“不亦……乎？”跟今天的“不是……吗？”结构基本相同，只是所用词汇不同。晚清维新派人物王照就认为孔夫子的著作是用“当时俗言”写的，他说夏代殷代书中所没有的“也、已、焉、乎”等助词，实际上就相当于今天白话文中的“呀、么、哪、咧”等，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按说，当口语里的语音、语法、词汇发生变化时，书面语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但是汉语的事实却不完全如此，书面语远远滞后于口语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三：

(1) 汉字的性质是形意文字，不以表音为原则，所以实际语音变了，汉字却可以不变，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地域可以代表不同的声音。比如“白”字在古代是入声字，而在现代普通话里是阳平字；“白”普通话读[pai](阳平)，贵阳话读[pe](阳平)，苏州话读[ba?](阳入)，广州话读[pak](阳入)，厦门话读[pe?](阳入)，读音各不相同，却仍用“白”字表示。汉字的这个特点缩小了古今书面语的距离，也使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借助于汉字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流。

(2) 书面语跟口语相比，比较保守。口语里早已消亡了的前代词汇和语法成分，往往仍在书面语中保存和复活。我们经常可

以看到,在现代语体文中仍然使用一些文言虚词或格式。写到这里,我随手翻开桌旁一张《北京晚报》,在一篇不足 500 字的短文里就出现了“现已寸步难行”“对其进行护理”“将此情况报告”等二十几处使用了文言虚词的句子。由此可知,尽管是语体文,也跟实际口语有一定的距离。

(3)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加工而成的一些古代文献,被历代尊崇为经典,后世文人学士刻意模仿沿袭,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文言文随着时代的推衍,跟口语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完全脱节的地步。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文言文为正宗,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因而文言在书面语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不登大雅之堂,只有小说、戏曲等才通篇采用白话。直到七八十年前,中国人的语言生活里,嘴上说的是方言,笔下写的是文言,两不相干。

如果说国人对于这一现象大多见怪不怪,外国人可就很难理解了。16 世纪末到我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晚年在札记中写道:“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与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他还描绘了如下的情况:“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沾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层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从这段描述可以知道,在知识分子圈内,文言是社交用语,口语中的文言成分也很重,这是

一种很不健康的风气。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响亮地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从那时起,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

2. 文言与白话

如前所说,汉语的书面语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简单点儿说,那些句中带有“之、乎、者、也、矣、焉、哉”的书面语是文言,而那些跟人们口头上讲的话大体一致的书面语是白话。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但是后来日益脱离口语,变成一种僵化的、基本上保存先秦语法和词汇特点的书面语。当然,各个时代的口语也会对文言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必说明清时代的文言文跟先秦时代会有一些不同,就是位居唐宋古文派散文大家之首的韩愈的文章,在语法上也有跟先秦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他的《祭十二郎文》:“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用了两个关系词“其”,而在上古只能用一个。又比如他的《答刘正夫书》:“有文字来,谁不为文。”先秦只用“以来”或“而来”,不单用“来”,单用“来”是六朝前后的事。不过总的来说,这种区别不很大,文言从古到今都有比较固定的格局。

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的书面语,它跟一定时代的口语相接近。白话的产生也有悠久的历史,比较保守地说,它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使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都能听得懂,一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不放弃使用典雅的古文,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另一方面,魏晋时期文人的笔记小说记录了当时民间的鬼怪传闻,其中的记言部分(即对话)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晋人的尺牍(书信)是用语体写的。这样几股溪流就汇成

了古代白话的源头。到了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不少用当时口语做基础、掺杂了一些文言成分的半文半白的俗文学作品,如僧人的白话诗、民间曲子词、敦煌变文等,另外还有数量可观的禅宗语录,比较完整地记下了禅师们的话语。正是上述作品、资料奠定了早期白话的规模 and 基础,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当时口语的大致面貌。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僵化的文言文占据着书面语的统治地位,这种现实成为普及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从19世纪末以来,一些有识之士相继发起了改革书面语的运动,有清末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和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这些运动一浪接一浪,对现代语体文的确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用语体文写作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可是不要忘记,为了争得语体文的合法地位,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段相当激烈的斗争呢!

3. 古代白话与近代汉语

古代白话跟汉语史的分期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大学里教汉语只有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分,把“五四”时期以前的语言统称为古代汉语。这种分期忽略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没有正确地反映汉语发展的历史阶段,因而是不太科学的。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就提出了“近代语”的概念,他说:

近来继承清代朴学家,更应用科学的方法,而从事于中国之“语言文字学”(philology)者,其取材仍偏重上古(先秦)与中古(隋唐),或参以现今之国语与方言,未免抹煞近代(宋元至清约九百年间一大段)。此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国语之基础。(《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8.10《新晨报副刊》)

这里所谓“近代语”,就是此后吕叔湘先生所说的“近代汉语”。黎先生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为宋,吕先生则前移至晚唐五代,理由

是：“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掺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见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所作的序）不管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宋，还是定在晚唐五代，都是以白话文献的出现为依据的，也就是说近代汉语是以古代白话文献为研究资料，主要以隋唐以后的口语为研究对象的。现在国内学者大都接受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把下限定在明末清初。当然，也有人倾向于黎先生的观点。

把汉语史由古代和现代的二分法改成古代、近代、现代的三分法不仅符合汉语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也便于研究者分段开展研究。不过，如果以“文言”和“白话”来划分，那么古代汉语属于文言的系统，而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属于白话的系统。

二 古代白话文献一览

古代白话文献数量大，内容十分丰富，当然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白话成分有多少之别，纯杂之异。拿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和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书后所附的引书目录来看，不下几百种，其中有的作品是文白夹杂、半文半白的，有的通篇纯用白话，因此这些作品阅读时的难易度不同，研究上的价值也不等。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刘坚先生曾着力于古代白话文献的介绍和整理工作，写有《古代白话文献简述》一文（载《语文研究》1982年第一辑），编著了供高等学校中文系开设近代汉语课程用的《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修订本1995）。此外，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也选收了一批最重要的古代白话文献选段。

下面我们参考上述论著,按类扼要介绍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白话文献及其语言特点。

1. 敦煌俗文学作品

敦煌文书出自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据专家考证,藏经洞大约封闭于11世纪初瓜沙州曹氏地方割据政权覆亡前夕。为了躲避西夏进扰,洞窟僧人在出逃前把大批寺院经卷、文书隐藏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复壁内(今编号为16洞窟)。后来洞窟的僧人没有回来,这批文书就一直沉睡了九百年,直到1900年(一说1899年)被一个姓王的道士无意中发现。藏经洞内藏各种经卷、文书约二万二千余卷,大部分是写本,只有百分之一、二为刊本。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石室藏书。从1901~1907年间,英国人斯坦因(M. A. Stein)和法国人伯希和(P. Pelliot)劫走了其中的大部分精品。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派人把劫余部分运到北京,押运途中以及到京后又遭劫夺。劫余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约有八千余卷,斯坦因所获九千卷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伯希和所获五千卷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些散落在日本和俄罗斯。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把藏于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的卷子全部影印成书(共140册),使用十分方便。

在敦煌文书中,最能反映唐五代白话面貌的是一些俗文学作品,如变文、俗赋、曲子词、王梵志诗等,其中又以变文的价值最高。所谓变文,是指唐代寺院里盛行的一种又说又唱的文学形式。讲唱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宣讲佛经教义的讲经文,如敦煌文书中的《维摩诘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无常经讲经文》等,一般先引一段经文,然后用散文加以解释,用韵文咏唱铺排;还有演绎佛经中神变故事的佛陀变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丑女缘起》等。这类变文内容充满了浪漫色彩,情节曲折奇巧,语言形象生动,很有文学吸引力。还有一类变

文内容取自民间传说或历史人物,如《孟姜女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除了少数两篇如《秋胡变文》、《舜子变文》之外,也大都是有说有唱,散韵相间的。

敦煌俗文学中有一类篇名题为“话”或“话本”,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话本小说大都通篇用散文叙述故事,大概是说书人的底本。

唐代僧侣的俗讲活动深受平民百姓的欢迎。韩愈《华山女》诗形容当时的盛况是“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赵璘《因话录》说当时一位有名的俗讲大师文淑“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这类讲唱活动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十分流行。唐末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翠眉嚬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可见讲唱者应有底本,并有图画展开,与讲唱相辅,使听众在视听两方面都得到满足。

讲唱文学的对象是平民百姓,为了使他们听而能懂,变文、话本的语言力求通俗,贴近生活。比如《破魔变文》写三个魔女企图用美色引诱世尊(佛祖),被世尊变为丑女(下列各例括号内是笔者的简释):

於是世尊垂金色臂,指魔女身,三个一时化作老母。且眼如珠盏,面似火曹(即糟,烧焦的木头),额阔舌尖,胸高鼻曲,发黄齿黑,眉白口青,面皱如皮裹髑髅,项长一似箸头鲠子(筷子头上的圆形面食)。混身锦绣,变成两幅布裙;头上梳钗,变作一团乱蛇。身卷项缩,恰似害冻老鸱(怕冷的猫头鹰),腰曲脚长,一似过秋谷鸱(鸟名)。

《庐山远公话》中有一段写远公被强盗白庄虏去为奴,一夜远公念《涅槃经》,被白庄知觉,两人有大段对话,是当时口语的真实反映,略摘数语于下:

白庄于东岭上惊觉,遂乃问左右曰:“西边是甚声音?”左

右曰：“启将军，西边是虏来者(的)贱奴念经声。”白庄闻语，大怒非常，遂唤远公直至面前，高声责曰：“你若在寺舍伽蓝，要念即不可；今况是(却是)随逐于我，争合(怎该)念经！”远公曰：“将军当日虏贱奴来时，许交(教)念经。”白庄曰：“我早晚(何时)许你念经？”远公当即不语，被左右道：“将军实是许他念经。”

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一类故事赋的口语程度也很高，如《燕子赋》、《韩朋赋》、《茶酒论》、《𪚩𪚩书》等。《𪚩𪚩书》描绘出一个性格泼辣，敢闹敢斗的妇女形象：

斗唇合舌，务在喧争。欺儿踏婿，骂詈高声。翁婆共语，殊总不听。入厨恶发(发脾气)，翻粥扑羹，轰盆打甑，雹釜打铛(雹：摔打)……阿婆嗔着，终不合觔(顶吵)，将头自磕，筑天筑地(筑：碰击)，摸著卧床，佯病不起。见婿入来，满眼流泪。夫问来由，有何事意？没可分疏，口称：“是翁婆骂我，作奴婢之相，只是耽眠夜睡，莫与饭喫，饿急自起。”阿婆向儿言说：“索(娶)得个屈期(奇)丑物入来，与我作底(抵)。”新妇闻之，从床忽起：“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色(索，即娶)我将来，道我是底(抵：对头)！未许之时，求神拜鬼，及至入来，说我如此！”新妇乃索离书：“废我别嫁可憎夫婿(另嫁如意郎君)！”

一个泼辣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可以看出，后来宋元话本《快嘴李翠莲》就受到此赋的影响。

敦煌文书中还有一类民间曲子词，是文人词作的先河。由于这类曲子词不少是乐工伶人创作的，又由歌伎传唱，因而内容有许多是反映爱情或妇女的不幸遭遇的，语言通俗如话。

莫扳(折)我，扳我太心偏。我是曲江池边柳，者(这)人折去那人扳，恩爱一时间。(《望江南》)

有一首《菩萨蛮》，一连用了六个咒誓，写出了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翻悔）直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除了以上题材，还有写战争和普通百姓如商人、书生、渔父各种人物的生活的，虽然艺术上比较粗糙，但作为古代白话的资料还是很有价值的。这类作品收录在任二北编录的《敦煌歌辞总编》和饶宗颐、戴密微（P. Demiéville）编辑的《敦煌曲》中。

跟口语最为接近的韵文是敦煌本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极少数为六言），如大家所熟悉的“城外土馒头（喻坟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据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考证，“王梵志诗”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若干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称，应是从初盛唐至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僧侣和民间文人陆续创作的。现举产生于初唐，内容有浓重世俗气息的一首为例：

世间慵懒人，五分向有二。例着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形容瘦骨伶仃）。出语觜头高，诈作达官子。草舍元无床，无毡复无被。他家人定（十二时之一，指夜深）卧，日西展脚睡。诸人五更走，日高未肯起。朝庭（朋友）数十人，平章（商量）共博戏（赌博）。菜粥喫一椀（锅，钵），街头阔立地（叉腿而站）。逢人若共语，荒说（乱说）天下事。唤女作家生（把女儿当作家奴所生），将儿作奴使。妻即赤体行，寻常饥欲死。一群病癰（麻风病）贼，却搦（把）父母耻。日月甚宽恩，不照五逆鬼（不孝之人）。

这首诗批判了懒汉二流子的可憎，从中不仅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了解当时平民百姓的语言风貌。

2. 禅宗语录

禅宗作为佛教宗派的名称,是唐代才出现的。它一方面与原始印度佛教保持着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对原始佛教进行了最彻底的变革,可以说,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的宗教观、禅宗的悟道方式集中反映在历代整理编辑的禅宗语录之中。所谓语录,是门徒对禅师口头说法的记录。禅师们大多出身贫苦,没有太高的文化(据说禅宗的创始人六祖慧能干脆就不识字),说法喜用口语,多采取一问一答,口耳传习的方式。因此他们的语录十分多,语录的口语化程度也很高。宋代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五记载了本觉法真一禅师如下一段话:

禅家语言不尚浮华,唯要朴实,直须似三家村里纳税汉及婴儿相似,始得相应。他又岂有许多般来此道?正要还淳返朴,不用聪明,不拘文字。今时人往往嗤笑禅家语言鄙野,所谓不笑不足以为道。

“鄙野”二字,道出了禅宗语言朴质无文的本色。请看德山宣鉴禅师是怎么呵佛骂祖的:

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祖无佛。达磨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①是被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②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五灯会元》卷七)

[注:①等觉、妙觉是佛的名字。②“四果”以下是修行达到的各种等级阶位。]再看慧海禅师是怎么回答如何修道这一问题的:

有源律师^①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②,所以不

同也。”律师杜口。(《景德传灯录》卷六)

[注:①律师:佛典分经、律、论三部分,专门研究佛律的称律师。②计校:思考、谋算。]

跟“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类似的话有“困则睡,健则起”、“夏天赤骨力(指打赤膊),冬寒须得被”、“热即取凉,寒即向火”(景岑和尚语)等,意思是顺其自然,持平常心。禅宗语录的语言跟它的教旨一样,崇尚朴实、自然、不饰雕琢的风格。

禅宗语录中有许多口语虚词,对研究汉语语法史很有价值。比如下面所举石巩和尚(师)跟西堂(智藏)关于“捉虚空”的一段对话中,就有许多反映当时口语的代词、语气词、副词等。

师问西堂:“你还^①解捉得虚空摩^②?”西堂云:“捉得。”师云:“作摩生^③捉?”西堂以手撮虚空势^④。师云:“与摩^⑤作摩生捉得虚空?”西堂却问师:“作摩生捉?”师便把西堂鼻孔拽着。西堂作忍痛声云:“太杀拽人鼻孔,直得脱去^⑥!”师曰:“直须^⑦与摩捉他虚空始得。”(《祖堂集》卷十四)

[注:①还:疑问副词,相当于“可”。②摩:疑问语气词,相当于“吗”。③作摩生:怎么。疑问代词。生,词尾。④此句意为“西堂作出用手抓虚空的样子”。⑤与摩:这么,这样。指示代词。⑥“太杀”二句意为:你把我的鼻子拽得太痛了,简直要拽掉下来。太杀,程度副词。⑦直须:就该,只应。]

正因为禅宗语录在语言风格上有上述特点,所以它在语言史研究上的价值跟它在宗教史上的价值几乎同等重要。

尽管禅宗语录的白话程度很高,读起来却并非容易,这一方面由于对当时的口语词不甚了了,另一方面是由于禅宗的思想、传意方式十分独特。下面作一简单介绍。

(1) 禅宗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宗旨,提倡直截了当认识自心的“顿悟”,反对问佛问祖,反对在佛经词句、概念上纠缠不休,因此当僧徒问及此类问题时,禅师一般都不正面回答,往往是问东答

西,所答非所问。例如: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昨夜栏中失却牛。”

(《五灯会元》卷四台禅师)

这是暗讽提问僧“骑牛觅牛”,失掉了自心、本心。有时禅师以反问的方式作为回答,例如:

(道信)来礼师,而问师曰:“如何是佛心?”师答:“汝今是什摩心?”对曰:“我今无心。”师曰:“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

(《祖堂集》卷二僧璨禅师)

这是禅宗先“打得念头死”,然后“救得法身活”的办法。有时禅师不用言语,只以动作示法,发展到极端,甚至动手动脚,用当头棒喝的方式施教。

(2) 大量使用违背常理的悖论。比如有个僧人问自满禅师:“如何是无诤之句?”(诤:争论,争吵)师曰:“喧天动地。”用“喧天动地”解释“无诤”显然不合常理,但这种不合逻辑的悖论正表达了禅宗无对立的思想。再如有僧人问道钦禅师:“如何是道?”师曰:“山上有鲤鱼,海底有蓬尘。”山上不可能有鲤鱼,海底也不会有蓬尘,禅师用显然荒谬的语句作答,是反讽僧人的问题十分荒谬,无法回答,也没有必要回答。禅家说“无心是道”,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用心即乖。

(3) 禅宗认为“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因此禅师常用含有机锋的话语来验证对方悟道的程度。例如,一日四祖道性禅师在路上遇到一个七岁的孩子,问他姓什么,

子答曰:“姓非常姓。”师曰:“是何姓?”子答:“是佛性。”师曰:“汝勿(无)姓也?”子答曰:“某姓空故。”(《祖堂集》卷二弘忍禅师)

孩子的答话用“性”换“姓”,利用谐音应对,深得玄机,他就是后来的五祖弘忍禅师。

(4) 禅宗讲究“以心传心”的传道方式,佛法不可思议,禅机不可道破,但是又要通过语言使对方开悟,于是禅录中运用了许多含蓄隐晦的讽喻和形象生动的类比。比如:

(神赞禅师的业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景德传灯录》卷九)

用于纪年的十二生肖中没有驴,“驴年”表示不可能有的年月。这里神赞禅师用钻故纸讽喻那些只知死读经而不能解悟的人。

在禅宗语录中讽喻和比拟俯拾皆是,如用“镜花水月”比喻世界的虚幻不实;用“解铃还须系铃人”讽喻自求本心,不须他求;用“寰中天子,塞外将军”讽喻应自我为主;用“压良为贱”讽喻舍弃自我,到处他求的信徒;用“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比喻应立足目前;用“蒲华柳絮,竹针麻线”比喻佛法大意平凡无奇;用“鹦鹉学舌”比喻人云亦云,并未真正悟解佛法真谛;用“漆桶底脱”比喻处于暗昧中的众生,一旦智光透入顿然大悟的快感……

禅宗语录中那些充满思辩异彩的回答,那些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口语,是一份宝贵的语言遗产,值得今人从中汲取营养。

现存最早的禅宗语录有敦煌本《六祖坛经》、《神会语录》以及成书于五代的《祖堂集》。

《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的禅宗史料总集,共 20 卷,由五代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编成,书前序文作于保大十年(952 年)。这部书在我国失传,本世纪初在朝鲜庆尚南道海印寺发现,是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 年)的刻板。1972 年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了影印本,1994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我国首次影印出版。

宋代的禅宗语录,以道原编辑的《景德传灯录》影响最大,此书共 30 卷,成书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 年),比《祖堂集》晚 50 年。所谓“传灯”,是用灯火相传比喻佛法的传承。宋代还有把《景德传

灯录》和另外四种灯录汇集在一起的《五灯会元》，今天看到的本子是淳祐年间普济把原来的 150 卷删为 20 卷的简本。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了《五灯会元》的点校本。宋代的语录还有雪窦（980～1052）的《碧岩录》和宗杲（1089～1163）的《大慧书》，也是很值得利用的白话资料。元明以后，禅宗语录大都沿袭唐宋僧人的套子，内容格式化，不再能反映当时语言的面貌，因而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3. 宋儒语录

儒学到了宋代发展成为“理学”。宋儒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认为“理”先天地而存在。其代表人物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宋儒受禅宗口耳传习方式的影响，讲学之风很盛，弟子们把他们的讲话记录下来，集成语录，就是我们所说的宋儒语录。

宋儒语录中文言成分比较多，这跟他们都是理学大师、讲话比较文有关。宋儒语录中口语程度较高的数程颐、程颢兄弟（世称“二程”）和朱熹，其中又以朱熹的语录更接近口语。

程颐（1032～1085）北宋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程颢（1033～1107），世称伊川先生。他们的语录收在《河南程氏遗书》（国学基本丛书本）中。

问你身上有几条骨头？血脉如何行动？腹中有多少藏府（脏腑）？皆冥然莫晓。今人于家里，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问著，已（己）不能知，却知为不智。于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第二下，二先生语）

这段话是程颢讲的，他批评学人对自身不了解却毫不介意，面对身外之事不了解则以为不智，这是十分糊涂的。其中“家活”（居家所用器物），“不到”（不致于，不见得）“大小大”（多么）等，都是口语词。再引一段：

“人语言紧急，莫是气不定否？”曰：“此亦当习，习到言语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了。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人只是一个习。今观儒臣自有一般气象，武臣自有一般气象，贵戚自有一般气象，不成生来如此？只是习也。”（第十八，伊川先生语）这段话强调人的气质是习练而成的，而不是天生的。“不成生来如此？”意思是：难道天生如此？“不成”是个口语疑问副词，宋时用在问句的前边，相当于“难道”；到了现代，“不成”的位置移到了句尾，与“难道”或“莫不是”相呼应，作“难道……不成”或“莫不是……不成”。

朱熹(1130~1200)江西婺源人。他的语录收在《朱子语类》里，此书共120卷，篇幅浩大。清代张伯行编《朱子语类辑略》（正谊堂全书本）比较好用。朱子的语录中以《训门人》《总训门人》部分更为口语化，下面就从这两部分各引一段。

某尝喜那钝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彻时，极好；却烦恼那敏底，他只是略绰（大致，粗略）看过，不曾深去思量。当下说也理会得，只是无滋味，工夫不耐久，如庄仲便是如此。某尝烦恼这样底，少间（不一会，以后）不济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钝底工夫方得。（《训门人》）

公们如此做工夫，大故（太）费日子。觉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无昌大发越（发挥突破）底意思。这物事须教看得精透后，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会，都不曾抓著那痒处，济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处，自然流出来不住。而今都干燥，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说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说，正是出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无家事炒，又无应接人客，正好提撕（聚精会神）思量道理。（《总训门人》）

朱子语录是研究南宋口语的宝贵资料，朱老夫子的为学之道

也很值得今人体味。

4. 诗、词、曲

除了僧人的白话诗外,唐诗中很少有整首用白话写的。倒是一些谐谑诗不避俗语方言。例如郑綮《题中书壁》诗:“侧坡蛆蛄蛄蛄(曲躬爬行的样子),蚊子竞来拖,一朝白雨(暴雨)中,无钝(笨)无喽啰(精明)。”诗中说蛆在坡上爬行,一群蚂蚁竞相拖拽,如果大雨倾盆而下,它们就一起完蛋。唐诗中使用了许多口语中的虚词,这对研究汉语虚词演变史很有价值。李白《江夏行》诗“作个音书能断绝?”其中“作个”即咋地,怎么;“能”后来写作“恁”,义为这么,那么。这句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个音讯?”杜甫《哭李尚书》诗:“秋色凋春草,王孙若个边?”“若个”即“哪个,哪”。唐诗的用韵是研究唐代语音的好材料,唐诗中还偶有几首诗直接谈到方言语音。比如唐末胡曾《戏妻族语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为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诗中反映胡曾妻子族人的口语中[-m]韵尾的“针、阴”已经混到[-n]韵尾,变得跟“真、因”同音了。据考,胡曾是湖南邵阳人,唐咸通(860~870)中曾在蜀地做官,他妻族的口音可能带有当时四川方音的特征。

词在盛唐出现,历经晚唐五代,到两宋时特别盛行。宋词句子长长短短,很接近自然话语。宋词吸收口语的情况很不相同,整首俚俗的较少,大都在雅俗之间,黄庭坚、辛弃疾的词口语成分较多。例如黄庭坚《卜算子》:“要见不得见,要近不得近。试问得君多少怜,管不解、多于恨。禁止不得泪,忍管不得闷。天上人间有底愁,向个里(这里),都谙尽。”再看辛弃疾的词《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词中用大白话描绘出一幅恬静的农村风俗画,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情趣。再如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也不避口语,她的《声声慢》词一开头就用“寻寻觅觅,冷冷

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连串的重叠词渲染了无限凄苦的愁情,“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都是如实道来的口语。

跟词相比,曲的口语化程度更高。这里说的曲,包括金代的诸宫调、宋元的戏文、元代的杂剧和散曲等。

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的民间文艺形式,因为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故事,所以称诸宫调。现存诸宫调主要有金代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两种。《刘知远诸宫调》原本十二卷,现仅存第一、二、三、十一、十二卷,有的还有缺页。它是沙皇俄国柯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探险队于1907~1908年间发掘西北黑水故城时出土的。这部作品语言古朴,包含着丰富的口语词汇和语法现象,历来受到汉语史学家们的重视。下面是刘知远要到太原投军,妻子李三娘跟他话别的片段:

若太原闻(文)了面,早早来取。我怀身三个月,你咱(代词词尾)思虑。李洪义、李洪信,如狼虎;棘针棍、倒上树(两个嫂子的外号)曾想他劣缺(坏、恶劣)名目,向这遛(这些人,即他们)眉尖眼角上存住。神不和,天生是卯酉子午。我这口无虚语,道一句只一句。生时节是你妻,便死也是贤妇。

《西厢记诸宫调》一般简称《董西厢》,以区别于元代王实甫《西厢记》。董解元的生平无可考,“解元”只是当时对读书人的泛称。《董西厢》保存完整(共六卷),篇幅宏大,通篇运用了生动活泼的口语,随处可引。例如卷二〔双调〕(文如锦)描写法聪和尚等迎战来寇的一段:

细端详,见法聪生得扠搜(凶狠)相。刁厮(刁蛮)精神,跷蹊(古怪)模样。牛脚(牛皮帮子鞋)阔、虎腰长,带三尺戒刀,提一条铁棒。一匹战马,似敲了牙的活象。……从者诸人二

百余,一个个器械不类寻常。生得眼脑瓠瓠(眼窝深凹),人材猛浪(鲁莽)。或拿着切菜刀、幹(擗)面杖,把法鼓擂得鸣、打得斋钟响。着绫幡做甲、把钵盂做头盔戴着顶上。几个髡头(蓬头)的行者着铁褐直裰(黑褐色僧衣)走离僧房,聘无量(聘勇武,聘能),道俺咱(即俺,我们)情愿苦战沙场。

戏文 戏文又称南戏,产生于宋室南渡之后,流行在以浙江温州为中心的东南一带。现存宋元戏文有传本的仅十五本,收在《古本戏曲丛刊》初编。一般认为出自《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张协状元》是较为可靠的南宋戏文剧本,另两种《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是元代的作品。南戏在用韵上反映南方方音,下以《张协状元》第二十六出为例:

(旦出唱)[黄莺儿]一去更无耗音,使双双孤令。未知甚日挂绿袍,使奴家称心?它恁地我英俊,定必占魁名。早得个人往江陵,问及第是甚人?

唱词中以“音、令、心、俊、名、陵、人”为韵脚,反映了南人[-n]与[-ŋ]不分的方音特点。

元杂剧 元杂剧是元代新兴的艺术形式,它的剧本主要由曲词和宾白组成。曲词语言浅近,包含有丰富的白话词汇,例如关汉卿《诈妮子调风月》第二折[朱履曲]:

莫不是郊外去逢着甚邪祟?又不风又不呆痴,面没罗、呆答孩、死堆灰。这烦恼在谁身上(因谁而起)?末不在我根底,打听得些闲是非?

其中“面没罗”“呆答孩”“死堆灰”都是俗语词,形容表情木然颓丧的样子。

曲词中还能反映出一些元代特殊的语法现象,例如同上[上小楼]曲:

我敢摔碎这盒子,玳瑁纳子(别针,关钮)交石头砸碎。这

手帕剪了做靴檐(靴子的面盖),染了做鞋面,撝(摺,叠置)了做铺持(把碎旧布加衬纸糊成厚片)。一万分好待你,好觑你,如今刀子根底,我敢割得来粉零麻碎!

末两句的意思是:如今我将用刀子把这手帕割得粉碎。“刀子根底”意思是“用刀子”,“根底”表示工具格,这是元代白话文献中特有的现象。另如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二折[滚绣球]曲末尾几句:

今日把俺子父情都撇在九霄云外,三口儿生吃插两处分开。做娘的剜心似痛杀杀刀攒腹,做爷的滴血似扑簌簌泪满腮,苦痛伤怀!

这是写周荣祖夫妻卖儿时内心痛楚的话语。其中“剜心似”“滴血似”意为“似剜心”“似滴血”,把动词“似”放在宾语之后,这也是元代白话文献始见的特殊语法现象。上举“根底”表工具及此处“似”字后置,应该都是蒙古语语法对汉语的影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元杂剧对研究元代语言的重要性。现存元杂剧的资料十分丰富,但作为语言研究资料其价值却各有分别。《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元杂剧中惟一一种同时代刊本,因而最为可靠。明人编辑的元杂剧辑本很多,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臧懋循编的《元曲选》影响最大,但臧氏编选时删改之处颇多,使用时须注意鉴别。

元人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主要形式)的语言也很通俗,限于篇幅不作介绍。今人隋树森辑有《全元散曲》,搜罗最全,可资利用。

5. 史书、史料

我国古代的正史都用文言写成,但魏晋南北朝的正史、《旧唐书》、《旧五代史》等书中有一些零星的白话,主要见于对话中。如《北齐书》卷九《文宣李后列传》:

武成践祚,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

之。后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阁，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对后前筑杀绍德。

太原王绍德是李后的儿子，李后原为太原公夫人。“生女不举”指把女婴溺死。从对话文中我们知道鲜卑人称母为姊姊。另，《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载：“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联系到敦煌本《董永变文》中称父母为“哥哥孃孃”，可以知道当时北方亲属称谓中有不区分父兄辈与母姊辈的情况，这是否跟当时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结婚不避忌不同辈分的人的习俗有关？可以研究。

正史之外，有些史籍如实录、别史之类，有时保留着一些诉状和谈话记录，是很好的白话资料。北宋沈括（1031～1095）《乙卯入国奏请》记录他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国与契丹谈判领土问题的详细经过，收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百六十五卷。沈括以文书为据，指斥契丹侵占南朝（即宋朝）领土，辽方代表梁颖说：“只是紧执定这个文字。”（抓着契书不放）

臣括云：“这个文字不执，更执甚文字！”颖云：“这个只是州县一时错误行遣，当时官吏若在，必不轻恕。”臣括答云：“但没便宜的文字，便总道‘错误’，即休，怎生使得！”

沈括说：“只要对你们不利的契约，就说是错误的，就要反悔，这怎么行！”梁颖说：契丹人在那里“住坐放马，半年有余”怎么无人发遣？”沈括据理反驳：

“譬如民家，去别人地内居住一世、两世，若执出契书，亦须夺却，住坐半年，岂足为凭！……当时纵不发遣，自是北人不合侵越。后来又拆却铺（边界兵寨），立却十八个烽堆，七个铺子，岂是不经发遣！”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是编年体史书，共二百五十卷，记录

了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跟金人和战的史实,材料十分丰富。其中《燕云奉使录》、《茅斋自叙》、《靖康城下奉使录》、《山西军前和议录》、《绍兴甲寅通知录》、《采石战胜录》、《秀水闲居录》等篇有比较完整的白话资料,口语程度在《乙卯入国奏请》之上。限于篇幅,只引卷四赵良嗣《燕云奉使录》中的一个片断。(括号内为笔者所注)

阿骨打(金太祖)与良嗣把手酬酢曰:“契丹煞大国土,被我杀散,我如今煞是大皇帝。昨来契丹要通和,只为不著‘兄’字,以至领兵讨伐。自家、南朝(指宋)是天地齐生底国王、皇帝,有道有德,将来只恁地好相待通好,更不争要做兄弟。这个事是天教做,不恁地後(假设语气词),怎生隔着个恁大海便往来得?我从生来不会说脱空(虚话),今日既将燕京许与南朝,便如我自取得亦与南朝。”

这段话把金人狂妄自大、得意洋洋的神情传摹得惟妙惟肖。

《元朝秘史》记述了帖木真(元太祖成吉思汗)和斡歌歹(元太宗窝阔台)早年的事迹,有的内容近乎神话。原书为蒙文,明初洪武年间被译成汉文。下面引一段帖木真躲在锁儿罕失刺家里被迫捕的惊险情节。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说:“帖木真莫是人藏了他?将俺自火里(自己一伙)搜一搜!”于是搜到锁儿罕失刺家,家里、车里、床下都搜遍了。落後上(后来)到载羊毛的车上,将车门内的羊毛掀出。掀到车後时,锁儿罕失刺说:“似这般热天气,羊毛里若有人,如何当得(怎么受得了)?”搜的人所以下车去了。搜的人去了後,锁儿罕失刺对帖木真说:“你险些将我断送得烟消火灭!如今你母亲兄弟行寻去。”

“如今”句意思是:现在你找你母亲兄弟去。“行”对译蒙古语表示对象的后置词。

《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汇集了元代的法制、案

牋、诏令等文件,其中《刑部》收载了一些案例诉状等,白话成分最多,下引“诸恶门·不义目”中“烧烙前妻儿女”状片断。状中开始交待案由,郝六嫂的女佣对郝千驴的后妻端哥说:

“你昨日城里来的晚了,你两个孩儿偷出小豆,客人处换梨儿吃。”道罢,端哥存心,随即还家发怒,将女子丑哥元穿衣服脱去,於灶窝内用破盆片取出元烧下柴火,又於屋内取到大团头铁鞋锥一个,用火烧红,将女子丑哥扑倒,用左脚踏住脖项,用左手将丑哥舌头扯出,用鞋锥烙讫三下。次後於两小腿上及腰膀连背脊,直至臀片前後,通烙讫七十二下。有女子丑哥疼痛难忍,以此言说:“我是换了五个梨儿吃来。”才行放起。文中作主语的第二人称代词用“你”,作定语的用“您”,“您”本是“你们”的合音。另外表示完成体的助词不用“了”而用“讫”(烙讫三下,通烙讫七十二下)是很独特的。这类讼状,要求与事实相符,又多是事主口头陈述的记录,所以采用白话。

明代的诏令敕书如《皇明诏令》也有一些白话资料。此外,明人编辑的《纪录汇编》里也有几种是白话资料,如卷十九哈铭(蒙古人,后赐名杨铭)《正统临戎录》记录了明英宗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前后的经过。当时英宗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哈铭随侍左右当翻译。这段记录纯用口语,其中有一些可看作是蒙古语词汇和语法的特征。比如句末用语助词“有”(“达子要伤害我有”),名词短语后加“上”表示原因(“今上天可怜见那颜上”),名词后加“上”表示动作的对象(“我有个比喻皇帝上说”)等,对于了解明代口语和蒙语对汉语的影响是很有用的材料。

6. 直讲和直译

元代蒙古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方面的统治,开始崇尚儒教,提倡程朱理学。他们让大臣用口语讲解儒家经典,或者把一些汉文典籍译成白话,以便学习推广,这就是直讲和直译。这些直讲

一般都是先引一段文言文,然后再用口语加以串释和阐发。先看吴澄(1249~1337)《经筵讲义·帝范君德》中的一段:

“夫民乃国之本,国乃君之体。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圆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望……”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任凭)那里都照见有。做着皇帝,天下百姓看着,都随顺着。行的好勾当呵,天下百姓心里很快乐;行的勾当不停当呵,天下百姓失望……

吴澄的讲解不局限于字面,而是融会了全篇旨意,阐发得很透彻。直讲保存在某些儒臣的文集里,如许衡(1209~1281)《鲁斋遗书》中收了他为皇帝讲解经书的《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吴澄的《经筵讲义》收在《吴文正集》中。

直译的作品有元代散曲家贯云石(1286~1324)的《孝经直解》,原题《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全一卷,元刊本。下面举两段以窥其一斑:

(1)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孔子说:“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教人的勾当先从这孝道里生出来。”

(2) 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你再坐地,我说与你。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阿的是孝道的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坐地:坐着。么道:这么说。相当于句末的“云云”。

阿的:这,这个。)

通过对照可以看出,古代的文言跟元代的白话差别何等之大!无论直讲还是直译,都真实地反映出元代口语的面貌,是研究这个时

期语言不可不利用的宝贵资料。

7. 话本和长篇小说

话本的“话”，意思是故事。讲说故事的民间伎艺叫做“说话”，话本就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说话”这种民间伎艺早在唐代已经出现，元稹《寄白乐天代书一百韵》诗里说：“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可见当时已很流行。敦煌文书中属于话本的有《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诗”应为“话”之误，因全文无一句诗）、《唐太宗入冥记》等，这些是宋元话本的先驱。到了宋元时候，“说话”伎艺更加盛行，在艺术上也更趋成熟。“说话”的听众是普通老百姓，这就要求它的语言通俗易懂。话本的内容主要分小说和讲史两家，其中小说家类的话本的语言比讲史类的更加口语化，几乎达到通篇白话的程度。小说类的话本集主要有明人洪楹编的《清平山堂话本》，全本应有六十篇，现仅存二十九篇，除了两篇是文言，其余都是白话，而且多数是宋元作品，如《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杨温拦路虎》等。《简帖和尚》中复数词尾用“恁”，“殿直道：‘你恁不敢领他，这件事干人命。’”我们知道“恁”是宋金白话文献中复数词尾用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收《茅斋自叙》有“自家恁这里斗口做甚”句，“自家恁”即“咱们”；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有“畜生恁悄地”之句，也用“恁”表示复数，因此可以用这个关键词判断《简帖和尚》应是南宋的作品。

另有一话本集叫《京本通俗小说》，近人缪荃孙说是他据元人抄本影刻的。这是一个残本，只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等七篇。国内外不少学者举出证据说此书出于缪氏伪托，是他从明人冯梦龙编辑的话本集《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抽出来刻的。这个意见比较可信，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宋元白话资料利用。

明代冯梦龙辑集的“三言”，即《古今小说》（又称《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共收宋元明话本和明代拟话本一百二十篇，其中有些篇目的原写作时代不易确定，即使能断定为宋元旧篇的，也因在编辑和刊刻中难免有明人改动之处，使用时不得不十分谨慎。拿《简帖和尚》为例，它被冯氏收在《古今小说》中，题目改为《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你慫不敢领他”一句中的“慫”已被改为“们”，“们”是明代中后期复数词尾通行的写法。拿“三言”当小说读，无须顾忌什么，但如果拿它做语言研究的资料，就不得不下一番鉴别的功夫了。

明代文人的拟话本还有凌濛初的“二刻”即《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后来又有明梦觉道人等编的《三刻拍案惊奇》，是南方人模仿北方话写的，但语言上难以摆脱南方话的特点。讲史类话本主要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等，其中前两种一般被看作南宋的作品，后一种是元人所作。这类作品叙述部分半文半白，但对话部分却是地道的口语。例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平话》郭威买剑一段中有“您也不是个买剑人，咱这剑也不卖归您”句，其中“卖归”的“归”是给予动词，相当于今天的“给”。《周史平话》中还有一例：“你且在此闲耍几时，却讨个生活归您做。”另外，《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也有一例：“有能增损一字者，归千金。”这些“归”字应是当时人们口语音的记录，在其他文献里又写作“馈”（《老乞大》《朴通事》，详见下），在清代用山东方言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里又写作“己”。要搞清北京话“给”（gěi）音的来源，以上文献都不可忽略。

长篇白话小说 元末明初，开始产生了一些章回体的长篇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水浒传》等；明代产生了《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重要作品；清代产生了不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这些作品大家比较熟悉，特别是《红楼梦》跟现代汉语白话相一致，又限于本书的篇幅，这里就不详谈了。我们要提醒读

者的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跟作为语言资料来利用不是一码事儿,后者特别要注意作品语言的方言背景和时代层次。下面以《水浒传》和《西游记》为例稍加说明。

先看《水浒传》。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到了宋末元初更成为艺人讲唱的题材,经过众多艺人的加工整理,其故事情节已具雏形,最后由施耐庵(元末明初人)通过再创造,使它成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可以想见它的语言应包含有南宋、元及明初各代的成分,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利用时要注意跟宋、元、明初的其他白话资料作横向比较,以正确地判别各种语言现象的时代层次。《水浒》现存版本很多,都是明刊本。有百回本系统(如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等)和百二十回本系统(如余象斗本、杨定见本等)。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有王利器先生的校勘,这个本子使用方便,也比较可靠。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也很漫长,早在南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已经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其情节也显现出后来《西游记》中某些章回的雏形。据专家考证,取经故事到元代已经定型,至迟在元末明初就已经有了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最终把取经故事创作为百回本白话小说的是吴承恩(1510?~1582?)。吴承恩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淮安),书中反映出不少江淮方言词汇和语法现象。例如“行者漫门缝儿钻将进去”(二十一回)“瞒墙跳过便罢”(三十八回)，“漫、瞒”为介词,引介出动作经由的处所。另如第四回有“忙哈哈”一词,“哈哈”是形容词词尾,也很具方言特色。

最后说一下《金瓶梅》。此书一百回,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为山东峄县,作者应是山东人,这从书中有大量山东方言俚语也可印证。《金瓶梅》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金瓶梅词话》系统,现存

万历刊本；一是《原本金瓶梅》系统，现存崇祯刊本。前者更适合作语言研究的资料。《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长篇小说，又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纯用家常口语，是研究明代北方话的资料宝库。

8. 会话书

所谓会话书是指教外国人学习汉语口语的教科书。比如成书于元末的《老乞大》、《朴通事》就是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课本。“乞大”是“契丹”的音译，指中国，“老乞大”犹言“中国通”。《朴通事》意思是姓朴的通事（翻译官）。到了明代，汉语口语有了很大变化，朝鲜李朝成宗有感于此，让人对这两部书加以修改。16世纪初，朝鲜著名学者崔世珍又奉敕用谚文（朝鲜15世纪创制的拼音文字）对这两部书进行注音和解释，称之为“谚解”。现在通行的《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刊行于1670年、1677年，反映的虽是明初的口语，但其中仍然保存着一些元代语言的面貌。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少汉儿言语省的。”“你谁根底学文书来。”“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老乞大谚解》上2a）

“我汉儿人上学文书”意思是“我跟着汉人学文书”，“上”跟在名词后边，表示动作的对象；“你谁根底学文书来”的“根底”也是同样的用法。这些相当于蒙古语里的后置词的用法，是元代汉语受蒙古语语法影响的反映。到了《老乞大新释》（18世纪中叶刊本）里，这段话被修改得更合汉语语法：

“你却是朝鲜人，怎么能说我们的官话呢？”“我在中国人根前学书来着，所以些须知道官话。”“你跟着谁学书来着？”“我在中国人学堂里学书来着。”（1a）

从词汇上看，把“高丽人”、“汉儿人”、“汉儿言语”分别改为“朝鲜人”、“中国人”、“官话”；从语法上看，把“汉儿人上”、“谁根底”这样

的句式分别改为“在中国人跟前”、“跟着谁”，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后置词改为前置的介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汉语与阿尔泰语相互影响的痕迹，看出元代及明初的口语的特点，这对深入了解汉语发展的历程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现在所能看到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有朝鲜奎章阁丛书本。《朴通事谚解》书后附有崔世珍所撰《老乞大集览》（上、下）及《单字解》，对于研读二书，了解当时的口语词汇和语法很有帮助。

古代白话资料十分丰富，上面只介绍了主要的几大类。此外在历代文人所写的笔记文中，在一些文集和历代编写的地方志中，都保存了不少的古代白话语料，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和利用。

三 学一点古代白话常识

古代白话是那么源远流长，那么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它是现代汉语语体文的源头，我们要通过对古代白话的了解去认识汉语的过去，从而更好地把握汉语的今天和明天。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古代白话是以古代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现代语体文是在继承和吸收古代白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要更好地使用现代汉语、了解和研究现代汉语，就应该具备一些古代白话的常识。现代汉语中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往往需要往上溯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表示概数的助词“来”（三十来岁，五十来斤，十来里地），有人说它表示比那个数目略少，有人说表示略多，当然还有人可以说兼表略多或略少。究竟哪一种意见更正确呢？只要对概数词“来”在古代白话中的使用情况作一番调查就清楚了。概数词

“来”源自“以来”(字又作“已来”),“以来”最初只表示从过去某时刻到说话时的一段范围(如“秦汉以来”),但是从唐代开始,它又扩大到表示许多事物的范围,如地域处所、事物、人等,其中也包括数量的范围。它最初的意义只表示一个数量的范围,即不超过某数(等于或略少),而不表示略多,这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知道:

中使蜀州一百余里已来,忽见净能缓步徐行。(敦煌本《叶净能诗》)

在“一百余里”后边又用“已来”,足见“已来”只表示约数。

凡千叶牡丹,须于八月社前打剥一番,每株上只留花头四枝已来,余者皆可截。(《说郛·洛阳花木记》)

“四枝已来”是用“已来”限定一个数额,即不得超过四枝,超过者“皆可截”。可见“已来”也不表略多。

总之,从“以来”“来”限定某一范围来说,它更倾向于表示略少;而从它表示约数来说,可以表示比限定的数量范围略多或略少一点。《现代汉语八百词》是这样概括概数词“来”的意义的:

表示大概的数目。一般指不到那个数目,有时也指比那个数稍大或稍小。

这个表述非常精当,不仅完全符合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而且也反映了跟古代白话的相承关系。

某一时代的白话,是那个时代口语的反映。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那些白话一听就懂,无须解释(除了地域方言的障碍)。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词汇的变动更大。新词新义不断产生,一些旧词旧义逐渐消亡,唐人懂得的白话词语,宋元人未必全懂,更不用说今人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喜欢用口语,有的简直朴白如话,所以素有妇孺皆知的美誉。他跟元稹(字微之)是好友,二人唱和甚多。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由来才命相磨折,天遣无儿欲怨谁! (《酬微之》)

概叹命不好，没有儿子。另有一首诗写道：

常忧到老都无子，何况新生又是儿。（《予与微之老而无子》）

从诗题我们知道白居易和元稹都“老而无子”，可是诗句里却说“新生又是儿”，这岂不是矛盾吗？问题就在这“儿”字上。“儿”通常指儿子，古今皆然，白诗“天遣无儿”的“儿”正作此解；但是在唐代的口语里，“儿”又是女性自称之词，青年妇女多用来代称自己，相当于“我”。比如：

十娘答曰：“儿是清河公之末孙，适弘农杨府君之长子……”（唐张文成《游仙窟》；十娘回答说：我是清河公末代子孙，嫁给弘农杨府君的长子为妻……）

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元稹《莺莺传》；莺莺给张生的信中写道：送上一枚玉环，这是我幼年的玩物）

应是潇湘红粉继，不念当初罗帐恩，抛儿虚度春。（敦煌本《破阵子》词；想必是你有了红粉新欢，因而不念当初同枕共寝的恩情，把我抛弃，让我虚度青春）

上面各例中的“儿”都是女子自称之词。白诗“何况新生又是儿”的“儿”是指女孩，因为女子自称用“儿”，所以白居易就用“儿”代指女子。这种借代义当时人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现代人如果不知道唐时“儿”的这一特殊用法，就会百思不得其解。唐郑棨《开天传信记》里记录了一则讼事，说是有位妇女为争一只猫而递状子打官司：

状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法官一看就笑了，可现在的人却莫名其妙，原因就在于不知道“儿”的特殊词义。“儿”一指雄性动物，如儿马、儿羊；一为妇人自称。那讼状的意思是：“如果是公猫，就是我的猫；如果不是公猫，就不是我的猫。”原来如此也！这个例子很可以说明，如果没有一些古

代白话词汇的知识,有些文献就读不懂,无法得其妙旨。

再举两个跟语法有关的例子。

五代南唐僧人编辑的禅宗语录《祖堂集》卷五云岩和尚条下有一句问话:

那人还吃不?

其中的“还”,今人很容易理解为表示动作继续进行的副词。其实这里的“还”是个表示疑问语气的副词,没有动作继续进行的意义,相当于现代汉语“那人可吃?”的“可”。这从同时期的其他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问言诸将:“还识此阵?”(敦煌本《韩擒虎话本》;问诸将:“可知道这是什么阵法?”)

诸佛还有师也无?(《祖堂集》卷十三“报慈和尚”;“诸佛有老师吗?”“还……也无”相当于“可……吗?”)

另外,“还”用于特指问句,含有追究的意味,相当于“究竟”,如敦煌本《庐山远公话》中的二例:

远公还在何处?(远公究竟在哪里)

(夫人)启相公曰:“只如相公数年,于福光寺内听道安上人讲《涅槃经》,还听得何法?”(相公……究竟听到什么法)

以上各例,如果没有近代汉语的知识,就会以今度古,把“还”理解为“仍、尚、再”等。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是爱国主义名篇,抒发了满腔忠义奋发之气,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其下阕开头几句为: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其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的“缺”字不好解释。有的注本避而不注,有的注作“缺口”,但“踏破贺兰山的缺口”,诗味索然。要正确解读此句,还得从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入手。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动补结构句。汉魏六朝以来,口语中有一种“动词+宾语+补语”的句式(以下称甲式),可以用“VOC”来表示(V:动词,O:宾语,C:补语);这种句式的语法意义是:动作使宾语产生某种结果。例如:

吹欢罗裳开(乐府诗《子夜四时歌》;把情人的罗衣吹开)

当打汝口破(刘义庆《幽明录》;将把你的嘴打破)

若为留客住(白居易《寒亭留客》诗;如何把客人留住)

遂即打其齿落(敦煌本《伍子胥变文》;当即把他的牙齿打落)

在这种句式中,充当动词宾语的名词在意义上又是后面的补语动词、形容词的主体,像个兼语。即:吹罗裳~罗裳开;打汝口~汝口破;留客~客住;打其齿~其齿落。

另有一种动补句式“V得OC”(乙式)产生于唐代,盛用于宋元。例如:

十三学得琵琶成(白居易《琵琶行》诗)

后妻设得计成(敦煌本《舜子变》)

读得《诗经》熟(《朱子语类》)

乙式跟甲式在结构上的区别在于一个动词后有补语助词“得”,一个没有;在语法意义上,乙式中做宾语的名词不是后面补语动词或形容词的主语,即不是琵琶成,计成,《诗经》熟,而是学成(琵琶),设成(计),读熟(《诗经》)。

第三种动补句式“VC₁OC₂”(丙式)产生于晚唐五代,它跟乙式的区别在于不用“得”而用形容词“破、尽”等:

打破烦恼碎(敦煌本《坛经》;把烦恼打碎)

斫破项羽营乱(敦煌本《汉将王陵变》;把项羽军营袭击得大乱)

弹尽《相思》破(敦煌本《喜秋天》词;把《相思》曲弹尽)

在丙式中 C_1 与 C_2 是同义或近义词,由于表示结果如何的意义主要由句末的 C_2 承担,就使 C_1 的意义虚化,主要起语法作用,相当于补语助词“得”。岳飞《满江红》词“踏破贺兰山缺”的句式就是丙式“ VC_1OC_2 ”,其句义是:踏得贺兰山破缺,也就是把贺兰山(代指金国的脏腑之地)踏得粉碎。“缺”应释为破缺。可见,如果没有古代白话的语法知识,这句话是很难准确地加以解释的。

掌握古代白话知识对于校点整理文献典籍也很有帮助。比如《敦煌变文集》卷二《秋胡变文》:“今蒙娘教,听从游学,未季娘子赐许已不?”(155页)原书把“季”校改为“知”,大概以为“季”与“知”音近而误。其实这里的“季”是“委”字之误,“委”有知义,唐宋文献中常见,又与“知”连用作“知委”“委知”等。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下:“夫以宋祖无学,愚所知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有个本子把“知委”的“委”改为“悉”,也是因为不知道“委”字本有“知”义而错改的。再看由于不明白话词汇而把标点点错的例子。

今日不著,便被这汉当面涂糊。(《五灯会元》卷十九,提刑部祥正居士 1250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今生不着,便共文遽个汉行脚,到处被他带累。(同上,卷七雪峰义存禅士 379 页)

这两例中的“便”字都应该属上句。“不著便”为一俗语词,义为不走运,倒霉。

我商(适)来於门外设誓,与他将军为奴。来更久住不得,汝在后切须努力。(《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173 页)

例文中的“来”字是个助词,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相当于普通话的“来着”,因此应属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刚才在门外发誓给那位将军当奴仆来着。因而不能在这里久留,你今后务须好自为之。

看来,了解一些古代白话的常识很有必要,它能帮助我们提高

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有助于提高点校文献典籍的质量；对于汉语研究者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要了解汉语中古以后各个阶段的真实面貌，只能依赖于各种白话文献。而且，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要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更好地用现代语体文写作，都应该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口语中去汲取营养，当然也包括从丰富的古代白话文献中，向古人学习那些至今仍极富表现力、极有生命力的语言，从而使自己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

（原载语文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百种语文小丛书》）

作者论著目录

(一)论文

“望空便额”别解.中国语文.1983,(2)

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校注(之一).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8)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字词天地.1983,(1)

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中国语文.1984,(2)

《敦煌变文集》校记补议.敦煌学辑刊.1984,(1),总5

元杂剧语词拾穗.字词天地.1984,(3)

“影响”释义.中国语文.1985,(2)

敦煌俗文学熟语初探.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3)

敦煌变文词语琐记.语言研究.1985,(1)

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语文研究.1986,(2)

古今称谓词语杂谈.中国语文天地.1986,(2)

说“乐、爱、喜”.香港:普通话.1986,(4)

“著”字例证献疑.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4)

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中国语文.1987,(4)

反切趣话.普通话.1987,(4)

《皇明诏令》里的白话敕令.语文研究.1988,(3)

- “举似”补说. 古汉语研究(创刊号). 1988, (1)
- 《生经·舅甥经》语词集释. 语言研究. 1989, (1), 总 16
- 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 中国语文. 1989, (4)
- 语词探源笔记选录. 语文研究. 1989, (4)
- 话说“少废话”. 普通话. 1989, (1)
- 说“兀自”. 辞书研究. 1990, (1)
- “面首”不是男妾. 普通话. 1990, (1)
- 疑问副词“可”探源. 古汉语研究. 1990, (3)
- 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与吕叔湘先生合写). 中国语文. 1990, (4)
- 古代与朋友义有关的特殊词语. 文史知识. 1990, (8)
- 禁止词“别”小考. 语文研究. 1991, (1)
- 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 中国语文. 1992, (6)
- 1991 年近代汉语研究回顾. 语文建设. 1992, (5)
- 相关词语的类同引申(英文). 法国: 语汇丛刊. 1993, (6)
- 相关词语的类同引申(中文). 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 中华书局. 1999, (8)
- 试述吕叔湘先生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贡献. 中国语文. 1994, (1)
- 启发式与中学文言文教学. 河北师院学报. 1994, (2)
- 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方法. 日本: 中国语研究. 1994, (36)
- 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 语言学论丛(上文修改稿). 商务印书馆. 1998, (29)
- “动词 + X + 地点词”句型中介词“的”的来源. 古汉语研究. 1994, (4)
- 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上). 语文研究. 1994, (4)
- 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下). 语文研究. 1995, (1)
- 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与曹广顺、吴福祥合写). 中国语

- 言学现状与展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8)
- 说“措大”. 语言研究. 1995, (1)
- 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 中国语言学报. 1995, (5)
- 说“麽”与“们”同源. 中国语文. 1995, (3); 美国: 中国语言学报. 1997
- 《燕子赋》(乙)校释拾零.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禅问答的传意. 语言与传意. 香港和平图书·海峰出版社, 1996
- 当前广播电视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语文. 1997, (1)
- 游仙窟漫笔. 日本: 开篇. 1997, (14)
- 后置词“行”考辨. 语文研究. 1998, (1)
- 吕叔湘学术思想研究(与方梅合写). 人民日报. 1998, (7)
- 求实创新, 开拓汉语史研究的新局面. 语言文字应用. 1998, (1)
- “瞒天过海”新解. 香港: 中国语文研究. 1998, (6)
-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 汉语历史句法及构词法论文集——庆祝梅祖麟教授 65 岁华诞. 巴黎: 东方语言学报. 1999
-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 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 65 岁华诞.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1999
- 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 中国语文. 1999, (3)
- 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中国语文. 1999, (5)
- 北京话单音词书证. 立说传薪风雨人——庆祝詹伯慧教授从教 45 周年.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吕叔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9)
- 重读刘知远诸宫调. 文史. 1999, (3). 总 48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4)

甲骨文的发现与汉语言文字研究. 殷都社科. 1999, (4)

老乞大语序研究. (与李泰洙合写). 语言研究. 2000, (3)

开拓新世纪的敦煌学. 光明日报. 2000-7-25

(二)专著、工具书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 语文出版社, 1988

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 江蓝生补). 学林出版社, 1985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刘坚、白维国、曹广顺等合著). 语文出版社, 1992

繁简体字用法词典(与陆尊梧合著).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5

唐五代语言词典(与曹广顺合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近代汉语探源. 商务印书馆. 2000, (2)

古代白话说略. 语文出版社, 2000, (7)

(三)译著

汉语史通考(太田辰夫著;与白维国合译). 重庆出版社, 1991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志村良治著;与白维国合译). 中华书局. 1995

白话语汇研究(香坂顺一著;与白维国合译). 中华书局. 1997

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伊藤道治著). 中华书局. 2002 即出

跋

1962年夏,我很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文系从一年级就分文学、语言、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因此刚进校门不久就面临选择专业的大事。我和绝大多数考入中文系的青年人一样,满脑子做的是文学梦,很少有人报语言专业,系里就派朱德熙先生给新生做动员。朱先生知识渊博,口才极好,他把语言学介绍得那么有用,那么有趣,我至今记得他说,学了语言学,你就能知道孔夫子是怎么讲话的。我被朱先生打动了,在考虑了自己的客观条件后,就报了语言专业。是朱先生最初把我引进了语言学的大门。那时候王力先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已经基本不授课了,给我们上专业课的都是一班风华正茂的中青年老师,如唐作藩、郭锡良、石安石、裘锡圭、陆俭明、王福堂、王理嘉、符淮青等,现在他们早已是国内外的语言学家了。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很多,当上到四年级时,又开始了十年动乱,因此学业上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和同学们常有入宝山而空归的遗憾。

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我又很幸运地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师从吕叔湘、刘坚两位老师学习近代汉语专业。两位老师对我和师兄李崇兴进行了悉心的指导,使我们从一个门外汉走上了专业研究的道路。尤其是吕叔湘先生,在为学和做人两方面都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曾在《永远的怀念》(《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一文中谈到过。1987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做访问学

者一年,参加了当时任教于京都产业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主持的研读会。太田先生在学业上给了我许多教诲,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逊的长者之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另外,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先生有关语法史、方言本字考方面的论文,在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对我有许多启发和帮助。回想自己的学习道路,不禁深深感念各位教导过我的老师们。而今,吕先生和太田先生皆已云归道山,但他们的道德文章连同那慈祥的目光一直激励着我。每当想到自己由于天分有限、努力不够而远远没有达到老师们的期望时,就抱愧不已。这次能入选《自选集》,我很感谢编委会前辈老师们的鼓励。

在接到入选通知之前,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了我的论文集《近代汉语探源》,那里面已经收入了我的主要论文。我曾向编委会组织者提出不作为本次《自选集》的人选,但未能获许。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我从那本论文集中挑选了占本书少一半篇幅的文章,另一多半则是这次新选的。《〈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写作前曾跟太田先生讨论过,因此1989年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时我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但太田先生以为不妥,他事后在日本《中国语研究》杂志上以我一个人的名字重新发表,并写来一封说明的信,让我感慨殊深,再次领略了大家风范。《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一文是跟吕叔湘先生合写的,《〈老乞大〉语序研究》一文是跟李泰洙先生合写(由我执笔)的,他是最先向我国介绍1998年在韩国大邱发现的古本《老乞大》的韩国学者。我希望同行学者们能给这本小书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我有机会修正疏漏和错误。

十几年来,我担任一些科研管理工作,尘务萦心,学业荒疏,很多师友赠送的大作只浏览了一下就放在了书架上,总想以后再一一仔细拜读,但是总是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一直在期盼着,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归自我,以一个读书人的平静心情,读一些自己想读

的书,写一些自己想写的文,我希望,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我的籍贯是湖北沔阳县,但那是我父亲的老家;我出生在安徽含山县,六岁以前都生活在那里,如果以出生地论,我应该是安徽人。这次安徽教育出版社以扶持学术的热心与卓见出版语言学学者《自选集》,我又能忝列其中,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我与家乡的一点缘分吧,在此谨向安徽教育出版社表示一个学人与游子的谢意。

我国语言学事业近 20 多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新人新成果层出不穷,可以预见,在 21 世纪中国语言学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与进步,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学者,我们希望类似的《自选集》能不断地出下去,形成系列,形成规模,成为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一种良好传统。权以这本小书抛砖引玉,是为跋。

江蓝生

2000 年 3 月于北京听雨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江蓝生卷

作者 =

页数 = 2 8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说“么”与“们”同源
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
处所词的领格标记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
时间词“时”和“后”的语法化
《老乞大》语序研究
后置词“行”考辨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
《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
《燕子赋》（乙）校释拾零
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
重读《刘知远诸宫调》
北京话单音词书证
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古代白话说略
作者论著目录
跋